

幹部必讀

列寧斯大林
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

(卷下)

解放社編



東北新華書店印行

• 讀 必 部 幹 •

列寧斯大林 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

(卷 下)

解 放 社 編

東 北 新 華 書 店 印 行

• 請 必 部 幹 •

論 林 大 斯 寧 列
設 建 濟 經 義 主 會 社

(卷 下)

編 者 解 放 社

印 行 者 東 北 新 華 書 店

• 一 九 四 九 年 九 月 出 版 •

1 3,000(1)

目次

四、爲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化而鬭爭

蘇聯無產階級與農民問題（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斯大林 四四—四六

反對派在政治上與組織上的錯誤（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一日至三日）……………斯大林 四七—四九

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一日至三日）……………斯大林 四三—四六

蘇聯對外貿易壟斷制問題（一九二七年四月七日）……………斯大林 四一—四二

論社會主義工業的推動力（一九二七年四月七日）……………斯大林 四三—四六

與外國工人代表團的談話（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五日）……………斯大林 四七—四七

社會主義建設的成績與蘇聯的內部情形（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斯大林 四七—五〇

（一） 整個國民經濟

（二） 我們社會主義的大工業發展的速度

（三） 我們農村經濟發展速度

（四） 階級、國家機關、國家的文化發展

在糧食戰綫上（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八日與紅色教授學校、共產主義學院以及斯維爾德洛夫

大學學生的談話摘錄）……………斯大林 五一—五二

列寧與聯合中農問題（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二日答C同志）……………斯大林 五三—五三

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底問題（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三日）……………斯大林 五五—五八

(一) 收買五穀底政策問題

(二) 造就工業建設的專門人材

(三) 結論

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危險（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九日在莫斯科委員會和莫斯科監察委員會全體聯席會議上的演說詞）……………斯大林 五五—五八

論國家工業化及聯共（布）黨內的右傾（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在聯共中央全體會議上的演說）……………斯大林 五七—五八

(一) 工業化發展的速度問題

(二) 五穀問題

(三) 論反對傾向及調和派的鬭爭

(一) 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一九二九年四月在聯共（布）中央全會上的演說縮錄）……………斯大林 五七—五九

(二) 在共產國際各問題方面的意見分歧

(一) 理論家的布哈林

(二) 大轉變的一年（爲十月革命十二週年紀念而作）……………斯大林 五九—六一

(一) 在勞動生產率方面

(二) 在工業建設方面

(三) 在農業建設方面

(四) 結束語

五、爲農業集體化而鬭爭

五、爲農業集體化而鬭爭

論蘇聯土地政策底幾個問題（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馬克思主義土地問題專家

代表會議上的演說）……………斯大林 六〇九—六三〇

(一) 『平衡』論

(二) 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自流』論

(三) 小農經濟『鞏固』論

(四) 城市與鄉村

(五) 論集體農莊底本質問題

(六) 階級的變動和黨政策中的轉變

(七) 結論

論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問題（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一日）……………斯大林 六三三—六四〇

勝利衝昏頭腦（論集體農莊運動問題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斯大林 六三三—六四一

給集體農莊工作同志們的答覆（一九三〇年四月三日）……………斯大林 六四一—六四三

社會主義建設不斷地發展和蘇聯底內部情形（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一日）……………斯大林 六四三—六五〇

(一) 整個國民經濟底發展

(二) 工業化的成績

(三) 社會主義工業底指導地位和它發展的速度

(四) 鄉村經濟和穀類問題

(五) 農民之轉向社會主義和蘇維埃農場集體農場發展的速度

(六) 改良農工的物質條件和文化條件

(七) 發展中的困難，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在整個戰線上的進攻

(八) 資本主義制度還是社會主義制度？

(九) 目前的任務

A 一般的

B 工業方面

C 農村經濟方面

D 運輸方面

論經濟工作人員底任務(一九三二年二月四日在第一次全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工作人員

代表會議上的演說)

斯大林 三二—三三〇

新的環境和新的經濟建設任務(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在經濟工作人員

會議上的演說)

斯大林 三三一—三三六

(一) 勞動力

(二) 工人工資

(三) 勞動組織

(四) 工人階級底生產技術智識界問題

(五) 舊生產技術智識界中轉變的徵象

(六) 論經濟核算制

(七) 用新的方式來工作，用新的方式來領導

第一個五年計劃底總結(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

聯席全會上的報告)

斯大林 三五—五九

(一) 五年計劃底國際意義

(二) 五年計劃底基本任務和實現這一任務的道路

(三) 五年計劃在工業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

(四) 五年計劃在農業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

(五) 五年計劃在改善工農物質狀況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

(六) 五年計劃在城鄉間商品流轉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

(七) 五年計劃在與敵對階級餘孽鬭爭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

(八) 一般結論

論農村中的工作（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一日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

會聯席全會上的演說）……………斯大林 七九五—八〇五

在第一次全蘇聯集體農莊突擊隊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九日）……………斯大林 八〇七—八三三

(一) 集體農莊道路是唯一正確的道路

(二) 我們最近的任務，是要把一切集體農莊莊員都變成爲生活富裕的人

(三) 幾點個別的意见

蘇聯國民經濟繼續高漲和內部狀況（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斯大林 八三三—八五三

(一) 工業高漲

(二) 農業高漲

(三) 勞動者物質狀況和文化水準的提高

(四) 商業高漲與運輸業

論農業勞動組合與農業公社問題（一九三四年一月）……………斯大林 八五五—八六一

六、爲完成社會主義建設而鬭爭

在克里姆里宮舉行的紅軍學院學生畢業典禮大會上的演說（一九三五年五月四日）……………斯大林 八六五—八七〇

在第一次全蘇聯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會議上的演說（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斯大林 八七一—八八五

- (一) 斯達漢諾夫運動底意義
- (二) 斯達漢諾夫運動底根源
- (三) 新的人材和新的技術定額
- (四) 最近的任務
- (五) 兩句話

蘇聯底內部狀況（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斯大林 八七一—九〇六

(一) 工業與農業更進一步的高漲

(二) 人民物質狀況和文化狀況更進一步的提高

(三) 蘇維埃制度更進一步的鞏固

在先進的男女收割機師會議上的演說（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斯大林 九〇七—九三三

在克里姆里宮招待高級學校工作人員宴會上的演說（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七日）……………斯大林 九五—九二七

蘇聯無產階級與農民問題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蘇聯無產階級與農民問題。——黨認為：「專政底最高原則，就是保持無產階級與農民間的聯合，祇有這樣，無產階級才能保持其領導的作用及國家政權。」（『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一本，第三三一頁）在經濟方面，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同樣的在政治方面（譬如一九一七年十月推翻資產階級底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一樣），無產階級都能够而且應當是農民羣衆基本的領導者，祇有根據大多數農民羣衆（貧農、中農）物質生活之逐漸改善，才能真正實行國家工業化。這些農民羣衆是我們工業底主要市場，因此必須執行一種足以鞏固工業與農民經濟間聯合、足以保持工人階級與主要的農民羣衆間聯盟的經濟政策（價格政策、賦稅政策等）。

反對派聯盟，則完全由另外一種前提出發。在農民問題中，它們與列寧主義底基本路線完全分歧，不相信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之中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作用，而主要的是把農民看作仇敵的分子，因此反對派聯盟提議實行祇足以瓦解城市和鄉村的聯合、破壞工農聯盟的經濟財政方針，自然這就破壞了一切實際工業化底可能。這種政策，譬如：（一）反對派要求提高工業品出賣的價格，這樣必然要引起其他價格之提高，而使貧農及中農的大部份貧困化，減低了國內市場底容量，破壞了無產階級與農民間底關係，使貨幣價值降低，結果，就減低了實際工資；（二）反對派提議

對農民實行最高的賦稅剝削，這種剝削不能不使工農聯合發生裂痕。

代表會議認為：反對派聯盟在農民問題上的政策，不適合於國家工業化及無產階級專政底利益。

——選自斯大林選集第二卷一九三九年解放社版

『論聯共黨內的反對派聯盟』第九二至九三頁

反對派在政治上與組織上的錯誤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一日至三日——

反對派聯盟在政治上與組織上的一切錯誤，就是從他們在十月革命底性質與前途這個基本問題上的主要錯誤中發生出來的。

在講到反對派在政治上與組織上的錯誤時，我指的便是下面幾個問題：經濟建設工作之中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工業化問題；黨的機關問題與黨內『統制』問題等等。

黨底出發點，就是認為：本黨一般的政策，特別是經濟政策，是不能使工業與農業分開的，必須使這兩個基本經濟部門照着互相融合的方向發展，以至於綜合成爲一個社會主義的經濟。

從這條路線中，就產生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方法，這個方法要注意到努力改善勞動羣衆底物質生活，基本的農民羣衆也在其內，這些羣衆正是發展工業化的基礎。我所講的，正是社會主義的工業化的方法，而不是資本主義的工業化方法，因爲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方法，就是要廣大勞動羣衆貧苦下去。

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方法有什麼缺點呢？它的缺點，就是使工業化底利益與勞苦羣衆底利益互相衝突起來，使國內矛盾劇烈化，使整千萬的工農羣衆貧困下去。工業利潤不用來改善國內廣大羣衆底物質與精神生活，而是輸出國外，用來擴張國內外資本主義剝削的基礎。

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方法，有什麼優點呢？它以下的優點：它使工業化底利益與基本勞苦羣衆底利益融合起來；它不是使羣衆貧困化而是改善羣衆底物質生活；它不是加緊國內的矛盾而是和緩與消滅國內的矛盾；它能不斷擴大國內的市場及其容量，於是就給工業化造下鞏固的內部基礎。

因此，基本的農民羣衆就對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發生直接的興趣。

因此，在一般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上，特別在工業化這個工作上，無產階級有對農民實現領導權的可能和必要。

因此，就產生了首先就經過農民大批合作化而實現工業與農民經濟密切聯合的思想，即由工業領導農業的思想。

因此，就產生了我們的賦稅政策與其他減低工業品價格的政策，爲的就是保持工農底經濟合作，鞏固工農聯盟。

反對派聯盟底出發點則完全相反，他們將工業與農業對立起來，使工業與農業互相隔離起來。他們不知道而且不承認，誰如果忽視或破壞了農業底利益，誰就不能發展工業。他們不了解：如果工業是國民經濟底主腦，那末，農業便是發展工業的基礎了。

因此，他們就把農民經濟當作殖民地看待，說無產階級國家可以把它當殖民地剝削（如普列布拉仁斯基）。

因此，託洛茨基就怕農民經濟得到豐收；以爲收成豐裕，可以破壞我們的經濟。

因此，反對派聯盟就提出他們的特殊政策，以加緊工業與農業間的矛盾，採取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方法。

我們試聽一聽普列布拉仁斯基（反對派領袖之一）所說的話，不很好麼？下面就是他自己論文

中所說的話：

「愈是經濟落後的小資產階級的農民國家，它欲進展到社會主義的生產組織，愈是需要向社會主義以前形式的經濟加緊剝削，藉以加增社會主義的積累……反之，如果愈是經濟和工業發展國家，它欲得到社會革命的勝利，則無產階級愈是需要減輕工業品與殖民地農產品間不等量的交換，就是說，減輕對殖民地的剝削，社會主義積累底重心，愈會轉移到社會主義形式的生產上面去，即建築在自己的工業上面。」（見普列布拉仁斯基『社會主義積累底根本法則』，載『共產主義學院季刊』，第八期）

普列布拉仁斯基是落到工業利益與農民經濟利益絕對衝突的路線——即落到資本主義工業化方法上去了，這難道還要證明嗎？

我以為普列布拉仁斯基以『殖民地』看待農民經濟（也許他自己還不知道），企圖在無產階級與農民中間建設相互的剝削關係，於是他就破壞任何工業化底基礎。

我敢肯定說：此種政策與黨的政策——根據工農經濟合作而進行工業化的政策，是沒有絲毫相同之處的。

同樣，或者說，差不多也是這樣，託洛茨基生怕農村收成豐裕，以為收成豐裕會危害到我國經濟的發展。下面就是他在四月全會上所講的話：

『在此種條件之下（託洛茨基講的就是目前生產不稱比例底條件。——斯大林註），收成豐裕，即是鄉村經濟剩餘商品之增多，不是加速經濟向社會主義發展的因素，而是破壞我們的經濟，使城市與農村間、消費者與國家間關係惡化的因素。就實際上說，豐裕收成，在缺乏工業生產品時，就要使城市變成鄉村底尾巴。就政治上說，豐裕收成能引起農民反對對外貿易壟

斷權，即反對社會主義的工業。」（見中央四月全會記錄，託洛茨基對李可夫底報告所提出的修正案）

把託洛茨基這種奇異的聲明來與列寧在商品貧乏時所說的話——「豐收是我國底救星」對照一下，便可知道託洛茨基這種聲明所包含的全部錯誤。

這裏，很明顯的，託洛茨基是不承認要發展我國工業化就必須逐漸改善農村勞動羣衆底物質生活。也祇有這樣，才能使工業化向前發展。

照託洛茨基底意見，似乎我國工業化必須經過幾個「歉收」才行。

從這裏，就產生了反對派各種實際的主張：抬高物價、向農民增加賦稅等等。所有這些主張，並不能鞏固工農中間經濟的合作，而是使之破裂；不是準備無產階級在經濟建設中實行領導權的條件，而是破壞此種條件；不是使工業與農民經濟聯合起來，而是使之分裂。

現在要簡略地談到農民分化問題。反對派對於農民分化之加緊，異常吃驚，如臨大敵，這是誰都知道的。除了反對派外，再沒有人像他們那樣的大驚小怪地來觀察私人資本底滋長了。實際上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呢？這就是第一，正像李可夫所報告的一樣，農民的分化是發生在特殊形式之下，擴大在我國實際情形之下，不是消滅中農而是使中農在相當範圍內加力增長。因為土地國有、農民合作化以及我們的賦稅政策等等元素，不能不使農民的分化有一定的限度，受相當的限制；第二，這是最重要的，即私資滋長，必然要受我們工業發展所抵消，所超過；我們的工業發展，就要鞏固無產階級與社會主義經濟形式底地位，給一切私人資本以致命的打擊。

但是，在新反對派看來，這些事情正如浮雲過目，不足重輕，它們祇是對鄉村私資滋長事實表示張惶失措，痛哭流涕。

我們現在把列寧對這個問題所說的話，引一段來給反對派看一看，也許不是沒有益處的事。列寧關於這個問題曾經這樣說過：

「我們如果能够改善大生產，建設幾個大工廠，那我們就鞏固了無產階級底地位。那末小資產階級底散漫作用就是滋長起來，也沒有什麼可怕了。小資產階級與小資本底滋長並不可怕，而所可怕的就是貧困狀態（生產品缺乏）延長太久，就會使無產階級喪失元氣，無力對抗小資產階級散漫性的動搖。如果，大生產能向前發展，大生產能使生產品數量增加則無論小資產階級如何滋長，也不至於有什麼大的害處。」（『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一章，第一五四——一五五頁）

反對派同志們，是否也有一個時候能夠了解：他們對於農民分化與私人資本表示這樣張惶失措，就是他們懷疑我國能完成社會主義建設這個懷疑態度底另一方面。

關於反對派反對黨內機關和黨內『統制』問題，還要說幾句話。

實際上，反對派進行鬭爭以反對黨的機關——即反對黨的領導中心，將會產生怎樣的結果呢？反對派這個鬭爭，結果終不免破壞黨的領導作用，使黨在改善國家機關、掃除國家機關內官僚份子和領導國家機關這些工作中，解除自己的武裝。

反對派向黨的『統制』進行鬭爭，將會發生那一種結果呢？結果會要破壞黨內鐵的紀律（而沒有這種紀律便談不到什麼無產階級專政），結果就要動搖無產階級專政底基礎。

所以，黨認為反對派底政治上與組織上的錯誤，是非無產階級份子向我們黨與無產階級專政反攻底表現，黨這種估計是完全正確的。

同志們！反對派聯盟政治上與組織上的錯誤，就是如此。

選自斯大林選集第二卷一九三九年解放社版

『論聯共黨內社會民主主義的傾向』第一五〇至一五六頁

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一日至三日——

同志們！在我的報告中我曾經說過，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恩格斯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所講的有名的公式，在當時完全是正確的，但是，在現在就不充分了。因此，我以為應當以列寧底公式去代替它。列寧說：在資本主義及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發展底新條件之下，在一個國內社會主義的勝利是完全可能，而且是可靠的。

在討論時，有人反對我的意見。季諾維埃夫在這方面更是特別努力。因此，我不能不再提出這個問題，並給以更詳細的回答。

我想季諾維埃夫沒有讀過恩格斯底『共產主義原理』，要是讀過了，那就是他沒有懂得；不然他就不會發生懷疑，不然他就會注意到，現在的社會民主黨，在他們與列寧主義鬥爭中，就是咬着恩格斯底老公式不放；不然，季諾維埃夫就會懂得，跟着社會民主黨走，是要遭受『蛻化』危險的。

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這一本書，是敘述到各種個別的原理。在這裏，他用答覆的方式來闡明這些原理：

『問題：廢除私有制度，能不能一鼓成功？』

答：不，這個是不可能的，正如不能立刻將現在所有的生產資料馬上增到的必要數量，足以建

設社會的生產一樣。因此，無產階級革命（一般講來，它是必然發生的），祇能逐漸改造現存的社會，祇有當廢除私有制的必需的生產資料已增加到必要的數量時，才能廢除私有制。

問題：這個革命底進程是怎樣的呢？

答：首先，就要建立一個民主的制度，即直接或間接建立無產階級的統治。」

很明顯的，這裏，是講推翻資產階級和奪取無產階級專政。同志們！你們知道，這一條我們已經實現了，而且除實現之外還有多的呢。（叫聲：『是的！』『對呀！』）其次：

『假若無產階級不能夠利用這個民主制度來實行各種大規模的設施。以侵犯私有制度並保障無產階級底生存；那末，這種民主制度，對於無產階級，是毫無作用的。由現時狀況所產生的這些設施，最重要的有下列各點：

「一，採用累進稅制及遺產承繼的重稅制，廢除非嫡系的親屬遺產承繼權（如兄弟、侄兒之類）以及發行強迫借款之類，用這種方法來限制私有財產。」

你們知道，這些方法在我們蘇聯早已實現了，而且早已超過了。其次：

「二，一方面用國有工業來競爭，一方面用紙幣來作收私產爲國有的賠償，以逐漸的消滅地主、工廠主人、鐵路主人及船主等。」

你們知道，這些方法還在我們革命的第一年，我們的國家就執行了了的。還有：

「三，沒收一切向外逃遁的人民以及一切作亂反對大多數人民的人們底財產。」

你們知道，我們早已把他們沒收了，而且沒收得厲害到了極端。（笑聲）其次：

「四，把勞動組織起來，或者使工人們能在國有的產業、工廠及作坊中去作工，用這個方法將工人間的競爭免除，再則，此時如果還有私有工廠，廠主必須支付高價工資，如國有工廠

所付的一樣。」

大家都知道，我們是在着手實現這一條，而且我們已獲得許多勝利，一般說來這一條我們已經實現了。其次：

「五，社會中所有的一切組成員，均須同樣勞動，一直到私有財產制度廢除爲止，組織產業軍，特別爲農業組織產業軍。」

你們知道，在軍事共產主義時，我們走上了這條道路，例如組織勞動軍。但是，在這條道路上沒有得着大的成績。後來我們沿着迂迴路來達到這個目的，而且在這一方面我們會得着極大的成績，這是毫無懷疑之可能的。其次：

「六，把信用制度與貨幣經營，集中到國家管理之下，由那具有國家資本的國家銀行經手，封閉一切私有銀行及銀行經理處。」

同志們，你們大家都知道，在基本上，這一條在我國已經實現了。其次：

「七，增加一切國家的工廠、作坊、鐵路及船隻；開拓荒地，並改良熟地，使兩者底加增與國有資本及工人數量底加增成正比例。」

你們都知道，這種事業我們是在着手實現的，而且在向前進展，土地國有及一切主要工業部門國有化，便是促進這一條實現的。其次：

「八，兒童到了能够脫離母親照顧的時候，便將他們都送到國家育兒院去養育，經費由國家支給。」

這一點我們已經着手實現，但是還沒有完全實現，因爲我們受戰爭與武裝干涉破壞得太厲害；所以不能把國內所有的兒童都拿來由國家照顧。再有：

「九，在國產上，建築大宮室作爲公共寄宿舍，使在工業農業上工作的人民，得以在該處集聚公談，並將城市生活與鄉村生活的優良之點會合起來，同時也要防止兩方面生活的劣點，並防止對於任何方面有畸輕畸重之弊。」

很明顯的，這裏是講大規模的宿舍問題。你們都知道，我們正在把這種工作推向前進；一般講來，這個問題在基本上並未實現，而且大概也不會很快實現，因爲遺留下來的破壞了的工業，我們來不及而且也不能很快地積累充分的基金來普遍地建築住宅。再有：

「十，拆毀城市中一切不合衛生及建築得很壞的房屋及住宅。」

這一條是上一條底組成部份，因此，我們關於上面一條所說的話，對於這一條也能適用。再有：

「十一，正生子與私生子都有同等的遺產承繼權。」

我想，在我國，這一點是實現得令人滿意的。最後，還有下面一條：

「十二，使一切運輸機關都集中在國家手裏。」

你們都知道，這一條在我國已經完全實現了。

同志們！恩格斯在他「共產主義原理」中所提出的無產階級革命政綱，就是如此。

你們可以看見，我們的革命對於這個政綱，已經實現了十分之九。

再看：

『問題：這個革命（這是指上面所講的。——斯大林註）能否在單獨一國以內完成呢？

（着重點是斯大林加的）

回答：不，不能。大工業既經造成了世界的市場，使全球各民族，尤其是先進的民族，彼

此非常密切聯繫起來，所以這一民族裏所發生的事端，必然要影響到其他的民族。更進一層，在各先進國社會的發展，都走上一個平行線上：無論在甚麼地方，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都成了社會上最重要的兩個階級，而這兩個階級間底鬭爭爲現代最主要的鬭爭。所以，共產主義革命，不僅是一國的革命，它是要在一切先進國內（至少也要在英、美、法、德等國）……同時發生的。」（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着重點是斯大林加的）

同志們！問題就是這樣。

恩格斯曾說：無產階級革命與上述的政綱，是不能在一國以內完成的。然而，事實告訴我們，在無產階級階級鬭爭新的條件之下，在帝國主義條件之下，這樣一類的革命，我們在基本上已經在一國以內執行了（就是在我們的國家內）而且實現了它的政綱十分之九。

季諾維埃夫可以說，我們實現了這個政綱，實現了這些條文是作錯了。（笑聲）很有可能，因爲我們實現了這些條文，所以犯了一些『民族狹隘主義』的錯誤。（笑聲）這是很可能的。但是，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在壟斷資本主義以前的條件之下，恩格斯認爲在一國以內不能夠實現與不可能的，而在帝國主義時代，在我們蘇聯却已經成爲可能實現的事了，這一點是非常明顯的。

自然，假使恩格斯尙未死去，他絕不會抓住舊的公式不放；恰巧相反，他一定會盡量的歡迎我們的革命，他會講：『讓一切舊的公式滾蛋罷，蘇聯革命勝利萬歲！』（鼓掌）但是社會民主派先生們却不是這樣想。他們拚命抓住恩格斯底舊公式，企圖用它來掩藏自己，好來反對我們的革命，反對布爾塞維主義。自然，這是他們的事。可是，季諾維埃夫要想來摹仿這些先生們，在這個問題上走上了社會民主黨底道路，這就不好了。

我剛才引證恩格斯底公式並將它更詳細引伸出來，這是因爲有三點理由：第一，把列寧認爲在

一國以內有社會主義勝利可能的公式與恩格斯底公式（這公式乃是馬克思主義觀點在某一階段中最明顯、最嚴格的表现）對比起來，使這個問題得以非常明瞭；第二，揭露社會民主黨底改良主義和反革命主義，他們企圖引用恩格斯底老公式來掩飾自己的機會主義；第三，證明列寧是解決在一國以內有社會主義勝利可能這個問題的創始者。

同志們！應該承認，正是列寧而不是別人，發現了在一國以內有社會主義勝利可能的真理。不應該抹煞列寧所應有的功績。不要害怕真理，應該有勇氣來講真理，應該勇敢公開地說：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間，能够照新的環境提出一國社會主義勝利問題並給以肯定解決的，列寧便是最初的一個。

這裏我絕不是要想說，思想家列寧比馬克思、恩格斯要高超些。我想說的祇是兩件事情：第一，不管恩格斯和馬克思是怎樣偉大的思想家，可是絕不能向他們要求，在壟斷前的資本主義時代，把一百多年以後，在發展的壟斷資本主義時代所發現的無產階級階級鬥爭以及無產階級革命底一切可能，都預先判斷出來；第二，恩格斯和馬克思天才的學生——列寧，能够發現資本主義發展新的條件中無產階級革命新的可能性，因此，就發明了在一國以內有社會主義勝利可能的這個真理，這是絲毫用不着奇怪的。

應該把馬克思主義底字句與本質分開，個別的論斷與方法分開。列寧能够發明一國社會主義勝利可能這個真理，正是因為他認為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他不是字句底奴隸而能够取得馬克思主義中主要的和基本的東西。關於這個問題，列寧在『共產主義中左派幼稚病』這本小冊子裏面說道：

『馬克思與恩格斯說，我們的理論並非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像考茨基、鮑威爾那些

「專利的馬克思主義者」底最大錯誤，最大罪惡，就是他們不懂得這個真理，不能够在無產階級革命最重要的關頭上去應用它。」（『列寧全集』，第十七卷，第一五九頁）

這就是馬克思、恩格斯與列寧底道路。我們現在正是站在這條道路上，而且假設我們願意自始至終成爲革命者，那我們將來還應該站在這條道路上。列寧主義所以是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正因爲它是站在（而且繼續站在）這條路上。不站在這條道路上，這就是墮入了機會主義的爛泥塘。拋棄這條道路，就要變成社會民主黨底尾巴。在這個問題上，季諾維埃夫正是犯了這個毛病。

季諾維埃夫在這裏說過，馬克思、恩格斯曾改變了恩格斯底老公式，認爲無產階級革命可以先在一國以內開始。他引證恩格斯底話：『德國人開始，法國人繼續。』這是對的。這是現在在每一個初級蘇維埃黨校學生都知道的。可是季諾維埃夫現在所說的並不在此。要是說：開始革命罷，在最近將來有別國革命勝利底幫助，同時，在別國勝利時，你也可以獲得勝利；這是一回事。要是說：開始革命罷，並將革命推向前進，而且知道，就是在最近時期中他國革命不能得着勝利，而在現時條件之下，在發展了的帝國主義時代，你也可以獲得勝利，然後推動各國的革命；——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引證了恩格斯底老公式，並不是要來抹煞馬克思和恩格斯後來改變了這個窄狹和片面的公式的事實，而是爲了：第一，把這兩個相反的公式對比起來，以便解釋這個問題；第二，揭露那些企圖用恩格斯底老公式來掩藏自己的社會民主黨底機會主義；第三，證明列寧是最初以新的方式提出在一國內有社會主義勝利可能，並給以肯定解決的馬克思主義者。

同志們！你們可以看見，我說季諾維埃夫沒有讀過『共產主義原理』，要是他讀過，他也沒有懂得，祇是用社會民主黨底觀點來解釋恩格斯底舊公式，因此，就走上了機會主義的道路。——我

這個估計，完全是對的。

選自斯大林選集第二卷一九三九年解放社版
『論聯共黨內社會民主主義的傾向』第一六一至一六九頁

蘇聯對外貿易壟斷制問題

——一九二七年四月七日——

如果有一批非黨的人組織了自己的派別組織，在選舉時提出了自己的那些站在擁護蘇維埃政府的立場上的候選人，可是同時又要求取消對外貿易壟斷制——他們能不能有自己的經費和進行積極的政治運動呢？

回答：我認爲這個問題本身就包含有不可調和的矛盾，決不能有這麼一批人，這批人一方面主張擁護蘇維埃政府，而另一方面又要求取消對外貿易壟斷制。爲什麼呢？因爲對外貿易壟斷制，是蘇維埃政府『立場』底堅固基礎之一。因爲要求取消對外貿易壟斷制的一批人決不會主張擁護蘇維埃政府，因爲這樣的一批人祇能是深深地仇視整個蘇維埃制度的一批人。

在蘇聯當然是有要求取消對外貿易壟斷制的份子。這就是耐潑曼，富農，已被打碎的剝削者階級底殘餘等等。可是這些份子足佔人民底極少數的。我想，代表團在發問題時所講的，不是這種份子。如果代表團所講的，是工人和農民中的勞動羣衆，那末，我就應當說，取消對外貿易壟斷制的這種要求祇能引起他們的哈哈大笑和敵視態度。

老實說，由工人們看來，取消對外貿易壟斷制，這是什麼一回事呢？由工人們看來，就是放棄國家工業化，放棄新工廠和新製造廠底建造，放棄舊工廠和舊製造廠底擴充。由工人們看來，這就

是讓資本主義國家運來的商品充溢蘇聯市場，使我們自己的比較軟弱的工業縮小，使失業人數增加，使工人階級底物質生活變壞，使他們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削弱。歸根到底，這就是使耐潑曼和一般新資產階級底勢力加強。蘇聯無產階級能不能去實行這種自殺政策呢？當然是不能的。

而由勞動農民羣衆看來，取消對外貿易壟斷制，又是什麼一回事呢？這就是把我們的國家由獨立的國家變爲半殖民地的國家和使農民羣衆貧窮化。這就是恢復高爾察克和鄧尼金時代所風行一時的『自由貿易』制度，當時，反革命的將軍和『協約軍』底聯合勢力，自由地搶劫和剝削了千百萬農民羣衆。歸根到底，這就是使富農和鄉村裏其他的剝削分子底勢力加強。農民在烏克蘭，在北高加索，在窩瓦區，在西伯利亞，已經嘗够了這種制度的滋味。有什麼根據可以預定說，農民忽然又想跳進這個圈套呢？農民勞動羣衆是不能主張取消對外貿易壟斷制的，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選自斯大林選集第三卷一九三九年解放社版

『與第一次美國工人代表團的談話』第五五至五六頁

論社會主義工業的推動力

——一九二七年四月七日——

當然是相對缺乏的。代替它的是什麼東西，而且這種代替，依你的意見，有多少效果？它能不能是經常的？

回答：資本主義經濟底基本推動力就是榨取利潤，這是對的。說榨取利潤不是我們社會主義工業底目的，也不是它的推動力，這也是對的。既是這樣，那末，我們工業底推動力究竟是什麼東西呢？

首先就是這樣的情況，就是在我們這裏，工廠和製造廠是屬於全體人民，而不是屬於資本家，管理工廠和製造廠的不是資本家代理人而是工人階級底代表。覺悟到工人不是爲着資本家作工而是爲着自己的國家作工，爲着自己本階級作工——這種覺悟心就是我國工業發展和改善底極偉大的推動力。應當指出，在我們這裏，工廠和製造廠底經理，絕大多數都是由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在商得職工會底同意以後，指派的工人担任的，並且沒有一個經理能够違反工人們或相當工會底意志而保留自己的職位。其次應當指出，就是在每個工廠或製造廠內都有自己的工廠委員會，這委員會是由工人選舉的，是監督本工廠管理處底工作的。最後，應當指出，在每個企業內都舉行生

產會議，本企業裏的全體工人都參加這種會議，工人在這種會議上審查工廠經理底全部工作，討論工廠管理處底工作計劃，指出錯誤和缺點，並有可能經過職工會，經過黨，經過蘇維埃政權機關去糾正這些缺點。不難明白的，所有這些情形是根本改變了工人底地位以及企業裏的規則。要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面，工人把工廠看作牢獄，那末在蘇維埃制度下面，工人却已經不把工廠看作牢獄，而把它看作自己的親近的和切身的事業了，對於這種事業底發展和改善，他是非常願意的。顯然用不着證明，工人對企業的這種新的態度，工人底這種親近企業的感覺，就是我們的全部工業底最大的推動力。因為這個緣故，所以由工人出身的生產技術發明家和工業組織者底人數，就一天一天增長着。

第二就是這樣的情況，就是我們這裏的工業收入不是用去使個人發財致富，而是用去繼續擴大工業、改良工人階級底物質的和文化的狀況，用去減低工農所都需要的工業品底價格，即是說又是用去改善勞動羣衆底物質的狀況。資本家不會把自己的收入用去提高工人階級底幸福。他是爲利潤而生活的。不然他就不是資本家了。他榨取利潤，爲的是要積成剩餘資本而輸出於比較不發達的缺少資本的國家，以便榨取新的更大的利潤。資本就是這樣從美國流到中國，流到南洋羣島，流到南美洲，流到歐洲，從法國流到法屬殖民地，從英國流到英屬殖民地的。我們這裏的情形就不同了，因爲我們不進行並且不承認殖民地政策。我們這裏的工業收入是留在國內，用去繼續擴張工業，用去改善工人底狀況，用去減低工業商品價格來提高國內市場底銷售能力——農民市場底銷售能力也在內。在我們這裏，百分之十的工業利潤是用去改善工人階級底生活的。在我們這裏，由國家開支的工人階級保險費等於工人所領的貨幣工資底百分之十三（每年八萬萬多盧布）。有一部份的收入（我現在不能確定說有多少）是用去供給文化上的需要，工廠藝徒學校及工人休假費的。很大部份

的收入（我現在也是不能確定說有多少）是用去每年增高工人底貨幣工資的。其餘部份的工業收入，是用去繼續擴張工業，用去修理舊工廠，用去建立新工廠，末了，用去減低工業商品價格的。這些情形對於我們的全部工業的偉大意義就在於：（一）這些情形使農業易於和工業接近，使城市與鄉村間的對立形勢易於消滅；（二）這些情形促進國內市場，城市與鄉村的市場銷售能力底增長，這樣就替工業底繼續擴展造成不斷增長的基礎。

末了，就是這樣的情況，就是工業國有化的事業，使整個工業經濟底有計劃的經營易於進行。我們工業底這些刺激和推動力會不會是經常的因素呢？它們能不能成爲經常有效的因素呢？是的，它們一定會是經常有效的刺激和推動力。我們的工業將來越是發展，這些因素底力量和意義會越增加增長。

選自斯大林選集第三卷一九三九年解放社版

『與第一次美國工人代表團的談話』第六三頁至六六頁

與外國工人代表團的談話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五日——

蘇聯政府想用什麼方法與外國的煤油公司鬭爭？

回答：我覺得這個問題根本問得不對。在這一種問題之下，就似乎蘇聯煤油工業已準備向外國的煤油公司進攻，企圖把它們消滅。事實上是不是這樣的呢？不，決不是這樣的。實際上，情形是這樣的：有些資本主義國家的煤油公司努力的想消滅我們蘇聯的煤油工業，而我們蘇聯的煤油工業為維持自己的生存與繼續發展起見，就不得不採取防禦的手段，蘇聯的煤油工業，無論在生產額方面（我們出產的煤油比資本主義國家要少些）或在市場的聯繫方面（他們與世界市場的聯繫比我們密切得多），都比資本主義國家的煤油工業要薄弱得多。蘇聯的煤油工業用什麼方法來防禦呢？它的防禦的方法，第一就是改善煤油的質量，第二降低煤油的價格，使我們的煤油出賣到市場上去的時候比資本主義國家的煤油還要便宜些。有人一定要問：難道蘇維埃國家竟這樣富裕，能比最富強的資本主義企業還更能便宜些把煤油出賣到市場上去麼？當然，蘇聯的工業不比資本主義企業富強，而且，資本主義的企業還多富強於蘇聯的工業，但這原因並不是在於富強，這原因是由於蘇聯的煤油工業並不是資本主義的工業，所以它不需要猛烈地榨取額外利潤；可是，資本主義的煤油企業都是非榨取大量的額外利潤不可的。正因為蘇聯的煤油工業不需要額外利潤，所以它可以把它的

貨物比資本主義的企業的貨物更賤價地出賣到市場上去。蘇聯的糧食、蘇聯的木材等等也都是這樣。一般的說來，蘇聯的貨物，特別是煤油，在世界市場上是減低價格、減輕購買人之經濟情形底原動力。這就是蘇聯的煤油業防禦資本主義國家煤油企業進攻底方法與力量。世界各國的煤油大王，特別是台脫亭，狂暴地反對蘇聯和蘇聯的煤油工業，用反對『共產主義宣傳』的時髦話掩飾其煤油的高價政策及其對消費羣衆的劫掠，這其中的一切巧妙就在於此。

怎樣實現農民問題中之集體制度？

回答：我們認爲，農民問題中的集體制度是逐漸地，用經濟的、財政的、文化的和政治的方面來實現的。我以爲最有興趣的問題，要算經濟方面的問題。在這個領域內，我們底辦法是從三方面進行的：（一）組織個別的農戶於合作社中；（二）組織農戶（主要的是貧農）於生產協作社中；（三）經過國家的計劃機關和調節機關，在銷售農產品以及供給農民以工業必需品方面來包羅農村經濟。

幾年以前，在農業與工業之間，有許多的中間人——以城市製造品供給農民、以農產品供給工人的那些私有企業家——阻隔着。當然，這些中間人決不肯『白出力』的，他們從農民身上以及城市居民身上抽括去的利潤不止數千百萬。這是城市與鄉村間的聯繫、社會主義工業與單獨的農民經濟間底聯繫還沒有建立好的時期。那時候合作社和國家分配機關底作用還比較小。但這個時期以後，情形就大變了。現在在城市與鄉村間，工業與農業間底商品流通中，合作社和國家商業機關作用已不僅可以算爲主要的作用，而且也可以算爲統治的作用了（雖然我們還不能說它是壟斷的作用）。農民所購買的輕工業品，由合作社和國家機關經手的佔百分之七十以上，農業機器差不多百分之百都是國家供給的。農民所出賣的糧食，由合作社和國家機關經手的佔百分之八十以上，工業原料如

棉花、甘蔗等物品的交易，差不多百分之百都是由合作社和國家機關經手的。

這是什麼意思呢？

第一，這就是證明，資本家已漸漸從商品流通範圍中排擠出去，工業已漸漸與農村經濟直接聯繫起來，投機商人的利潤已保留在工業與農業中，農民已經可以比較賤價地購買城市的商品，同時工人也可以比較賤價地購買農業品。

第二，這就是證明，工業已把資本家從商品流通範圍中趕出去，因此，它也就得到了領導農村經濟、影響農村、提高其文化程度、使其合理化與工業化底可能。

第三，這就是證明，國家把工業與農業直接聯繫起來之後，也就得到了有計劃地發展農村經濟的可能，它可以把最好的種子和肥料供給農村經濟，可以決定它的生產額，以價格政策去影響它等等。

最後這就是證明，鄉村已漸漸造成了一種很好的條件，使我們可以順利地消滅資本主義成份，節制和克服富農，組織勞動的農民經濟於生產協作社中，盡可能地用國家的經費幫助這些生產協作社。

例如，就拿製糖工業所必需的蘿蔔和紡織工業所必需的棉花來講罷。這種原料的出產額，及其價格和質量，都不是由無組織的市場情況來決定的，也不是由投機事業家以及交易所這類資本主義的機關來決定的，而是糖業和紡織業新迪加與代表成千成萬農戶的棉花合作社和蘿蔔合作社預定了條約，有計劃地來決定的。這一切已沒有交易所這類組織，也沒有買空賣空的這一類投機事業。這一切資本主義經濟的工具，在我們這一個領域內已不存在。我們在一個領域內，祇有兩方單獨的直接交易，沒有什麼交易所，沒有什麼中間人——一方面是國家的新迪加，另一方面是合作化的農

民。國家新迪加與合作機關預先訂好合同，規定合作社必須出產多少蘿蔔和棉花，而新迪加則必供給多少優良的種子和借款給農民。經濟年度告終的時候一切出產品都歸新迪加所支配，而農民，也就可以按照預定的條件從新迪加方面得到一筆款子。這種制度，我們叫做合同制度。這個制度的優點就是它能使雙方都得到利益，而且能使工業與農業直接聯繫起來，不要經過中間人。這種制度是農村經濟集體化的最正確的道路。

我們現在還不能說農村經濟的其他部門已經發達到這個程度。但我們可以肯定地說，農村經濟的一切部門，麥子的生產也包括在內，將都漸漸的過渡到這一條發展的道路。這一條道路，就是直接走到農村經濟集體化的一個入門徑。

完全的集體化，祇有到農村經濟已在新的技術基礎上改造過、已經實現了機器化和電氣化、大多數勞動農民已加入合作社、大多數鄉村已都有農村經濟協作社組織的時候，才能實現。我們現在正在向這個目的進行，但這個目的還沒有達到也不能很快地達到。爲什麼呢？因爲要達到這個目的，還必須一大筆經費，但國家現在還沒有這樣一筆大經費。當然，這筆經費經過相當時間，一定可以積聚起來的。馬克思曾經說過，無論那一個新的社會制度，沒有大量的數千百萬的財政上的消費，是不能在歷史上鞏固起來的。我認爲我們已進入了農村經濟發展底新階段，國家現在已開始能够加緊地在財政上資助新的社會制度，社會主義的工業已經在國民經濟中獲得了領導作用，已經能够領導農村經濟，——這件事實，就是農村經濟要走向集體化的最可靠的保證。

在軍事共產主義時代，當時企圖消滅貨幣有些什麼主要的困難？

回答：無論在內部的發展上以及對外的關係上，都會經過到了很多困難。如果單就內部的經濟方面而論，那我們可以指出三個主要的困難。

第一個困難就是：我們的工業當時完全處在破產和停頓的狀態中（祇有軍事工業在外國武裝干涉的時候供給我們內戰的軍需品是例外）。三分之二的工廠都關門起來，交通也完全停頓起來，商品差不多完全沒有。

第二個困難就是：農村經濟也完全處在停頓的狀態中，農民都被招募到戰線上去，缺乏原料，城市居民（首先是工人）的糧食也非常缺乏。我們那時候每每祇發半磅麵包給工人，有時甚至祇發五十格蘭姆。

第三，那時候差不多還完全沒有組織為城市與鄉村間的蘇維埃商業的傳遞機關，以便將城市製造品供給鄉村並將農村生產品供給城市。那時，合作社和國家商業機關還處在萌芽的狀態。

但在國內戰爭告終、實施新經濟政策之後，我們國內的經濟情形就根本改變了。

工業已發展而加強起來，在全部國民經濟中佔了領導地位。我們在最近兩年來，不靠外債，不靠國外任何的幫助，純粹用我們自己的積累，投到我們工業中去的經費已達二十萬萬餘盧布，這是證明我們工業發展的一個最明顯的事實。我們現在已經不能說對於農民沒有商品。

農村經濟的生產額已提高到戰前的水平線。現在我們已經不能說工人沒有麵包和其他的農產品了。

合作社和國家商業機關也已大大的發達起來，他們在商品流通中已佔領導地位。現在我們已經不能說，在我們城市與鄉村間、工業與農業間沒有商業的傳遞機關和分配機關了。

所有這些已經獲得的成績，現在當然還不能夠把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完成。但是一切成績已足使我們可以順利的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前進了。

我們現在必須改造我們的工業及在新的技術基礎上建築新的工廠。我們必須提高農村經濟的文

化，盡可能的製造農業機器供給農民使用，使大多數的勞動農民都吸收在合作社中，把個別的農民經濟改造成爲大規模的農業協作社。我們必須在城市與鄉村間建立這樣的一種傳遞分配機關，使它真正能够像每一個人估計他自己的預算和收支那樣地來估計和滿足全國城市與鄉村底需要。當我們達到這一切的時候，我們才可以完全不需貨幣。但現在離這個時候還很遠呢！

『剪刀』問題現在究竟如何？

回答：如果，這裏所說的『剪刀』是指農產品與工業品（指成本費）間價格的差異而言，那末，『剪刀』形勢就像下面所說的那樣：

毫無疑義的，現在我們工業品的價格，比在其他條件下要貴些。其原因，就是因爲我們的工業還很幼稚，我們還必須防禦外來的競爭，造成加速工業發展的條件，而工業的迅速發展，對於城市和鄉村同樣都是必要的。因爲工業如果不加速發展，我們就沒有充分的製造品與農業機器可以按時的供給農村經濟。這一種情形，就造成了工業品與農產品的價格底差異，這種差異，對於農村經濟是有一點損失的。

爲了消除農村經濟的這一種損失起見，政府和黨採取了逐漸的降低工業品價格的政策。這個政策是否能稱爲實際的呢？我認爲這個政策絕對是實際的。大家知道，在最近一年來，工業品的零售價格已降低了百分之八十。同時，我們的工業組織已經有系統的減低工業品的成本費與批發價格。我們毫無疑義地可以堅信這個政策將來還是要繼續採取的。此外我還要告訴你們，不斷減低工業品價格的政策，是我們整個經濟政策的樞紐，沒有這個政策，就根本談不到我們工業的改善、合理化，同時也根本莫想鞏固工農的聯合。

資產階級的國家在這方面所採取的政策就完全不同。在那些國家中，資本家往往把企業組織在

託拉斯和新迪加內，以便提高國內工業品的價格，使這種價格變為壟斷的價格，用這種手段多榨取一點利潤，造成商品輸出於國外的基礎；這些資本家在國外以賤價出賣自己的商品，以便拿得新的市場。我們俄羅斯在資產階級統治時代，也採取了這種政策。例如白糖，在我們國內的價格要三倍，而出賣到外國去的時候，都非常便宜，例如英國甚至用白糖喂豬。蘇維埃政府所採取的政策與這完全相反的。蘇維埃政府認為工業應為人民而服務，而不是相反。它認為不斷的減低工業品的價格就是發展工業的主要方法。不用說，減低工業品價格的政策同樣也足能提高人民的需要、擴大國內市場的容量及造成發展工業所必須的不斷增長的源泉。

蘇維埃政府對於法國小債主有什麼意見？如何可以使法國的閒逸階級與他們相識？

回答：我們對於戰前債務的意見，已在拉哥夫斯基的談話中發表出來了。我想這些意見，你們大概都已經看過。我們對於戰前的債務償還與否，是要看法國是否肯借債給蘇聯而決定的。我們所堅持的原則就是：你如果給我，我也就給你。你們如果肯借債給我們，我們也就把戰前的債款還你們一點；不借給我們，我們就不還給你們。這是不是說，我們在原則上已承認了戰前的債務了呢？不，決不是這樣。這祇是說，我們一方面保持我們取消沙皇債務的法令，同時在實際的、妥協的條件之下，如果肯借債給我們（這種債款不僅為我們所必需，同時也有利於法國工業的），那我們也同意把戰前的債款還一點。這一筆付還戰前債款的錢，我們祇當作發展我們工業所必需的債款底一種附加利息。

談到沙皇俄國的軍事債款。說到由於十月革命的結果對蘇聯的各種要求。但是，大家都忘記了，我們的革命是原則上否認帝國主義戰爭及與此種戰爭相關聯的沙皇政府底債款的。大家都忘記了蘇聯是不能償還而且將來也不償還這些軍事債款的。除此之外大家都忘記了蘇聯是不能不計算

外國向蘇聯進兵時期（蘇聯的反攻是與這種進兵有聯帶關係的）所遭受的劫掠與損失及由此而生的蘇聯的相反的要求。試問這些劫掠與損失應當由誰負責呢？誰應當賠償這些劫掠與損失呢？帝國主義的強盜，很希望人家忘記它們這些野心的事，但是它們應當知道，這種事情無論如何是不能忘記的。

怎樣把燒酒的壟斷和與酒癖做鬪爭聯繫起來？

回答：我認爲，這兩件事是難以聯繫起來的。這裏毫無疑義的有一個矛盾。明明知道這個矛盾，而且有意地的這樣做，黨知道，在現在這個時候，這種矛盾的存在，是沒有什麼要緊的。當我們施行燒酒壟斷的時候，在我們面前擺着兩件出路：或是向資本家妥協，把許多重要的工廠都租讓給他們，從他們方面取得我們所必需的經費以便從事工作；或是施行燒酒的壟斷，以取得我們所必需的流通經費，用我們自己的力量來發展我們的工業。中央委員（我也在內）當時會和列寧商量這件事情，列寧認爲在得不到外債的時候，就祇好公開的、直接的實施燒酒的壟斷，作爲一種臨時辦法。這就是我們實施燒酒壟斷的時候所發生的問題。

一般的說來，完全廢止燒酒當然要好一些，因爲燒酒是一種壞東西；但如果廢止了燒酒，我們就祇好去受資本家的奴役，這就更壞了。因此，我們寧願少得些壞處。現在我們每年從燒酒得到的收入，共計五萬萬盧布以上。放棄燒酒事業，就是放棄這項收入，而且酒癖的現象也必定不會減少。因爲國家如果不製造酒，農民自己就要去製造酒，成天的醉迷於燒酒罈中。農村文化的不發達，在這種地方當然也有相當的作用。不用說，如果我們立刻放棄了燒酒的壟斷，我們的工業就喪失了五萬萬以上的盧布。這一筆經費是無從填補的。

但這是不是說燒酒的壟斷在將來也應當一直的保留下去呢？不，決不是的。我們實施燒酒壟

斷，祇是一種臨時的辦法。因此，祇要在我們的國民經濟中找到一個新的收入底來源，使我們可以藉此去發展我們工業的時候，我們就馬上要取消這一種辦法。這種新的收入的來源，毫無疑義地是可以找得到的。

我們把燒酒事業交給國家經營，這種辦法究竟對不對的呢？我認為是對的。如果我們把燒酒事業交給私人去經營，那就要引起下列的結果：第一，必然會加強私有資本；第二，政府就不能調節燒酒的生產與消費；第三，政府就不能在最近的將來取消酒的生產與消費。現在，我們的政策就是逐漸的縮小燒酒的生產。我想，我們在最近的將來，一定可以完全取消燒酒的壟斷，把酒的生產縮小到純粹為技術上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然後就完全禁止酒的買賣。

我想，如果西歐的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並給我們以必要的幫助，那我們也就用不到去經營燒酒事業以及其他那些不好的事業了，可是有什麼辦法呢？現在我們西歐的兄弟們還不願意奪取政權，我們祇好靠我們自己的經費。但這並不是我們的過失，這是命運如此。所以，我們西歐的兄弟們對於燒酒壟斷也應該負相當的責任哩。（笑聲、鼓掌）

選自斯大林選集第三卷一九三九年解放社版

『與外國工人代表團的談話』第一四二至一五二頁

社會主義建設的成績與蘇聯的内部情形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

同志們，現在讓我來講一講我們國家的内部情形，我們社會主義建設底成績，無產階級專政的命運，它的發展和它的鞏固。

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委託中央委員會根據下列的基本任務去發展我們的國民經濟：第一個任務就是，我們應採取促進整個國民經濟生產迅速之發展底政策；第二，我們應採取加緊工業發展的速度和保證工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之領導作用底政策；第三，應當在國民經濟的發展過程中保證社會主義成分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在國民經濟中之發展，應日形削弱私有商人和資本主義的成份；第四，必須努力的加緊我們的經濟發展，組織新的工業部門，發展原料的製造等等，——使這種發展能保證我們國家底經濟獨立，使我們的國家不變成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系統底附屬品；第五，應當使無產階級的專政、工農的聯合和無產階級在這個聯合中的領導鞏固起來；第六，我們應當不斷的提高工人階級和貧農物質上和文化上的生活條件。

中央委員會在這一時期內究竟執行了這些任務沒有呢？

(一) 整個國民經濟

第一個問題，就是整個國民經濟底發展。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到現在的這個時期中，關於整個

國民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工業和農業的發展，我現在可以舉幾個主要的數目字給你們看。這些數目字，我是從國家計劃局的統計中得來的。我所說的就是國家計劃局對於一九二七至二八年預定數字和五年計劃的草案。

一，兩年來整個國民經濟生產的發展。

農村經濟在一九二四至二五年的生產量，按國家計劃局新的統計，佔戰前的百分之八七·三，工業的生產量佔戰前的百分之六三·七；但到現在，兩年之後，農村經濟的生產量已達戰前的百分之一〇八·三，工業的生產量已達戰前的百分之一〇〇·九。按照國家計劃局一九二七至二八年的預定數字，預定農村經濟的生產量要增加到百分之一一·八，工業要增加到百分之一一四·四。兩年來國內商品流通的發展。如果我們假定一九二四至二五年的商品流通是一百（共計一四、六一三、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那末，在一九二六至二七年間就已增加了百分之九七（二八、七七五、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在一九二七至二八年間我們預定要增加到百分之一一六（三三、四四〇、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

兩年來我們信用事業的發展。如果我們假定一九二五年十月一號以前的一切信用機關的出入總數是一百（共計五、三四三、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那末到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就已增加了百分之五三（八、一七五、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毫無疑義地，我們可以斷言，在一九二七至二八年中，我們國家的信用事業必將有更大的發展。

兩年來鐵路運輸事業的發展。我們在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全國鐵路所運輸的貨物僅達戰前的百分之六三·一，但到現在，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就已達戰前的百分之九九·一，到一九二七、二八年，將達戰前的百分之一一·六。此外全國鐵路的長度在兩年來也已從七四四〇〇啓羅米突增加

到七六二〇〇啓羅米突，和戰前的水平線比較起來增加了百分之三〇・三，和一九一七年比較起來共增加了百分之八・九。

兩年來國家預算的增加。我們在一九二五至二六年的總預算額（統一的國家預算加上地方的預算），僅佔戰前的百分之七二・四（五、〇二四、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但到現在，即一九二七至二八年，總預算額，就要達到戰前的百分之一一〇到一一二（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以上），兩年間竟增加百分之四一・五。

兩年來對外貿易的發展。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對外貿易的總流通一共祇有一、二八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即戰前的百分之二七），但到現在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就已達一、四八三、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即戰前的百分之三五・六），到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就要達一、六二六、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即戰前百分之三七・九）。我們對外貿易發展速度緩慢的原因：第一，就是因為資產階級的國家常常阻礙我們的對外貿易，有時竟至於秘密的封鎖；第二，就是因為我們不能按照資產階級底公式——『自己不够，還應當輸出口去』——做生意。我們的對外貿易在一九二六至二七年一共出超了五七、〇〇〇、〇〇〇盧布。這是一九二三至二四年以後對外貿易的第一次出超。

總結起來，我們全部的國家收入在兩年來一共增加了這許多：一九二四至二五年，蘇聯的國民收入共計一五、五八九、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九二五至二六年共計二〇、二五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即一年之中增加了百分之二九・九，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則已達二二、五六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即在一年之中增加了百分之一一・四。按照國家計劃局的預算數字，到一九二七至二八年，我們的國民收入將有二四、二〇八、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即增加百分之七・三。

如果我們好好地注意一下，美國的國民收入平均每年至多祇增百分之三至四（祇有在一八八〇年美國的國民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七），其他國家，例如英國和美國，國民收入每年平均也祇多增加百分之一至三，這樣看來，蘇聯國民收入近年來增加的速度與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比較起來，實可算爲世界第一了。

結論：我們國家的國民經濟是在迅速地發展。
黨的任務：推動我們國民經濟的一切生產部門，向前發展。

二，我們國民經濟的發展並不是一種盲目的、數量上的生產的增加，我們的國民經濟是按着嚴格規定的方向而發展的。下列兩點，就是最近兩年來發展我們國民經濟之最主要的因素：第一，我們的國民經濟，是在國家工業化的標幟下，增加工業對農業之領導作用底標幟之下發展起來的；第二，我們國民經濟的發展、國家的工業化是按着增加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在生產中及商品流通中底比重與領導作用，縮小私有商人與資本主義成分底方向進行的。

工業在國民經濟中比重增加的數目字（運輸與電氣化除外）。在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度，工業總生產量佔國民經濟全部生產量的百分之三二·四（按戰前的價格計算），而農業的生產量却佔百分之六七·六，到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度，工業生產量已增加到百分之三八，農業生產量已降低到百分之六二。預計到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度，工業生產量要增加到百分之四〇·二，而農業生產量則須降低到百分之五九·八。

生產工具的生產——工業的基本軸心——最近兩年來在全部工業中之比重的增加：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度生產工具的生產佔全部工業的百分之三四·一，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度——佔百分之三七·六，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度，預計要增到百分之三八·六。生產工具的生產兩年來在國家大工業中的

比重之增加：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度——佔百分之四二，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度——佔百分之四四，及至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度，預計要增加到百分之四四·九。

工業的商品生產量兩年來在全部商品中之比重的增加：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度佔百分之五三·一，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度已達百分之五九·五，預計至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度要增加到百分之六〇·七。農村經濟的商品生產量在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度佔百分之四六·九，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度就已降到百分之四〇·五，到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度，預計還要降低到百分之三九·三。

結論：我們的國家已漸漸要成爲工業國。
黨的任務就是：用各種方法盡量的推進我們國家的工業化。

兩年來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比重和領導作用底增加與私有資本主義成份的縮小。大規模地投在國民經濟社會化成份（國家的與合作的工業、運輸事業、電氣化事業等等）中的資本，在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度是一、二三一、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到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度已達到二、六八三、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及至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度，預計要增加到三、四五六、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就是說，從百分之四三·八（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度）增加到百分之六五·三（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度）；可是投在非社會化經濟成份中的資本，相對的數目祇是日益降低，而其絕對的也增加得很少，在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度共計一、五七七、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到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度僅達一、七一七、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到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度預計也祇增加到一、八三六、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投在非社會化成分中之資本的比重已從百分之五六·二（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度）低降到百分之三四·七（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度）。

社會化工業的總生產量，在一九二四至三五年度佔全部工業生產量的百分之八一，到一九二六

至二七年度已達百分之八六，甚至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度預計就要增加到百分之八六·九，——非社會化工業底作用却一年年地低降：在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度佔全部工業生產量的百分之一九，至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度已降低到百分之一四，預計至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度將要減少到百分之一三·一。私有資本在大工業中的作用，不僅是相對的減低（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度佔百分之三·九，至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度已減低到百分之二·四），它的絕對的數目也同樣的減少（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共計一六九、〇〇〇、〇〇〇戰前的盧布，至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已減少到一六五、〇〇〇、〇〇〇戰前的盧布）。

在我們國家的商品流通中，私有資本主義成份的作用也日形減少。社會化的成份在商業流通中的比重，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度是百分之七二·六，在批發方面是百分之九〇·六，零售方面是百分之七七·三，至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度社會化的成份在整個商品流通中的比重，已增加到百分之八一·九，在批發方面增至百分之九四·九，零售方面增至百分之六七·四，而私有商業在全部商品流通中的比重，在這個時期內却從百分之二七·四降低到百分之一八·一，在批發方面——從百分之九·四減低到五·一，在零售方面——從百分之四二·七減低到三二·六。私有商業在全部商業中的比重，預計到一九二七至二八年還要減少。

結論：我們的國家正在不屈不撓地、迅速地走向社會主義，已漸漸地、得步進步地把資本主義的成分從國民經濟中排擠出去。

這件事實已向我們揭露出了問題的基礎：誰戰勝誰？這個問題是列寧在一九二一年實施新經濟政策之後提出來的。還是我們戰勝私有商人和私有資本，把社會主義化的工業與農業聯繫起來呢？還是私有資本戰勝我們，使無產階級與農民分裂開來呢？這就是當時的問題。現在我們已可以說：

我們在這方面已經獲得了主要的成功。祇有瞎子和失了腦筋的人才能否認這件事實。現在『誰戰勝誰』這個問題的性質已與前不同。現在這個問題已從商業方面轉移到生產方面——轉移到手工生產和農村經濟方面，在這裏，私有資本還有相當的比重，我們必須有系統地把它們排擠出去。黨的任務就是：擴大和鞏固我們社會主義的成份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無論在城市中或鄉村中）的領導作用，努力的設法消滅國民經濟中之資本主義的成份。

(二) 我們社會主義的大工業發展的速度

一，國有化的大工業（佔全部工業的百分之七七）之生產量的發展。國有化的大工業在一九二五至二六年度之生產量，與前一年度比較起來（以戰前的盧布計算）增加了百分之四二，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增加百分之一八·二，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增加百分之一八·八，按國家計劃局所規定的五年計劃草案，在五年之內生產量要增加百分之七六·七，每年平均增加百分之一五，工業的生產量，至一九三一至三二年度，與戰前的生產量比較起來共要增加兩倍。

我們國家全部工業的生產量（大的、小的、國有的、及私有的工業都算在內），按國家計劃局所規定的五年計劃草案，每年平均要增加百分之一二，到一九三一至三二年度，全部工業的生產量與戰前的水平線比較起來，平均差不多要增加百分之七〇。

美國全部工業的生產量，在一八九〇至一八九五的五年之中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八·二，一八九五至一九〇〇的五年之中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五·二，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五的五年之中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二·六，一九〇五至一九一〇的五年之中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三·六，俄國在一八九五至一九〇五的十年之中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一〇·七，在一九〇五至一九一三的八年之間平均每年

增加百分之八·一。
 我們社會主義工業的生產量，以及我們全部工業的生產量，每年增加的百分數實可稱為世界第一，這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所從來沒有達到過的。

雖然美國的工業以及俄國戰前的工業有大批的、豐富的外國資本之強有力的幫助，而我們國有化的工業却祇能依靠自己的積蓄。

雖然我們國有化的工業已進入了改造時期，這時改造舊的工廠和建設新的工廠對於工業生產量的增加是有很重大意義的。

我們全部的工業，尤其是社會主義的工業，就其發展的速度而論，將趕上與趕過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之發展。

二，我們的大工業為什麼能有這樣空前的發展呢？

第一，因為它是國有化的工業，因此它就可以免除資本家之貪吝妨害社會利益的慾望，可以按照整個社會的利益而發展起來。

第二，它是世界上最宏大的、最集中的工業，因此它可以超越私有資本主義的工業。

第三，因為國有化的運輸事業、國有化的信用事業、國有化的對外貿易、國家的總預算都完全操縱在國家手裏，因此，國家可以有計劃地領導國有化的工業，使它成爲統一的工業經濟，使它在其他任何工業前面都佔有巨大的優勢及加倍地加速它的發展底速度。

第四，因為國有化的工業是最大的最強有力的工業，它可以實施不斷的減低成本費、減低批發價格、減低商品價格的政策，因此也就擴大了銷售它的生產品的市場，增加了國內市場的容量，替自己造成了不斷擴大生產的源泉。

第五，國有化的工業，由於許多原因，同時也由於它堅持着降低價格的政策，所以能在城市與鄉村、無產階級與農民漸漸聯合的環境中發展起來，它與資本主義的工業却巧相反，資本主義的工業是在資產階級的城市——榨取農民脂膏的城市——與日益破產的鄉村間之仇恨逐漸加深的環境中發展起來的。

第六，國有化的工業是依靠在我們全部發展的主宰——工人階級身上的，因此它很容易發展技術，尤其是勞動生產率，很容易實施生產與管理的合理化，它有廣大的工人階級的幫助，這種情形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是決不可能的。

在最近兩年來我們技術之迅速的進步，及新的工業部門（機器的製造、氣管的製造、自動機與航空機的製造、化學品的製造等等）之迅速的發展，已毫無疑義地證明了這一切。

在縮短工作時間（七小時工作日）及不斷的提高工人階級物質上與文化上的生活狀況的條件之下所實行的生產合理化（這在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之下也是絕對不可能的），也同樣證明了這一切。我們社會主義工業之空前的發展就是蘇維埃制度勝於資本主義制度之明顯的鐵證。

列寧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布爾塞維克未奪取政權之前，曾經說：我們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之後，在經濟上能夠而且必須『趕上與趕過先進的國家』（『列寧全集』，第十四卷，下冊，第二二三頁）黨的任務就是：鞏固現有的社會主義工業發展的速度及在最近的將來加強這種速度，以造成趕上與趕過先進國家所必須的優越條件。

（三）我們農村經濟發展的速度

一，在農村中，却巧相反，生產量的增加，是比較緩慢的。如果在一九二五至二六年農村經濟

的總生產量（以戰前盧布計算）與前一年比較起來增加了百分之一九·二，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增加百分之四·一，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增加百分之三·二，那末，按照國家計劃局所規定的五年計劃草案，在五年之中生產量一共要增加百分之二四，即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四·八，到一九三一至三二年的時候，農村經濟的生產量與戰前的生產量，比較起來要增加百分之二八到三〇。

農村經濟生產量的每年的增加，照這樣看來，總算還不差。但與資本主義國家比較起來，却不能算是一種超越的發展，是還不能在將來保持農業與我們國有工業間之必要的平衡的一種發展。美國農村經濟的生產量，在一八九〇至一九〇〇十年之中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九·三，在一九〇〇至一九一〇十年之中每年增加百分之三·一，在一九一〇至一九二〇十年之中每年增加百分之一·四。在戰前的俄國，農村經濟的生產量，在一九〇〇至一九一〇的十年之中每年增加百分之三·二至三·五，不錯，我們蘇聯農村經濟的生產量在一九二六——二七到一九三一——三二年五年之內每年要增加百分之四·八，與資本主義時代的俄羅斯的農業生產所增加的百分數比較起來，已經多了一些。但是我們切不可忘記，國有工業在一九三一至三二年度的總生產量與戰前比較起來要增加兩倍，全部工業的生產量到一九三二至三三年的時候，與戰前的生產量比較起來要增加百分之七〇；——而農村經濟在這時候的生產量與戰前的農村經濟生產量比較起來，却祇增加百分之二八到三〇，即不到三分之一。

因此，我們認為我們農村經濟發展的速度是不能令人滿意的。

二，我們農村經濟發展的速度與我們國有工業發展的速度比較起來，為什麼這樣緩慢呢？這一方面是由於我們農業技術非常落後、農村文化程度太低的緣故，另一方面（主要的原因），因為我們大規模的聯合的國有工業佔有很多的優勢，而我們渙散的農業生產是沒有這一種優勢的。最主要

的，是因為我們農村經濟的生產還沒有國有化，還沒有組織起來，還是一盤散沙似的。農村經濟現在並不是有計劃地進行的，大部份還被小生產的自發性所支配着。它還沒有按着集體化的原則組織和集合起來，因此它還是富農份子剝削的好場所。由於這一切原因，所以渙散的農村經濟還不能像我們國有化的工業那樣，取得那些有計劃的大生產底優勢。

農村經濟的出路在什麼地方呢？是不是使我們工業發展的速度緩慢一些呢？決不能這樣！這完全是反動的、反無產階級底烏託邦。（座下喊聲：『對啊！』）國有化的工業必須加速地發展起來。這是我們達到社會主義的保障。這同時也是農村經濟工業化底保障。

究竟出路在什麼地方呢？出路就在：使小的、渙散的農村經濟轉變為大的、聯合的公共耕種土地的經濟，轉變成以新技術為基礎的集體耕種土地的經濟。出路就在：用證明和說服的方法（而不是用強迫的方法）使碎小的農民經濟逐漸不斷的在公共的、集體的耕種土地的基礎上聯合成為大規模的經濟，採用農業機器和拖拉機，採用農業深耕化的科學方法。別的出路是沒有的。不這樣做，我們就不能趕上也更不能趕過農業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加拿大等國）。節制農村經濟中之資本主義成分，發展農村中之社會主義成分，吸引農民經濟於合作社的發展中，使國家在供給與銷售及生產上來包羅農民經濟方面能有計劃的影響農村——這一切辦法，果然都是非常重要的，但總祇能算是準備農村經濟過渡到集體制度的一種辦法。

三、最近兩年來，黨在這方面做出了些什麼成績來呢？我們所做到的還太少。在我們可能的範圍之內實際上還可以做到許多。至於說到從外部、從供給農村經濟以必需品及銷售農產品方面來包羅農村經濟，則我們有了下列的成績：現在差不多三分之一的農戶已組織在農業合作社裏面，消費合作社所包羅的供給事業已從百分之二五·六（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增加到百分之五〇·八（一九

二六至二七年），合作社和國家機關所包羅的農業品的銷售事業已從百分之五五·七（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增加到百分之六三（一九二六至二七年）。至於說到從內部，從農村經濟生產方面來包羅農村經濟，則我們所做到的還非常少。現在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的農業生產量一共祇佔全部生產量的百分之二多一點，商品生產量也祇有百分之七多一點。這裏的原因，當然是很多的，有客觀的原因，也有主觀的原因。我們的工作人員不會辦事，不充分的注意這件事情，農民的保守和落後，沒有充足的經費去幫助農民實行集體耕地制等等。這筆經費是很浩大的。列寧曾經在第十次黨代表大會上說，使農村經濟屈服在國有制度或集體制度之下，必需一大筆基金，可是現在我們還沒有這樣一筆基金。我認爲，這一筆基金我們現在已快要有了，而且這筆基金必將與時俱增，現在的情形是這樣：如果不把一盤散沙似的農民經濟組織起來，不把它們過渡到集體耕地制，也就不能使農村經濟的深耕化、機器化向前進展，也就不能使我們農村經濟發展速度趕上加拿大那樣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因此，目前的任務，就是要使我們農村工作人員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這件重要的事業上去。我認爲隸屬於人民土地委員部和農業合作社之下的借貸所，在這件事業中應起最大的作用，下面就是一個實在的例子。足可證明蘇維埃農場有時往往幫助農民過渡到集體耕地制，使農民得到極大的利益。這件事實，就是這樣：烏克蘭蘇維埃農場聯合會捐助拖拉機給放得薩區的農民，放得薩的農民寫了一封道謝的信，給烏克蘭的蘇維埃農場，這封信不久前曾發表在『新聞報』上。容許我把這封信讀一下吧。（喊聲：『請讀啊！』）

『我們是舍甫瑾珂農場、克拉新農場、加里寧農場「巧逢齊加」農場和「旭日」農場的移民，我們向蘇維埃政府深深地表示我們的誠懇的感謝，感謝你們給了我們這樣大的幫助，使我們得能振頓我們的農業。我們大多數都是沒有耕畜、沒有農具的貧農，我們不能耕種我們

名下的土地，我們迫不得已，祇好把土地租讓給富農，以取得一部份的收穫。收成總是很不好的，因為那些佃戶們對於人家的土地總不肯好好耕種的。國家分給我們的那一點小小的借款，我們都用盡了，我們已一年不如一年地貧窮起來，今年烏克蘭蘇維埃農場聯合會的代表到我們這裏來向我們提議，說用拖拉機來替我們耕種土地，代替借款。我們全體移民，除了富農之外都一致同意，雖然那時候很少人相信工作會做好的。誰知出人意料，拖拉機竟把一切土地都完全耕鬆，耕了五六次就把一切雜草石子剷盡，在全部土地上播種下了質量優美的種子，這真使我們高興得了不得，富農當然是怨恨得了不得，可是，富農現在總已不敢再譏笑拖拉機隊的工作了。今年本區的農民由於缺乏雨水的緣故，差不多都沒有種冬麥，就是在已經播種了冬麥的土地上，也都還沒有發芽。可是在我們的土地上已佈滿了成千成萬鮮綠茂盛的一莖莖雙穗的麥子，這就是在最富裕的德國殖民地上也從來沒有的。除了播種冬麥之外，拖拉機已把一切土地都種滿了五穀。現在我們已沒有一畝土地是棄置不耕或租給別人的了。現在我們無論那一個貧農，都有好幾畝土地的好麥子。我們自從看見了這樣偉大的拖拉機的工作之後，我們已不願再經營小的貧農經濟，我們決定組織集體的拖拉機的農場，我們與舍甫瑾珂蘇維埃農場訂了合同，他們已答應替我們組織拖拉機的農場。』（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新聞報』，第二六七期）

這樣的例子如果再多一些，這事業就可大大的進展了。

黨的任務就是：用合作社和國家機關來擴大在銷售和供給方面對農民經濟的包羅，在農村中提出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目前任務：逐漸將渙散的農民經濟過渡到根基於使農業深耕化與機械化上的大規模的、集體的經濟，過渡到公共的、集體的耕地制，使這種發展的道路就是加速農村經濟發展。

的·速·度·和·克·服·農·村·中·資·本·主·義·成·分·之·最·重·要·的·方·法·。

這就是經濟建設方面一般的成績和總結。

這並不是說，我們在這方面的工作，就都做得很好了。不，同志們，我們在這方面的工作還差得很。

例如，我們現在還有商品飢荒的成份。這是我們經濟中的缺點，不過缺點現在還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我們重工業發展的速底比輕工業還要快——這件事實的本身已使商品飢荒的成份在最近幾年之中還是要存在的。但我們如果要努力的使我們國家的工業化向前進展，那我們沒有別的法子，就只好這樣做。有些人，例如我們的反對派，盡量的在投機商人的尾巴後面搜集他們理論上的材料，高叫商品飢荒，要求『超工業化』。但是同志們，這完全是無稽之談。祇有糊塗人才會說這樣的話。我們決不能也決不應該因為要發展工業而縮小重工業。而且不加速發展重工業，也就不能充份的發展輕工業。反對派有一個時候曾經主張增加進口貨以消滅商品的飢荒。可是，這一種蠢笨的主張，就是反對派自己後來也祇好放棄。但是我們，在我們條件下所完全可以做到的，而且為黨所堅持的、減少商品飢荒的事業到底做到了多少，那是另外一個問題。我認為正就是在這方面，我們的工作還不好。

此外，在我們工業方面和商業方面都還有比較不少的資本家。這些份子的比重並不像我們有些同志所說的那樣小。這也是我們經濟中的一個缺點。不久前我把拉林著的『蘇聯之私有資本』一書讀了一遍，這本書從各方面看來都是很有興趣的。我介紹同志們最好也把這本書去讀一下。你們從這本書裏面，就可知道資本家怎樣狡猾地聰明地在生產合作社的旗幟之下，在農村經濟合作社的旗幟之下，在各種商業機關的旗幟之下掩藏起來。有沒有用盡了各種方法去節制和減少資本家，使

資本主義成份終於從國民經濟的範圍內排擠出去呢？我認爲沒有用盡各種方法。據我所知道的，例如在家庭手工業方面，尤其是在皮革和紡織工業方面，有很多新興的資本家在剝削這些手工業者和一般小生產者。我們有沒有用盡了各種方法把這些剝削份子從經濟上排擠出去，把手工業者與合作社或國家機關聯繫起來呢？毫無疑義的，在這一方面還差得很。可是這個問題對我們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同時，鄉村中的富農也有了相當的發展。這是我們經濟中的一個缺點。有沒有用盡了各種方法去節制富農，使富農在經濟上孤立呢？我認爲沒有用盡各種方法。有些同志認爲應當用行政手段，經過國家政治管理局去消滅富農。他們說：『祇要打一個印子就完了。』這是不對的。這個方法是很容易做到的，可是很不切於實際的。我們應當在革命法律的基礎上，用經濟手段去對待富農。可是革命法律並不是一句空話。採取相當的行政手段去反對富農當然也是可以的。但行政手段決不能代替經濟手段。在反對富農這一件工作中，我們對於我們的合作社機關、尤其是農業機關對黨的路線之曲解，必須加以鄭重的注意。

此外，我們還有這樣的事實：工業成本費、工業品的發行價格及城市商品的零售價格，減低的速度都非常緩慢。這也是我們經濟建設中的缺點。在這一方面，我們常常遇到國家機關、合作社機關和黨的機關的很大的反抗，這一點也不得不指出的。我們的同志，大概都不瞭解降低工業品的價格是改善我們工業、擴大市場及加強工業發展的源泉之最主要的槓桿。毫無疑義的，祇有與我們各級機關的這一個惰性、對降低價格政策的這一種反抗作無情的奮鬥，才能消滅這一個缺點。

最後，我們還有這樣一個缺點，就是預算案中的燒酒事業，我們對外貿易發展的速度非常緩慢，同時又缺乏商品的積蓄。我認爲我們可以開始漸漸的縮小燒酒事業，發展電影和無線電事業，

以這一種收入的來源來代替燒酒事業。實際上，爲什麼不擱取這一種很重要的事業，不把真正的布爾塞維克放到這種事業上去，使這種事業興隆起來，藉此而消滅燒酒事業呢？至於說到對外貿易，我認爲我們經濟上的許多困難都是由於出口不充分的緣故。我們可否使出口事業發展起來呢？我認爲是可以的。我們有沒有用盡一切方法去發展出口事業呢？我認爲是沒有。商品的積蓄也是這樣。有些同志，一方面是由於輕率從事，另一方面是由於不明白實際的情形，便瞎說『我們沒有商品的積蓄』，這種說法是不對的。同志們，我們的商品是有一點積蓄的。我們的一切國家機關，上至中央的以及州的國家機關，下至省的以及縣的國家機關，是辛辛苦苦地積蓄了一些。但是這些商品的積蓄還太少。這是必須承認的。因此我們的任務就是要盡可能的增加商品的積蓄，有時甚至於必須減少一點日常的消費。

同志們，這就是我們經濟建設的一些缺點，對於這一種缺點，我們必須加以鄭重的注意，而且無論如何必須把它們消滅，使我們的經濟建設能夠加速地前進。

(四) 階級、國家機關、國家的文化發展

我們現在要從經濟問題談到政治問題了。

一，工人階級。——工人階級和僱傭勞動數量的增加。僱傭勞動的數量（失業工人除外），在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共計八、二一五、〇〇〇人，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共計一〇、三四六、〇〇〇人，一共增加了百分之二五。其中體力勞動的工人（農業工人和季候工人也包括在內），在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共計五、四四八、〇〇〇人；至一九二六到二七年則已達七、〇六〇、〇〇〇人，共增加了百分之二九·六。其中大工業的工人在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共計一、七九四、〇〇〇人；至一九二六

到二七年已達二、三八八、〇〇〇人，一共增加了百分之三三。

工人階級的物質狀況。僱傭勞動者的總收入，在一九二四至二五年佔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四·一，至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就增加到百分之二九·四，與戰前比較起來，增加了百分之三〇；可是其他社會階層（資產階級也包括在內）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百分數，在這同一時期內反而減少了一些（例如，資產階級的成分已從百分之五·五減少到百分之四·八）。一切國家工業的工人，在一九二四至二五年的實際工資（公家所扣的款項除外）每月平均二五·一八個以莫斯科的價值來計算的盧布，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共計三二·一四盧布，兩年之內一共增加百分之二七·六；超過戰前的水平百分之五·四。如果把公家所扣的款項（社會保險費、文化的消費、市政用費等等）也算在一起，一九二四至二五年的工資共達戰前百分之一〇一·五，至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則已達戰前百分之一二八·四。社會保險的基金，在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共計四六一、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已達八五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即增加百分之八五，因此使我們可以派送五一三、〇〇〇人到休養所和療養所去休養，可以保證四六〇、〇〇〇失業工人的生活費，可以撫恤七〇、〇〇〇個廢人（因勞動和國內戰爭而殘廢的人），工人在疾病期內，可以得到完全的工資。

工人房舍的建設費，在兩年以前，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共計一三二、〇〇〇、〇〇〇餘盧布，一九二五至二六年共計二三〇、〇〇〇、〇〇〇餘盧布，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共計二八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共計三九一、〇〇〇、〇〇〇餘盧布，中央執行委員的宣言上所規定的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也包括在內。三年以來，工人房舍的建設費一共是六四四、七〇〇、〇〇〇盧布，把一九二七至二八年所預定的數目算在一起，共計一、〇三八、〇〇〇、〇〇〇盧布。這三年來的建築費一共建築了四、五九六、〇〇〇平方米突的房舍，滿足了二五七、〇〇〇個工人

的房舍需要（如果把工人的家眷算在一起，約有九〇〇、〇〇〇人）。

失業問題、蘇聯職工會中央和人民勞動委員會，在這個問題上有一種分歧。我現在以人民勞動委員會的統計作為標準，因為，這個統計是要勞動介紹所有關係的失業工人底確數。按照人民勞動委員會的統計，兩年來失業工人的數目一共從九五〇、〇〇〇人增加到一、〇四八、〇〇〇人。其中產業工人佔百分之一六·五，智力勞動和不熟練的工人佔百分之七四。所以，我們失業工人的基本來源是鄉村的人口過剩，我們工業容量的有限祇是一種次要的原因。

總結：整個工人階級的物質狀況是毫無疑義的提高了。

黨的任务就是：繼續改善工人階級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狀況和提高工人階級的工資的路線。

二，農民。——我想，關於農民的分化問題用不到引數目字了，因為我的報告太長，而且，數目字大家都知道了的。毫無疑義的，無產階級專政之下的分化是不能與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的分化混為一談的。在資本主義之下，兩個極端日益發展：貧農與富農日趨分化，中農一天比一天減少。而在我們國內，却巧相反，中農（一部分貧農漸漸升為中農）和富農日見增加，而貧農却一天天的減少。這個事實就是證明農村中的中心人物還依舊是中農。依靠在貧農身上，與中農聯合，對於我們整個建設的命運，對於無產階級專政有非常重大底意義。

鄉村物質狀況一般的發展。農民收入增加的數目如下：兩年以前，即一九二四至二五年，農民的收入共計三、五四八、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至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就已增加到四、七九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即增加百分之三五·一，農民的人口在這個時期內一共增加百分之二·三八。這毫無疑義的證明農村的物質狀況是日趨改善了。

但這並不是說，全國各地的農民的生活狀況都改善了。大家知道，這兩年以來，有些地方收成很壞，一九二四年歉收的影響也還沒有完全消滅。因此國家給一般的勞動農民特別是貧農以經濟上的幫助。國家在一九二五至二六年，幫助勞動農民的經費共計三七三、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共計四二七、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九二五至二六年特別幫助貧農的經費如下：幫助最貧窮的農戶的共計三八、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貧農免繳的稅捐共計四四、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最貧的農民免繳的保險費共計九、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一共總計算起來是九一、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九二六至二七年特別幫助農民的經費如下：幫助最貧窮的農戶的三九、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貧農免繳的捐費五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最貧的農民免繳的保險費九、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共計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總結：基本農民羣衆的物質狀況是改善了。
 黨的任务就是：繼續改善基本農民羣衆。首先是貧農的物質狀況和文化狀況，鞏固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合，提高工人階級和黨在農村中的威信的路線。

三，新興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新興資產階級的特點就是，它同工人階級和農民完全相反，它決不能滿意蘇維埃政權的。它底不滿，並不是偶然的。這種不滿，是有生活底根源的。我已對你們說過，我們的國民經濟，我們的工業，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成分，都已經一天天的發展起來，而私有資本以及小的商人却日見衰落。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如果我們的工業和商業機關發展起來，成千成萬的中小資本家就要隨之而破產。在這幾年來，多少私人的小店鋪關了門呢？有好幾千。多少生產者無產階級化了呢？也有好幾千。在我們國家機關實行裁員以後，被裁的職員有多少呢？成千成萬。推進我們的工業，推進我們的商業機關和合作社機關，改善我們的國家機

關，就是我們國家的一種進步和改良，這一種進步和改良祇利於工人階級，利於農民的基本羣衆，而不利於新興資產階級，不利於一般中產階級，尤其不利於城市的中產階級。在這些階層中間，對於蘇維埃政權不滿的情緒日形增長，這有沒有什麼奇怪呢？當然是毫不奇怪的。因此在這種階層中充滿了反革命的情緒，產生了改變道標派的思想——這是新興資產階級政治市場上的最時新的貨物。

但如果以為一切職員、一切知識份子都處在一種不滿的狀態中，都是反對蘇維埃政權的，那末這也是錯誤的。新興資產階級的不滿情緒雖日見增長，但知識份子中間却發生了分化，他們漸漸的脫離改變道標派的思想，成千成萬勞動的知識份子都漸漸地轉到蘇維埃政權方面來了。同志們，這是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實。這些知識份子的主幹就是技術方面的知識份子，因為他們與生產的過程有密切的聯繫。他們不能不看到，布爾塞維克是在引導我們的國家向前進展。許許多多驚人的大建築，例如：伏爾霍甫水電站，第列泊爾水電站，斯維爾水電站，土耳其坦鐵路，伏爾加河、頓河的開通，許許多多新工廠的建築（技術方面的知識份子與這一切大建築的命運是密切關聯着的），對於一部份技術方面的知識份子當然不能不發生一種很好的影響。這對於他們不僅是飯碗問題。這是一種偉大的創造事業，這一種偉大的創造事業自然而然地使他們與工人階級、與蘇維埃政權親近起來鄉村中的勞動知識份子，尤其是鄉村的教師更不用說，他們早已站在蘇維埃政權方面，他們不能不慶賀鄉村教育事業的發展，因此在某一部份知識份子中間對蘇維埃政權的不滿情緒雖日見增長，但同時廣大的勞動知識份子却已經與工人階級聯合起來了。

黨·的·任·務·就·是·：·要·繼·續·使·新·興·資·產·階·級·孤·立·及·鞏·固·工·人·階·級·與·蘇·聯·城·鄉·勞·動·知·識·份·子·聯·合·的·路·線·。

四、國·家·機·關·及·與·官·僚·主·義·的·鬭·爭·。——官·僚·主·義·問·題·，·現·在·說·的·人·非·常·之·多·，·我·不·必·再·來·多·

講了。官僚主義份子在我们的國家機關、合作社機關及黨的機關中，當然是有的，這是不成問題的。與官僚份子作鬭爭是必須的，在國家政權尙未消滅之前，在國家還存在着的時候，這個任務是時刻擺在我們面前的，——這也是事實、但是總應當守一點分寸才是。與國家機關中官僚主義份子應當鬭爭的，但如果因此而至主張消滅國家機關，解散國家機關，毀壞國家機關，——這就走上了違反列寧主義的道路，就是忘記我們的國家機關是蘇維埃的機關，是世界上最完善的一種國家機關。我們國家機關的力量在什麼地方呢？它的最強就在於：它經過蘇維埃而使政權與廣大的工農羣衆聯繫起來。就在於蘇維埃是成千成萬的工農羣衆學習管理的學校。就在於國家機關與廣大的人民羣衆沒有絲毫的隔閡，經過許許多多的羣衆組織，各種各樣的委員會、社會團體、代表會議等等與民衆混合起來。它們是圍繞於蘇維埃機關的周圍的，政權機關就是依靠在這種社會組織身上的。我們國家機關的弱點在什麼地方呢？就是官僚份子的存在，這些份子時刻在損害和破壞國家機關的工作。要把官僚主義從國家機關中驅逐出去（一兩年之內是驅逐不完的），就必須有系統地改良國家機關，使它和羣衆接近起來，提拔忠於工人階級事業的新人才，以共產主義的精神，去改造國家機關，而並不是去破壞它，解散它。列寧說：『如沒有國家機關，我們早就滅亡了。如不有系統地堅決地改善國家機關，我們在未建築下社會主義的基礎之前，就必然要滅亡。』列寧這句話是千真萬確的。

關於我們國家機關中的那一些缺點，我不詳細的敘述了。這些缺點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我首先要講一講『辦事遲緩的官僚主義』。我手頭有一大卷材料，都充滿了這種官僚主義的事實。審判機關、行政機關、保險機關及合作社等機關的工作人員，辦事都非常遲緩，往往把一切重要事情擱置起來置之不理。有一個農民，到保險所去了二十一次，想得到一點真實的消息，可是結果一點也

沒有得到。還有一個農民，已經是六十六歲的老頭子，老遠的從六百俄里的地方跑到縣立社會保險所那裏去弄明白一件事情，可是結果一點也得不到什麼。還有一個五十六歲的鄉村老太婆，走了五百俄里的路，又坐了六百俄里的馬車，辛辛苦苦的跑到人民審判廳那裏打一件官司，可是結果還是得不到一點真理。這一類的事實，簡直不勝枚舉。同志們，這確實是我們的恥辱！這樣不成體統的現象我們怎麼能夠忍耐下去呢？

最後，還要講一點『壓制人才』的事實。除了從工人中提拔人才之外，還有一種『壓制人才』的現象，這些人才被他們的同事擠了下去，並不是因為能力薄弱，而是因為他們肯努力的、誠實的工作的緣故。有一個器械工人，因其能力高強、品格高尚而被提拔了起來。他做工作非常勤懇，極力振頓秩序，剷除一切浪費和不經濟的現象。因此妨害了一部份狼狽為奸的『共產黨員』底安寧，引起了他們的仇恨，後來怎麼樣呢？這些狼狽為奸的『共產黨員』於是便多方設法和他為難，迫使他辭職，硬把他『排擠』下去。『老兄，你想聰明過人！你不使我們安安靜靜地過活和享樂，哼，老子就要請你滾蛋？』還有一個工人，也是器械工人，也是由工廠中提拔出來的。他做工作也很誠懇而努力。可是這又妨害了一部份人的安寧。結果怎麼樣呢？結果這些『不得安寧的』同事們便藉故把他趕走了。這位工人被趕走時的感覺怎樣呢？他說：『無論派我到什麼地方去工作，我總是要努力證明人們對我的信任、毫不辜負他們。可是這一件惡作劇的事，我是永不忘記的。我蒙了極大的污辱。我希望把一切事情弄個清白，可是這終究是一個希望罷了。工廠委員會、工廠管理處以及支部都不願意聽我的話。我為提拔而死，他們即使把金子散在我的身上——我是無論如何不走的。』（『勞動報』一，二八期，一九二七年六月九日）同志們，這是我們的恥辱！這樣不成體統的事，情怎麼能夠忍耐下去呢？

黨的任務就是：要與官僚主義鬭爭，改善國家機關，用赤熱的鐵條來燒滅上述一切不成體統的現象。

五，列寧關於文化革命的口號。——反對官僚主義最可靠的一個方法就是提高工農的文化程度。我們可以辱罵國家機關中的官僚主義，可以誹謗和辱罵官僚主義，但如果不提高廣大工人羣衆的文化程度，使他們能夠從下層以工人階級自己的力量來監督國家機關，那官僚主義還是可以存在的。因此發展工農羣衆的文化程度，不僅是要使他們識字（識字雖然是文化的基礎），而且也必須要使他們學會管理國家的那一種技能，——這是改善國家機關及其他一切機關的基本槓桿。列寧關於文化革命的口號底意義就在於此。列寧在一九二二年三月第十一次黨代表大會開幕之前，給中央委員莫洛託夫同志的信中，關於這個問題曾這樣說道：

「我們最缺乏的就是文化和管理國家的技能。新經濟政策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已完全可以担保我們建築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現在的問題一僅僅一在於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的文化程度。」

同志們，我們切不可忘記列寧的這句話。（座下喊聲：『對啊！』）黨的任務就是：要加強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羣衆文化的發展。關於我們國內的政治狀況可以得到怎樣的一個總結呢？總結就是這樣：蘇維埃政權現在已成了世界上最堅固的一個政權了。（熱烈的拍掌聲）

蘇維埃政權雖已算爲世界上最堅固的一個政權，是可以被任何資產階級政府所羨慕的一個政權，可是這並不是說，我們在這一面的情形全都是很好的了。不，同志們，我們在這一方面還有許多缺點，我們每一個布爾塞維克不應把這種缺點隱藏起來。第一，我們國家內還有失業工人，這是我們的一個缺點，我們必須克服這一種現象，至少必須盡量地使它減少到最低限度；第二，工人的住房

還不够，發生了一種住房的恐慌，這一個現象在最近的將來也必須把一消滅，至少也必須把它減到最低限度；第三，不僅在中等階層中有反猶太人的情緒，就是一部份工人以及黨員中間也還有這一種的情緒。同志們，我們必須與這一種情緒作無情地鬭爭。此外，反宗教的鬭爭也有一種削弱的趨勢，最後，文化程度也非常落後，——不僅是從這個字的廣義方面來講，就是從這個字的狹義方面來講（即從最粗淺的識字的意義上來講）也是非常落後的，因為蘇聯不識字的人還是多得很。

同志們！如果我們要迅速的前進，我們就應當努力的去消滅這一類的缺點。

在第十四次黨大會到第十五次黨大會的時期中，曾經有幾次委任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關於這一點我還要講幾句話，藉此把這一段報告來作一個結束。關於委任李可夫為蘇聯人民委員長這件事姑且不講。此外關於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人民商業委員部、蘇聯國家政治管理局等等的委任我也不講了。我現在所要講到的就是有模範意義的三個委任。你們知道，現在已正式委任羅波夫為蘇俄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的主席。他是一個五金工人。你們知道，烏漢諾夫已代替加米涅夫而當選為莫斯科蘇維埃的主席，他也是一個五金工人。同時，康馬洛夫已代替季諾維埃夫而當選為列寧格勒蘇維埃的主席，他也是一個五金工人。現在兩大首都的『市長』都是五金工人了。（拍掌）他們固然不是貴族出身，但是，他們管理京都的事務比任何貴族都要好得多。（拍掌）你們也許要說，這是五金化的趨勢。但我認為這絲毫沒有壞處。（會場叫道：『却巧相反，這是很好的現象。』）希望資本主義的國家，希望倫敦和巴黎，希望它們最後能趕上我們，能提拔他們自己的五金工人來充當『市長』。（拍掌）

選自斯大林選集第三卷一九三九年解放社版

『聯共中央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與結論』第一八六至二一六頁

在糧食戰線上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八日與紅色教授學校，共產主義學院以及斯維爾德洛夫大學學生的談話摘錄——

那末對於我們一般工業發展速度，特別從輕工業與重工業對比關係方面看來，應得出什麼結論呢？

回答：驟然看來，也許覺得我國糧食困難是一種偶然現象，只是由於設計工作不好，只是在經濟計算工作中有些錯誤。可是，只有驟然看來才會覺得是這樣。其實，這裏困難原因是更深刻得多的。設計工作不好，經濟計算工作上的錯誤，在這裏起了頗大的作用，——這是有絲毫懷疑的，可是，如果以設計工作不好與偶然錯誤來解釋一切，那就大錯特錯了。輕視設計工作底作用與意義，那是錯誤的。可是，誇大計劃原則底作用，以為我們已達到可能計劃與調節一切的發展階段，那就更錯誤了。不要忘記，在我們國民經濟中，除那些服從於我們計劃影響的成份而外，還有另一種成份，即暫且尙不服從於計劃工作的成份，最後還有些敵視我們的階級，而這些階級是不可用單純的國家計劃局的設計工作手續來克服的。正因為如此，所以我認為不可把一切都歸結為簡單的偶然現象，歸結為設計工作錯誤等等。

那末，我國糧食戰線上種種困難底基本原因何在呢？

我國糧食困難底基本原因，就在於我國商品糧食產量增長速度是比糧食需要額增長速度慢些。工業是在增長着。工人數量是在增長着。城市是在增長着。最後，需要商品糧食的各種技術作物（棉、麻、糖蘿蔔等等）出產區域，是在增長着。所有這些情形，就使糧食需要額，商品糧食需要額迅速增長起來，而商品糧食產量增長速度，却慢得要命。不能說我們今年採辦得來的由國家支配的糧食比去年或前年少些。恰巧相反，我們今年所採辦得來的由國家支配的糧食，要比過去幾年多得多。可是，我們現在畢竟遇到了糧食困難。請看幾個數字吧。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截至四月一日止，我們共採辦有四萬三千四百萬普特糧食。其中輸出國外的有一萬二千三百萬普特，所採辦得來的糧食剩留在國內的有三萬一千一百萬普特。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截至四月一日止，我們共採辦有五萬九千六百萬普特糧食。其中輸出國外的有一萬五千三百萬普特，所採辦得來的糧食剩留在國內的有四萬四千三百萬普特。在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截至四月一日止，我們共採辦有五萬七千六百萬普特糧食。其中輸出國外的有二千七百萬普特。所採辦得來的糧食剩留在國內的有五萬四千九百萬普特。換言之，在本年度，截至四月一日止，我們已經採辦來供國內需要的，比去年多一萬萬普特，比前年多二萬三千萬普特。可是，我們今年在糧食戰線上還是遇到了困難。

我有一次做報告時已經說過，農村資本主義份子，特別是富農，利用這些困難來破壞蘇維埃經濟政策。你們知道，蘇維埃政權已採取好些辦法來消滅富農底反蘇維埃發動。因此，關於這點，我現在不來多說。我在這裏所注意的，是另外一個問題。我所指的，就是關於商品糧食出產額增長得緩慢的原因問題，就是關於雖然我國播種面積和糧食出產總量已經達到戰前程度，而我國商品糧食出產額還是比糧食需要額增長得慢些的問題。

我國播種面積已達到戰前程度，這難道不是事實麼？是的，這是事實。糧食出產總量在去年已等於戰前出產額，就是說已達到五十萬萬普特糧食，這難道不是事實麼？是的，這是事實。那末爲什麼雖有這些情況，而我們所出產的商品糧食却比戰前少至兩倍，而輸出國外的糧食却幾乎比戰前少至二十倍呢？這首先和主要是因爲在十月革命發生後，我國農業結構發生了變化，已從商品糧食出產極量多的巨地主經濟和巨大富農經濟，過渡到了商品糧食出產量極少的小農經濟和中農經濟。戰前我國有一千五百萬至一千六百萬個體農戶，而現在我國却有二千四百萬至二千五百萬農戶，——單是這一點就已說明現在我國農業底主要基礎，是商品糧食出產量極少的小農經濟。巨大農莊，不管它是地主農莊也好，富農農莊也好，或是集體農莊也好，其所有的長處，就是它能採用機器，利用科學成績，採用肥料，提高勞動生產率，所以它能出產最多的商品糧食。反之，小農經濟所有的弱點，就是它沒有這種可能性，或幾乎沒有這種可能性，所以它是半消費性的經濟，商品出產量很少的經濟。例如拿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來說吧。它們所出產的商品糧食佔它們的總產量百分之四七點二。換言之，它們所糶出的商品糧食比戰前地主農莊所出產的還要多，而小農農莊和農農莊呢？它們所出產的商品糧食只等於它們的出產總量百分之一一點二。可見，這裏的差別是很大的。

從下面的數字中，便可看出過去戰前時期與現在十月革命後時期糧食生產底結構情形。這些數字是中央統計局委員聶蒙啓諾夫同志製定的。據聶蒙啓諾夫同志在說明書裏附帶聲明說，這些數字並不能說完全精確，而只能使人作出一種大約的計算。但這些數字完全足使我們明白，從一般糧食生產底結構上看來，特別從商品糧食生產底結構上看來，戰前時期與十月革命以後時期是有很大差別的。

大戰以前：

	糧食出產總量		商品糧食(運出農村以外的)		商品糧食所佔百分數	
	單位百萬普特	百分數	單位百萬普特	百分數	單位百萬普特	百分數
(1) 地主	六〇〇	一一·〇	二八一·六	二一·六	四七	
(2) 富農	一,九〇〇	三八·〇	六五〇·〇	五〇·〇	三四	
(3) 中農和貧農	二,五〇〇	五〇·〇	三六九·〇	二八·四	一四·七	
總計	五,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三〇〇·六	一〇〇·〇	二六	
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						
	單位百萬普特	百分數	單位百萬普特	百分數	商品糧食所佔百分數	
(1) 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	八〇·〇	一·七	三七·八	六·〇	四七·二	
(2) 富農	六一七·〇	一三·〇	一二六·〇	二〇·〇	二〇·〇	
(3) 中農和貧農	四,〇五二·〇	八五·三	四六六·二	七四·〇	一一·二	
總計	四,七四九·〇	一〇〇·〇	六三〇·〇	一〇〇·〇	一三·三	

這個統計表是說明什麼呢？

第一，它說明絕大部份糧食出產，已從地主富農方面轉到小農中農方面。這就是說，小農中農既已完全解脫了地主壓迫，在基本上打破了富農勢力，於是就得到了最切實改善自己物質狀況的可能。這是十月革命底結果。基本農民羣衆從十月革命方面所獲得的最大利益，首先就表現在這裏。

第二，它說明我國商品糧食基本擁有人，是小農，尤其是中農。這就是說，不僅從糧食出產總量方面看來，而且從商品糧食出產額方面看來，蘇聯在十月革命之後，已變成小農經濟的國家，中農成了農業方面的『中心人物』。

第三，它說明地主經濟（巨大經濟）已被消滅，富農經濟（巨大經濟）已縮減至三倍有奇，我國已由大地主富農經濟過渡到只能糶出百分之二一的产品的小農經濟，同時在糧食生產方面又還沒有若何發展的巨大公共經濟（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這些情形，本來應當而且果然已使商品糧食出產額比較戰前銳減了。雖然我們現在糧食出產總量是與戰前產額一樣，而我們現在所有的商品糧食，却比戰前少至兩倍，——這是事實。

這就是我們在糧食戰線上困難底基本原因。

正因爲如此，所以不可把我們在糧食採辦工作方面的困難當作是簡單的偶然現象。

毫無疑義的，還有一個情況也在這裏起了某種不良作用，這就是我們商業機關承担了本來沒有必要的一種替許多中小城市供給糧食的義務，結果是不能不在某種程度上減少了國家糧食儲存。可是，我們在糧食戰線上遇到困難的基本原因，當然不是這個情況，而是我國農業商品額增長得遲慢，而同時商品糧食需要額却增長得很迅速的事實。

出路何在呢？

有些人認爲出路就在於恢復富農經濟，在於發展和擴展富農經濟。這些人不敢說要恢復地主經濟，因爲他們大概懂得，在現時來瞎說這類事情，是很危險的。可是，唯其如此，他們也就更高興說必須多方發展富農經濟，以利用於……蘇維埃政權。這些人認爲蘇維埃政權可以同時倚靠於兩個彼此對立的階級……一方面倚靠於以剝削工人階級爲經濟原則的富農階級，另方面倚靠於以消滅任何剝

削為經濟原則的工人階級。這真是只有反動派才表演得出來的把戲。不必證明：這種反動「計劃」，是與工人階級利益，與馬克思主義原則，與列寧主義任務沒有絲毫相同處的。有人說，富農並不「劣於」城市資本人家，富農絲毫也不比城市耐潑曼危險些，因此我們現在不必「害怕」富農，——這種說法是自由派的空話，是用來催眠工人階級和基本農民羣衆的警覺性的。不要忘記，如果說我們在工業方面能用供給工業商品總量十分之九的巨大社會主義工業去和城市小資本人家對立，那末我們在農村生產方面所能用去與巨大富農生產對立的，却不過是尙未強固而糧食產量尙比全體富農農莊糧食產量少至八倍的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不懂得巨大富農農莊在農村中的意義，不懂得富農在農村中的比重超過資本人家在城市工業中的比重百倍的事實，那就是神經錯亂，完全離開列寧主義，而投奔到工人階級底敵人方面去了。

那末，出路究竟何在呢？

(1) 首先，出路就是把落後的散漫的細小農場聯合為大規模的公共農莊，這種公共農莊是得到機器供給，用科學成績武裝起來，而能够生產最多商品糧食的。出路就是要在農業方面由個體的農民經濟過渡到集體的公共的經濟。

列寧還在十月革命最初時日，就已號召我們黨去組織集體農莊。從那時起，關於集體農莊思想的宣傳，在我們黨內是始終沒有停止過的。可是，關於建設集體農莊的號召，直到近來才獲得羣衆方面的響應。這首先是因為農村中合作社運動的廣濶發展，已在農民情緒上準備了一個趨向於集體農莊的轉變，而有許多集體農莊現時已能每俄畝出產一百五十至兩百普特糧食，其中商品糧食佔全部收成百分之三四十的情形，又在貧農和下層中農裏面造成了很願意加入集體農莊的趨向。還有一個情況在這裏也有不小的意義，這就是我們國家直到最近以來才獲得了大大資助集體農莊運動的可

能。大家知道，國家在今年所已支出幫助集體農莊的款項，比去年多至兩倍（在六千萬盧布以上）。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是完全正確的，它認為羣衆集體農莊運動所需要的條件已經成熟，認為加強集體農莊運動是提高我國糧食生產商品額的最嚴重方法之一。

據中央統計局統計，集體農莊在一九二七年的糧食出產總量不下五千五百萬普特，其一般平均商品額是等於百分之三十。本年年初所發生的那個成立新集體農莊的廣濶浪潮和實行擴大舊集體農莊的事實，將使集體農莊糧食產量到本年年底大大增加起來。任務就是要保持現時集體農莊運動發展速度，擴大集體農莊規模，取消那些虛張的集體農莊，而組織真正的集體農莊，並規定各集體農莊必須把全部商品糧食交給國家和合作社機關，不然就領不到國家方面的津貼和借款。我認為只須遵守這些條件，那我們經過三四年後，就能從集體農莊方面得到約近四五千萬普特的商品糧食。

人們有時候把集體農莊運動與合作社運動對立起來，大概認為集體農莊是一回事，而合作社却是另一回事。這當然是不對的。有些人甚至把集體農莊與列寧底合作社計劃對立起來。不待說，這種對立是絲毫不合真情的。其實，集體農莊是一種合作社形式，是最明顯的生產合作社形式。有銷售合作社，有供給合作社，也有生產合作社。集體農莊一般說來是合作社運動不可分開的組成部份，局部說來是列寧合作社計劃不可分開的組成部份。實行列寧合作社計劃，就是把農民從銷售合作社和供給合作社提高到生產合作社，提高到集體農業合作社。也就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我們的集體農莊，是在銷售合作社和供給合作社發展和加強了的時候才產生和發展起來的。

(2) 其次，出路就是要擴大和鞏固原有的蘇維埃農莊，組織和發展新的巨大蘇維埃農莊。據中央統計局統計，現有蘇維埃農莊糧食出產總量，在一九二七年不下四千五百萬普特，其中商品額佔居百分之六十五。毫無疑義，在國家予以相當贊助下，蘇維埃農莊就可大大提高糧食生產了。

可是，任務並不以此爲限。蘇維埃政權已經決定，在那些沒有農民份地的區域內應組織新的巨大的蘇維埃農莊（每個農莊由一萬至三萬俄畝不等），這些農莊經過五六年後，就應出產約近一萬萬普特的商品糧食。組織這些蘇維埃農莊的工作，已在着手進行，任務就是無論如何都要實現蘇維埃政權底這個決定。我認爲：只須完成這些任務，那我們大約經過三四年後，就能够從新舊蘇維埃農莊方面得到八千萬至一萬萬普特左右的商品糧食了。

（3）最後，出路就是要一貫提高小農和中農個體經濟底收成率。我們不可以而且不應當贊助巨大的個體經濟，即富農經濟。可是，我們可以而且應當贊助小的中等的個體農民經濟，提高它的收成，把它引上合作制底軌道。這是一個舊的任務，是我們還在一九二一年用糧食稅代替餘糧收集制時就已特別用力宣佈過的任務。這個任務後來又由我們黨在第十四次和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加以批准了。現在因爲在糧食戰線上發生困難，這個任務底重要性也就更其明顯了。因此，應當堅決執行這個任務，也如必須堅決執行頭兩個任務，即關於集體農莊的任務和關於蘇維埃農莊的任務一樣。

所有一切材料，都是說明農民經濟底收成率在幾年以內便能增高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現在我國所使用的木犁，不下五百萬。只須用鐵犁代替這些木犁，就可使我國糧食產量大大增長起來。更不必說，我們將用某種最低限度數量的肥料、優良種子和小型機器等等供給農民經濟。訂立合同，與整鄉整村訂立關於供給它們以種子等等，同時一定要它們交出相當數量糧食的條約，就是提高農民經濟收成率和吸收農民加入合作制的最好方法。我認爲：只須在這方面認真工作，那末經過三四年以後，我們便能從小農和中農個體經濟方面取得不下一萬萬普特的新增商品糧食了。

所以，只須執行這一切任務，那末經過三四年以後，我們國家就會擁有二萬萬至二萬五千萬普

特的新增商品糧食，而在國內和國外都頗能機動自如了。

爲逃出糧食戰線上的困難所必須採取的辦法，大體上就是如此。

除採取這些基本辦法而外，還要採取一些臨時辦法來改善關於用商品供給農村的設計工作，並且使我們各商業機關不再担任供給許多中小城市糧食的義務，——這就是現時的任務。

除這些辦法而外，是不是還應當採取其他某些辦法，譬如說採取降低我國工業發展速度的辦法，因爲我國工業增長是使糧食需要額迅速增長，甚至於暫時還超過商品糧食產量增長速度的？不是的，是不應當的。無論如何都是不應當的！降低工業發展速度，就是削弱工人階級，因爲在工業發展方面的每個前進步驟，每個新工廠，按照列寧說法，都是工人階級底『新要塞』，足以及加強它在反對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的鬭爭中，在反對我國經濟裏資本主義份子的鬭爭中的陣地。恰巧相反，我們應當保持現時的工業發展速度，我們應當在一切可能時就更加發展這個速度，以便把大批商品輸入農村，並從那裏多多收取糧食，以便把機器供給農業，首先是供給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以便把農業工業化，並提高農業生產底商品額。

也許爲着更加『慎重』起見，應當阻延重工業發展速度，把主要是供應農民市場的輕工業變成我國工業底基礎吧？無論如何都是不應當的！這就會是自殺，這就會是破壞我國全部工業。連輕工業也在內。這就會是離開我國工業化底口號，把我國變爲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底附屬品。我們在這裏所持的出發點，就是列寧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世界代表大會上所提出的著名的指示，這些指示是我們全黨所絕對必須遵行的。請看列寧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世界代表大會上關於這個問題所說的話吧：

『要挽救俄國，單靠農民經濟收成豐盛還不够，而且單靠供給農民消費品的輕工業情況與旺，也還不够，——我們還要有重工業』。

其次：

『我們在各方面，甚至在學校經費方面，都實行節省。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我們知道：不挽救重工業，不恢復重工業，我們就不能建成任何工業，而沒有工業，我們就根本不能維持我們爲獨立國家的地位。』（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四九頁）。

列寧底這些指示，是不可忘記的。

既然採取上面所指出的辦法，那末工農聯盟又將怎樣呢？我認爲這些辦法只會促進工農聯盟鞏固的事業。的確，如果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加快速度發展起來；如果由於直接幫助小農中農的結果，他們農莊上的收成率提高起來，而合作社又會包括日益廣大的農民羣衆；如果國家又得到幾萬萬普特爲實行機動辦法所必要的新有商品糧食；如果由於實行這些以及諸如此類辦法的結果，富農將被壓制，漸被克服，——那末工農聯盟內的工農矛盾就會因此而日益消失，糧食採辦事業方面的非常手段將沒有採取的必要，廣大農民羣衆將日益轉向農業集體形式，而爲克服農村資本主義份子的鬭爭將日益帶有羣衆的有組織的性質，這難道不很明白麼？工農聯盟事業只會因實行這種辦法而得到利益，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只是應當注意一點：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工農聯盟，並不是什麼簡單的聯盟。這是工人階級與農民勞動羣衆兩者階級聯盟底特殊形式，其目的是：（1）加強工人階級底陣地，（2）保證工人階級在這個聯盟內的領導作用，（3）消滅階級和消滅階級社會。對於工農聯盟的任何其他一種瞭解，都是機會主義，孟塞維主義和社會革命黨主義，無論叫作什麼都可以，只是不可叫作馬克思主義，不可叫作列寧主義。

怎樣使工農聯盟思想與列寧說農民是『最後的一個資本主義階級』這一著名原理相容呢？這裏

沒有矛盾麼？這裏只有表面上的，似是而非的矛盾，其實，這裏是沒有絲毫矛盾的。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世界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把農民估計爲『最後的一個資本主義階級』，同時他在這個報告中又再三論證工農聯盟底必要，說『專政底最高原則，就是維持無產階級與農民聯盟，使無產階級能够保持領導作用和國家政權』。很明顯的，列寧無論如何也沒有認爲這裏有絲毫矛盾。

應怎樣瞭解列寧說農民是『最後的一個資本主義階級』這一原理呢？這是不是說農民階級是由資本公司組成的呢？不是的，不是說這一點。這是說，第一，農民是個特別階級，它是把經濟建築在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因此也就與無產階級不同，因爲無產階級是把經濟建築在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基礎上的。這是說，第二，農民是從自己隊伍中分泌出，產生着和培養着資本公司、富農以及其他各種剝削份子的階級。

這個情況是對於工農聯盟組織事業的一個不可克服的障礙麼？決不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無產階級與農民聯盟，並不是與全體農民聯盟。無產階級與農民聯盟是工人階級與農民勞動羣衆聯盟。這樣一個聯盟，不與農民資本主義份子作鬭爭，不與富農作鬭爭，是不能實現的。這樣一個聯盟，不把貧農當作工人階級在農村中的支柱組織起來，是不能鞏固的。因此，現時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工農聯盟，只有在列寧所提出的一個著名口號，即倚靠貧農，與中農成立堅固聯盟，一分鐘也不停止反富農鬭爭的口號下，才能實現。因爲只有在實行這個口號的條件下，才能把農民基本羣衆吸引到社會主義建設軌道上來。

你們由此就可知道：在列寧這兩個公式之間只有臆造的矛盾，似是而非的矛盾。其實它們是沒有絲毫矛盾的。

列寧與聯合中農問題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二日——答C同志——

C同志！

你說列寧在他那篇論索洛卿的著名論文中所提出的口號，即『要善於與中農達到協定，一分鐘也不放棄反富農鬭爭，而只是穩穩地倚靠着貧農』這一口號，是『貧委時期』的口號，是『所謂中立中農時期末』的口號，——你這種說法是不對的。這種說法是完全不對的，貧農委員會是成立於一九一八年六月。到一九一八年十月末，我們在農村中的勢力已超過富農，中農已轉向蘇維埃政權方面來了。中央當時根據這個轉變，就決定取消蘇維埃與貧農委員會間的兩個政權並存局面，改選村鎮蘇維埃，把貧農委員會溶化在新選出的蘇維埃中去，也就是說取消貧農委員會。大家知道，將這個決定當作蘇維埃正式的决定提出來，是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在蘇維埃第六次代表大會上議決的。我所指的，是蘇維埃第六次代表大會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所通過的決議，即改選村鎮蘇維埃以及把貧農委員會溶化於蘇維埃中去的決議。列寧那篇標題為索洛卿底寶貴自供而宣佈與中農協定口號以代替中立中農口號的論文，又是在什麼時候出現的呢？它是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一

* 本文篇幅，略有刪減。

——斯大林註

日出現的，即在蘇維埃第六次代表大會決議以後幾乎經過兩星期時出現的。列寧在這篇論文內直截說道：我們之所以採取與中農協定的政策，是因為中農已轉向我們這方面來了。請看列寧底話吧：

『我們在農村裏的任務，就是消滅地主，打破剝削者和富農投機份子底反抗；爲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只能穩穩地倚靠半無產者，即倚靠『貧農』。但中農並不是我們的敵人。他過去動搖過，現在動搖着，而且將來還會動搖的，但感化動搖份子的任務，却與推倒剝削者以及戰勝積極敵人的任務不同。要善於與中農達到協定，一分鐘也不放棄反富農鬭爭，而只是穩穩地倚靠着貧農，——這就是現時的任務，因為正是在現時，由於上述種種原因，中農轉向我們這方面來是必不可免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九四頁）。

由此就應得出什麼結論呢？

由此所應得出的結論是：列寧底口號所指的不是舊時期，不是貧農委員會和中立中農時期，而是新時期，即與中農協定期。所以，它所反映的，不是舊時期底末尾，而是新時期底初頭。

可是，你關於列寧口號的斷語，不僅在形式上不對，不僅在所謂年月方面不對，而且按實質說來也是不對的。大家知道，列寧所提出的關於與中農協定的口號，在我們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一九一九年三月）已成爲用全黨名義宣佈的新口號。大家知道，第八次黨代表大會正是確定了我們與中農堅固聯盟政策基本原则的代表大會。大家知道，我們聯共（布）底黨綱也是在第八次黨代表大會上通過的。大家知道，在這個黨綱內有幾項專門條文，規定黨對於農村各個集團的態度：對於貧農的態度，對於中農的態度，對於富農的態度。在聯共（布）黨綱這幾項條文內，關於農村各個社

會集團以及關於黨對於他們的態度，是怎樣規定的呢？請聽吧：

『俄國共產黨在其全部農村工作中，照舊還是倚靠着農村無產者階層和半無產者階層，首先就要把他們組織為獨立的力量，在農村中成立黨支部，成立貧農組織，成立農村無產者與半無產者特式職工會等等，竭力使他們與城市無產階級接近，使他們擺脫農村資產階級和小私有財產利益底影響。』

俄國共產黨對於富農，對於農村資產階級的政策，就在於堅決反對他們剝削者的趨向，鎮壓他們反抗蘇維埃政策的行動。

俄國共產黨對於中農的政策，就在於逐漸地和有計劃地吸收他們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工作。黨底任務就是要使中農離開富農，細心關注中農底需要，以便把他們吸引到工人階級方面來，用思想感化的辦法，而絕對不是用鎮壓的辦法來克服他們的落後性，在一切有關中農切身利益的地方，都要設法與中農達到實際協定，在決定社會主義改造工作方法的時候，要向中農讓步』*（見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速記錄，第三九六頁）。

你試試找出黨綱這幾項條文與列寧口號間的區別，那怕就是最小的區別，那怕就是字句上的區別吧！你是找不出這種區別來的，因為天地間根本就沒有這種區別。不僅如此。毫無疑義的，列寧底口號不僅不與第八次代表大會關於中農問題的決議相矛盾，而且恰巧相反，它是這些決議底最精確最中肯的表述。須知，事實是這樣：聯共（布）黨綱是於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專門討論了中農問題的第八次黨代表大會上通過的，而列寧宣佈與中農協定口號的那篇反對索洛卿的論文，是在一九一

* 所有的着重點都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八年十一月，即在第八次黨代表大會四個月以前出現於報章的。

第八次黨代表大會完全全批准了列寧在他那篇反對索洛卿的論文內所宣佈的口號，作爲黨在整個現今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內農村工作中所務必當作指南的口號，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列寧口號底要旨何在呢？

列寧口號底要旨就在於它非常準確地把握住黨在農村中工作底三位一體的任務，用一個簡短公式表示出來：（一）要倚靠貧農，（二）要與中農成立協定，（三）一分鐘也不停止反富農鬭爭。你若從這個公式內拿出某一部份作爲現今農村工作底基礎，而忘記其餘兩部份，便一定會走入絕境的。在現今社會主義建設階段條件下，不倚靠貧農，不進行反富農鬭爭，是否可以與中農建立真正的堅固的協定呢？當然是不可以的。在現今發展條件下，不倚靠貧農，不與中農協定，是否可以進行反富農的順利鬭爭呢？當然是不可以的。怎樣才能最中肯地把黨在農村中工作底這個三位一體的任務用一個概括口號表示出來呢？我認爲列寧口號是這個任務底最中肯的表示。必須承認：誰也不能比列寧說得更中肯些：

爲什麼正是在現時，正是在農村工作現今條件下，必須着重指出列寧口號底適當性呢？

因爲正是在現時，有個別同志趨向於把黨在農村中工作底三位一體的任務撕成幾部份，而將其彼此隔開。這是我們今年一二月間的糧食採辦運動底實踐所完全證實了的。必須與中農成立協定，這是所有一切布爾塞維克都知道的，但究竟怎樣來成立這個協定，却不是每個人都懂得的了。有些人想用放棄反富農鬭爭或減弱這個鬭爭來與中農成立協定：他們以爲進行反富農鬭爭，就會嚇退一部份中農，即那部份富裕中農，另外有些人則想用放棄組織貧農工作或減弱這個工作來與中農成立協定：他們以爲組織貧農，就會使貧農獨樹一幟，而獨樹一幟，就會把中農從我們方面嚇走。由

於這樣離開正確路線，結果便忘記了如下的馬克思主義原理：中農是一個動搖階級，只有堅決反對富農並加緊在貧農中間進行工作，才可使與中農的協定成爲堅固的協定，不然中農就會認爲富農是強大的力量，而動搖到富農方面去。請記起列寧在第八次黨代表大會上所說的話吧：

『必須決定對沒有一定不移的堅固地位的*那個階級的關係。無產階級大多數都贊成社會主義，資產階級大多數都反對社會主義，——要決定這兩個階級間的關係，是容易的。可是，當我們講到如中農這樣一個階層時，那就可以看見這是一個動搖的階級。他一方面是私有主，另一方面又是勞動者。他是不剝削其他勞動者的。他在數十年內受盡千辛萬苦，勉強維持自己的地位，親身受到地主和資本家底剝削，忍受一切苦痛，但同時他又是私有主。因此，我們對於這個動搖階級的關係，是有莫大困難的』（見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速記錄，第三四六頁）。

可是，也有另外一種離開正確路線的趨向，其危險性並不少於上述趨向。有時候，人們進行着反富農鬭爭，可是他們把它進行得這樣笨拙，這樣粗率，以致打擊到中農和貧農頭上來了。結果，富農仍然是完整無恙，而與中農聯盟的事業却發生裂痕，一部份貧農竟暫時落在那些對蘇維埃政策進行陰謀破壞鬭爭的富農爪牙裏去了。有時候，人們又企圖把反富農的鬭爭變爲剝奪富農財產，把糧食採辦工作變爲餘糧收集制，而忘記在我們現今條件下剝奪富農財產是一件蠢事，餘糧收集制並不是與中農聯盟，而是與中農鬭爭。

這些離開黨路線的趨向，是從什麼地方產生出來的呢？

*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就是由於不瞭解黨在農村中工作底三重任務是單一而不可分開的任務。由於不瞭解解決不可把反富農鬭爭的任務和與中農協定的任務分開，決不可把這兩個任務和將貧農變為黨在農村中支柱的任務分開*。

爲要使這些任務在我們日常農村工作過程中不致彼此隔離，便要怎樣作呢？

爲此至少必須提出一個基本口號，把一切任務合併爲一個總公式；而不容許將其彼此隔離起來。在我們黨的武庫內不是有這樣一個公式，這樣一個口號呢？

是的，是有的。列寧所說『要善於與中農達到協定，一分鐘也不放棄反富農鬭爭，而只是穩穩地倚靠着貧農』這一口號，就是這樣的公式。

* 由此可見，離開正確路線的轉向能爲工農聯盟事業造成兩種危險：一方面的危險，是由於有些人想把——譬如說——糧食採辦方面的臨時非常辦法變爲黨底經常的或長久的方針；另一方面的危險，是由於有些人想利用取消非常辦法這件事情來放縱富農，來宣佈貿易完全自由，使貿易不受國家機關所調節。因此，爲要保證正確路線，就必須在兩條戰線上進行鬭爭。

我還要乘機指出，就是我們的刊物並不是常常都遵守這個規則，而有時表現出一些片面態度。例如，有時候揭露着那些想把糧食採辦方面的臨時非常辦法變爲我們政策底經常方針，因而給工農聯盟造成一種威脅的人。這樣揭露是很好。可是不好而且不對的，就是同時却没有充分注意，沒有量量揭露那些從另一方面威脅工農聯盟的人，沒有揭露那些屈服於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要求減弱反農村資本主義份子的鬭爭，要求規定貿易完全自由，使其不受國家調節，因而從另一端來破壞工農聯盟的人。這就不好了。這是片面態度。

有時候，揭露着那些認爲——譬如說——不可以，不宜於振興現今階段上還是農業基礎的個體小農中農經濟的人。這樣揭露是很好。可是不好而且不對的，就是同時却没有揭露那些忽視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意義，不懂得現時除必須振興個體小農中農經濟之外，還要切實發展集體農莊蘇維埃農莊建設事業的人。這就是片面態度了。爲要保證正確路線，就必須在兩條戰線上進行鬭爭，拋棄任何片面態度。

因此，我認爲這個口號是最適當而能包括一切的口號，正是在現時，正是在農村工作現今條件下，必須把它提到第一位。

你認爲列寧底口號是『反對派的』口號，並且在你的來信內問道：『爲什麼這一個反對派口號竟能於一九二八年五月一號前夜在真理報上登載出來呢？爲什麼這個口號竟然出現於聯共中央底號關刊物真理報上呢，這是否只是排印上的錯誤，抑或是在中農問題上與反對派妥協呢？』不待機，話是說得氣勢汹汹的！可是，C同志，你總得在『轉彎地方』慎重一點兒才好，免得你在氣頭上得出結論說要禁止刊印我們黨綱，因爲它完全批准了列寧的口號（是事實啊！），且基本上是由列寧（絕對不是反對派份子！）起草，而由我們黨（也不是反對派！）第八次代表大會通過的，請多尊重我們黨綱上關於農村各個社會集團的那些著名條文吧！請多尊重第八次黨代表大會關於中農的決議吧！至於你說『在中農問題上與反對派妥協』，那末我認爲這句話簡直不值一駁，因爲這句話大概你莫冒火說出來的。

使你莫明其妙的，大概是這樣一個情況：在列寧底口號裏和第八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聯共（布）黨綱上所說的，是與中農協定；而列寧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致開幕辭時所說的，却是與中農堅固聯盟。你大概認爲在這裏有某種矛盾。也許你甚至還想這樣設想，以爲與中農協定的政策是一種離開與中農聯盟的政策的做法。這是不對的，C同志。這是個很大的錯誤。只有那些會讀口號字母而不會考察口號意思的人，才能這樣想，只有那些不知道關於與中農聯盟，關於與中農協定這個口號底歷史的人，才能這樣想。能這樣想的只有這樣一種人，這種人以爲：列寧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致開幕辭時既說到要實行與中農『堅固聯盟』的政策，而列寧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所作另一篇演說內以及在第八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黨綱內，却又說我們現在需要實行與中農『協定』的政策，於是他

就是自己離開了自己。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原來是因為列寧和黨——以第八次代表大會為代表——認為在「協定」與「聯盟」這兩個概念間沒有絲毫區別。原來是因為列寧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的一切演說內，到處都認為「聯盟」和「協定」這兩個概念是完全相等的。第八次代表大會「對中農態度問題」的決議也是如此，在這裏也認為「協定」和「聯盟」這兩個概念是完全相等的。因為列寧和黨認為與中農協定的政策，並不是一個偶然的，很快就成過去的政策，而是一個長期的政策，所以他們過去和現在都有充分理由把與中農協定的政策稱為與中農堅固聯盟的政策；反轉來說，他們過去和現在都有充分理由把與中農堅固聯盟的政策，稱為與中農協定的政策。只須讀一讀第八次黨代表大會底速記錄以及這次代表大會關於中農的決議，就可以深信這一點了。

請看從列寧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中摘引來的一段話吧：

「因為蘇維埃工作人員沒有經驗，因為問題困難，所以預定對付富農的那些打擊就往往落到了中農身上。我們在這裏犯了非常大的過失。在這方面積聚起來的經驗，將能幫助我們極力設法避免今後重犯這種過失。這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不是理論上，而是實際上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你們明白知道這個任務是困難的。我們還沒有什麼物質福利可以給與中農，而中農却是唯物主義者，實際主義者，他要求具體的物質福利，這種福利我們現在還拿不出來，而且國家也許還要在沒有這些福利的情況下渡過現時已表明有完全勝利希望的艱難鬭爭月份。可是，我們在我們的行政實踐中能做出很多事情：改善我們的機關，糾正大抵濫用職權的現象。我們能夠而且應當設法糾正，並完全糾正我們黨沒有充分注意到與中農同盟，與中農聯盟，與中農協定*的路線」（見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速記錄，第二四至二五頁）。

由此可見，列寧是沒有認爲『協定』與『聯盟』有絲毫區別的。又請看從第八次代表大會『對中農態度問題』的決議中摘引來的一段話吧：

『把中農和富農混淆起來，把對付富農的辦法在某種程度內推行到中農身上，那就不僅是最粗魯地違背蘇維埃政權一切法令及其全部政策，而且是最粗魯地違背共產主義底一切基本原則，這些原則指出：無產階級在其爲推翻資產階級而進行決鬥時期與中農協定，是無痛苦地過渡到消滅任何剝削現象的條件之一。』

因爲農業技術比較工業落後之故，——甚至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裏，俄國更不必說了，——中農具有比較堅固的經濟根蒂，所以在無產階級革命開始以後，中農還會支持到頗久的時間。因此，蘇維埃工作人員以及黨工作人員在農村中的策略，應當是計算到與中農實行長期合作……

……這樣，蘇維埃政權在農村中實行完全正確的政策，就能保證獲得了勝利的無產階級與中農的聯盟和協定……

……工農政府和共產黨底政策，今後也應當本着無產階級和貧農兩者與中農實行這種協定的精神來進行』（見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速記錄，第四一七至四二〇頁）。可見，這個決議也是絕對沒有認爲『協定』與『聯盟』有什麼區別的。

*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 所有的着重點都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不妨還指出一點，就是在第八次代表大會這個決議中，沒有一句話是講到與中農『堅固聯盟』的。但這是不是說決議因此就離開了與中農『堅固聯盟』政策呢？決不是。這只是說，決議認為『協定』『合作』概念是與『堅固聯盟』概念完全相等的。而這是不言而喻的：不與中農『協定』，便不能與中農『聯盟』，而不與中農實行『長期』協定與合作，便不能使與中農聯盟成爲『堅固的』聯盟。事實就是如此。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列寧和第八次黨代表大會離開了列寧關於與中農『堅固聯盟』的聲明，或者是必須拋棄這種不莊重的假設，而承認列寧和第八次黨代表大會並沒有認爲『協定』與『堅固聯盟』這兩個概念有絲毫的區別。

總之，誰不願意成爲空洞咬文嚼字主義犧牲品，誰願意細心思索列寧口號，即倚靠貧農，與中農協定，與富農鬪爭這一口號底意思，誰就不能不瞭解與中農協定的政策乃是與中農堅固聯盟的政策。

你的錯誤，就在於你沒有懂得反對派撞騙的圈套，却中了他們挑撥離間的詭計，落入敵人給你掘好了的陷阱。反對派的騙子在那裏大喊大叫，硬說他們贊成列寧關於與中農協定的口號，同時又故意作出挑撥離間的暗示，說與中農『協定』是一回事，而與中農『堅固聯盟』却是另一回事。他們想這樣來一箭雙鵰：第一，隱瞞自己對於中農問題的真正立場，其內容不是要與中農協定，而是要『與中農爭執』（參看我在第十六次莫斯科省黨代表會議上所引證過的反對派份子斯米爾諾夫那篇有名的演說）；第二，把『協定』與『聯盟』間的虛構的區別當作圈套，來籠絡布爾塞維克裏那些頭腦簡單的人，完全迷住他們，推着他們離開列寧。

而我們的某些同志又是怎樣回答這一點的呢？他們不僅不撕破反對派騙徒底假面具，不僅不揭

破這些騙徒對黨隱瞞自己真正立場的欺騙行爲，——却反而滾入圈套，滾入陷阱，讓別人推着他們離開列寧。反對派大吹大擂，暢談列寧口號，反對派份子把自己裝成擁護列寧口號的人，因此我應當避開這個口號，免得人家把我和反對派混在一塊，否則人家就會責備我是和『反對派妥協』，——這些同志底邏輯就是如此！

而且，這還不是反對派撞騙手段底唯一例子。例如就拿自我批評的口號來說吧。布爾塞維克不能不知道自我批評口號是我們黨行動底基礎，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是布爾塞維克培養幹部方法底靈魂。反對派大聲囂嚷，硬說自我批評口號是他們（反對派）想出來的，硬說黨是從他們那裏抄襲這個口號，並因此而向反對派投降了的。反對派這樣幹法，至少是想達到兩個目的：第一，是想欺瞞工人階級，欺騙工人階級，不讓工人階級知道，以破壞黨性爲目的的反對派自我批評和以鞏固黨性爲目的的布爾塞維克自我批評，是根本不同的；第二，是想籠絡某些頭腦簡單的人，並逼迫他們表示不同意於黨的自我批評口號。

而我們的某些同志又是怎樣對付這一點的呢？他們不僅不撕破反對派騙子底假面具，不僅不堅持布爾塞維克自我批評口號，反而落入陷阱，離開自我批評口號，而聽憑反對派愚弄，並……向它投降，同時却又誤以爲他們是表示不同意於反對派。

這樣的例子，是可以引出一大堆來的。

可是，我們在自己工作中，決不能聽憑他人愚弄，尤其不能以反對派對於我們的評論爲指南。我們應當走自己的道路，既排斥反對派底拐騙手腕，又排斥我們某些落入反對派挑撥離間圈套的布爾塞維克底錯誤。請記起馬克思所常用的話：『一心循着你自己的道路走，讓人們隨便怎樣去說吧！』

本文選自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一九四八年莫斯科版第二七六至二七八頁

一九二八年七月三日發表於真理報第一百五十二期

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底問題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三日——

(一) 收買五穀底政策問題

首先讓我作一個小小的歷史更正。今年正月一日我們有怎樣的現象？大概你們從黨內的文件上可以知道，今年的正月一日比起去年來，缺少了一萬二千八百萬普特的糧食（或麥子）。

關於這個現象的原因，我將不復詳述，因為這些原因已經在報紙上公佈的黨的文件內解說明白了。對於我們重要的，就是我們缺少了一萬二千八百萬普特的糧食，使我們走了兩三個月艱困的羊腸棧道。

因此，我們究竟怎樣去選擇我們的方向，我們還是填補我們的損失，規定將來收集糧食的經常的速度呢，或者到了我們整個的國民經濟嚴重的恐慌的必然性前面呢？！

要填補損失，應該採取怎樣的辦法呢？第一，應該對那些企圖飛漲糧食價格及以饑餓來威嚇全國的富農及投機商人，加以打擊；第二，在糧食區域的大宗商品，應該運送出來。最後，我們黨的所有各機關一致動作起來，在我們收集糧食的工作中，造出一個轉變，驅除實際工作中的自流論。因此，我們迫不得已，採用了非常的手段。我們實行了這種方法以後，直到三月底，我們已收集了二萬七千五百萬普特的糧食。我們不僅填補了虧空，我們不僅預先征服了一般的經濟恐慌，我

們不僅超過了過去一年收集糧食的速度，並且祇要往後幾月內（四月、五月、六月）能保持相當的收集糧食的經常的速度，我們就可以絕無意外的危險，免去那已經醞釀了的恐慌。

但是，在烏克蘭的南部和北高加索的一部份的冬耕荒歉的結果，烏克蘭全部及北高加索局部的失掉了糧食供給的作用，對國家糧食的供給，少了兩三千萬普特之多。既有這樣的情形，又加以糧食的過渡消費，於是使我們不得不加緊在其餘區域的收集，動用農民積穀，於是狀況不得不惡化。

於正月至三月中間，我們能收集到將近三萬萬普特的糧食，處理農民的積蓄，已有了辦法，可是從四月到六月，我們却沒有能收集到幾萬萬普特的糧食，因此在青黃不接的條件下，使我們不得不動用農民的積穀。然而糧食始終是要收集的。於是又復演了非常的方法，用行政專橫、挨戶催促、非法的搜索、破壞革命法律等，使國家的政治狀況惡化，使工農的聯合受了一種威嚇。工農的結合，有沒有因此分裂呢？沒有，還沒有分裂，或者這是不緊要的小事？不是，這並不是小事哩！這是給工人階級與農民的聯合一種威嚇，可以說，這是由於我們有些黨的工作人員沒有鎮靜和堅定，以便切實的去估量現存的狀況之緣故。

以後，我們有了良好的收成，便局部的取消非常的方法，使得狀況改良與平靜起來。

在解決糧食問題上，我們困難的中心點是什麼？這些困難的根源在那裏？我們現在所有的耕地底面積，差不多已和戰前一樣（總計僅比戰前少百分之五），這難道不是事實？現在我們所出產的糧食，也已和戰前差不多（總計，現在一年可以出產五十萬萬普特，比戰前僅少二萬萬到三萬萬普特），這難道不是事實？可是我們現在所出的商品糧食却比戰前的時候要少兩倍，這究竟是怎樣解說呢？這可以說，是由於我們農村經濟的零亂和散漫的緣故。在戰前，我們大約有一千六百萬農戶，現在我們大約已不下二千四百萬農戶，其間農戶繼續分裂的傾向，還沒有停止。

那末，小農經濟究竟是什麼？他祇有很少的商品經濟，很小的收入，而有比較多的自然經濟，祇有百分之十二或十三作為商品。此外，城市和工業，我們倒是整個的發展起來，隨着建設的發展，對於糧食商品的要求的高漲，也就意外的迅速。這就是在解決糧食問題上我們困難的根本所在。

列寧在自己的『論糧食稅』的小冊子上，對於這點，便是這樣估計：

『要是農民經濟能繼續的發展，就必要堅決的保證它往後的轉變。而往後的轉變，必然在於這個獲利很少而很落後的散碎的小農經濟之漸漸統一起來，組成社會化的大規模的農業經濟。一切社會主義者常常是這樣想的，我們共產黨也正是這樣去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一部，第一八九頁）

這就是說明在解決糧食問題上我們困難的根源在那裏。打破這個難關的出路又在那裏呢？

第一，我們的出路是要提高小農及中農的經濟，對於他們的生產和收穫，給以一切的幫助。用耕犁去代他們的手鋤，給他們精良的種子，供給他們以肥料，供給簡便的機器，把單個的農戶組合到合作社的廣大系統中去，和整個的鄉村訂結契約——這就是我們的任務。我們採用過這樣的方法：就是農村經濟合作社與農民訂立合同，其目的在乎供給農民良好的種子，藉以提高糧食收成，使農民可以按時為國家供給麥子；同時，國家方面除應付農民的價格以外，並給以額外的獎金以建立國家與農民間鞏固的關係。經驗告訴我們，這個方法是容易得到效力的。

有些人以為，那種個人經濟自己會消滅的，值不得去幫助的。同志們！這話是不對的。這些人與我們黨的路線完全沒有相同之點。另一方面，有些人這樣想，農民的個人經濟一般的是農村經濟的始終。這也是不對的，更與列寧主義沒有相同之點。

我們不需要個人經濟的任何的詛咒者和頌揚者。我們祇需要正確的政策，能最大限度的把這些

農民奪過來，同時，逐漸把這些個人的農民經濟轉變為集體的經濟。

第二，我們的出路，是在把散碎的中小農民經濟逐漸的統一於大規模的集體經濟及合作社，成爲一種完全自願的聯合，共同在新的技術的基礎上工作，共同應用拖拉機及其他的農業機器。

集體農莊的優點在那裏？集體農莊的優點，就在於它能利用一切的已有的科學和技術，它最有利、最穩固，生產的商品更多而更精良。在集體經濟中可以出產百分之三十到三十五的商品，每一俄畝常常可以收穫二百普特以上，這一點我們不應當忘記的。

第三，我們的出路是在於要改良舊的蘇維埃農莊和建設新的大規模的蘇維埃農莊。我們要知道，蘇維埃農莊是最能生產商品的經濟單位。我們現在有些蘇維埃農莊能夠貢獻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商品。

現在的主要任務，就在要把這三個任務聯成一氣，而向着這三條坦道去加緊工作。現時的特點就是在於要完成第一個任務，僅在提高個人的中小農民經濟，已經是不夠解決整個的任務了；雖然提高個人的中小農民經濟在農村經濟底工作中，還是主要的任務。而是要以兩個新的實際任務來補充第一個任務：提高集體農莊和改善蘇維埃農莊的事業。

除掉這些主要原因以外，還有一些特殊的和臨時的原因，這就是將收集糧食的困難轉變成收集糧食的恐慌，這些原因是什麼？中央全會的決議指出下列幾點：

一，因爲由於鄉村收入的增高（如收成漸多之類），特別是由於殷實農戶及富農的收入增高，引起農民購買力的要求之發展的速度，比工業品的供給要快得多，於是破壞了市場的比重，並加劇了這個破壞。

二，糧食的價格和其他農村經濟的生產品的價格沒有協調的相互關係，減弱了實現多餘糧食的

刺激，同時，在本年的春季，黨又不能把這種情形變更過來，使不致破壞鄉村內力量弱小的農民的利益。

三，主要的，在當時的運送商品及收稅方面領導計劃的錯誤（鄉村富裕農民的稅收低微），同樣，在糧食消費方面，也有許多不正當的地方。

四，收集糧食的機關及黨的蘇維埃的組織的缺點（缺乏統一戰線，缺乏積極性，聽其自然）。

五，破壞革命法律，行政式的專橫，挨戶搜索，地方市場部分的停閉等等。

六，城市的和鄉村的資產階級的份子（如投機商人及富農）利用這些缺點，因此，破壞糧食底收集和國內政治狀況惡化。

要是一般性質的原因要經過幾年才能消滅，那末，特殊的臨時性質的原因，在現在完全可以消滅，使得預先免去收集糧食的恐慌之復演。

爲要消滅這些特殊的原因，需要什麼？要消滅這些特殊的原因，必須這樣：

一，要實際上立刻取消挨戶檢查，非法搜索以及一切破壞革命法律的行動。

二，立刻取消一切軍事共產時代搜索糧食的故事，消滅停閉商場的企圖，政府隨機應變的來調劑商業。

三，相當的提高糧食的價格，按照各區域及穀類種植的情形而加以變更。

四，在收集糧食的區域內，應有商品之正確的運輸組織。

五，要有供給糧食的正當組織，不許有過量的消費。

六，應有國家糧食積蓄的組織。

在目下收成良好的條件之下，正當的有系統的去實行這些方法，形成一個很好的環境，無論如

何，要變更收集糧食運動的非常手段。黨的當前的任務，就在注意到這些方法底確切執行。

與我們當前的糧食的困難問題有聯繫的問題，就是工農的聯合問題，工農聯盟的將來命運問題，鞏固這個聯盟的方略問題。

有的說，我們現在並沒有什麼聯合，分裂代替了聯合。當然的，這種蠢話祇有那些張皇失措之徒才講的，一旦沒有這個聯合，農民就馬上不信任我們，捨我們而去，改變他對蘇維埃政權的堅固的信仰，他將縮小耕地，無論如何再也不去擴充耕地，他恐怕我們又去挨戶搜索，奪取他的糧食。

然而我們在事實上究竟怎樣呢？我們各區的耕地已擴大起來了。在生產糧食的主要區域，農民已把耕地從擴大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十五或二十，這是事實。農民不相信這種非常手段能够永久，他很有根據去測度糧食價格的一定要提高，這難道不明顯嗎？這怎樣的分裂聯合呢？這自然也不是說，我們的聯合沒有受過什麼威嚇。然從此就得出結論，說我們的聯合破裂了——這完全是一種莫名其妙的無稽之談。

有人以為，為要鞏固聯合起見，須將重心由重工業轉到輕工業（紡織）方面去，而且認為紡織是主要『聯合』工業。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這完全不對的。當然，紡織工業在配置社會主義的工業與農民經濟間底商品流通上有很大的意義。但是根據這一點而以爲紡織工業是工農聯合的唯一基礎——這犯了很嚴重的錯誤。事實上，工業和農民經濟間的聯合，不僅在於爲農民個人所需的棉紗布匹方面，就是在五金工業方面，在種子、肥料及機器方面，也是糧食生產者的農民所必要的。我也並不是說，不發展重工業，那紡織工業也就不能發展和存在。

我們須要聯合，並不是要保存和鞏固階級的永久存在。我們須要聯合，正是要使農民接近工人階級，教育農民而使之變化，改造他底個人主義的心理，在集體主義的精神上鍛鍊他們，因此準備

在社會主義社會之基礎上消滅階級。誰不明白或不願意承認這一點，便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不是列寧主義者，而是農民的哲學家，祇看後面而不看前面的。

但是怎樣去改造和鍛鍊農民呢？

首先並主要的，須在新技術的基礎上，在集體勞動的基礎上去改造他們，才有可能。

列寧對於這點，這樣的說：

『改良小農及改造他的一切心理和習慣這一件事，是整代的事。要解決這個問題，對於改造小農的心理，祇有物質的基礎，技術，在農業中大規模的應用拖拉機和其他機器，大規模的電氣化，才能解決。祇有如此，才能根本的非常迅速的去改造了小農。』（『列寧全集』，第十八卷，上冊，第一三九頁）

事情已很明顯了：誰以為要保證工農聯合，祇有發展紡織工業，而忘記了鋼鐵工業，那他便是永遠保持了階級的存在，他便不是無產階級的革命者，而是農民的哲學家。

列寧在別的地方又說：

『祇有在這種情形之下，實際上能指示給農民看，社會的、集體的、合作的、勞動組合的耕種土地，確是能得到優勝的，祇有在合作的勞動組合的經濟幫助之下幫助農民，那時候，掌握政權的工人階級能實際向農民證明自己的公平，能吸收幾千百萬的農民到自己方面來。』（『列寧全集』，第十六卷，第三九一——三九二頁）

這就可以知道，要如何才能保證實際的堅固的吸引幾千百萬農民羣衆到自己方面來，到社會主義方面來了。

往往有人說，對於保證聯合，我們祇有準備向農民讓步的一着。從這點出發，便構成了不斷的

讓步理論，以為祇有工人階級不斷的讓步才能加強自己的力量。同志們，這是不對的，完全不對的。這樣的理論，祇有破壞一切事業。這是一種毫無希望的理論。

為要鞏固聯合，必須在自己的命令之下，除了讓步的一着外，還有其他的種種步驟，經濟的柱石（如發展合作社、集體農莊、蘇維埃農莊），別方面更有政治的柱石（如加緊在貧農中的工作及保證貧農的擁護）。至於中農，是一個動搖的階級，要是我們沒有貧農的擁護，要是蘇維埃政權在農村中太薄弱，那末中農便將跑到富農那邊去。反之，要是貧農的擁護有了保證，就可以確信的說，中農一定會跑到蘇維埃政權方面來的。所以在貧農中有系統的來工作以及用種子和廉價食品去保障貧農，是我們黨當前的急務。

（二） 造就工業建設的專門人材

現在來說一說關於以技術人材新的中堅份子來保證我們的工業問題。

先說我們工業方面的困難，及發現與礦山事件有聯繫的困難。

從改良工業的觀點上看來，煤礦事件的實質是什麼？煤礦事件的實質和意義，是表現我們於工業保證上差不多沒有武器，非常落後，落後到不成樣子，忠實於工人階級事業的專門家還是非常之少。

煤礦事件給我們的教訓，使我們對於教育和訓練從工人階級出身的份子成爲新的技術人材的速度加緊，使能爲社會主義盡力，於技術上領導我們社會主義的工業。

這並不是說，把所有那些與蘇維埃的思想不相同的，或不是共產主義者而能與蘇維埃政權合作的專門家，我們一概棄而不用。我們將用全力去向前進行，吸引非黨的專門家，非黨的技師、準

備使他們來和蘇維埃政權共同在建設我們工業的路上攜手前進。

我們並不一定要求他們取消自己的觀點或要求他們立刻變更自己的觀點。我們祇要求他們一點——既然他們自願的贊成與蘇維埃政府合作，那末他們就應誠懇的與蘇維埃政府合作。

然而事實是這樣：那些願意和蘇維埃政府共同進行的專門家實在還很少。要有新的來補充他們，這是絕對的必要。所以黨以為要有新的補充，須要加速度的來養成，不要使我們期待的又落了空，並且要選出工人階級出身的份子來把他養成。這就是說，養成新的技術人材，能夠滿足我們工業上的需要。

種種事實指示出來，人民教育委員會還沒有能夠盡這個重要的任務。我們沒有理由來設想人民教育委員會各自為各而與生產的聯繫很少，同時在它那種保守性和不活動的現象之下能於最近的將來完成這個任務。所以黨的結論，要三個人民委員會（人民教育委員會、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及人民交通委員會）分任加速養成新的技術人材之工作。黨認為這條道路是最便利的道路，最能保證完成這重要工作的必要的速度。因此，分出幾個高等工業學校給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及人民交通委員會辦理。這自然不是說，分辦了幾個高等工業專門學校就算能盡了加速養成技術人材的新的中堅份子之任務。毫無疑義的，對於學生物質關係上的保障，自然有重大的作用。

所以蘇維埃政府，決定在培養新的幹部底消費與大建設的比重相平衡，因此決定每年提出四千萬盧布作為培養幹部底補充費用。

(三) 結 論

同志們！我們往往在我們的困難和錯誤中學會了，這是應該承認的。直到現在，事實總是如

此：在困難中，在這個或那個危機中，歷史教訓了我們，並鍛鍊了我們的黨。

這樣的事實在一九一八年曾有過的，那時因東方戰線上的吃緊和高爾察克戰爭的失敗，覺着困難，於是我們明白了，必須要組織常備的步兵，結果把它組織起來了，這樣的事實，在一九一九年也有過的，那時因我們的軍隊和白黨但尼金激戰於前，被馬孟託夫襲擊於後，受了困難，於是我們明白了，必須要組織有力的騎兵，實際上就把它組織起來了，把工人階級的勁敵消滅了。

所以，我以為現在我們差不多又碰到這樣的事實了。糧食問題的困難，對於我們不是徒然的。它們（糧食的困難）督促着布爾塞維克，逼着它去從事發展農村經濟，特別是發展穀類的耕種事業。要是沒有這樣困難，說不定布爾塞維克還不會這樣嚴重的去努力於解決穀類問題呢。

關於煤礦事件及與這件有聯繫的困難，也應該說一說。煤礦事件的教訓，對於我們的黨也完全不是徒然的。我以為這個教訓迫着我們去提出這樣的問題：養成那些能為我們社會主義工業服務的新技術人材。你們都已知，解決這個技術人材的問題，我們已走了很重要的第一步。我們希望這一步不是最後的一步。（熱烈的繼續的鼓掌）

選自斯大林選集第三卷一九三九年解放社版

『聯共中央擴大會議的總結』第三〇四至三一六頁

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危險

——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九日在莫斯科委員會和

莫斯科監察委員會全體聯席會議上的演說詞——

同志們，我以為，首先就要撇開小事情，撇開個人問題等等，以便解決那個引起我們注意的右傾問題。在我們黨內不是有右傾的機會主義的危險；是不是存在着有利於這種危險的客觀條件；怎樣和這個危險鬭爭——這就是現時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可是，如果我們不除淨那一切蒙蔽了這個問題的和妨礙着我們來瞭解問題實質的小事情和次要成份，那末，我們就不能解決這個問題。

查波爾斯基以為右傾問題是一個偶然問題，這是不對的。他斷定說，這裏的事情，並不在於什麼右傾，而完全是在於意氣鬭爭，在於個人野心等等。就暫時假定說，這裏也同在任何鬭爭裏一樣，意氣鬭爭和個人野心是有幾許作用。可是拿意氣鬭爭來解釋一切，祇看見意氣鬭爭而不看見問題底本質，這就是離開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道路。決不會有這樣的事情，就是像莫斯科組織這樣一個毫無疑義地是巨大的、年老的、團結一致的組織，會因為幾個意氣鬭爭者或野心家底努力而整個組織都被驚動了，都被推動了。不，同志們，天下是不會有這樣的怪事的。更不必說，對於莫斯科組織底力量和能力，是不可以這樣輕視的。在這裏發生了作用的，顯然是一些更深刻的原因，這些原因無論與意氣鬭爭，無論與個人野心，都是沒有關係的。

福翁託夫雖然是承認有右傾危險存在，可是他並不認為這個危險會值得由認真的正經人去認真

研究，他這種態度也是不對的。照他這樣說來，右傾問題，原來是空喊家研究底對象，而不是正經人研究底對象。我完全懂得福翁託夫底意思，他是這樣忙於日常的實際工作，以至沒有工夫來想到我們的發展前途。可是這還不是說，我們應當把某幾個黨務工作人員底狹隘的和求實的實踐主義變為我們的建設工作底教條、健全的實際主義本來是一件好事情，可是如果它在工作中間失掉前途和不使自己的工作服從黨的基本路線，——那末，它就會變為壞事情了。可是不難明白，右傾問題就是我們黨底基本路線問題，就是這樣一個問題：我們黨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所規定的發展前途，究竟是正確的還是不正確的呢。

有些同志在討論關於右傾的問題的時候，把問題完全着重在代表右傾的個人身上，這些同志也是不對的。他們說，請指出右傾份子或調和份子來，請說出他們的姓名來，以便使我們可以來對付他們，這樣提出問題，是不正確的。個人當然是有相當的作用。可是，這裏的事情並不在於個人，而是在於產生黨內右傾危險的那些條件和那種環境。可以把個人排除，但是這還不是說，我們這樣就算掘毀了黨內右傾危險底根源。所以關於個人的問題雖然確實有意思，可是它並不能解決事體。說到這裏，使我不能不回憶起敖得薩地方的一件故事，這是一九一九年末和一九二〇年初的事情，那時我們的軍隊將但尼金底軍隊逐出了烏克蘭，完全打敗了敖得薩區內但尼金軍隊底最後殘部。那時有一部份紅軍兵士在敖得薩忿然搜尋了協約國，因為他們相信，如果他們拿獲了協約國，戰爭就會終結了。（全場發笑）就假定說紅軍兵士當時是在敖得薩拿獲了協約國底某個代表。可是，關於協約國的問題當時是不會因此而解決的，因為雖然那時敖得薩是但尼金隊伍底最後一塊地盤，可是，協約國底根源並不在於敖得薩，而是在於世界資本主義。關於我們的某些同志也可以這樣說，這些同志在關於右傾的問題上把事體着重在代表右傾的個人上，同時却忘記了產生這種傾向的條件。

所以，在這裏，我們首先應當說明的，就是關於離開列寧路線的右傾和『左』傾（託洛茨基主義的傾向）產生底條件問題。

在資本主義底條件下面，共產主義裏的右傾，就是一部份共產黨人底一種傾向，偏向，固然是沒有正式形成的，也許是還沒有覺悟到的，可是畢竟是一種偏向——離開馬克思主義底革命路線而走向社會民主黨方面去的偏向。既然有些共產黨員認為選舉鬭爭中的『階級反對階級』的口號是不妥當的（法國），或者起來反對共產黨提出自己的單獨的候選名單（英國），或者不願着重提出與『左派』社會民主黨作鬭爭的問題（德國）以及諸如此類等等，——那末，這就是說，在共產黨以內，是有人正在極力想使共產主義去遷就社會民主主義。如果資本主義各國共產黨內的右傾得到勝利，那末，這就會使共產黨在思想上被人粉碎，使社會民主主義大大加強。而社會民主主義底大大加強又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資本主義底加強和鞏固，因為社會民主黨是資本主義在工人階級裏的主要支柱，所以，如果資本主義各國共產黨內的右傾得到勝利，那末，這就會使那些為保存資本主義所必需的條件日益增長起來。

在蘇聯發展底條件下面，就是說，在資本主義已經被推翻可是資本主義底根帶還沒有被拔除的地方，共產主義裏的右傾，就是一部份共產黨人底傾向，偏向，固然是沒有正式形成的，也許是還沒有覺悟到的，可是畢竟是一種偏向——離開我們黨底總路線而走向資產階級思想方面去的偏向。既然在我們這裏，有些共產黨員企圖拉着我們黨離開第十五次大會底決議而往後退，否認有向農村資本主義成份進攻的必要，或者是要求縮小我們的工業，認為現時的工業發展速度，是足以使國家滅亡的，或者是認為撥款發展集體農莊及蘇維埃農莊是不妥當的，是枉費金錢，或者是認為在自我批評底基礎上與官僚主義鬭爭是不妥當的，認為自我批評可以掘動我們的機關底根基，或者是

要求減弱對外貿易底壟斷以及諸如此類等等，——那末，這就是說，在我們黨內，是有人在企圖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去遷就（也許自己不覺得）『蘇維埃的』資產階級底胃口和需要。如果我們黨內的右傾得到勝利，那末，這就會使我們國內的資本主義成份大大加強。而我們國內資本主義成份底加強又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底減弱和資本主義恢復機會底加強。所以，如果我們黨內的右傾得到勝利，這就會使那些爲恢復我們國內的資本主義所必要的條件增長起來。

在我們蘇聯國家內是不是存在着使資本主義底恢復（復辟）成爲可能的事情的條件呢？是存在着。——同志們，這也許好像是很奇怪的，可是，這却是事實。我們推翻了資本主義，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並加以加快的速度發展着我們的社會主義的工業，同時將農民經濟與我們的社會主義的工業聯絡起來。可是我們還沒有拔出資本主義底根蒂。這些根蒂到底是深藏在什麼地方呢？它們是深藏在商品生產裏，深藏在城市的和特別是在農村的小生產裏。資本主義底力量，如列寧所說的，是在於『小生產底勢力，因爲，可惜得很，小生產在世界上還保留着很多很多，而小生產則經常地、每日每時、自發地、大批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頁）

顯然的，既然我們這裏的小生產是具有大批的甚至於是優越的性質，既然它經常地和大批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特別是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面，——那末，我們這裏就有使資本主義底恢復成爲可能的事情的條件。

在我們這裏，在我們的蘇維埃的國家內，是不是存在着爲消滅資本主義恢復底可能性所必要的工具和力量呢？是存在着。列寧關於在蘇聯有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可能性的提綱，其所以是正確的，正因爲它是以這一點爲基礎的。爲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需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鞏固工農

聯盟，根據國家工業化底觀點來發展我們的經濟命脈，用很快的速度來發展工業，使國家電氣化，將整個國民經濟轉到新的技術基礎上，使農民大批合作化和提高農民經濟收成額，漸漸使個人的農民農莊聯合成爲公共的農莊，發展蘇維埃農莊，限制和克服城市和鄉村裏的資本主義成分以及諸如此類等等。

請看列寧關於這一點所說的話：

『當我們還生活在小農民的國家裏的時候，在俄國，資本主義所有的經濟基礎是比共產主義所有的更加堅固的。這是必須記着的。凡是細心考察過農村生活和將它與城市生活作過比較的人，都知道，我們還沒有拔出資本主義底根蒂，我們還沒有掘動國內敵人底基礎。國內敵人支持在小經濟上面，爲要掘動它底基礎，就祇有一個方法——這就是把全國底經濟——農業也在內，都轉移到新的技術基礎上，轉移到現代大生產底技術基礎上。祇有電氣，才是這樣的技術基礎。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上全國電氣化。不然，國家就仍舊還是小農民的國家，我們須要明白覺悟到這一點。不僅在世界範圍內，而且在國內，我們都比資本主義軟弱些、這是大家所知道的。我們已經覺悟到這一點，而且一定會做到這一步，就是使經濟基礎從小農民的過渡爲大工業的。祇有當國家已經電氣化的時候，當工業、農業及運輸業都有現代的大工業底技術基礎的時候——祇有在這時候，我們才能獲得最後的勝利。』（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四六——四七頁）

由此可見，第一，當我們還生活在小農民的國家裏的時候，當我們還沒有拔出資本主義底根蒂的時候，資本主義所有的經濟基礎是比共產主義所有的更加堅固的。可有這樣的事情：就是把樹砍倒了，而樹根子却還沒有拔出，因爲力量不够的原故。由此也就產生出在我們國家內資本主義恢復

底可能性的。

由此可見，第二，除了資本主義恢復底可能性以外，在我們這裏還有社會主義勝利底可能性，因為我們能夠消滅資本主義恢復底可能性，能夠拔出資本主義底根蒂和達到澈底戰勝資本主義，如果我們努力進行使國家電氣化的工作，如果我們給工業、農業、運輸業建立起現代大工業底技術基礎的話，由此也就產生出在我們國家內社會主義勝利底可能性。

最後，由此可見，不可以祇是在一個工業裏面建設社會主義，而同時却使農業服從自發的發展，以為農村『自己會跟着』城市走。城市裏社會主義底工業存在，就是農村裏社會主義改造底基本因素。可是，這還不是說，這個因素是完全足夠的。要使社會主義的城市能夠引導農民的農村到底，要做到這一步，就須要如列寧所說的，『將國家底經濟，農業也在內，轉移到新的技術基礎上，轉移到現代大工業底技術基礎上』。

列寧底上面這段話，不是與他所說的『新經濟政策完全保證我們有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可能性』這段話相矛盾嗎？是不相矛盾的。恰巧相反，它們彼此是完全相符合的。列寧並不是說，新經濟政策給我們現成的社會主義。列寧祇是說，新經濟政策保證我們有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可能性。在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性與社會主義底實在的建成之間，是有很大的差別的。不能把可能性與實在性混為一談。正是爲要把這個可能性變爲實在性，正爲着這一點，列寧在上面那一大段話裏面，才主張國家電氣化，主張給工業、農業及運輸業建立起現代大工業底技術基礎，以作爲社會主義澈底勝利的條件。

可是在一兩年內就要實現這個建成社會主義的條件是沒有可能的。不能在一兩年內就將國家工業化，建成強大的工業，使千百萬農民羣衆合作化，給農業建立起新的技術基礎，將個人的農民

的農莊合併爲大的集體農莊，發展蘇維埃農莊，限制和克服城市裏和鄉村裏的資本主義成份。要做到這一步，就需要無產階級專政底多年的加緊努力的建設工作。當這一點還沒有做到的時候——而這一點並不是一下子就做得到的——我們便仍舊還是一個小農民的國家，在這個國家裏小生產經常地和大批地產生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在這個國家裏資本主義恢復底危險還是存在的。而既然無產階級並不是生活在沒有人煙的孤島裏，而是生活在帶有各種複雜情形的最實在的和最實際的生活裏，所以在小生產基礎上生長着的資產階級的成份，是『用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來從各方面包圍無產階級，用這種自發勢力來浸染無產階級，來腐化無產階級，使無產階級內部經常重新發生小資產階級的無氣節性、渙散性、個人主義，由醉心轉爲灰心的心理』（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三六頁），並這樣把相當的猶疑、相當的動搖帶進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裏面去。

我們黨內各種動搖和各種離開列寧路線的傾向，其根源和基礎就在這裏。

正是因爲這個原故，所以關於我們黨內的右傾或『左』傾問題，不能認爲是微小的問題。

我們黨內的右的公開的機會主義的傾向底危險，是在於什麼地方呢？是在於這個傾向不充分的計我們敵人底力量，資本主義底力量，看不見資本主義恢復底危險，不懂得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面的階級鬭爭底關鍵，因而就這樣輕易去向資本主義讓步，要求降低我們工業發展底速度，要求緩和對待農村裏和城市裏的資本主義份子，要求把集體農莊及蘇維埃農莊的問題推到後面去，要求減弱對外貿易壟斷制以及諸如此類等等。毫無疑義的，如果右傾在我們黨內得到勝利，那末，這就會放縱資本主義底勢力，就會破壞無產階級底革命立場，就會提高資本主義在我們國家裏恢復起來的機會。

我們黨內『左』傾（託洛茨基主義派的傾向）底危險是在於什麼地方呢？就是在於它過分估計

我們敵人底力量，資本主義底力量，祇看見資本主義恢復底可能而看不見有用我們國家底力量來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陷於絕望地步而不得不拿這樣的空談——說我們黨正在齊米圖爾化——來安慰自己。列寧說，『當我們還生活在小農民的國家裏的時候，在俄國，資本主義所有的經濟基礎是比共產主義所有的更加堅固的』——從列寧底這句話當中，『左的』傾向就作出那種不正確的結論，說在蘇聯根本就不可建成社會主義，說對農民是一點沒有辦法的，說工農聯盟底思想是已經失去時效的思想，說要是沒有西歐已經勝利的革命趕快來幫忙，蘇聯無產階級專政就必會倒台或是蛻化，說如果不採納超工業化底幻想計劃——那怕就是用與農民分裂的代價來實行的計劃——那末，社會主義底事業便應當認為是已經滅亡的了。因此就有『左』傾政策中的冒險主義。因此就有政策中的『超人類的』躍進、毫無疑義的，如果『左』傾在我們黨內得到勝利，那末就會使工人階級脫離自己的農民基礎，使工人階級底先鋒隊脫離其餘的工人羣衆，——因而使無產階級遭受失敗，使恢復資本主義的條件易於形成。

可是這兩個危險，無論是『左的』或是右的危險，這兩個離開列寧路線的傾向，無論是右傾，或者是『左』傾，雖然各從不同的兩端出發，而它們兩者所引起的結果，却總是一樣的。

在這兩個危險中間，那一個壞些呢？我以為兩個都是很壞的。站在與它們作順利的鬭爭底觀點來說，這兩個傾向中間的差別就在於，在我們底黨看來，『左』傾現時是比右傾明顯些。我們與『左』傾已經作了幾年的加緊努力的鬭爭，——這種情形，當然不能不給我們黨許多益處。顯然的，在與『左的』託洛茨基主義傾向作鬭爭的幾年中，我們的黨已學會了許多東西；用『左的』詞句來欺騙我們的黨，已經不是容易的事情了，至於說到右傾危險——這個危險，從前也是存在過，現在由於因去年糧食採辦危機而使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加强的原故，所以更加公開暴露出來，——那

末，我認爲右傾危險，對於我們黨內某些黨員還不是很明顯的。因此我們的任務就在於，一分鐘也不減弱與『左的』，託洛茨基主義的危險作鬭爭，同時却着重與右傾作鬭爭，並盡力設法做到這一步，就是務必使這個傾向底危險，由我們的黨看起來，是與託洛茨基主義的危險一樣明顯。

右傾問題，如果它不是與我們發展中的困難問題有聯繫，也許不會像現在這樣緊張，可是事情底本質也就在於，右傾底存在，加深我們的發展過程中的困難，阻難着我們去克服這些困難。正因爲右傾危險是阻難着我們克服困難的鬭爭，正因爲這樣，所以在我們看來，關於克服右傾危險的問題是有特別重大的意義。

現在要關於我們的困難底性質問題說幾句話，應當注意，我們的困難不是停頓過程中的或衰落過程中的困難。有經濟衰落過程中或經濟停頓過程中的困難，而在發生這種困難的時候，人們總是努力把經濟停頓現象弄得比較不這樣沉重，或使經濟衰落狀況比較不這樣深刻。我們的困難，是絲毫不像這樣的困難的。我們的困難底特點就是在於，它們是高漲過程中的困難，發展過程中的困難。當我們這裏講到困難的時候，我們通常所講的，都是關於要把工業提高百分之幾，要把耕種面積增加百分之幾，要把收成率增加多少普特以及諸如此類等等。正因爲我們的困難是高漲過程中的困難，而不是衰落過程中或停頓過程中的困難，正因爲這樣，所以這種困難對於黨是不會有什麼特別危險的。可是困難到底還是困難。正因爲要克服困難，就需要緊張一切力量，需要有堅固性和穩定性，而堅固性和穩定性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夠有的，這也許因爲有人覺得疲倦和疲勞了，或者因爲有人寧願安靜些過活，不願有鬭爭和吵鬧，——正因爲是這個原故，於是就發生猶疑和動搖，向着抵抗力最小的方面走，說要減低工業發展底速度，說要寬待資本主義份子，否認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並根本否認一切超出日常工作尋常環境和安靜環境的東西。可是我們如果不克服擺在我們面

前的困難，便不能向前進展。而爲要克服困難，首先就必須打倒右傾危險，首先就必須克服右傾。因爲右傾阻礙與困難鬭爭的事業並企圖搖動我們黨的那種爲要克服困難而鬭爭的意志。這裏所講的，當然是與右傾作真正的鬭爭，而不是口頭上的、紙上的鬭爭。我們黨內有些人，因爲怕良心上過不去，所以也不拒絕宣佈與右傾危險作鬭爭，好像傳教師有時唱念『上帝至善，上帝至善』一樣，可是並不採取任何實際辦法來把與右傾的鬭爭放在應有的基礎上和在事實上克服這個右傾。這樣的派別，在我們這裏就叫做對公開機會主義的右傾採取調和態度的調和派。不難明白，與這種調和態度鬭爭，是與右傾，與右傾危險的總鬭爭底組成部份。因爲不與庇護機會主義者的調和態度作有系統的鬭爭，便不能克服右的機會主義的傾向。

關於右傾底代表人物的問題，固然並不能解決事情，但確實是有意義的。我們有過這樣的情形，就是在去年糧食採辦工作方面發生危機的時候，我們在黨的下層組織裏會碰到右傾危險底代表人物，當時，在村鎮裏有些共產黨員起來反對黨底政策，實行與富農份子聯絡起來。你們知道，這種份子在今年春季已被我們清出我們的黨以外，這一點，在今年二月間，已經在我們黨中央委員會底一個著名的文件裏特別提到了。可是如果說我們黨內再沒有剩下這種份子，那就不對了。如果往上面去看看黨的縣組織和黨的省組織，仔細考察蘇維埃機關和合作社機關，那末，你用不着花費什麼功夫就可以在這裏找到右傾危險底代表人物以及對這個危險取調和態度的調和派底代表人物。大家知道有我們黨的機關和蘇維埃機關好些工作人員底『信』、『申明書』及其他的文件，在這些東西裏面，右的傾向，表現得十分鮮明。你們知道，在中央委員會七月全會底速記錄上曾提到了這些信和文件。如果再往上去看看並提出關於中央委員會的問題，那末就須要承認，在中央委員會底委員裏面，也有一些對右傾危險取調和態度的份子，固然，這些份子是極少的。中央委員會七

月全會底速記錄就是這一點底直接證明。在中央政治局內又是怎樣的呢？在中央政治局內有沒有什麼傾向呢？在我們中央政治局內，也沒有右派，也沒有左派，也沒有對他們取調和態度的調和派。這是應當在這裏十分肯定地說明的。黨內不良份子及各種反對派散佈謠言說我們中央政治局內有右傾或對右傾的調和態度，這種謠言是應當拋棄的。

在莫斯科的黨組織裏或它的上層機關莫斯科委員會內，是不是有過動搖和猶疑呢？是有過的。要是現在斷定說那裏未曾有過猶疑和動搖，那就愚蠢極了。彭可夫底誠懇的演說詞，就可以直接證明這一點。彭可夫並不是莫斯科組織和莫斯科委員會裏的最後的一個人。你們聽見了，他直接地和公開地承認了他在我們黨的政策底許多極重要問題上面所犯的錯誤。當然，這並不是說，莫斯科委員會整個都發生過動搖。不，不是的。像今年十月莫斯科委員會告莫斯科組織底全體黨員書這樣的文件，無疑義地是證明，莫斯科委員會已克服了自己的某些委員底動搖。我不懷疑，莫斯科委員會底領導核心是會能够澈底糾正現狀的。

各區的組織曾經干涉了這件事情，曾提出了要剷除莫斯科組織裏某些領導人底錯誤和動搖的問題，而有些同志對於這一點便表示不滿意。我不知道，這裏的不滿意可以拿什麼來做理由。莫斯科組織裏的各區的積極份子們發表了自己的意見，要求剷除錯誤和動搖，這有什麼壞處呢？難道我們的工作不是在自下的自我批評情況中進行的嗎？自我批評可以提高黨的和一般的無產階級的下層份子底積極性，這難道不是事實嗎？要是各區積極份子曾經能盡自己的責任，這又有什麼壞的或危險的東西呢？

中央委員會干涉了這回事情，這是不是做得對呢？我以為中央委員會是做得對的。伯爾津認為，中央提出關於撤換一個會被區組織所反對的區的領導人問題，這是做得太激烈的。這是完全不

對的。我可向伯爾津提起關於一九一九或一九二〇年的幾件小事，那時有幾個中央委員在黨的路線方面犯了幾個錯誤，我想是不很嚴重的錯誤，而依列寧底提議就受了處罰以警告大家，其中一個人被派往土耳其斯坦，而另一個人幾乎是被取消了中央委員底資格。列寧當時是不是做得對呢？我以為他是做得完全對的。那時中央委員會裏面的情況不像現在這樣。當時有一半中央委員是跟着託洛茨基跑的，而中央委員會本身裏面的情況是不穩固的。現今中央委員會底做法已經是柔和得多了。爲什麼呢？也許我們想比列寧慈善些吧？不，事情底本質不在這裏。事情底本質是在於，現今中央委員會底情況比當時穩固些，所以中央現在有比較柔和些去做的可能。沙哈洛夫說中央委員會干涉得太遲了，他這種說法也是不對的。他之所以說得不對，是因為他大概不知道，中央委員會底干涉，事實上是從本年二月起就開始了。沙哈洛夫可以信服這一點，如果他願意的話。固然，中央委員會底干涉沒有立刻就收到良好的結果。可是如果拿這一點去責備中央，那就奇怪了。

結論：（一）右傾底危險是我們黨內嚴重的危險，因爲它的根源在於我們國家底社會經濟環境中；（二）右傾底危險，因有各種困難而加深，而不克服右傾及對右傾的調和態度，便不能克服這些困難；（三）莫斯科組織裏有過動搖與猶疑現象，有過不穩固的成份；（四）莫斯科委員會底中心，藉着中央委員會及各區積極份子底幫助，已經採取了一切辦法去剷除動搖現象；（五）莫斯科委員會一定能够克服以前所暴露了的錯誤，這是不能懷疑的；（六）任務就在於剷除內部的鬭爭，使莫斯科的組織團結一致，在擴展的自我批評基礎上順利地進行各支部底改選。（大鼓掌）

選自斯大林演講第三卷一九三九年解放社版

『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危險』第三〇四至三〇六頁

論國家工業化及聯共（布）黨內的右傾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在聯共中央全體會議上的演說——

同志們！今天我所要講的，就是在政治局的提綱中所提出來的三個基本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國家工業化的問題，並要講到工業化的要素就是發展生產工具的生產，並保證這種發展的速度盡可能的迅速，第二個問題，就是關於我們農村經濟發展的速度，農村經濟發展的速度遠遠不及工業發展的速度，因此，現時在我們內政中最迫切的問題是農村經濟問題，尤其是五穀問題，就是關於如何在新的技術基礎上來提高並改造農村經濟的問題。最後，第三個問題，這就是關於傾向的問題，關於在兩條戰線上鬭爭的問題，並講到現時主要的危險是右傾。

（一）工業化發展的速度問題

我們的提綱的出發點，就是認為：一般工業尤其是生產工具的生產迅速的發展是國家工業化的基礎，也就是在社會主義發展的基礎上來改造我們全部國民經濟的鑰匙。但是究竟什麼是迅速的發展工業呢？這就是說，多投資本到工業中去。但這非使我們的一切計劃，無論預算內的或預算外的，都緊張起來不可，而且實在也是這樣，最近三年來，在改造時期中，我們的標準數字的特點就是，它們是在緊張的表誌之下而規定和實現的。你們如果把我們國家的標準數字和我們的預算案拿

來看一看。你們如果和我們黨內的同志——無論是那些在黨的組織內作工的，或是那些領導我們蘇維埃經濟機關、合作社等建設工作的同志們談談話，那末，你就處處可以看到一種特點，就是我們計劃的緊張性。現在就發生了這樣的一個問題，就是，到底我們的工作需不需要這樣緊張呢？不緊張不行嗎？難道我們不可以比較『安靜』的環境中用比較緩慢的速度進行工作麼？我們採取的迅速發展工業的主張，是否因為政治局和人民委員會委員們的性質浮躁？當然不是的，在政治局和人民委員會中都是些切實而平靜的人。如果祇憑空想，離開內外的實際環境抽象地來講，我們當然可以用比較緩慢的速度進行工作。但是事實上，第一，我們不能離開內外的實際環境；第二，我們如果根據我們周圍的環境看來，我們就不能不承認，正是環境叫我們去迅速的發展我們的工業。

現在讓我們來分析國內、國外底條件及使我們採取迅速發展工業底速度底環境。

外部的條件。我們正在技術非常落後的國家內奪得了政權。在少數技術多少新一些的大工業之旁，我們還有千百個工廠和製造廠的技術從近代新發明的觀點上看來，簡直是受不住批評的。同時，在我們的周圍，還有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它們的工業技術比我們完善得多和發展得多。你們如果把資本主義的國家觀察一下，你們就可看到它們的技術不僅是在前進，簡直是在向前奔跑，越過了一切舊的工業技術。由此可見，一方面，在我們國內有世界上最先進的政權，蘇維埃政權；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蘇維埃政權的基礎——工業的技術，却非常落後。你們是否以為在這種矛盾之下可以達到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呢？要消滅這個矛盾應當怎樣做呢？這就必須要趕上並超過資本主義發展的國家之先進的技術。我們在建設新的政治制度——蘇維埃制度方面說來，已經趕上並超過了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是很好的。可是這還不够。要達到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還必須要在經濟和技術方面趕上並超過這些國家。我們或者是達到了這個目的，或者是失敗。這不僅從建設社會主

義的觀點上看來是對的，而且從我們國家在資本主義的包圍中保持其獨立的觀點上看來也是正確的。我們的國防如果沒有一種充分的工業基礎，國家就沒有保持獨立的可能。在工業中沒有高的技術，也就不能造成這種工業的基礎。這就是我們爲什麼要迅速發展工業的原故。

我們經濟技術之落後，並非是我們憑空想像出來的。這種落後是一種悠久的落後，這是由我國累代歷史的傳統遺傳給我們的。這種落後，無論從前在革命以前或後來當革命的時代，早就覺着是件不幸的事了。當大彼得與西方更發達的國家周旋的時候，曾狂熱的建立了工廠製造場來供給軍需及加強國防，這也就是想從落後的圈套中跳出來的一種特殊的企圖。但是，很明顯的，在舊的階級中沒有一個階級，無論封建貴族或資產階級，能够完成剷除我國落後狀態底任務。而且這些階級不僅不能完成這種任務，它們甚至也不會將這種任務用稍微令人滿意的方式提出來。祇有靠着社會主義建設勝利的基礎，才能剷除我國悠久的落後，而且祇有建立了自己的專政及掌握着國家的指導權的無產階級，才能剷除這種落後。

如果以爲，因爲我國的落後並非我們憑空想像的，而是歷代的歷史遺傳給我們的，因此我們就不能而且也不應該去管它，這樣的來安慰自己是最愚蠢不過的了。同志們，這是不對的。我們既已取得了政權，而且自己負擔起在社會主義基礎上去改造國家的使命，我們對一切無論好的壞的就必須並且應該負責。正因爲我們對一切都要負責，所以我們也就應該剷除經濟技術上的落後。假使我們在事實上要想趕上和超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我們就必須去作這件事。而且這件事體除了布爾塞維克黨人而外是誰也不能作的。所以要使這種任務在生活中實現，我們就應該有系統的迅速的發展我們的工業。至於我們現在已經迅速的發展着工業，這是大家都看見的。

在經濟技術上趕上及超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問題：對於我們布爾塞維克黨人，並不是什麼

新的或意料之外的問題。這問題還是一九一七年在十月革命以前的時候就提出來的。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十月革命的前夜，帝國主義大戰的時候，列寧在自己的小冊子——『可怕的災害及怎樣與它鬭爭』中，已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了。

這就是列寧關於這個問題所說的話：

『革命在幾月中使我們的政治制度趕上了先進的國家。但是，這還不够。戰爭是極頑強的，它很嚴厲地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或者是滅亡，或者是同樣的在經濟上也趕過它們。滅亡，或者開足馬力向前進展，這是歷史提出來的問題。』（『列寧全集』，第十四卷，下冊，第二二三頁）列寧同志曾這樣堅決地提出了剷除我們經濟技術落後的問題。

這一些都是列寧同志在十月革命前後，無產階級尙未奪得政權的時候所寫的。當時布爾塞維克黨人還沒有政權，沒有社會主義化的工業，沒有很普遍的包羅了千百萬農民的合作社，沒有集體農莊及蘇維埃農莊。現在當我們已有了一些能够在根本上剷除經濟技術落後東西的時候，我們可以將列寧的話大約這樣改變一下：『我們在政治方面趕上了並超過了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但是這還不够。我們應該利用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化的工業、交通、信用借貸制度、合作社、集體農莊及蘇維埃農莊等等，使我們能够在經濟方面同樣的趕上及超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

假使我們有如德國那樣發展的工業，那樣發達的技術；假使我們工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能像它在德國那樣的高，則工業發展的速度問題，對我們也就沒有現在這樣迫切了，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也就可以用稍緩的速度來發展工業了，不怕落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後面，而且知道我們一下子就馬上可以趕過他們。可是那時候我們經濟技術的落後也就不會像現在這樣厲害了，但是我們在

事實上在這方面確是落在德國的後面，在經濟技術發展方面與乙相差得還很遠。

如果我們不是唯一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而是無產階級專政國家之一，如果無產階級專政不僅實現於我國，並且實現於其他更先進的國家，譬如德國與法國，那末，工業發展的速度問題便不會這樣嚴重了。在這種條件之下，資本主義之包圍對於我們亦不會像目下這樣嚴重地危險了，我國經濟獨立的問題，自然要成爲次要的了，我們可以包括在更先進的無產階級國家的系統裏，我們以原料和食品去供給這些國家，而可以從這些國家裏得着機器來振興我們工業與農村經濟。所以，我們也就可以把發展我們工業的速度稍微緩慢一些，但是你們都很明白，我們還沒有這種條件，我們還是在資本主義國家包圍中的一個唯一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而其中許多國家，在技術上與經濟方面比我們要先進得多。

因此，列寧同志認爲在經濟上要趕上和超過先進國家的問題，是我們發展中的生死問題。

這就是迫着我們以很快的速度去發展我們工業的外部條件。

內部條件。但是除了國外條件，還有國內條件要我們以很快的速度去發展工業（這是我們整個國民經濟底主腦）。這種國內條件就是指我們的農業、技術及文化之非常落後而言的。散漫零碎的小商品生產者及其落後的生產，目下在我國還佔大多數，我們的社會主義大工業和這些小生產比較起來實是大海中的一個小島，這個小島的基礎雖然每日都在擴大，然而它還是大海中的一個島嶼。我們平常都說工業是整個國民經濟（自然，農村經濟也在內）底主腦，工業是一個鑰匙，在這個鑰匙的幫助之下，才能在集體化的基礎上來改造落後的星散的農業。這完全是正確的。這一點我們絕

不應當放過一分鐘。可是要記着，如果工業是主腦，那末，農村經濟便是工業發展之基礎，農村經濟是銷售工業品的市場，是原料與食物的供給者，是出口貨之來源，我們必需有些出口貨，以便能輸入機械供改造國民經濟之需要。如果農村經濟仍在技術完全落後的狀態中，不以農村經濟的基礎保障工業，不改造農村經濟，並且也不使它去接近工業，可不可以推動工業前進呢？決不能夠的。因此我們的任務就是盡量地以必要的生產資料與工具去保證農村經濟，以便在新的技術基礎上加速及推進農村經濟改造的事業。但是爲使這個任務得以實現，就必須使我們工業發展的速度加快。改造零碎的散漫的農村經濟，當然比改造統一的集中的社會主義工業更困難些。但是，這是擺在我面前的任務，我們應當去解決它。但解決這個任務，祇有在加緊工業發展的速度之基礎上才有可能。蘇維埃政權和社會主義的建設是不能過於長期的依靠在兩個不同的基礎上的，一方依靠大的統一的社會主義工業，一方依靠着星散的落後的小商品生產之農業經濟。我們應當漸漸地而且有系統地很堅決地把農村經濟推進到新技術的基礎和大生產的基礎上去，引導它接近社會主義的工業。如果我們能夠解決這個任務，那末最後的勝利便有了保障，如果我們退縮而不能解決這個任務，那末資本主義之恢復就將成爲不可避免的現象。

列寧關於這個問題，曾說：

『我們生存在小農國家中，俄國資本主義比共產主義有更堅固的經濟基礎。這是必須記牢的。每個注意觀察鄉村生活而與城市生活相比較的人都知道，我們還沒有掘出資本主義的根蒂，也還沒有剷除內部敵人的基礎，國內的敵人牢守着小經濟，要剷除它祇有一種方法，就是把國家底經濟，農業也在其內，過渡到新的技術基礎上，放到現代大生產的基礎上去。祇有電氣化是這種基礎。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上全國的電氣化。』（『列寧全集』，第十七卷）

你們可以看到，列寧所說的國家電氣化，不是孤獨的建立電站，而是漸漸的『把國家經濟，農業也在其內*，轉變到新的技術基礎上，過渡到現代大生產的基礎上去』。這種大生產，是這樣或那樣，直接或間接和電氣化事業相聯繫着的。

這是列寧在新經濟政策將要實行以前，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第八次蘇維埃大會上的演說詞，那時他確定了所謂電氣化的計劃，即俄國國家電氣化計劃。有幾位同志就根據這一點說，列寧在這一段中所說的話，已不合於現在實際情形了。那末有人要問，爲什麼呢？說是因爲從那時候到現在情形已變動許多了。從那時候起情形變動了許多，這自然是對的。我們現在有發達的社會主義工業，集體農莊已成了普遍的現象，我們有許多發展的合作社的組織，我們有借貸所來供給農民經濟，我們現在採用契約方法，作爲與農民聯合的新形式，我們可以採用這些方法和許多別的方法來逐漸把鄉村經濟束縛到新的技術基礎上去，所有這些都是對的。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對的，就是說，雖然有這一切，可是我們還是一個小農國家，一個小生產佔優勢的國家。而這一點却是主要的，祇要這個主要點還存在着，那末列寧的提綱中所說的『我們生存在小農國家中，在俄國資本主義比共產主義有更堅固的經濟基礎』這段話，就還是有效力的，因此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也並非空話。

在新經濟政策已實行以後（一九二一年四月至五月間），列寧曾在他的小冊子『論糧食稅』中也說過同樣的話，並且更加嚴格了：

『假使經過十年或二十年電氣化，小農民的個人主義及其在地方商品流通中的自由貿易就

一點也不可怕。假使沒有電氣化，那末就無論如何都必不可避免的將恢復到資本主義去。」

又說：

『同農民保持十年或二十年的正確關係，那足以保證世界範圍內的勝利（即使西歐無產階級革命延遲下去——而這些革命正在升漲着）；反之，將有二十年或四十年白黨白色恐怖的痛苦。』（『列寧文件』，第四卷，第二七四頁）

列寧就這樣嚴格的提出了這問題：或者是電氣化，就是把國家經濟、農業亦在其內，轉到新技術基礎上，轉到現代大生產基礎上去，或者是恢復到資本主義。

這就是列寧關於『和農民保持正確關係』問題的見解。和他們保持正確的關係並不在於向農民獻媚，因為獻媚是收不到大效果的。實情是在乎幫助農民，把農民經濟『轉到新的技術基礎上去，轉到現代大生產基礎上去』，因為這是農民從貧窮中解脫出來的根本道路。

可是，若不用很快的速度發展工業，尤其是生產工具之生產，想要把國家經濟轉到新的技術基礎上去，是不可能的。

這就是迫使我們加快工業發展底速度的國內條件。

這就是引起我國國民經濟的標準數字之緊張性底內外條件。

就是因為這個原故，我們的經濟計劃，預算內和預算外的都在內，才那樣緊張，才規定大大的向基本的建設中投資，以保障工業能迅速的發展。

有人將要問：在提綱內什麼地方談到了這點呢？在提綱內那個地方呢？（台下喊道：『對呀，在什麼地方有這樣的話？』）提綱中規定的一九二八至二九年向工業中投資的數目就可以表明這一點。我們的提綱叫做標準數字的提綱，是不是呢，同志們？（台下：是的！）

好了，在這個提綱內說，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裏我們要投十六萬萬五千萬盧布到工業中去。換句話說，我們在這一年中投到工業內的資本比去年要多三萬萬三千萬盧布。因此，可以得出結論說，我們不僅保持了工業發展固有的速度，並且向前進了一步，投在工業的資本比去年多了，就是工業中的基本工作絕對的、相對的都增加了。關於國民經濟標準數字的提綱之中心點就在這裏。然而有幾個同志，祇是吹毛求疵的指摘和批評這提綱的小節，而重要的却未看見。

(二) 五穀問題

我在上面所講的，都是關於提綱上的第一個根本問題，即工業發展的速度問題。現在就要講到第二個根本問題，即五穀問題了。提綱的特點，就在於它注重了發展一般的農村經濟，特別是發展五穀經濟的問題。提綱上的這個立場是否正確呢？依我想來是正確的。在七月全體會議上面，我們就已講到在我們國民經濟之中最困難的地方，就是一般的農村經濟特別是五穀經濟的非常落後。當有些人講到農村經濟比工業落後的時候，而對於這種情形就悲嘆起來，這自然是不鄭重的。農村經濟總比工業落後，而且將來還要比工業落後。這一點，在我們的工業已十分集中而農村經濟却十分分散的條件之下，更是正確。誰也懂得，統一的工業是要比分散的農村經濟發展得快。從這裏也就發生了工業對於鄉村經濟的領導作用。因此，農村經濟比工業普通的落後，還不是提出五穀問題的理由。祇有在農村經濟比工業之平常的落後變為農村經濟發展的過度落後的時候，農村經濟的問題，特別是五穀問題，才在舞台上出現。現在國民經濟狀況之特點，就在於目前蒸蒸日上城市和工業區域對糧食商品的需要日益增加了。我們農村經濟發展的速度比工業發展的速度過度的落後，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的任務，並不是把工業發展的速度減低到五穀經濟發展的速度之水平線（這

便要顛倒是非且會使發展向後退)，而是使五穀經濟趕上工業發展的速度，並且把五穀經濟發展的速度提高到保證國民經濟、工業與農業迅速向前發展之水平線。我們若解決了這個任務，那末五穀問題也就因此而解決，我們不解決這個任務，那末社會主義的城市與小農的鄉村中間就不免要發生破裂。同志們，我們的問題就是這樣，五穀問題的實質便是如此。

這是否說現時五穀經濟的發展是停頓了或者甚至退化了呢？伏龍肯在他的第二封信中正是這樣提出這個問題來，這封信，我們根據他的要求今天發給中央委員會及監察委員會了。他在信中直接說道，我們農村經濟中有了『停滯』。他說：『我們不能而且不應把關於退化的事，發表在報紙上，但是在黨內我們不應掩飾，這種落後，就是等於退化。』伏龍肯的這種論斷是否正確呢？自然，是不正確的。我們政治局的委員完全不能同意於這種論斷。而政治局的提綱，也根本不是這樣來觀察五穀經濟的問題的。

事實上，什麼是退化，而且退化在農村經濟中應該表現於什麼地方呢？很明顯的，退化應表現於農村經濟之後退和下降，應表現於從新的經濟形式而退化到中世紀的舊經濟形式。退化應表現於農民耕田之改變中，例如從三田制過渡到移耕制的經濟，從犁和機器過渡到鋤頭，從純潔一色的種子過渡到不純潔、不一色的種子，從現代農業的生產品過渡到下等的農業生產品，諸如此類皆是。但是，我們現在難道看見了這類的事實嗎？難道大家不知道幾千幾萬的農戶每年由三田制過渡到四田制以至多田制，從不純潔的種子過渡到純潔的種子，從鋤頭過渡到犁和機器，從下等的農業生產過渡到高等的農業生產麼？這怎樣會是退化呢？

伏龍肯總愛拿政治局這個或那個委員的話來做自己觀點的基礎，所以這次他也竭力想把布哈林拖到自己一方面來，為的證明布哈林在他『經濟學家』的論文中『也是這樣說的』。但是布哈林遠

非『也是這樣說的』，布哈林在他的論文中，提出了關於退化的可能或者是關於退化的危險之抽象的理論的問題。抽象的說來，這種問題的提法，完全是可能而且合法的。但伏龍肯做的是什麼呢？他把關於退化的可能之抽象的問題，變為農村經濟退化的事實了。這就是他所謂關於五穀經濟現狀的分析 同志們，這豈不是好笑的事嗎？

要是蘇維埃政權在它存在的第十一年使農村經濟趨於退化，那還得了！那對這種政權簡直不應客氣要推倒它，而不是幫助它、而且這個政權如果真正是使農村經濟趨於退化，那末工人們就早已把它推翻了。所有資產階級的專門家都在向我們高唱退化論調，這些專門家睡在夢裏夢着農村經濟退化了。託洛茨基曾有個時候也在向我們高唱過退化。我們不料伏龍肯也走入了這一條迷途！

伏龍肯根據什麼來確定自己的退化論呢？首先就是今年播種五穀的面積比去年少些。這事實的原因何在呢？是不是蘇維埃政府的政策呢？自然不是的。這個事實發生的原因是因為烏克蘭與北高加索一部份的荒原區域經冬禾苗的枯死，與今年夏天在烏克蘭同一地方又遭受旱災的原故。假如沒有這樣的不利的氣候條件（而鄉村經濟又完全是依賴這些條件的），那我們今年播種五穀的面積至少要比去年多一百萬俄畝。伏龍肯的論點，其次就根據：我們今年五穀產品的總數比去年多得有限（比去年多七千萬普特），而小麥與黑麥却比去年少過兩萬萬普特。這些事實的原因何在呢？這也是因為旱災和禾苗因大霜而枯死的原故。假如沒有這些不利的氣候條件，那我們今年的糧食生產總量就會比去年多三萬萬普特呢！請問，這些事實——大霜、旱災等，這些對於這區或那區的收成有極大關係的事實，我們如何可以忽略過去呢？我們現在已規定了這樣的任務——擴張百分之七的耕地，收成提高百分之三，五穀生產量增加百分之十。無疑義的，我們將用一切方法完成此任務。然而，無論我們如何採用方法，還是不能保證不再遭受部份的荒收與這一區或那一區的旱災或霜災；

在這種不幸的條件之下，五穀生產總量也許難免較我們的計劃要相當的減低，也許甚至於比今天的收成還少。這種情形不能說是鄉村經濟在『退化』，這種『退化』能不能歸咎於蘇維埃的政策呢，能不能說我們『遜奪了』農民經濟上的興奮呢，能不能說我們『破壞了』農民經濟的前途呢？

幾年以前，託洛茨基曾經也犯了這種的錯誤，他以爲『下雨』對於農村經濟是無關係的，李可夫曾在中央委員大多數的幫助之下駁覆了他。現在伏龍肯也犯了同樣的錯誤，他把與農村經濟極有關係的氣候條件放開不說，而大賣氣力的來歸咎於吾黨的政策。

提高一般農村經濟特別是五穀經濟發展的速度，需要一些甚麼路線與方法呢？這種方法有下面的三個：（一）提高收成及擴大貧農、中農個人經濟的耕地；（二）繼續發展集體農莊；（三）擴大舊的蘇維埃農莊與發展新的蘇維埃農莊。關於這點，在七月全體會議的決議中已經說過了。提綱又把七月會議的決議案重複一次，而把問題却更提得具體些了。同時並指出了爲着發展這部工作所應投資的數目。伏龍肯這裏又找到攻擊的口實了。他以爲如果把個人經濟放在第一位，把集體農莊與蘇維埃農莊放在第二位與第三位，這恰好就是說他的觀點得到勝利了。同志們，這簡直是笑話。自然，如果從各種農村經濟的比重看來，那自然要把個人經濟放在第一位，因爲個人經濟出產的糧食比集體農莊與蘇維埃農莊的要多六倍。但是，如果從經濟形式的觀點出發，如果從那一種經濟最接近我們的觀點上看來，那末就應當把集體農莊與蘇維埃農莊放在第一位了，因爲這種經濟與個人農莊比較起來，它是一種更高的經濟形式。這兩個觀點我們都採用，難道還要證明嗎？

爲使我們底工作可以從這三條道路進行，以達到農村經濟特別是五穀經濟的發展速度實際的提高，須要怎樣辦呢？

爲要達到這一點，首先就要使我們黨的幹部人才注意農村經濟方面的工作，把注意力集中在五

穀問題上的具體問題上面。最後我們必需把關於一般農村經濟的空話和無稽之談丟開，應當按照各區域的特殊條件製出提高五穀經濟的具體辦法。現在已經是從口頭轉到實際行動的時候了。我們應當研究下面具體的問題：怎樣去提高收成與擴大貧農、中農的個人經濟的耕地；怎樣繼續改善與發展集體農莊與蘇維埃農莊；怎樣使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幫助農民以好的種子與好的畜種；怎樣經過借貸所而給農民以機器與其他工具的幫助；怎樣擴大與改善訂合同的事業與一般農村經濟合作社的工作等等。（喊聲：『這是實際主義』）這種實際主義我們絕對需要，因為沒有它，我們就祇好空講一般的農村經濟而不能解決五穀問題這種嚴重的情形。中央決定叫主要糧食區域的重要工作人員在蘇維埃人民委員會及政治局報告農村經濟發展的問題。在這次全體會上你們可以聽到安得利夫關於解決北高加索五穀問題方法的報告。我想以後我們要依次叫烏克蘭、中部黑土區域、伏爾加流域、西伯利亞等區作同樣的報告。為轉移我們黨的注意力到五穀問題方面去，及遷徙我們黨的中堅份子到具體的提出與五穀問題相關的軌道上去起見，這是絕對必要的。

第二、必須使我們黨在農村的工作人員，在他們的實際工作中嚴格地把中農和富農分別清楚，不把他們混在一塊，當打擊富農的時候，不要連累中農。末了，我老實說，現在已經是消滅這些錯誤的時候了。例如拿個別稅的問題來說吧，按照政治局的決議及關於該項稅則的法律，個別稅不得超過全體農戶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即是指富農中最富裕的一部份。但是實際上是怎樣呢？有許多區域這種稅達到了百分之十、十二，甚至更多的農戶，因此連累到中農了。肅清這些罪孽的時期不是已經到了嗎？我們親愛的『批評家』不來指出消滅這些及這一類的不成體統的方法，而偏要尋章摘句，提議把『富農中最富裕的一部份』這句話改作『富農中最有力的一部份』，或『富農中最上層的一部份』，好像這些字句是不相同的樣子！已經證明了我國的富農約有百分之五，已經證明了

在個別稅的法律中祇規定課農戶中百分之二至三，就是富農中最富的部份的這種稅。而且已經證明有許多區域在實際上是破壞了這項法律。那班『批評家』並不指出消滅這些現象的具體辦法，而祇尋章摘句的批評，不願意了解這完全是無濟於事的。真是博學之士呵。

（喊聲：『他們提議對全體富農徵收個別稅。』）

啊！那末就應該要求取消關於百分之二至三個別稅的法律了。不過我倒從來沒有聽過誰要求取消個別稅的法律。有些人說隨意擴大個別稅，其目的是在填補地方預算案。但是不應該用破壞法律、破壞黨的指令的方法來彌補地方的預算案。我們黨存在着，它還沒消滅。蘇維埃政權存在着，它也還沒有消滅。假使地方預算案的費用有不够的時候應該提出地方預算案的問題；不應該破壞法律，不應該取消黨的指令。

以後，必須繼續發展對貧農和中農的個人經濟底激勵作用。提高糧食的價格，切實執行革命的法律，用簽訂合同的手續實際地幫助貧農、中農的經濟等等，毫無疑義的更大的加緊了對農民經濟的激勵作用。伏龍肯以為我們已完全消滅了或差不多消滅了這種激勵作用，剝奪了農民經濟的前途。當然這是無稽之談。如果真是這樣的，那末，我就不懂得，工人階級和基本的農民羣衆的聯合怎樣能保持得住呢？不能以為這種聯合是精神上的聯合。當然明白，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合是打算盤的聯合，是兩個階級利益的聯合，工人階級和農民的基本羣衆之階級聯合，目的是在雙方相互有利。很明白的，假使我們毀滅了或者差不多毀滅了這種農民經濟的激勵作用，剝奪了農民經濟的前途，那末我們就沒有聯合，就沒有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了。很明顯的，現在的問題並不是在『建立』或破壞對貧農、中農經濟的激勵作用，而是在於加緊這個激勵作用，並繼續發展它以達到工人階級和基本農民羣衆的相互利益，在關於國民經濟標準數字的提綱中所說的正是這個問題。

最後，必須增加對鄉村的商品供給。不僅消費的商品，而特別是含有生產性質的商品（如機器、肥料等），這種商品能够提高農村經濟的生產品之生產。我們還不能說在這方面一切的事情都是很順利的。你們都知道，商品飢荒的現象並沒有消除，大概消除它也不是馬上就可辦到的。我們黨有些人有這樣的幻想，以為我們馬上可以消除商品的飢荒。這種幻想，可惜是不對的。要知道，商品飢荒的現象，第一是與工業的狀況一天一天的改善，商品的購買力大量的發展有關係的，因之生產品雖然逐年的增加，但還不能滿足全部的需要；第二，商品缺乏的現象是與目前工業改造的時期有聯繫的。工業的改造，就是把資本從消費品的生產移轉到生產工具的生產品之過程。不這樣，就不會並且不能大規模的改造工業，特別是在我們蘇聯的條件之下。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投資到新企業的建築上面去，城市的數量和新的消費者增加起來，但新的企業也要經過三四年後才能够供出大批新的商品。很容易明瞭，這種情形是不能幫助我們消除商品飢荒的。但這是不是說，在商品飢荒現象的前面我們祇好束手無策承認自己無能為力呢？不是，當然不是這樣說。事情是在於我們能够而且應當採取具體的方法來減弱和消滅商品飢荒，這些我們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我們現在就應當做。因此我們先要注意到加強那些和農村經濟的發展有直接關係的工業部門（如斯大林城的拖拉機工廠、羅斯多福的農村機器製造廠、瓦羅業世城的犁機工廠等），為達到此目的起見，尤須盡可能的加強那種與缺乏商品有聯帶關係的工業部門（布廠、玻璃廠、鐵釘廠；等）。

古巴克說，按國民經濟的標準數字，給個人農民經濟的款項今年比較去年少，我認為這是不正確的、很明顯的，古巴克沒有計算到在簽訂合同上，我們今年用訂合同的手續供給了差不多三萬萬盧布的借貸（比去年幾乎多了一萬萬盧布）。如果計算到這一點（這是不能不計算到的），就可以知道，我們今年用作發展個人農民經濟的比去年增加了。至於說到舊的和新的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

莊，今年投在其中的款項大約有一萬萬八千萬盧布（較去年多了七千五百萬盧布）。

要特別注意到集體農莊、蘇維埃農莊和訂立合同的方法。而且不能把這類東西僅僅視爲增加我們食品來源底方法。它們同時還是工人階級和基本的農民羣衆聯合的新形式。關於訂合同的方法講得很多了，我用不着多說了。每個人都知道，大批訂合同的方法，容易使個人的農民經濟力量聯合起來，並在政府和農民的互相關係中間造成固定的現象，並藉之而鞏固城市和鄉村中間的聯合。我希望你們都注意到集體農莊，特別是蘇維埃農莊，因爲它們使在新技術的基礎上改造農村經濟的事業更容易，並且能使農民的頭腦起一番革命，幫助他們從舊的頑固的習慣中解放出來。大的農村經濟的機器和成排的拖拉機隊在生產糧食的區域中發現了，這對於周圍農民底經濟，是不會沒有影響的。我們以種子、機器、拖拉機幫助鄉下的農民，必然會使農民估計到及感覺到工人政府力量的強大，並且工人政府是在盡量的使他們走上大大的提高農村經濟的康莊大道。這一點我們過去沒有顧及到，即現在我們也沒有充分的顧及到。我認爲這是目前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能在解決五穀問題和鞏固聯合的新形式中所盡的和能盡的最主要的作用。

這就是我們在解決五穀問題的工作中所應採取的道路和方法。

(三) 論反對傾向及調和派的鬭爭

現在要講到我們提綱上的第三個基本問題，即關於各種脫離列寧主義路線的傾向的問題。

各種傾向之社會基礎，就是在我們國家內小生產佔優勢，從小生產中產生出資本主義成份來，小資產階級的勢力圍繞着我們的黨。最後，黨的某幾部份，受了這種勢力的薰染，這就是各種傾向的主要社會基礎。這些傾向，都帶有小資產階級的性質。

此地主要的要說右傾，但這右傾要歸向到那裏去呢？它向那方面牽引？它牽引着去迎合資產階級的思想，要把我們的政策拉到適合『蘇維埃』的資產階級的口味與要求的路線上面去。

假使右派在我們黨內得到勝利，對於我們將有怎樣的危險呢？這將是吾黨的思想破產，將是資本主義份子的被解放，將增多資本主義復辟之時機，或如列寧所說的『回復到資本主義』。

右傾的傾向，主要的是潛居在那兒呢？潛居在我們的國家機關、經濟機關、合作社的與職工會的機關，甚至黨的機關，特別是在它的下級的農村機關內。

我們黨內，有無表現右傾的黨員呢？不消說，是有的，李可夫曾引夏杜諾夫斯基爲例，因他表示反對第列泊爾電站的建築。毫無疑義的，夏杜諾夫斯基犯了右傾公開的機會主義傾向。但是，我想夏杜諾夫斯基還不能做評判右傾及右傾的面目的標本。我想在這件事上的錦標應歸之伏龍肯。我所說的就是關於他的第一封信（一九二八年六月）及他的最近的第二封信，這封信已分送給中央委員及中央監察委員了（一九二八年十一月）。

我們現在來分析這兩封信。先分析第一封信的『根本意見』。

一，『鄉村內除了極少數的一部份貧農外，大部份的農民，都反對我們。』真是這樣麼？很明顯的，這是不對的。假使真是這樣，那我們的聯合早已沒有了。然而自六月（該信寫於六月）以來，快要半年了，祇要不是瞎子，總可以看到工人階級與農民的基本羣衆的聯合，仍然存在着與鞏固着。但是伏龍肯究竟爲什麼要寫這樣不符合事實的信呢？爲的恐嚇黨，好使黨向右派讓步。

二，『最近所採用的方針，引導中農基本羣衆走到沒有希望及絕路的地步。』果是這樣麼？完全不對的。很明顯的，假使我們今年春季真把基本中農羣衆的經濟發展的希望及前途斷絕了，那末在主要的糧食區域內的中農就絕不會擴充春耕的土地了。我們的春耕是在四五月之間，而伏龍肯的

信是在六月寫的。這正與事實相反。在蘇聯國內，誰是糧食的主要收買者？國家及和它有關係的合作社。很明顯的，假使中農羣衆苦於經濟沒有發展的希望，假使他們處在與蘇維埃國家『分離』的地位，那末他們絕不會爲了糧食的主要收買者的利益，而擴充他們的耕地了。伏龍肯所說的話，完全不符合事實。他想以沒有發展前途的『危險』來恐嚇黨，以便黨向伏龍肯及其觀點讓步。

三，『要回到第十四次及第十五次大會去。』這裏與第十五次大會毫不相干是無疑義的。這裏的要點並不在第十五次大會而是在回到第十四次大會的口號。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要拒絕『向富農加緊進攻』。（參看第十五次大會的決議）我這樣說並不是詆毀第十四次大會。完全沒有這樣的意思。我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伏龍肯否認黨由第十四次大會到第十五次大會是進了一步，他號召同志回到第十四次大會去，否認黨前進了一步是把黨拉向後退。中央七月會議對於這個問題，已有評判。這次會議在它的決議案上直接的說，人們想逃避第十五次大會關於『更發展向富農進攻』的決議案——這是『我們國內資產階級傾向的表現』。老實告訴伏龍肯，當政治局把這點列入七月擴大會議的時候，他便是指着伏龍肯及他的第一封信而說的。

四，『盡量幫助加入集體農莊的貧農。』我們永遠在盡力的盡可能的盡量幫助加入集體農莊的甚或未加入的貧農。這並沒有什麼新的所在。第十五次大會的決議與第十四次大會比較起來，它們的不同點並不在這裏，而在於第十五次大會提出盡可能的來發展集體農莊的運動，認爲這是重要的工作日程之一。伏龍肯說要盡量的幫助加入集體農莊的貧農，這就是要離開黨第十五次大會所規定的盡可能發展集體農莊運動的任務。伏龍肯實是反對在鄉村中努力在集體農莊方面加強社會主義成份。

五，『不要努力或過於努力來擴展蘇維埃農莊。』伏龍肯不能不知道我們還是僅僅才開始加緊

工作來擴大原有的蘇維埃農莊並建設新的蘇維埃農莊。伏龍肯也不能不知道我們做這件事情，若是我們有相當的蓄積，那我們所應拿出的錢比之我們所已經拿出的要多得多呢。所謂『努力和過於努力』，在這裏僅是用來恐嚇人的，用來掩飾自己不願意切實的擴大蘇維埃農莊。伏龍肯實在講來，祇是反對在鄉村中按照發展蘇維埃農莊的路線來增加社會主義的成份而已。

現在綜合伏龍肯所有的這些意見，你們可以知道什麼叫做右傾了。

再說到伏龍肯的第二封信。第二封信，同第一封信有什麼區別？就是它加深了第一封信所犯然的錯誤。在第一封信上說到中農經濟的前途無希望，而第二封信則說鄉村經濟『退化』了。第一封信說到回到第十四次大會去，即減弱對富農的進攻，第二封信則說『我們不應當妨礙富農經濟的生產』。第一封信並沒說到工業，而第二封信則發揚其『新的』理論，說應少去發展工業的建築。然而却有兩點，是兩封信相似的，即是關於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伏龍肯在兩封信上都是反對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的擴大。很明顯的，第二封信更加深了第一封信的錯誤。

關於『退化』的理論，我已經說過了。毫無疑義的，這個理論是那些準備着亂叫蘇維埃政權滅亡的資產階級專門家的設想。伏龍肯被隱藏在人民財政委員部的資產階級專門家所恐嚇了，現在自己轉而企圖來恐嚇黨，希望黨對右傾讓步。關於集體農莊與蘇維埃農莊，已說得足够了，因此不值得我們來重複。再來看其餘的兩點：關於富農經濟與對工業的投資。

關於富農經濟。伏龍肯說：『我們不應當妨礙富農經濟的生產。』這是什麼意思？這就是說，不要妨礙富農剝削者經濟的發展。不要妨礙富農發展自己的剝削經濟，是什麼意思？這就是給資本主義在鄉村中發展的自由。這恰好是法蘭西自由主義者的老口號『讓我們去做吧』，這就是不去妨礙資產階級做其自己的事，不要妨礙資產階級自由的動作。這個口號，是法國的老自由主義者在法

蘭西革命時代，在同封建政權鬭爭時代提出來的，因為封建政權束縛了資產階級，而且壓制了它的發展。這樣一來，就是我們現在應當從社會主義的口號——『不斷的增加對資本主義份子的限制』（參看標準數字的提綱），轉到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口號——不束縛資本主義在農村中的發展。難道我們想由布爾塞維克變為自由主義者嗎？在伏龍肯自由派的口號與黨的路線之間，有什麼相同的地方呢？

（伏龍肯：『斯大林同志，讀讀其他幾點吧！』）

我都要讀的。『我們不應當妨礙富農經濟的生產，同時須與其奴役式的剝削鬭爭。』伏龍肯不是以為這句話的下半節有補於事而無害於事呢？同奴役式的剝削作鬭爭是什麼意思？須知同奴役式的剝削鬭爭是資產階級革命反對封建與半封建的剝削方法之口號。在資產階級革命的時期我們真提出過這個口號，那時我們分別出奴役式的剝削形式（這是我們要消滅的）與非奴役式的剝削，所謂『進步』的剝削形式（這是當時還不能限制和消滅的），因為資產階級的制度還是有力量。可是當時我們是向着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走的。而現在若是我說得不錯，我們的革命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這個革命的方針是要堅決的來消滅一切剝削的，也無論是奴役式的或非奴役式的，並且它也不能不抱着這個方針。伏龍肯真要使我們從我們的發展着和推動着的社會主義革命重新回復到資產階級革命的口號嗎？伏龍肯為什麼能說得出這般無稽之談呢？

還有，不妨礙富農的經濟，這是什麼意義？這是給富農以自由。給他們以自由，是什麼意思？這是給他們以政權。當法蘭西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者要求封建政權不要妨礙資產階級的發展時，他們具體的要求是應給資產階級以政權。當時他們是對的。為着要好好的發展，資產階級是必要有政權。因此如若澈底講來，應當說：給富農以政權。因為我們應當明瞭，奪得富農的政權而集中之於

工人階級之手，就不能不束縛富農經濟。這就是當讀伏龍肯第二封信的時候自然要得出的結論。

關於向工業中投資的問題。當我們討論標準數字的時候，共有三個數目字：最高人民經濟委員會主張要八萬萬二千五百萬盧布，國家計劃局主張要七萬萬五千萬盧布，而人民財政委員會僅僅給六萬萬五千萬盧布。我們黨的中央委員會對於這個問題究竟如何決定了呢？中央委員會結果即決定了八萬萬盧布。這個數目字已經比人民財政委員部的提議多出一萬萬五千萬盧布了。人民財政委員部提出這樣少的數目字，自然並沒有什麼奇怪，大家都知道人民財政委員部的吝嗇，它不能不吝嗇。但是現在問題並不在這裏。問題就是伏龍肯堅持六萬萬五千萬盧布，並非出於吝嗇，而是建築在新奇的「可能」論上面的。在他的第二封信內與人民財政委員部機關報的特別論文中，肯定的說道，倘若我們給最高人民經濟委員會六萬萬五千萬盧布以上作投資之用，那我們的經濟一定要糟糕了。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伏龍肯反對保持現時工業發展的速度。這是明顯地不了解這個速度的降低實際上會使我們整個的國民經濟的情形變壞。

你們現在若把伏龍肯第二封信裏面關於富農經濟與工業的投資這兩點合攏起來，再加上「退化」的理論，——你們就得到右傾的面目了。

你們要知道什麼叫做右傾與右傾的觀點如何嗎？那末請細讀伏龍肯的這兩封信，好好的研究，體會其意旨，就自然明白了。

右傾的面目就是如此。但是提綱不僅說到右傾而已，他還說到了所謂「左」傾。什麼叫做「左」傾呢？我們黨內是否真正的有所謂「左」傾呢？我們黨內是否有反中農的傾向，好像提綱所說的過度工業化的傾向呢？不錯，有的。他們傾向於那方面呢？他們是傾向於託洛茨基主義。關於這點，在七月全體會議的時候，就已說過了。我是指着七月全體會議關於收買糧食政策的決議案說

的，在這個決議案裏說到了兩條戰線上的鬭爭：反對那些從第十五次大會向後退的——這是右派，和反對那些將非常手段轉變為黨的經常政策的人——這是『左』派，託洛茨基主義的傾向。很明顯的我們黨內現在還有託洛茨基主義的成份與傾向於託洛茨基的思想。當第十五次黨大會前討論時，大約有六千人左右舉手反對我們的政綱。（下面叫：『一萬人。』）

我想若有一萬黨員舉手反對，那末必定有兩萬同情於託洛茨基主義的黨員，因為有未到會而完全沒有舉手的。這些託洛茨基主義者未脫離黨，但恐怕還未從託洛茨基主義的思想中解放出來。此外我想已從託洛茨基組織脫離出來而轉回到黨內的一部份人，還未能完全拋開託洛茨基主義的思想，自然也不時散佈其觀點於黨員中。末了，在黨的下級黨部中還有過託洛茨基主義的思想死灰復燃的事實。若把這些事實湊合起來，我們就得出黨內託洛茨基主義傾向的基礎了。

自然，很明顯的，在小資產階級勢力存在的條件之下，在這種勢力影響到我們黨的條件之下，託洛茨基主義的傾向是不能沒有的。流放或逮捕託洛茨基派的中堅份子這是一件事，把託洛茨基主義的思想完全消滅，這是另一回事。這件事比較困難。我們說：有右傾的地方就必有『左』傾。『左傾』是右傾的影子。列寧曾指着召回派說過，『左派』也同樣是孟塞維克，不過是它的背面。這句話是完全對的。現在的『左派』也是這樣。傾向於託洛茨基主義的人，事實上也是右派的，右派祇是用『左派』的話來掩蔽自己的本相而已。

所以要做兩條戰線之鬭爭，反對右傾與反對『左』傾。

有人要說：若『左』傾實際上是右派機會主義的傾向，那末它們中間有什麼區別呢，所謂兩條戰線到底在什麼地方呢？事實上若右派得到勝利便是增加資本主義復辟的良機，而『左派』的勝利也是得同樣的結果，那末在它們中間還有什麼區別，為什麼一個叫做右派，一個又叫做左派呢？若

左派與右派中果真有區別的話，那末究竟區別在什麼地方呢？這兩個傾向的社會基礎一樣，它們同是小資產階級傾向難道不對嗎？這個傾向得到勝利以後，終歸是一個同樣的結果，這難道不對麼？它們中間的區別究竟在什麼地方呢？

不同的地方在於：綱領不同，要求不同，出發點與方法不同。譬如，右派說：『不應當建設第一列泊爾水電站。』而左派却恰恰相反，他們說：『怎麼我們祇一個第一列泊爾水電站，要一年給我們一個第一列泊爾水電站。』（笑聲）因此我們要承認，其中顯然是有分別的。如果右派說：『不要侵犯富農，讓他去自由地發展。』左派恰恰相反，說：『我們不僅要打擊富農，並且還要同樣打擊中農，因為中農亦同富農一樣地是私有者。』這亦是我們要承認的，其中顯然是有分別的。如果右派說：『困難來了，還不是逃避的時候嗎？』而左派相反的說：『什麼是我們的困難，這有什麼難，飛向前去啊！』（笑聲）這亦是我們要承認的，其中顯然是有分別的。

你們看，這就是『左派』特別的政綱及其手段底一幅畫圖。因此，『左派』才常能用那種左傾而動人的言詞，欺騙了一部份工人，表明自己是右傾底最堅決的敵人；可是，誰都知道，左派與右派的社會根源是沒有什麼分別的，他們時常走向妥協的道路，與右派聯合來作反對列寧主義路線的鬭爭。所以我們列寧主義者，必須要在兩條戰線上作鬭爭：一方面反對右傾，一方又反對『左傾』。可是，如果託洛茨基主義的傾向是代表『左』傾，那末是不是說這個『左傾』比列寧主義更左呢？不是的，列寧主義在全世界工人運動中，是最左的（這個左字沒有括弧）一派了。我們列寧主義者，在帝國主義戰爭開始以前的時期，加入到第二國際中去，是社會民主黨中最左的一派。我們未留在第二國際中，我們在第二國際中宣傳分裂，因為我們是最左的一派，不願意與馬克思主義底小資產階級的叛徒及社會和平主義者、社會愛國主義者共居一黨。這個策略與這個思想，結果做了

全世界布爾塞維克底基礎。我們列寧主義者在自己的黨內是唯一的沒有括弧的左派。因此我們列寧主義者，在自己的黨中，既無所謂『左』，亦無所謂右。我們的黨是馬克思主義者與列寧主義者的黨。在本黨內，我們不僅同那些已被我們公開的稱爲機會主義者的人鬭爭，並且同那些企圖做比馬克思主義『更左』、比列寧主義『更左』的人，用左而動人的言詞去掩飾右傾機會主義本質的人鬭爭。誰都懂得，稱那些還沒有從託洛茨基主義傾向解放出來的人爲『左派』，這是諷刺的意思。列寧稱那些『左派共產主義者』爲左派，有時把它放在括弧內，有時不用括弧。但是誰都知道，列寧之稱他們爲左派，即是譏諷的意思，要藉之以說明他們僅僅是在口頭上、表面上是左派，而在實際上是代表小資產階級的右傾。那些託洛茨基派的份子，昨天還與公開的機會主義份子結成了反列寧主義的聯盟，並且與國內反蘇維埃的份子直接勾結，他們怎麼可以稱爲左派（沒有括弧）呢？不久還有一個受資產階級份子贊助的反列寧黨底『左』右派公開的聯盟，難道這不是事實嗎？難道這不是說，如果『左派』與右派沒有一個共同的社會根源，如果它們沒有一個共同機會主義的天性，它們絕不能結合成一個統一聯盟嗎？託洛茨基派場合已有一年了。右傾的一部份，例如夏杜洛夫斯基，離開了這個聯盟。因此，右派今後將以右派的資格出台，而『左傾的』就將用左傾的話去掩飾自己的右傾。但是我們怎能保證這個『左傾的』與右傾的彼此不能再碰見呢？（笑聲）很明白的，簡直一點保證也沒有，也不會有。

如果我們擁護在兩條戰線上鬭爭的口號，那末，是不是說，我們這就宣佈了我們黨內必須有中派呢？究竟在兩條戰線上鬭爭是什麼意思呢？不是中派的意思嗎？你們都知道，託洛茨基主義者正是這樣說：有所謂『左派』，這就是『我們』——託洛茨基派，『真正的列寧主義者』；有所謂『右派的』，這是其餘的一切人；末了，有所謂『中派』，即動搖於『左』、右之間的。用這樣的觀

點來觀察我們的黨，能不能認為是正確的呢？很明顯，這是不能的。祇有那些糊塗的早與馬克思主義脫離了關係的人才能這樣說。祇有那些看不見與不瞭解大戰時期以前底社會民主黨——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利益聯盟底黨與共產黨——革命無產階級獨有的黨中間原則上的分別的人，才會這樣講。中派這個名詞，不是地位的觀念：例如我們說，在一邊坐着的是右派，在另一邊的是「左派」。在中部的——便是中派。中派是政治的觀念。它的思想是隨波逐流的思想，是在一個共同的黨內將無產階級的利益服從小資產階級的利益的思想。這是反列寧主義的思想。中派是大戰以前的第二國際內底天然產物。那裏曾經有右派（佔大多數），有左派（沒有括弧的），亦有中派。中派的一切政策，是用左派的言詞來粉飾右派的機會主義，並使左派服從右派。那時以布爾塞維克為中堅的左派底政策如何呢？即是堅決的與中派鬭爭，與右派作分裂的鬭爭（特別是在帝國主義戰爭開始以後），而從真正的左派中與真正的無產階級份子中，組織新的革命的國際。

爲什麼那時在第二國際內能發生這樣力量的分配與布爾塞維克的這樣政策呢？因爲第二國際那時是一個無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利益聯盟的政黨，這個黨是對於小資產階級的社會和平主義者及社會愛國主義者的。因爲那時布爾塞維克不能不集中火力來反對企圖使無產階級份子服從小資產階級利益的中央派。因爲那時布爾塞維克的責任是宣傳分裂的思想，不然，無產階級就不能組織自己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政黨。

能否斷定在本黨內也有同樣的力量分配及在本黨內應重演戰前布爾塞維克在第二國際內部所運用的政策呢？很明顯地，不可以。因爲，這是不懂得無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聯盟的政黨同革命的無產階級獨有的政黨間原則上的分別。社會民主黨的階級基礎與共產黨完全不同。那裏（社會民主黨）中央派是一種自然的現象，因爲各種利益聯盟的政黨，免不了要有中派，而布爾塞維克的責

任，正是在採用分裂的路線。而此地（共產黨）呢，中派是沒有根據的，而且是與列寧的黨不相容的，因為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獨有的政黨，而不是各種階級成份聯盟的政黨。並因為本黨的統治力量是世界工人運動中的最左派（列寧主義者），所以從列寧主義的觀點看來，在我們黨內採用分裂政策是沒有任何理由，而且也不能有任何理由去說這種政策是對的。

（座中人問：——本黨有分裂的可能沒有？）

問題不是關於分裂是否可能，而是關於分裂政策在我們獨有的列寧的黨中，用列寧主義的觀點來看，是沒有理由說它是對的。誰不懂得這種原則上的分別，那就是離開了列寧主義，毀壞了列寧主義。因此我想祇有瘋癲的和一點馬克思主義氣味都沒有的人，才能够斷言說本黨在兩條戰線上鬭爭的政策，是中派的政策。

列寧在本黨內不斷地在兩條戰線上進行鬭爭，反對『左派』，反對明顯的孟塞維主義的傾向。你們去看一看列寧著的『共產主義中左派幼稚病』這本書吧，看一看本黨的歷史吧，你們將懂得本黨是在與這兩種傾向——右派及『左派』——鬭爭中生長及鞏固起來的。一方面同召回派及『左派』共產主義者鬭爭，另一方面，在十月革命前，十月革命時，十月革命後，同公開的機會主義傾向鬭爭，這就是本黨在它自己發展中所經過的階段。大家都知道列寧關於這問題的話我們既要同機會主義鬭爭，又要同『左派』的信條主義者鬭爭。

這不是說列寧就是一個中央主義者，他採用了中央主義的政策呢？當然不是的。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的『左』右傾是什麼呢？所謂右傾，這當然不是戰前社會民主黨的機會主義。傾向於機會主義，還不就是機會主義。我們知道，列寧當時曾解釋過『傾向』的意思。傾向，是一種還未完全形成機會主義的東西，它還是可以糾正的。因此，不能拿右傾及已完成的機會

主義來等量齊觀。說到『左』傾，它簡直是一種同戰前第二國際內部極左派——即布爾塞維克——完全相反的東西，他們不僅不是沒有括弧的左派，按其實質，而且和右傾份子是一個東西；不過還有一個差別，就是他們不自覺地將自己的真性用左傾的詞句掩蔽起來。看不到在本黨內『左』傾份子及真正的列寧主義者——唯一的沒有括弧的左派——間的一切差別，這對於黨簡直是一種罪惡。

（座中人問：那末把傾向合法化就對嗎？）

假如和傾向公開的鬭爭是把傾向合法化，那末，就要承認列寧好久以前就把他們『合法化了』。他們，這些傾向份子，左派、右派都在內，是從各式各樣非無產階級的階層中產生出來的。這些份子反映着小資產階級勢力對黨的影響，以及黨的某部分組織的腐化。一部份由別的政黨退出來的人；一部份帶託洛茨基主義傾向的人；過去黨內小組織的殘餘；在國家的、經濟的、合作社的及職工會的機關中正在開始官僚化（及已經官僚化的）的黨員，他們與這些機關內的資產階級份子很明顯的勾結起來；在我們鄉村組織中的富裕黨員（他們是與富農同生並長的）等等——這就是脫離列寧主義路線的傾向之滋養料。很明顯地，這些成份不能接受什麼真正的左派及列寧主義。他們祇有培養公開的機會主義的傾向，或者是用左傾的詞句來掩飾自己機會主義的『左傾』。

因此在兩條戰線上鬭爭，是本黨唯一的正確的政策。

此外，在提綱上說，我們和右傾鬭爭的主要方法，應該是擴大思想上的鬭爭，這正確嗎？我想，是正確的。最好是來回想我們和託洛茨基主義鬭爭的經驗。我們用什麼開始和他們鬭爭的？用組織的方法嗎？不是，當然不是，我們是從思想上的鬭爭開始的。這種鬭爭從一九一八年作到一九二五年。在一九二四年我們的黨與在一九二五年第三國際代表大會，已經提出了關於託洛茨基主義的決議，決定它是一種小資產階級的傾向。然而託洛茨基依然還是在我們中央和政治局裏坐着。這

是不是事實？是事實。我們『容忍』了託洛茨基及託洛茨基主義者作中央的委員，爲什麼我們允許他們留在黨的指導機關裏呢？因爲，那時候託洛茨基主義者，雖然和黨是分歧着，但他們服從了中央的決議，並對黨是忠實的。到什麼時候我們才比較大規模的採用了組織方法呢？祇有當託洛茨基主義者組織了小組織，組織了自己的小組織中心，轉變自己的小組織爲新的政黨，並且號召人們參加反蘇維埃政權的示威遊行之後，才採取了組織方法。我想，和右傾鬭爭時我們也應該按照這條道路走去。右傾雖然在本黨內漸漸加強，但它還不是形成了的及結晶了的東西。它僅是開始形成及開始結晶罷了。右傾份子有沒有小組織？我想，沒有。能說他們不服從本黨的決議嗎？我想，我們還沒有歸咎他們以此種罪過的證據。能否斷言說，右傾份子一定要組織他們自己的小組織呢？我對這點是懷疑的。從此地得出這樣的結論：在現時的階段上我們和右傾鬭爭的主要方法，應該是擴大思想上的鬭爭。況且在本黨內有些黨員有一種相反的傾向——和右傾鬭爭，開始不用思想上的鬭爭，而用組織的方法，所以擴大思想上的鬭爭更是正確的。他們一直的說：你給我們十個或者二十個這樣右傾的人吧，我們一轉眼就把他們消滅，這樣我們就可結束了右傾。同志們！我想這種情緒是不正確的，而且是危險的。爲着不飄搖在這種情緒之下，爲着把反對右傾的鬭爭放在正確的軌道上，必須明白地堅決地說，我們和右傾鬭爭的主要方法，在現時的階段上，是思想上的鬭爭。

這是不是說我們應廢去一切組織上的結論呢？不是。無疑義的，組織上的結論祇能起附屬的作用，假如右派沒有破壞黨的決議的事實，則我們不能將他們從各領導機關中開除。

（座中聲：『莫斯科的事情呢？』）

我想在莫斯科的指導同志中沒有右傾的份子。那裏會有對右傾情緒不正確的態度，很可以說那裏會有調和的傾向。但是我不能說莫斯科省委中會有右傾。

（座中間：『組織上的鬭爭有過麼？』）
 組織上的鬭爭曾有過；雖然它是處於附屬的地位，但它曾有過。曾有過這種鬭爭，因為莫斯科在自我批評的基礎上進行改選，而各區的積極份子有權利更換他們的書記。

（笑聲，座中間：『難道我們曾宣佈過改選書記嗎？』）

誰也沒有禁止過改選書記。中央六月宣言上直接講到，如不能保證下層機關有更換任何書記和任何委員會的權利，則發展自我批評將變成空話。你們能够反對這種宣言麼？

（座中聲：『在黨的臨時代表會以前？』）

是的，就算在黨的臨時代表會之前吧。我看到幾個同志的面孔上帶有算命先生預知一切的笑容。同志們，這是不好的。我看到有些同志帶有不可抑止的希望迅速撤換右傾份子的職務。親愛的同志們，這樣不是解決問題。自然，撤換職務比作廣大的解釋左傾和右傾的危險以及與右傾鬭爭等的運動更容易，但是最容易的並不是最好的。努力來組織廣大的反右傾的解釋運動。費些力，不要吝惜時間，結果你們會看到運動的範圍愈廣愈深刻，則對右傾愈壞。所以我說我們反對右傾鬭爭的中心應該是思想上的鬭爭。

至於談到莫斯科的委員會，我不知道對於烏格蘭諾夫在莫斯科委員會及監察委員會會議上所作的結論以外，還有些什麼話可以補充。他很直爽的聲明：『若是略一回憶歷史，回憶一九二一年我在列寧格勒與季諾維也夫之鬭爭，那末，當時的「戰鬭」要大的多。當時我們戰勝了，因為我們是對的，現在我們遭了打擊，因為我們錯了。祇要對黨有益，我們是要做的。』這樣說來，烏格蘭諾夫現在所進行的鬭爭，同他當時所進行的反季諾維也夫的鬭爭一樣。那末最近他所進行的鬭爭是對誰呢？很明顯的是反對中央的政策。還反對誰呢？在什麼基礎之上進行這種鬭爭呢，很明顯的，

這種鬭爭是基於同右傾調和的基礎。

因此提綱上很正確的指出，必須與離開列寧主義路線的各種傾向的調和派，尤其是對右傾的調和派奮鬥，這是吾黨目前主要任務之一。

最後的問題。在提綱上說，我們目前應當特別注意與右傾鬭爭。這是什麼意義呢？這就是說，在我們黨內目前最主要的危險是右傾的危險。我們與託洛茨基主義傾向鬭爭，這是集中的鬭爭，已進行了十餘年了。託洛茨基主義基本幹部的破產就是這種鬭爭的結果。不能說最近與公開的機會主義已經作了怎樣緊張的鬭爭。鬭爭不特別緊張，因為右傾還是在形成與結晶的階段。右傾是隨小資產階級勢力的增強而發展的，這種小資產階級的勢力因為我們收買糧食的困難而增加起來。因此主要的應當給右傾以打擊。

在結束我的話之前，同志們，我要再指出此地所未講到的一個事實，這個事實照我的意見也有重要的意義。我們政治局的委員向你們提出標準數字的提綱。我在我的講演中擁護這非常正確的提綱。對提綱個別的修正，這是不成問題的。但是提綱在本上是正確的，並切實能保證我們正確的執行列寧主義的路線——這點是不能有什麼疑義的。我們應當向你們聲明這個提綱在政治局是一致通過了的。我想這件事實對於黨的敵人以及對黨不懷好意的人在我們隊伍中所散佈的許多謠言是有些意義的，我所指的是那些說好像在政治局內有右傾、「左」傾及調和派等等的謠言。這個提綱是政治局意見一致的又一個，第一百個，或第一百零一個證據；它證明我們政治局是始終一致的，將來還是一致的。我希望這次的全體會議也同樣一致的來通過這個提綱作為基礎。（鼓掌）

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

——一九二九年四月在聯共（布）中央全會上的演說摘錄——

（一） 在共產國際各問題方面的意見分歧

我已經說過，布哈林看不見，不瞭解日益增長的新革命高漲條件向共產國際所提出的新任務，即是要從共產黨內趕出右傾份子，制止調和派，把社會民主黨傳統從共產黨內清除出去的任務。這種情形是我們在共產國際各問題上的意見分歧所完全證實了的。

這方面的意見分歧是從什麼開始的呢？

是從布哈林提交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的那篇論國際狀況問題的提綱開始的。從前，這種提綱照例都是預先在聯共（布）代表團內審核的。可是，這一次却沒有遵守這個條件。結果，布哈林署名提出的提綱一面送往聯共（布）代表團，同時就分發給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各外國代表團了。可是，在這篇提綱上有許多條文是不能令人滿意的。聯共（布）代表團不得不對這篇提綱加進了二十來個修正。

這個情況使布哈林覺得有些不好意思。可是，這應歸咎於誰呢？試問布哈林爲什麼要在尚未交給聯共（布）代表團審核以前，就把提綱分發給各外國代表團呢？既然提綱竟是不能令人滿意，那末聯共（布）代表團能否不加進一些修正呢？而結果竟是這樣：由聯共（布）代表團內得出來的，其

實已是一篇論國際狀況問題的新提綱，而各國代表團就拿這篇提綱去與布哈林所署名提出的那篇舊提綱對立。很明顯的，如果布哈林不是這樣急忙地把自己的提綱分發給外國代表團，便不會有這種不好意思的情形了。

我想指出聯共（布）代表團所加進布哈林提綱的四個基本修正。所以我想指出這些基本修正，是爲着更明顯昭示我們在共產國際各問題上的意見分歧底性質。

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資本主義穩定局面底性質問題。按照布哈林底提綱說來，現時並沒有發生任何一個動搖資本主義穩定局面的新現象，恰巧相反，資本主義是在改造着，基本上是比較穩固地支持着。很明顯的，對於所謂第三時期，即對於我們現在所處的時期的這樣一種估計，是聯共（布）代表團所不能同意的。其所以不能同意這一點，是因爲如果保存這種對於第三時期的估計，就會使那些批評我們的人有所根據，說我們是主張所謂資本主義『健康化』的觀點，即希法亭底觀點，即我們共產黨人所不能主張的觀點。因此，聯共（布）代表團就加進了一個修正，從這個修正中可以看到：資本主義穩定局面是不穩固的，而且是不能穩固的；由於世界資本主義危機尖銳化，這個穩定局面是正被事變進程所動搖着，而且將來還會被事變進程所動搖的。同志們，這個問題對於共產國際各支部是有決定的意義。資本主義穩定局面究竟是動搖着，還是鞏固着呢，——共產黨日常政治工作底全部方針都要由這一點來決定。我們現在究竟是處在什麼時期，是處在革命運動低落時期，即簡單聚集力量的時期，還是處在新革命高漲條件日益增長的時期，即準備工人階級去作當前階級戰鬥的時期呢，——共產黨底策略方針是要由這一點來決定的。聯共（布）代表團所提出而後來已由世界代表大會通過的修正，其好處也就在於它規定出指望於第二個前途，指望於新革命高漲條件日益增長的前途的明白方針。

第二個問題，就是關於反對社會民主黨的鬭爭問題。在布哈林提綱內說，反對社會民主黨的鬭爭是共產國際各支部底基本任務之一。這當然是對的。但這還不够。爲要使反對社會民主黨的鬭爭進行得有成效，就須特別加緊反對所謂社會民主黨「左」翼，即反對那玩弄「左派」辭句並以此而巧妙欺騙工人，阻礙工人脫離社會民主黨的「左」翼。很明顯的，不粉碎「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就不能克服一般社會民主黨。可是，在布哈林底提綱內，關於「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問題却完全沒有說到。這當然是一個大缺點。因此，聯共（布）代表團不得不對布哈林提綱加進了一個相當修正，這個修正後來已由世界代表大會通過了。

第三個問題，就是關於共產國際各支部內的調和態度問題。在布哈林底提綱內說到必須進行反對右傾的鬭爭，可是一句話也沒有說到要進行鬭爭反對那對右傾調和的態度。這當然是一個大缺點。因爲我們向右傾宣戰時，右傾份子總是裝扮爲調和份子，使黨陷於困難地位。爲要預防右傾份子這種手腕，就必須提出堅決反對調和態度的問題。因此聯共（布）代表團當時認爲必須對布哈林提綱加進一個相當修正，這個修正後來已由世界代表大會通過了。

第四個問題，就是關於紀律問題。在布哈林底提綱內竟沒有說到必須在各共產黨內保持鐵的紀律。這也不是一個不大重要的缺點。爲什麼呢？因爲在加強反右傾鬭爭時期，在實行清除共產黨裏機會主義份子的口號時期，右傾份子總是組織成爲派別組織，建立其特殊的派別組織的紀律，而打破和破壞黨的紀律。爲要使黨不致受到右傾份子派別組織的襲擊，就須提出黨內鐵的紀律問題，黨員應該絕對服從這個紀律的問題。不然就根本談不到什麼反右傾的嚴重鬭爭。因此，聯共（布）代表團就對布哈林底提綱加進了一個相當修正，這個修正後來已由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通過了。

我們能否不把這些修正加進布哈林底提綱中去呢？當然不能。古代有人關於哲學家柏拉圖說

過：我們尊重柏拉圖，但我們更尊重真理。關於布哈林也可以這樣說：我們尊重布哈林，但我們更尊重真理，更尊重黨，更尊重共產國際。因此，聯共（布）代表團不得不把這些修正加進布哈林底提綱中去。

這可以說是我們在共產國際各問題上意見分歧的第一階段。

我們意見分歧的第二階段，是與所謂維托爾夫和特爾曼兩人案件有聯繫的。維托爾夫是漢堡黨部前任書記，曾以濫用黨內經費被控，並因此而被開除了黨籍。雖然特爾曼同志與維托爾夫犯罪行為毫不相干，但德共中央裏的調和派竟以維托爾夫與特爾曼同志接近為藉口，而把維托爾夫案件變成特爾曼案件，開始來攻擊德國共產黨底領導。你們大概已從報紙消息中知道，調和派份子愛維爾特和黑爾哈特當時竟能暫時拉攏德共中央大多數委員來反對特爾曼同志。結果怎樣呢？結果，他們竟把特爾曼從領導機關中撤銷了，誣控他為舞弊營私，並且事先沒有通知共產國際執委，也沒有得到共產國際執委批准，就把『相當』決議公佈出來。於是他們事實上不僅沒有執行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關於反調和派鬭爭的指示，不僅沒有反對右傾及調和派，反而最無理地違背了這個指示，反對德國共產黨底革命領導，反對特爾曼同志，以圖在德國共產黨員中間掩護右傾，並鞏固調和派底地位。

布哈林不但不去拉轉船舵，糾正現狀，不但不去恢復被違背了的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指示底權力，不但不去制止調和派底越軌行動，反而在他的一封有名的信內提議批准調和派底這次政變，把德國共產黨交給調和派，而對於特爾曼同志，却又在報紙上加以誹謗，再次說他犯有罪過。而這還叫作是共產國際底『領導者』哩！難道天下有這樣的『領導者』麼？

中央討論了布哈林底提議，並否決了這個提議。這當然是布哈林所不高興的。可是，這應歸咎

於誰呢？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通過決議，並不是要叫人去違背它，而是要叫人去執行它。既然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決定向右傾及調和態度宣佈鬭爭，把德共領導保留給特爾曼同志所領導的基本中堅，而調和派份子愛維爾特和黑爾哈特却想推翻這個決議，那末布哈林底職責就是要制止調和派份子底越軌行動，而不是把德共領導留歸他們。布哈林自己應負其咎，因為他『忘記了』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底決議。

我們意見分歧的第三階段，是與反對德共黨內右傾份子鬭爭的問題，即是與粉碎布蘭德列爾和達里格麥爾派別組織以及把這派別組織底首領從德共黨裏開除出去的問題有聯繫的。布哈林和他的朋友們在這個根本問題上的『立場』，就在於他們總是迴避參加這個問題的解決。其實，當時所解決的問題是德國共產黨底生命問題。而布哈林和他的朋友們雖然明明知道這一點，但他們還是始終一貫地迴避參加相當機關底會議，因而阻礙這件事情的解決。是爲了什麼呢？大概是爲了在共產國際面前以及在德共黨內右傾份子面前，都不失爲『潔白君子』，是爲了在後來可以說：『把布蘭德列爾和達里格麥爾開除共產黨籍的，並不是我們布哈林派，而是他們，即中央大多數』。而這還叫作是反對右傾危險的鬭爭哩！

最後，我們意見分歧的第四階段。這階段是與布哈林向中央十一月全會提出的要求有聯繫的。他當時要求從德國召回聶依曼，要求制裁特爾曼同志，說特爾曼同志似乎在某一次發言中批評了布哈林在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我們當然不能同意布哈林底意見，因爲我們手中沒有任何文件可以證實布哈林底要求。布哈林當時答應交出文件來證實聶依曼和特爾曼底錯處。可是，他連任何文件都沒有交出來。他不但沒有交出什麼文件來，而且把恩伯德洛在共產國際執委政治祕書處內作的那篇有名的演說辭分發給聯共（布）代表團委員，而這篇演說辭就是後來被共產國際執委主席

團評判爲機會主義演說辭的。布哈林當時把恩伯德洛底演說辭分發給聯共（布）代表團委員，並把它介紹爲控告特爾曼同志的材料，本來是想證明他要求召回聶依曼和制裁特爾曼同志的主張正確。其實，他却以此證明了他同情於恩伯德洛的事實，而恩伯德洛底立場是共產國際執委所指斥爲機會主義立場的。

同志們，這就是我們在共產國際各問題上意見分歧底各個主要點。

布哈林認爲我們反對共產國際各支部裏的右傾以及對右傾調和的態度，把社會民主黨份子和社會民主黨傳統從德國共產黨和捷克斯拉伐克共產黨裏清除出去，把布蘭德列爾輩和達里格麥爾輩從共產黨內驅除出去，就是『瓦解』共產國際，『殺害』共產國際。反之，我們却認爲我們實行這樣的政策，把問題着重於加緊反對右傾以及對右傾調和的態度，就是鞏固共產國際，把機會主義者從共產國際裏清除出去，使共產國際各支部布爾塞維克化，幫助各國共產黨準備工人階級進行當前的革命搏戰。

由此可見，這並不是聯共（布）中央委員中間什麼簡單不同的色彩，而是在共產國際政策各根本問題上所發生的很嚴重的意見分歧。

濱自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一九四八年莫斯科版

『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第二段第三〇七至三一二頁

(二) 理論家的布哈林

右傾反對派理論家布哈林在我們政策各基本問題上的主要錯誤，大體上就是如此。

有人說，布哈林是我們黨底理論家。他當然是一個理論家，而且是一個不小的理論家。可是，問題就在於他那套理論並不完全吉利。這是單從他在黨政策各問題上所作出的上述那一大堆錯誤中就可看出的。他在共產國際各問題，階級鬭爭問題，階級鬭爭尖銳化問題，農民問題，新經濟政策問題，城鄉結合底新形式問題上所犯的這些錯誤，決不是偶然的。不，這些錯誤不是偶然的。布哈林底這些錯誤是從他那個不正確的立場，從他那些理論缺陷中產生出來的。是的，布哈林是一個理論家，但他是一個不完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他這個理論家還得要補習一下，然後才可成爲完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

有些人援引着列寧同志評論理論家布哈林的那封有名的信。讓我們來讀讀這封信吧：
列寧說：

『從年輕的中央委員中間，我想關於布哈林和皮達可夫說幾句話。我以為這是最出色的人材（就最年輕的人材來說），關於他們必須注意以下一點：布哈林不僅是黨內一個很寶貴很巨大的理論家，他還理應被看作是全黨所喜愛的人；可是如果把他的理論觀點當作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那是很可疑的，因爲在他的理論觀點中有些學究式的東西（他從來沒有學過辯證法，並且我認爲他從來也沒有完全懂得辯證法）*（見一九二六年七月全會速記錄，第四

冊，第六六頁)。

總之，不懂辯證法的理論家。學究式的理論家。如果把他的「理論觀點當作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那是很可懷疑的」理論家。列寧給布哈林底理論面目所作的估計，就是如此。

同志們，你們自己懂得，這樣一個理論家是還須補習一下的。如果布哈林懂得，他還不是一個完全成熟的理論家，他還需要補習一下，他是一個還沒有完全領會辯證法的理論家，而辯證法却是馬克思主義底靈魂，——如果他懂得這一點，那他就會謙遜一些，而這對於黨是只會有好處的。可是，倒霉處就在於布哈林並不怎樣謙遜。倒霉處就在於他不僅不怎樣謙遜，而且在許多問題，首先是在國家問題上，他還想去教訓我們的導師列寧。倒霉處就在這裏，同志們。

說到這裏，我要來引證一九一六年列寧與布哈林關於國家問題所發生的那次有名的理論爭辯。這對於我們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可以揭露布哈林妄想教訓列寧的那種太不量力的奢望，同時又可揭露他在無產階級專政問題，階級鬭爭問題等等這樣重大問題上的理論弱點底根源。大家知道，一九一六年在青年國際雜誌上登出布哈林一篇署名為 *Nota Bene* 的論文，這篇論文在事實上是專門反對列寧的。布哈林在這篇論文中寫道：

「：如果以為社會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間的區別，是在於前者贊成國家，後者反對國家，那就完全錯」。其實，區別是在於革命社會民主黨想要組織新的社會生產，集中的生產，即技術上最進步的生產；而不集中的無政府主義的生產，却只是倒退到舊的技術，舊式企業上去：」

「：社會民主黨是羣衆底教師，或至少應當是羣衆底教師，它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必須着重指出它在原則上仇視國家的態度……現在的戰爭表明，國家觀念底根帶是十分厲害地深入到

工人心靈中去了』。

列寧在一九一六年發表的一篇專門批評布哈林這種觀點的論文中回答道：

『這是不對的。作者所提出的是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對於國家的態度上，有何區別的問題，但他所回答的並不是這個問題，而是另一個問題，即是他們對於將來社會經濟基礎的態度上，有何區別的問題。這當然是一個很重大和必要的問題。可是，由此並不能得出結論，說可以忘記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對於國家的態度上的主要區別。社會主義者主張在謀工人階級解放的鬭爭中利用現代國家及其各個機關，同樣也主張必須利用國家作為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特殊的過渡形式。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這樣的過渡形式，它也是一種國家。無政府主義者想「取消」國家，想「炸毀」(sprengen)它，如Nota Bene同志在一個地方就這樣說過，而且誤將這種觀點加在社會主義者頭上。社會主義者，——可惜作者把恩格斯關於這問題所說的話引得太不完全了，——認為在資產階級被剝奪後，國家就會消亡，「逐漸」——「死滅」……』

『……要想一着重指出——原則上仇視——國家的態度，就須真正一明白——瞭解它，但作者恰巧是沒有這種明白的見解。至於一國家觀念底根蒂——一語，是完全糊塗的，非馬克思主義的，非社會主義的。並不是一國家觀念——與否認國家的觀念相衝突，而是機會主義政策（即用機會主義的，改良主義的，資產階級的觀點對待國家的政策）與革命社會民主黨政策（即用革命社會民主黨的觀點對待資產階級國家，並按這種觀點去利用國家反對資產階級，以求推翻這個階級的政策）相衝突。這是兩個完完全全不同的東西』（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二九六頁，青年國際）。

由此就可明白這裏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布哈林究竟是滾到了怎樣的半無政府主義泥坑中去了！斯騰說：當時列寧還沒有詳細闡明必須『炸毀』國家的問題。而布哈林雖然是犯了無政府主義的錯誤，却已着手來闡明這個問題了。

斯大林說：不，這裏所說的並不是這一點。這裏所說的，是對於一般國家的態度。這裏所說的，是按布哈林底意見，工人階級應當在原則上仇視任何國家，包括工人階級底國家在內。

斯騰說：列寧當時只說到利用國家的問題，至於『炸毀』的問題，他在批評布哈林時是絲毫也沒有說到的。

斯大林說：你弄錯了。我敢向你担保，這裏所指的，是布哈林（以及無政府主義者們）認為工人應當着重指出他們在原則上仇視任何國家，因而也就是仇視過渡時期國家，仇視工人階級國家的態度。你試試向我們的工人解釋，說工人階級應當在原則上仇視無產階級專政，因為無產階級專政也是國家哩。布哈林在他登載於青年國際雜誌上的那篇論文中所發揮的主張，就是否認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國家的主張。布哈林在這裏沒有看見一件『小事情』，即是沒有看見整個過渡時期，在這個時期內，工人階級如果確實想鎮壓資產階級和建設社會主義，沒有自己的國家是不行的。這是第一、第二，說列寧同志當時在批評中沒有說到『炸毀』『取消』一般國家的理論。這是不對的。從我們所引證過的那段話中就可看出，列寧不僅說到了這個理論，而且澈底批評了這個理論，說它是無政府主義的理論，並提出了在推翻資產階級以後創造新國家，即創造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理論來與它對立。最後，不可把主張『炸毀』國家的無政府主義理論，與主張『打破』『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混為一談。同志們中間有人喜歡把這兩個不同的概念混為一談，認為它們都是同一思想底表現，但這是不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同志們。列寧在批評

那主張『炸毀』『取消』一般國家的無政府主義理論時，正是根據主張『打破』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出發的。

爲使問題更加明顯起見，我不妨在這裏引證列寧闡明國家問題的一篇手稿，這篇手稿大概是在一九一六年末或一九一七年初（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以前）寫的。從這篇手稿中就可容易看見：（1）列寧批評布哈林在國家問題上所犯的半無政府主義錯誤時，是根據主張『打破』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出發的；（2）雖然布哈林，——據列寧說，——是『稍比考茨基近於真理』，但他還是『不僅沒有揭破考茨基份子，反而用自己的錯誤幫助了他們』。請看這篇手稿底原文吧：

『在國家問題上有非常重要意義的，是恩格斯在一八七五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八日寫的那封致伯伯爾的信。

現在把這封信中最重要的地方完全引錄如下：

『……自由的人民國家變成了自由國家。按這幾個字底文法意思講來，自由國家就是可以自由對待自己公民的國家，即具有專橫政府的國家。應當拋棄這一切關於國家的廢話，特別是在巴黎公社以後，公社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無政府主義者利用一人民國家這一名詞來挖苦我們已够多了，雖然在馬克思駁斥普魯東的著作中以及後來在共產黨宣言上，都已經直截說過：在社會主義社會制度施行後，國家就會自行消散（sich auflöst）和消逝的。既然國家只是在鬭爭中，在革命中不得不用來以強力鎮壓敵人的一種暫時機關，那末說什麼自由人民國家，就純粹是無謂之談：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時，那就不是爲着自由，而是爲着鎮壓敵人；而一到有可能來談自由時，國家就不成其爲國家了。因此，我們提議到處都把國家一字改成

「公團」(Gemeinwesen) 一字，這是個很好的德文古字，是與法文中的一「公社」相當的」(着重點是恩格斯加的)。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底著作裏，這大概是^最明顯最激烈的所謂「反對國家」的語句了。

(1) 『應當拋棄一切關於國家的廢話』。

(2) 『公社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究竟是什麼呢？顯然是由國家過渡到無國家狀態的過渡形式！)

(3) 無政府主義者利用「人民國家」這一名詞來「挖苦」(原文是 in die Zähne geworfen 指斥)我們已够多了(可見，馬克思和恩格斯深以他們那些德國朋友犯了這種明顯的錯誤爲恥；但他們認爲——而且按當時情況說來當然是正確地認爲——這個錯誤是遠不如無政府主義者底錯誤那樣嚴重的。請注意這點!!)。

(4) 『從社會主義社會制度施行時起』，國家就會「自行消解」(『自行消散』)(請注意!)和消逝的』……(請與以後的「消亡」一字對照看)……

(5) 國家是「在鬪爭中，在革命中」需要的「暫時機關」……(當然是無產階級所需要的)……

(6) 其所以需要國家，並不是爲着自由，而是爲着鎮壓(Niederhaltung 一字按字面說來不是鎮壓，而是制止復辟，鎮壓)無產階級底敵人。

(7) 在有自由時，就不會有國家了。

(8) 『我們(即恩格斯和馬克思)主張「到處」(在綱領上)都把「國家」一字改成「公團」(Gemeinwesen)、「公社」!!!

由此可見，不單是機會主義者，而且考茨基也根本俗化和了和污辱了馬克思和恩格斯。

機會主義者是沒有懂得這八項極豐富思想中任何一項的！

他們只看見現今的實際需要：利用政治鬭爭，利用現代國家來訓練和教育無產階級，來『奪得讓步』。這是對的（在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意義上說），但這還只是百分之一的馬克思主義，如果可以這樣用算術方式來表示的話。

考茨基在他的宣傳作品和一般時論著作上，完全抹煞了（或是忘記了？或是沒有瞭解？）馬克思所說的（1）（2）（5）（6）（7）（8）等項和『Zerbrechen』一字（考茨基在一九一二年或一九一三年與潘業枯克辯論時（見下文第四五至四七頁），在這個問題上已完全滾落到機會主義方面去了）……

我們與無政府主義者不同的地方，就是我們主張（甲）現在利用國家，以及（乙）在無產階級革命時利用國家（『無產階級專政』），——這是立刻就對於實際工作有最重要意義的兩項。（而布哈林恰巧是把這兩項忘記了！）

我們與機會主義者不同的地方，就是我們主張以下幾點更深刻『更恆久的』真理：（甲）國家是有『暫時』性的；（乙乙）現在關於國家的『廢話』是有害的；（丙丙）無產階級專政不完全帶有國家性質；（丁丁）國家與自由是相矛盾的；（戊戊）用『公團』一字代替國家一字，『公團』一字是更正確的觀念（概念，綱領名辭）；（己己）『打破』（Zerbrechen）官僚軍事機器。還有一點不可忘記，就是德國的公開機會主義者（伯恩斯坦和科里布等等）直接否認無產階級專政，而正式綱領和考茨基却間接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在日常鼓動中不談到它，容忍科里布及其同流底叛徒行爲。

在一九一六年八月已向布哈林寫過：『請你讓你自己關於國家的思想完全成熟時再說吧。』

可是，他沒有讓他自己這些思想完全成熟，就署名『Noid Benur』爬到刊物上去發表文章，而結果又不僅沒有揭破考茨基份子，反而用自己的錯誤幫助了他們！而按實質說來，布哈林是稍比考茨基近於真理的』（尼·列寧）。

關於國家問題的理論爭辯的簡要歷史，就是如此。

看來是很明白了：布哈林犯了半無政府主義的錯誤，已經是改正這些錯誤，而跟隨列寧前進的時候了。可是，只有列寧主義者才能這樣想。布哈林原來是不同意於這點的，他反而硬說：不是他錯了，而是列寧錯了；不是他跟隨了或應當跟隨着列寧走，而是相反，原來列寧不得不跟隨布哈林走。同志們，你們不相信麼？那末，就請再聽下去吧。自從一九一六年發生這些爭論以後經過了九年時——在這九年當中，布哈林是沒有做聲的，——在列寧逝世一年以後，即在一九二五年，布哈林把自己那篇標題為談談帝國主義國家論的論文——即是從前社會民主黨人登刊編輯部（即列寧）所沒有接受來發表的那篇論文登在法權革命彙刊上發表出來，——他在這篇論文附註中公然說道：在這次爭論中，對的不是列寧，而是他布哈林。這看來也許是不可思議的，但這却是事實哩，同志們。

請聽聽這個附註底本文吧：

『弗·依（即列寧）發表一篇小評來反對了青年國際雜誌上的那篇論文。讀者容易看到，我並沒有犯過所加在我頭上的那種錯誤，因為我明白看見了無產階級專政底必要性，另一方面，從依里奇底小評中可以看出，他當時對於『炸毀』國家（當然是資產階級國家）這一原理是持有不正確的態度，因為他把這個問題和無產階級專政消亡問題混淆了*。也許我當時應當多多發揮專政這一問題。可是我所能藉以辯護自己的，就是在當時社會民主黨人紛紛讚美資產

階級國家的情形下，自然要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關於炸毀這架機器的問題上。

當我由美國回到俄國來會見納捷施達·康士坦丁諾福娜時（這是在祕密舉行的我們第六次代表大會上，當時弗·依躲藏起來了），她第一句話就是說：「弗·依請我轉告你，關於國家問題，他現在與你沒有意見分歧了」。依里奇在研究這一問題時，關於『炸毀』這一點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可是他已透澈發揮了這個問題以及專政學說，以至於在這方面的理論思想發展中開闢了一個新紀元」。

布哈林在列寧逝世以後一年時，就是這樣用筆墨來議論列寧的。

你們看，這就是沒有學習成就的理論家過分奢望底標本。

也許納捷施達·康士坦丁諾福娜真是對布哈林說過布哈林在這裏所寫的話，這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是從這裏可以得出什麼結論呢？從這裏只可得出一個結論，就是列寧曾有某些根據來意料布哈林已經放棄了或準備放棄自己那些錯誤。不過是這樣罷了。可是布哈林却有另外一種打算。他竟認定：從今以後應當作馬克思主義國家論底創造者或至少是提倡者的，不是列寧，而是他布哈林。我們向來都認為並且現在還照舊認為我們是列寧主義者。誰知列寧和他的門生，即我們大家，原來是布哈林主義者。這真是有點兒好笑哩，同志們。可是，你既碰到布哈林誇大吹牛的野心，那你有什麼辦法呢。

也許可以設想，布哈林在他上述那篇論文附註上，不過是偶然失言，無意中說出一番蠢話，而後來却已把它忘記了。但這原來是不對的，布哈林原來是完全認真說出這番話來的。這從下面一件事

*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實中間也可以看得出來：布哈林在這個附註中所說列寧錯誤和布哈林有理等語，在不久以前，就是說在一九二七年，即在布哈林第一次襲擊列寧以後經過了兩年的時候，又在麻列茨基所作的布哈林傳略裏發表出來了，而且布哈林連想都沒有想到要去抗議麻列茨基這種……大膽行爲。很明顯的，布哈林反對列寧的言論，是不可算作偶然的。

照這樣說來，對的竟是布哈林，而不是列寧；馬克思主義國家論底提倡者竟不是列寧，而是布哈林。

同志們！布哈林底理論錯誤和理論野心，就是如此。

雖然如此，而這個人在這裏發言時，却還有勇氣說在我們黨底理論立場中『有些腐朽東西』，說在我們黨底理論立場中有趨於託洛茨基主義的傾向！而說這種話的，正是這個布哈林，正是現在犯着（而且過去已經犯過）一些最嚴重理論錯誤和實踐錯誤，不久以前還作過託洛茨基門生，昨天還找過託洛茨基份子來做反對列寧主義者的同盟者，還跑去和他們暗中私通過的布哈林哩！同志們，這難道不是好笑麼？

選自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一九四八年莫斯科版

『論聯共（布）黨內右傾』第三三九至三五〇頁

大轉變的一年

——爲十月革命十二週年紀念而作——

過去的這一年，是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各條戰線上都發生大轉變的一年。這個轉變過去和現在都是在社會主義堅決進攻城鄉資本主義份子的標誌下進行的。這個進攻底特點就是它使我們在國民經濟社會主義改造事業各個基本方面，都獲得了許多有決定意義的成功。

由此就應得出結論：黨在新經濟政策最初幾個階段中，是適當地利用了退却，以便在新經濟政策往後各階段中組織一個轉變，並對資本主義份子實行順利的進攻。

列寧在施行新經濟政策時說過：

『我們現在退却着，好像是向後退却，但我們這樣做，是好似預備跳遠一樣，首先退後幾步，然後便向前猛進，更有力地跳往前去。僅僅是在這個條件下，我們在實行我們新經濟政策時，才向後退却過……以便在退却以後，開始一個最堅決的向前進攻』（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六一、至三六二頁）。

過去的這一年底總結就是不容置疑地說明，黨在自己的工作中是順利執行着列寧這個極重要指示的。

如果拿過去這一年在對於我們有決定意義的經濟建設方面的總結來說，那我們在這條戰線上進

攻的成功，我們在這一年的成績，就可歸納為以下三個基本要點。

(一) 在勞動生產率方面

毫無疑義，我們的建設在最近這一年當中的最重要事實之一，或者說最重要的事實，就是我們在勞動生產率方面達到了根本的轉變。這個轉變是表現於工人階級千百萬羣衆在社會主義建設戰線上創造發起作用和雄偉勞動熱潮的擴展，這就是我們在過去這一年來的第一個基本成績。

羣衆創造發起作用和勞動熱潮的擴展，是按着下面三個基本方向促成的：第一是用發展自我批評的手段反對了束縛羣衆勞動發起作用和積極性的那種官僚主義；第二，是用進行社會主義競賽的手段反對了那些偷懶逃工，破壞無產階級勞動紀律的份子；最後，第三，是用實行不斷生產制的辦法反對了生產中頑固守舊的惡習。結果，我們在勞動戰線上就獲得了極大的成績，其表現是在我們這個幅員廣濶的國家，到處都看得見工人階級千百萬羣衆努力勞動和互相鼓勵的熱潮，而這個成績是有無限偉大的意義，因為只有千百萬羣衆底勞動高潮和勞動熱忱，才能保證勞動生產率有蒸蒸日上的增長，而沒有這種增長，社會主義就不能最終戰勝資本主義。

列寧說：

「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保證新社會制度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條件，資本主義造成了在農奴制度下所沒有過的勞動生產率。資本主義可以被徹底戰勝，而且一定會被徹底戰勝，是因為社會主義能造成新的更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四二頁)。

列寧根據這點，認為：

『我們應具有滿腔勞動熱忱、勞動意志和堅持精神，因為在目前只有這樣，才可最迅速挽救工農，挽救國民經濟』（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七七頁）。這就是列寧在黨面前所提出的任務。

過去這一年來的事實表明黨是在順利執行這一任務，而堅決克服這條道路上所有的困難。黨在過去這一年來的第一個重要成績，就是如此。

（二） 在工業建設方面

黨底第二個成績，是與它這第一個成績有密切聯繫的。黨底第二個成績，就是我們在過去這一年中，大體上已經順利解決了重工業基本建築工程資金積累問題，實行了發展生產資料製造業的加快速度，造成了把我國變為五金國的前提。這就是我們在過去這一年來的第二個基本成績。

輕工業問題是沒有什麼特別困難的，我們在幾年以前，就已把它解決了。而重工業問題却比較困難，而且更加重要了。其所以比較困難，是因為它需要巨量資金，而且工業落後國底歷史表明，重工業沒有大批的長期的借款，是不能發展的。其所以更加重要，是因為我們如果不發展重工業，便不能建成任何工業，便不能實現任何工業化。既然我們過去和現在都沒有得到什麼長期的借款和若干長期的信貸，所以問題底緊張性對於我們是非常明顯的。各國資本家正是根據這點，所以不肯給予我們借款，不肯給予我們信貸，以為我們一定不能自力解決資金積累問題，一定會在重工業改造問題上遭受失敗，而不得不向他們低頭求救，甘受他們盤剝的。

過去的這一年底總結在這方面是說明什麼呢？過去這一年總結底意義，就在它把資本家老爺們底盤算打得粉碎。過去這一年已經表明：雖然我們蘇聯遇到明裏暗中的財政封鎖，可是我們並沒有

去受資本家們盤剝，却用我們自己所有的力量來順利解決了資金積累問題，奠定了重工業基礎。現在，甚至工人階級底死敵也不能否認這一點了。既然我們去年投入大工業的基本建設金共有十六萬萬餘盧布，其中約有十三萬萬餘盧布是投入重工業的，而今年投入大工業的基本建設金共有三十四萬萬餘盧布，其中有二十五萬萬餘盧布是投入重工業的；既然我們去年大工業出產總量增加的百分數等於百分之二十三，其中重工業出產總量應增加百分之四十六，——那末重工業建設資金積累問題對於我們並沒有什麼無法克服的困難，這難道不是很明白麼。我們現在正用加快速度來發展我們的重工業，超過舊時的速度，剷除我們『歷來的』落後性，這難道可以懷疑麼？

既然如此，那麼我們五年計劃底預料在過去這一年已被超過執行，而資產階級『作家』所認為是『無法實現的夢想』，我們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布哈林集團）聞之心驚的五年計劃最高標準，事實上却成了五年計劃最低標準，這又何足奇怪呢？

列寧說：

『爲要挽救俄國，單靠農民經濟收成豐盛還不够，而且單靠供給農民消費品的輕工業情況興旺也還不够，——我們還要有重工業……不挽救重工業，不恢復重工業，我們就不能建成任何工業，而沒有工業，我們就根本不能維持我們爲獨立國家的地位……重工業是需要有國家補助金的。我們如果找不到這種補助金，便不能成爲文明的國家，更不必說成爲社會主義的國家了』（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四九頁）。

由此可見，列寧是多麼激烈地規定了重工業資金積累的問題和黨在建設重工業方面的任務。過去這一年來的事實表明黨是在順利執行這一任務，而堅決克服這條道路上所有一切困難的。

這當然不是說工業已經不會有嚴重的困難了。爲了建成重工業，不僅需要解決資金積累問題。爲了建成重工業，還必須解決幹部問題，這就是說：（1）我們要吸收成千成萬擁護蘇維埃政權的技術人材和專門家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2）我們要從工人階級中間培養新起的紅色技師和紅色專門家。如果資金積累問題可以說在大體上已經解決了，那末幹部問題却還急待解決。而在現今工業技術改造時期，幹部問題正是社會主義建設中決定一切的問題。

列寧說：

『我們尙嫌不够的主要東西，就是文化程度和管理上的技能：在經濟和政治方面，新經濟政策完全保證我們能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問題『只』在於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底文化人材』（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〇七頁）。

很明顯的，這裏所說的首先是『文化人材』問題，是爲一般經濟建設，特別是爲工業建設和工業管理事業供給幹部的問題。

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雖然我們在資金積累方面已獲得了對於重工業有重要意義的極大成績，但在幹部問題尙未解決以前，是不可說重工業建成問題已經完全解決了的。

因此，黨底任務就是要切實實行解決幹部問題，無論如何都要佔領這個要塞。黨在過去這一年來的第二個成績，就是如此。

（三） 在農業建設方面

最後，就要說到黨在過去這一年來的第三個成績，這個成績是與上面兩個成績有密切聯繫的。這裏所說的就是我國農業發展中的根本轉變：由規模狹小的落後的個體農業，進到規模巨大的先進

的集體農業，進到共耕制，進到農業機器站，進到基於新技術的農業勞動組合和集體農莊，以及各用數百架拖拉機和康拜因機武裝起來的巨大蘇維埃農莊。黨在這裏的成績，就是我們把許多區裏的基本農民羣衆，由舊的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引上了新的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舊的發展道路僅僅有利於少數富豪資本家，而極大多數的農民却不得不忍受貧困的痛苦；新的發展道路是要把富豪資本家排擠出去，而把中農貧農從新武裝起來，用新工具把他們武裝起來，用拖拉機和農業機器把他們武裝起來，使其能夠擺脫貧困的境遇和富農的盤剝，而走上共同耕種，集體耕種的廣濶道路。黨底成績就是我們在農民中間造成了這個根本轉變，並引導廣大的貧農中農羣衆向前邁進，那怕有許多不可思議的困難，那怕有富農和神父，以至庸人和右傾機會主義者爲止的一切黑暗勢力拚命的反抗。

讓我們舉幾個數目字來說吧。在一九二八年，蘇維埃農莊底播種面積是等於一百四十二萬五千海克脫，其穀物商品產量是等於六百餘萬公担（即三千六百餘萬普特），而集體農莊底播種面積是等於一百三十九萬海克脫，其穀物商品產量約等於三百五十萬公担（即二千餘萬普特）。在一九二九年，蘇維埃農莊底播種面積是等於一百八十一萬六千海克脫，其穀物商品產量約等於八百萬公担（約四千七百萬普特），而集體農莊底播種面積是等於四百二十六萬二千海克脫，其穀物商品產量是等於一千三百萬公担（約七千八百萬普特）。在當前的一九三〇年中，按計劃規定，蘇維埃農莊底播種面積應等於三百二十八萬海克脫，其穀物商品產量應等於一千八百萬公担（約一萬一千萬普特），而集體農莊底播種面積應等於一千五百萬海克脫，其穀物商品產量應等於四千九百萬公担左右（約三萬萬普特）。換言之，在當前的一九三〇年中，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底穀物商品產量應等於四萬萬餘普特，即超過整個農業穀物商品總產量（即運出農村以外的穀物總量）百分之五十。

老實說，這樣飛快發展的速度，甚至我們的社會主義大工業也未曾有過，而一般說來，我們的社會主義大工業是發展得很迅速的。

既然如此，那末我們年輕的社會主義巨大農業（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的農業）有着偉大的前途，將顯出發展的奇蹟，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集體農莊建設事業獲得這種空前的成功，自有許多原因，其中所應指出的，至少有以下幾點。首先，這個成功是因為黨實行了列寧的教育羣衆的政策，用培植合作運動的方法來把農民羣衆一貫引向集體農莊。這個成功是因為黨進行了一種順利鬭爭，一方面反對那些企圖跳過運動，用命令手段發展集體農莊的份子（『左的』清談家），另一方面又反對那些企圖把黨拉向後退，甘作運動尾巴的份子（右傾糊塗蟲）。如果黨沒有執行這樣的政策，那它就會不能把集體農莊運動變為農民本身真正羣衆的運動。

列寧說：

『當彼得格拉無產階級和彼得格拉防軍兵士奪取政權時，他們已經明白知道農村中的建設事業是會遇到巨大困難的；在這裏必須採取比較漸進的步驟；在這裏企圖用法令，用法律來施行共耕制，是很荒謬的；當時只有很少數覺悟農民能夠同意實行共耕制，而大多數農民却還沒有立意這樣辦。因此，我們當時僅僅採取了革命發展所絕對必要的辦法：無論如何都不跳過羣衆底發展程度，而是要等待從這些羣衆本身經驗中，從他們本身鬭爭中長成前進的運動』（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五二頁）。

若說黨在集體農莊建設戰線上獲得了極大勝利，那就是因為它確切遵行了列寧這一策略指示。第二，農業建設事業獲得這個空前的成功，是因為蘇維埃政權正確估計到了農民日益需要新式

農具和新式技術的情形，正確估計到了農民在保存舊式耕作方法時沒有任何出路的情形，也正因為它估計到了這一切，所以它及時給了農民多方的幫助：設立農具租借處，拖拉機隊和農業機器站，組織共耕制，成立集體農莊，以及用蘇維埃農莊底力量來多方幫助農民經濟。在人類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出現了這樣一個政權，即蘇維埃政權，這個政權已實際證明它有決心，有能力來給勞動農民羣衆以有系統的長期的生產幫助。歷來苦於缺乏農具的勞動農民羣衆不能不極力歡迎這種幫助而走上了集體農莊運動的道路，這難道不很明白麼？從今以後，工人底舊口號『面向農村』，大概會有集體農莊新口號『面向城市』來補充，這有什麼奇怪呢？

最後，集體農莊建設事業獲得這個空前的成功，是因為我國先進工人担起了這件事情。我在這裏所指的是那些協助農村工作的工人隊伍，他們散佈於我國所有一切主要區域，成十成百不等，奔走工作。必須承認：工人宣傳員是最善於在農民羣衆中進行集體農莊運動宣傳工作的宣傳員，是任何其他現有的和可能的宣傳員所趕不上的。既然如此，那末這些工人竟說服了農民羣衆，使其相信集體巨大農業優越於個體細小農業，何況現有的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就是表明這種優越性的具體實例，這有什麼奇怪呢？

這就是我們在集體農莊建設中的成績所由長成的根源，而這一成績，我認爲是近年來所有一切成績中最重要和有決定意義的成績。

『科學』底反對意見，即反對組織面積五萬至十萬海克脫不等的大規模穀物工廠，而認爲組織這種工廠是不可能而且不適當的意見，是已經破產而被打得粉碎了。實踐已把『科學』底反對意見推翻，並且再次表明了，不僅是實踐應當向『科學』領教，而且『科學』也不妨去向實踐學習。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大規模的穀物巨型工廠是無法生長的。但我們的國家並不是資本主

義的國家。這個『小小的』區別是不可忘記的。在資本家那裏，因為有土地私有制，所以不預先購買大批田地，或不繳納絕對地租，便不能設立大規模的穀物工廠，而為要購買大批田地或繳納絕對地租，就要使生產担负極大的費用。而在我們這裏，恰巧相反，因為我們這裏沒有土地私有制，既沒有什麼絕對地租，也沒有土地買賣制，——這種情況當然不能不造成使大規模的穀物農莊易於發展的順利條件。在資本家那裏，大規模的穀物農莊底目的是要獲得最高限度的利潤，至少是要獲得適合於所謂平均利潤率的利潤，否則資本家就根本不會樂於設立穀物農莊了。而在我們這裏，恰巧相反，大規模的穀物農莊也就是國營的農莊，這種農莊為保證其發展，並不需要最高限度的利潤，也不需要平均利潤率的利潤，而能以最低限度的利潤為限，有時並且不需要任何利潤，——這種情況也造成使大規模穀物農莊易於發展的順利條件。最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既沒有什麼優待大穀物農莊的特殊信貸，又沒有什麼優待大穀物農莊的特殊稅率，而在以幫助社會主義部份為己任的蘇維埃制度下，却實行着，而且將來還會實行這種優待辦法。高貴的『科學』，竟把所有這一切都忘掉了。

右傾機會主義者（布哈林集團）底斷語，即妄稱（1）農民不會加入集體農莊；（2）加緊速度發展集體農莊，只能使羣衆不滿和工農聯盟破裂；（3）農村中的社會主義發展『大路』，不是集體農莊，而是合作社；（4）發展集體農莊和進攻農村資本主義份子就會使國家得不到糧食等語，是已經破產而被打得粉碎了。所有這些資產階級自由派的陳腐論調，都遭破產而被打得粉碎了。

第一，農民已加入了集體農莊，而且是整村、整鄉、整區一同加入了集體農莊。

第二，廣大的集體農莊運動，不僅沒有減弱工農聯盟，反而更加鞏固了這個聯盟，給了這個聯盟一個新的生產的基礎。現在就是瞎子也看得見：如果基本農民羣衆還有什麼嚴重的不滿，那就不是由於蘇維埃政權底集體農莊政策，而是由於蘇維埃政權在用機器和拖拉機來供給農民方面，還趕

不上集體農莊運動底發展。

第三、關於農村中社會主義發展『大路』問題的爭論，是只配愛恒瓦里得和斯列樸科夫這班年輕的小資產階級自由派去從事的學究式的爭論。很明顯的，在廣大的集體農莊運動還沒有發展的時侯，合作社底初級形式，即供給合作社和銷售合作社，本是這樣的『大路』；而當合作社底高級形式，即集體農莊已經出現的時候，集體農莊就成爲發展『大路』了。如果不用括弧來講，那就要說，只有列寧底合作化計劃，才算是農村中的社會主義發展大路，這個計劃包括所有一切農業合作形式，由初級形式（供給的、銷售的合作社）起，一直到高級形式（生產的、集體農業的合作社）止。把集體農莊與合作社對立起來，就是侮辱列寧主義，而暴露自己愚昧無知。

第四、現在就是瞎子也看得見：如果我們沒有進攻農村資本主義份子，如果我們沒有發展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運動，那我們現在就不會有今年在糧食採辦工作方面所得到的這種有決定意義的成功，也不會有現在國家手裏所有的幾千萬普特不可侵犯的穀物儲存了。而且可以肯定斷言：因爲有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運動的發展，我們正在完全走出缺乏糧食的恐慌，或者說已經走出了這種恐慌。如果我們的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愈益迅速發展下去，那末再過兩三年以後，我們的國家就一定成爲最富有糧食的國家之一，甚至也許會成爲世界上最富有糧食的國家。

目前集體農莊運動中的新現象究竟是什麼呢？目前集體農莊運動中有決定意義的新現象，就是現時農民加入集體農莊，已不像從前那樣只是幾人一隊，而是整村、整鄉、整區以至於整州一同加入的了。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中農加入集體農莊了。這就是農業發展中根本轉變的基礎，而這一根本轉變，就是蘇維埃政權在過去這一年來最重要的成績。

托洛茨基主義底孟塞維克『主張』，即認爲工人階級不能領導基本農民羣衆來建設社會主義社

會的『主張』，是陷於破產而被打得粉碎了。現在就是瞎子也看得見：中農已經轉到集體農莊方面來了。現在大家都看得見：工業農業五年計劃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五年計劃，而那些不相信我國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人，是沒有權利來慶賀我們五年計劃的。

各國資本家妄想蘇聯會恢復資本主義的最後一點希望，即『神聖的私有原則』，已在崩潰而化為灰燼。他們所認為是資本主義滋養料的農民，已紛紛拋棄那所讚美的『私有制度』旗幟，而走上了集體制度的軌道，走上了社會主義的軌道。妄想資本主義復辟的最後一點希望，已在崩潰下去。

也就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我國資本主義份子拚命企圖掀起舊世界一切勢力來反對實行進攻的社會主義，因而使階級鬭爭尖銳化。資本是不願意『長入』社會主義制度的。

同樣，也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最近以來，資本家底忠實惡狗，如司徒盧威輩與黑先輩，米留可夫輩與克倫斯基輩，唐恩輩與阿布拉莫維奇輩狂叫狂吠起來，反對布爾塞維主義。資本主義復辟的最後一點希望陷於破產，這並不是好玩的事情呀。

階級敵人這樣瘋狂的憤恨，資本走狗這樣兇惡的狂吠，若不是證明黨在社會主義建設最困難戰線上確實獲得了有決定意義的勝利，又是證明什麼呢？

列寧說：

『掌握國家政權的工人階級，只有當它在事實上向農民表明了公共的，集體的，共耕制的，勞動組合制的耕種方法底優越時，只有當它用共耕制的勞動組合制的經濟來幫助了農民時，它才能真正向農民證明自己正確有理，才能把數千百萬農民羣衆吸收到自己方面來，堅實可靠地真正吸收到自己方面來』（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五七九頁）。

列寧就是這樣提出吸收數千百萬農民羣衆到工人階級方面來的方法問題，就是這樣提出把農民引上集體農莊建設軌道的方法問題的。

過去這一年來的事實表明黨是在順利解決這一任務，而堅決克服這條道路上所有一切困難的。列寧說：

『只有當我們真正改進和改善了中農生活底經濟條件時，中農在共產主義社會裏才會站到我們方面來。如果我們明天就能够拿出十萬架頭等拖拉機，給以汽油，給以駕駛員（你們十分知道，這在目前還是一種夢想），那麼中農就會說：『我贊成康姆尼』（即贊成共產主義）。可是，爲要做到這一步，首先就必須戰勝國際資產階級，逼迫它給予我們這些拖拉機，或者我們就要把我們的生產率提高到足以親自製造這些拖拉機的程度。只有這樣提這個問題，才是對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七〇頁）。

列寧就是這樣提出改換中農技術武裝的方法問題，把中農吸收到共產主義方面來的方法問題的。

過去這一年來的事實表明了，這一任務，黨也是在順利執行着。大家知道，到來年，即一九三〇年春天，我們的田場上就會有六萬餘架拖拉機，再過一年，就會有十萬多架，而再過兩年，就會有二十五萬多架了。幾年以前還看作『夢想』的事情，我們現在已經可以把它變爲現實而綽綽有餘了。

這就是中農轉到『康姆尼』方面來的原因。

黨底第三個成績，就是如此。

黨在這一年來的幾個基本成績，就是如此。

(四) 結束語

我們正開足馬力，沿着工業化的道路前進，向社會主義前進，拋棄我們歷來的『俄羅斯的』落後性。我們的國家日益成爲五金業的國家，汽車化的國家，拖拉機化的國家。當我們把蘇聯架在汽車上，把農民架在拖拉機上的時候，就請那些以『文明』自誇的高貴資本家們來試試追上我們吧。我們且來看看，究竟那些國家可以『評定』爲落後的國家，那些國家可以『評定』爲先進的國家。

本文選自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一九四八年莫斯科版

『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第三段第六節第二六三至二七六頁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發表於真理報第二百五十九期

五、爲農業集體化而鬥爭

論蘇聯土地政策底幾個問題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馬克思

主義土地問題專家代表會議上的演說

同志們！現在我國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基本事實，引起大家注意的事實，就是集體農莊運動大規模增長的事實。

現時集體農莊運動底特點，就是現在加入集體農莊的，不像從前那樣只是個別貧農集團，而是大批中農一同加入的。這就是說，集體農莊運動已從個別勞動農民集團和個別勞動農民階層的運動，變成了幾百萬幾千萬基本農民羣衆的運動了。也就是因爲如此，所以現在有一件極其重要的事實，即集體農莊運動已具有強大的日益增長的反富農的巨浪性質，掃除自己發展道路上所有的富農反抗，擊破富農，並在農村中開闢廣闊社會主義建設的大道。

可是，我們雖然可以誇耀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有許多實踐的成績，但關於我們在一般經濟方面，特別是在農業方面的理論工作的成績，却就不可這樣說了。而且必須承認：我們的理論思想趕不上我們的實踐成績，在實踐成績與理論思想發展間有些隔離。其實，我們的理論工作不僅應當趕上實際工作，而且還要超過實際工作，武裝我們的實際工作者去爭取社會主義勝利。

我現在不來多講理論底意義。你們關於理論底意義，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大家知道：理論如果是真正的理論，就能賦予實際工作者確定方針的能力，明白認識的前途，進行工作的把握，確信我

們事業必勝的信念。凡此種種，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是有巨大意義的，而且是不能不有巨大意義的。不幸我們正是在這一方面，在我國經濟問題的理論研究方面，却開始跛腳。如果不然，那爲什麼在我國社會政治生活裏，關於我國經濟問題，總還流行着各種各樣的資產階級理論和小資產階級理論呢？如果不然，那爲什麼這些理論和所謂理論直到現在還沒有遇到應有的回擊呢？如果不然，那爲什麼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底許多基本原理，這些最能打破資產階級理論和小資產階級理論的武器，竟開始被人忘掉，而不在我們的刊物上廣加宣傳，不被提到最前面呢？不根據馬列主義理論去對資產階級理論作不調和的鬭爭，就不能完全戰勝階級敵人，這難道難得瞭解麼？

新的實踐就產生出對於過渡時期經濟各種問題的新的看法。現在，新經濟政策問題，階級問題，建設速度問題，結合問題，黨底政策問題，都應有新的提法。爲要不落後的實踐，就須立刻根據新環境來研究這一切問題。如果不然，那就無法打破各種模糊我們實際工作者頭腦的資產階級理論。如果不然，那就無法剷除這些已變爲頑固成見的理論。因爲只有對理論中的資產階級成見作戰，才能鞏固馬列主義底陣地。

讓我現在把這些資產階級成見，把這些所謂理論拿出幾個來批評一下，並在說明我國建設幾個樞紐問題時來證明這些成見毫無根據吧。

(一) 『平衡』論

你們當然知道，共產黨員中間至今還存在有說我國國民經濟各部份彼此『平衡』的所謂『平衡』論。這個理論當然是與馬克思主義毫無相同處的。可是，這個理論却爲右傾營壘裏許多人所宣傳着。按這個理論說來，我們這裏似乎是有兩個木桶，一個木桶裏裝着社會主義的經濟，而另一個

木桶裏却裝着非社會主義的，或者說資本主義的經濟。這兩個木桶循着彼此平行的軌道，並排向前滾去，和平共處，不相抵觸。大家知道，按幾何學說來，平行線是不會交合的。可是，這個高明理論底創作者却認為這兩條平行線總有彼此交合的一天，而它們一交合起來時，我們就有社會主義了。這個理論沒有看見，在這兩個所謂『木桶』後面是有相當的階級站着，而這兩個『木桶』底運轉是在殘酷的階級鬭爭，生死的鬭爭，以『誰戰勝誰』為原則的鬭爭中間進行的。

不難瞭解：這個理論是與列寧主義毫無相同處的。不難瞭解：這個理論底客觀目的是要保持個體農民經濟底陣地，用『新的』理論武器把富農份子武裝起來反對集體農莊，破壞集體農莊底陣地。可是，這個理論直到現在還流行於我們的刊物上。而且不可說它遇到了我們理論家方面的嚴重回擊，更不用說致命的回擊了。這種荒誕的情形，不是因為我們的理論思想界落後，又是因為什麼呢？

可是，只要打開馬克思主義寶庫，拿出再生產論來和各部份彼此平衡論對立一下，就可把這後一個理論打得粉碎了。底確，馬克思主義的再生產論教導說：現代社會沒有逐年增加的積累，便不能發展，而逐年增加的積累，又非有逐年擴大的再生產不可。這是顯而易見，不言而喻的。我們的巨大的集中的社會主義工業，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擴大再生產論發展着，因為它的容量逐年增加，它有自己的積累，並一日千里地前進。可是，我們的大工業並沒有包括整個國民經濟。反之，在我國民經濟中，小農經濟還佔有較大的比重。可以說我國小農經濟是按照擴大再生產原則發展的麼？當然是不可這樣說的。我國小農經濟，大部份不僅沒有逐年實現擴大的再生產，恰巧相反，它甚至連單純的再生產，也不是時時都有可能實現的。而這種小農經濟雖不能實現擴大再生產，却又是在我國民經濟中佔有較大比重的力量。有這樣的小農經濟為農業基礎，難道可以加快速度推進

我們社會主義工業麼？當然是不可以的。可以在多少長久的時期內，把蘇維埃政權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建築在兩個不同的基礎上，建築在最巨大集中的社會主義工業基礎上和最散漫落後的小商品農民經濟基礎上麼？當然是不可以的。長此以往，整個國民經濟都會有完全瓦解的一日。出路何在呢？出路就在於使這個農業成爲巨大的農業，使它成爲能够實行積累，能够實現擴大再生產的農業，並以此而改造國民經濟底農業基礎。可是，怎樣才能使它成爲巨大的農業呢？爲要達到這一步，只有兩條道路可走。一條是資本主義的道路，即是在農業裏培植資本主義，使農業成爲巨大的農業，結果是使農民陷於貧困，而使資本主義企業在農業中發展起來。我們反對這條道路，因爲這條道路是與蘇維埃經濟不能相容的。另外一條道路是社會主義的道路，即是在農業裏培植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結果是使小農戶聯合成爲用技術和科學武裝起來的巨大集體農莊，而把資本主義份子從農業裏排擠出去。我們是主張走第二條道路的。

所以問題是這樣：或者是走第一條道路，或者是走第二條道路，或者是向後退，退到資本主義，或者是向前進，進到社會主義。沒有而且也不能有任何第三條道路。而『平衡』論却是想規定第三條道路的企圖。正因爲它指望着第三條道路（不存在的道路），所以它是空想的，反馬克思主義的。

所以，只要拿出馬克思底再生產論來和各部份彼此『平衡』論對立一下，就可以把這個『平衡』論打得體無完膚了。

爲什麼我們的馬克思主義土地問題專家不幹這件事情呢？誰要這種令人發笑的『平衡』論流行於我們的出版物上，而把馬克思主義的再生產論束諸高閣呢？

現在來說政治經濟學中的第二個成見，來說第二個資產階級式的理論。我所指的，就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自流』論。這個理論雖與馬克思主義毫無相同之處，可是却為右傾營壘中的同志所極力宣傳着。這個理論底創作者所說的約如下述。從前我們這裏是有過資本主義的，當時工業是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發展着，而農村却自發地、自流式地跟着資本主義城市走，照着資本主義城市底形相和模樣改造着。既然在資本主義下是這樣，那末在蘇維埃經濟制度下又何嘗不可這樣呢？為什麼農村，小農經濟，不能自流式地跟着社會主義城市走，自發地照着社會主義城市底形相和模樣改造呢？這個理論底創作者根據這點，就斷言農村能自流式地跟着社會主義城市走。由此就有這樣一個問題：既然農村能自然而然的跟着社會主義城市走，那末我們是否還值得為組織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操心呢？我們是否還值得為此而努力奮鬥呢？

這又是一個按其客觀目的來說，是要給予農村資本主義份子一種新的武器去反對集體農莊的理論。這個理論底反馬克思主義實質，是毫無疑義的。

這個奇怪理論混亂着我們那些集體農莊實際工作人員底頭腦，而我們的理論家却直到現在都還沒有工夫去痛斥這個奇怪理論，這難道不是很奇怪麼？

毫無疑義，社會主義城市對於小農鄉村的領導作用是偉大而無可估量的。正因為如此，所以工業就具有改造農業的作用。可是，單靠這一個因素，是否已足夠使小農鄉村自動跟着城市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呢？當然是不夠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農村是自流式地跟着城市走的，因為城市資本主義經濟和農民小商品經濟，基本上是同類的經濟。當然，小農商品經濟還不是資本主義經濟，可

是，它基本上是和資本主義經濟同類的，因為它倚據於生產資料私有制。列寧在評論布哈林所著過渡時期經濟一書時說得萬分正確，他說『農民有商品資本主義趨勢』，即是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趨勢背道而馳的趨勢。正因為如此，所以『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大批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列寧語)。既是如此，是否可以說小商品農民經濟，在基本上是和城市中的社會主義生產同類的呢？很明顯的，若不離開馬克思主義，便不能這樣說的，否則列寧就不會說：『當我們還生活在小農國家時，資本主義在俄國比共產主義有更堅固的經濟基礎』。所以，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自流論是一種反列寧主義的腐敗理論。所以，爲要使小農鄉村跟着社會主義城市走，除其餘一切而外，還須在農村裏培植巨大社會主義農莊，即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作爲社會主義根據地，以引導基本農民羣衆跟着社會主義城市前進。

事情是很明白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自流』論是一種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社會主義的城市應當引導小農鄉村，在鄉村裏培植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按照新的社會主義的軌範來改造鄉村。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自流』論，直到現在都還沒有遇到我們土地問題理論家方面應有的回擊，這是很奇怪的。

(三) 小農經濟『穩固』論

現在來說政治經濟學中的第三個成見，來說小農經濟『穩固』論。大家知道，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反對馬克思主義說大經濟優越於小經濟的著名提綱說這個提綱只是在工業中發生效力，而在農

業中是不適用的。宣傳這個理論的社會民主黨理論家，如達維特和格爾茨一班人所企圖『倚據』的事實，就是說小農吃得苦，忍得住，他爲着保留自己那一小塊土地而不惜挨受千辛萬苦，所以小農經濟在與大農業經濟鬭爭時，就表現出它那種穩固性。不難瞭解：這種『穩固性』是比任何不穩固性都要壞些的。不難瞭解：這個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讚美和鞏固資本主義制度。正因爲它有這樣一個目的，所以馬克思主義者很容易就把這個理論打破了。可是，現在的問題並不在於此，現在的問題是在於我們的實踐。我們的實際情況，已拿出各種新證據來反對這個理論，而我們的理論家却不知爲什麼竟不願意或不能夠利用這個新武器來反對工人階級底敵人。我所指的實踐，就是我國土地私有制已經消滅，土地已經國有化，這就使小農已不復像奴隸一般忠順於自己的一小塊土地，而易於從小的農民經濟過渡到大的集體的經濟。

究竟在西歐方面有什麼東西，過去現在而且將來還會把小農束縛在小商品經濟上呢？首先而且主要是因爲他有一小塊私有土地，因爲存在有土地私有制。他多年積蓄一點金錢，買得一小塊土地，而他買得土地後，自然不願和它離別，寧願挨受萬般痛苦，寧願過牛馬生活，只圖保持自己這一小塊土地，即他那個人經濟底基礎。可以說這個因素在我們這裏，在蘇維埃制度條件下，也仍然如此發生作用麼？當然是不可這樣說的。其所以不可這樣說，是因爲在我們這裏沒有土地私有制。正因爲在我們這裏沒有土地私有制，所以我們這裏的農民，也就不會像在西歐那樣奴隸一般地忠順於土地。這個情況也就不能不使小農經濟比較容易轉入集體農莊軌道。

這就是在我國，在土地國有化條件下，農村大經濟，即農村集體經濟能很容易表明它優勝於小農經濟的原因之一。

這就是消滅了絕對地租、取消了土地私有制而實行了土地國有化的蘇維埃土地法所具有的偉大

革命意義。

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我們擁有新證據去反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反對那些說什麼小農經濟在大經濟鬭爭中能表現穩固性的妄談。

爲什麼我們的土地問題理論家，不充分利用這個新證據去反對所有一切資產階級理論呢？

我們在實行土地國有化時所持的出發點之一，就是資本論第三卷，馬克思底名著剩餘價值論以及列寧底土地問題著作內所發揮的那些理論前提，這些著作是最豐富的理論思想寶庫。我所指的，就是一般地租論，特別是絕對地租論。現在大家都可以看得明白：這些著作底理論原理是由我們在城市和鄉村中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所燦爛證實了。

試問爲什麼查揚諾夫這班『蘇維埃』經濟學家底反科學理論，竟應當在我們的刊物上自由流行，而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關於地租和絕對地租論的天才著作，倒不應當普遍宣傳和提到最前面，却應當束諸高閣呢？

你們大概記得恩格斯論『農民問題』的那本著名小冊子。你們當然記得恩格斯怎樣慎重看待把小農引入協作經濟道路，引入集體經濟道路的問題。讓我從恩格斯這本小冊子裏引證關於這個問題的一段話吧：

『我們堅決站在小農方面；我們將極力設法改善小農生活，使他們易於過渡到共耕制，要是他們決意這樣辦的話；如果他們還不能決意這樣辦，那我們就要設法給他們儘多的時間，讓他們在他們那一小塊土地上考慮考慮這個問題』*。

* 警重點是我加的。

斯大林註

你們看，恩格斯是很慎重看待把個體農戶引入集體制軌道問題的。恩格斯這種驟然看來未免過份慎重的態度，究應怎樣來解釋呢？他在這裏是根據什麼情形出發的呢？他所由出發的顯然是有土地私有制存在，農民還佔有『他們那一小塊』土地而難和這塊土地別離的情形。西方農民是如此。在土地私有制存在着的資本主義國家裏的農民是如此。在這裏當然是須要非常慎重的。可以說我們蘇聯也有同樣的情形麼？當然是不可這樣說的。其所以不可這樣說，是因為我們這裏並沒有什麼把農民束縛於個體經濟上的土地私有制。其所以不可這樣說，是因為我們這裏有使個體農民易於過渡到集體制軌道的土地國有制。

這就是近來我國集體農莊運動發展得比較容易而迅速的原因之一。

令人氣憤的，就是我們的土地問題理論家，還沒有企圖把我國農民狀況與西方農民狀況間的這種區別儘量揭示出來。可是，這樣的工作不僅對於我們蘇聯的工作人員有莫大的意義，而且對於世界各國共產黨員也有莫大的意義，因為將來在各資本主義國家裏，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以後的初期，究竟是要在土地國有制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還是要在沒有這樣一個基礎的情形下建設社會主義，這對於各資本主義國家裏的無產階級革命，並不是沒有關係的。

我在不久以前所發表的一篇論文（大轉變的一年）中發揮了幾個有名的計據，證明大農業經濟優勝於小農經濟，而我在當時所指的，是巨大的蘇維埃農莊。用不着證明，這一切論據對集體農莊這種巨大經濟單位，也是完全全適用的。我所指的，不僅是那些已經發達而有機器和拖拉機作為基礎的集體農莊，並且是那些初步的集體農莊，即代表集體農莊建設事業所謂手工場時期而倚靠於農民原有農具的集體農莊。我所指的，是現時在全盤集體化區域內所建立的那些初步的集體農莊，它們不過是把農民生產工具集合在一塊來耕種土地罷了。例如，拿前頓河省鶴普爾區裏的集體農莊

來說。從表面上看起來，從技術方面看起來，這些集體農莊彷彿是和小農經濟沒有什麼區別的（機器很少，拖拉機很少）。其實，在集體農莊裏面，單是把農民工具集合起來進行生產，就獲得了我們的實際工作者所想都沒有想到的一種功效。這種功效有何表現呢？其表現就是自農民加入集體農莊以後，播種面積已經擴大了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以至百分之五十。爲什麼有這種『衝昏頭腦』的功效呢？這是因爲農民在單獨勞動的時候，本來是沒有什麼力量，而當他們把自己的農具集合起來組織了集體農莊的時候，他們就變成極大的力量了。這是因爲在各人單獨勞動的時候，有許多荒土和生地很難耕種，而從組織集體農莊時起，農民却有可能來加以耕種了。這是因爲農民已有可能把生地拿到自己手裏了。這是因爲農民已經有可能動用荒原，零星小塊土地，田界以及其他等等了。

耕種荒土生地問題對於我國農業是有巨大意義的。你們知道，舊時俄國革命運動底樞紐就是土地問題。你們知道，消滅缺乏土地的現象是當時土地運動底目的之一。當時有許多人以爲缺乏土地是絕對的，即是以爲在蘇聯再沒有適宜於耕種的空閒土地了。而事實上究竟怎樣呢？現在大家都看得清楚，在蘇聯有過而且現在還有幾千萬海克脫的空閒土地。可是，農民用他們的可憐工具，是絕對無法耕種這些土地的。正因爲他們當時無法耕種生地荒土，所以他就趨向於耕種『熟地』，耕種屬於地主的土地，耕種在單獨勞動時便於用農民工具來耕種的土地。這就是『缺乏土地現象』底基本原因。因此，無怪乎我們的穀物託拉斯現在已有可能動用約近兩千萬海克脫的空閒土地，這些土地是農民所沒有耕種過，而且是不能在各人單獨勞動時用小農工具耕種的。

集體農莊運動在它的各個階段上，在初級的階段或在具備有拖拉機的更發展的階段上的意義，就在於農民現時已有可能去動用荒土生地了。這就是播種面積在農民過渡到集體勞動制時大大擴充

起來了的原因。這就是集體農莊優勝於個體農民經濟的一個基本原因。

不待說，當全盤集體化區中的初級集體農莊能得到農業機器站和農業機器隊方面的幫助，而集體農莊又有可能備置大批拖拉機和康拜因機的時候，集體農莊優勝於個體農民經濟的情形，是會更加顯然的。

(四) 城市與鄉村

還有一種為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培植的成見，即所謂「剪刀形態」論，這種成見也如其他一切不幸還流行於蘇聯刊物上的資產階級理論一樣，應當受到無情的反對。我所指的這個理論，是認為十月革命所給予農民的要比二月革命所給的少些，認為十月革命其實沒有給予農民絲毫東西。有一位「蘇維埃的」經濟學家曾在我們的刊物上鼓吹過這種成見。不錯，這位「蘇維埃的」經濟學家後來已經放棄了自己的理論。（噫聲：「到底是誰呢？」）。這就是格羅曼，可是，這個理論却受到託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對派方面的極力擁護，並被它利用來反對黨。而且無論如何也不可說，現時在「蘇維埃的」輿論界中，這個理論已不流行了。同志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它牽連到城鄉相互關係問題。它牽連到消滅城鄉對立性問題、它牽連到最迫切的所謂「剪刀形態」問題。因此，我認為這個奇怪理論是值得分析的。

說農民從十月革命方面沒有得到絲毫東西，這是否正確呢？讓我們來看事實吧。

我手裏有著名統計學家聶蒙啓諾夫同志底著名統計表，這統計表已經在我所著的在糧食戰線上的一文中公佈過了。從這個統計表上可以看出，在革命以前，地主「所生產的」穀物不下六萬萬普特。所以，地主當時是六萬萬普特穀物底所有人。富農當時所「生產的」穀物有十九萬萬普特。這

是富農當時所擁有的一種很大的力量。而貧農中農當時所生產的穀物，總共不過二十五萬萬普特。這就是舊時鄉村中，十月革命以前鄉村中的情景。

十月革命以後，在鄉村中發生了什麼變化呢？我又來引用這個統計表中的數目字。就拿一九二七年爲例吧。地主在這一年的生產了多少穀物呢？他們當然是絲毫沒有生產而且也不能生產什麼的，因爲地主已被十月革命所消滅了。你們當然懂得，這不能不大大改善農民底狀況，因爲農民已擺脫地主桎梏了。這當然是農民從十月革命方面所得到的很大的好處。富農在一九二七年生產了多少呢？已經不是十九萬萬普特而是六萬萬普特穀物了。所以，自十月革命以後，富農底力量已削弱了三倍多。你們當然懂得，這件事實是不能不改善貧農和中農狀況的。而貧農中農在一九二七年生產了多少呢？已經不是二十五萬萬普特，而是四十萬萬普特了。所以，貧農和中農在十月革命以後所生產的穀物，已經是比较革命前多十五萬萬普特。

這就是說明貧農和中農從十月革命方面得到了很大好處的事實。

這就是十月革命已經給予貧農和中農的東西。

既然如此，試問怎麼還可說十月革命沒有給予農民絲毫東西呢？

可是，同志們，這還不能概括一切哩。十月革命消滅了土地私有制，消滅了土地買賣制，確立了土地國有制度。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農民爲要生產穀物，已不須要購買土地了。從前，他們爲要買得一小塊土地，不得不積年累月，勉強積蓄一點金錢，東湊西借，以至於債台高築，遭受盤剝。購買土地的費用，當然也就使穀物生產底成本費增加起來。而現在，農民已不必這樣幹了。現在，他不必購買土地，便能生產穀物了。這是什麼——是改善農民底狀況，抑不是改善農民狀況呢？當然是改善農民狀況的。

其次，直到最近時候爲止，農民始終不得不用單獨勞動方法，用陳舊工具來勉強耕種土地。大家知道，農民用現在已不中用的陳舊生產工具來單獨勞動，是不能獲得必要利益，來享受寬裕生活，一貫改善自己的物質生活，提高自己的文化程度，走上社會主義建設的康莊大道的。現時在集體農莊運動加緊發展以後，農民已有可能聯合起來，把自己的勞動同鄰居的勞動打成一片，共同組織集體農莊，開墾生地，利用荒土，領得機器和拖拉機，這樣來把自己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兩倍，以至於三倍。而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由於共同組織集體農莊的結果，現在農民已有可能用一樣多的勞動來生產比以前多得多的穀物。其次，這就是說，穀物生產底成本費已比先前便宜多了。最後，這就是說，在價格穩定時，農民因出賣穀物所能得到的金錢，是比以前多得多的。

既然如此，試問怎樣還可說十月革命沒有給予農民什麼利益呢？

散佈這種謠言的人顯然是在誣衊我們黨，誣衊蘇維埃政權，這難道不很明白麼？但由此就應得出什麼結論呢？

從這裏就應得出如下的結論：現在，『剪刀形態』問題，消滅『剪刀形態』問題，都應有新的提法。從這裏就應得出如下的結論：如果集體農莊運動將來也按現有的速度發展下去，那末『剪刀形態』在最近將來就會消滅。從這裏就應得出如下的結論：城鄉關係已經是建立在新的基礎上，城鄉對立性是會加快速度消滅下去的。

這個情況對於我們整個建設工作有極大的意義，同志們。它改變着農民底心理，使農民面向城市。它造成消滅城鄉對立性的條件。它造成一種基礎，使黨所提出的『面向農村』的口號，將由集體農民所提出的『面向城市』的口號來補充。而這是毫不奇怪，因為農民現在從城市方面得到機器、拖拉機、農學家、組織者以及直接的幫助去反對富農，消滅富農。極不信任城市，把城市看

作強盜的那種舊式農民已退到後面去了。他已由新式農民，即集體農民所代替了。集體農民對城市抱着希望，希望從城市方面得到切實的生產上的幫助。生怕降為窮人，只想暗中（恐怕喪失選舉權啊！）變成富農的那種舊式農民已由新式農民所代替了。新式農民有着新的前途：加入集體農莊，逃出貧困境地，而走上經濟高漲的康莊大道。

事情就是這樣變化的，同志們。

因此，同志們，更令人氣憤的，就是我們的土地問題理論家，竟沒有極力設法把所有一切企圖辱沒十月革命勝利品企圖辱沒日益增長的集體農莊運動的那些資產階級理論澈底揭穿，連根剷除。

（五）論集體農莊底本質問題

集體農莊這一經濟種類，乃是社會主義經濟底形式之一，這是不容懷疑的。

有一個人在這裏發言辱沒過集體農莊。他硬說，集體農莊這一經濟組織，是與社會主義經濟形式毫不相同的東西。同志們，我認爲他這樣估計集體農莊是完全不對的。這種估計毫無疑義是與列寧主義毫無相同處的。

經濟種類是由什麼來決定的呢？顯然是由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關係來決定的。那裏還有其他什麼東西可以決定經濟種類呢？難道在集體農莊內有生產資料私有者階級和被剝奪生產資料者階級麼？難道在集體農莊內有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麼？難道集體農莊不是把一切基本生產工具實行公共化，並且是在屬於國家的土地上實行的公共化麼？有什麼根據來說集體農莊這種經濟不是社會主義經濟形式之一呢？

固然，在集體農莊裏還有矛盾。固然，在集體農莊裏還有一種個人主義心理，甚至富農心理

的遺毒，這種遺毒還沒有消滅，可是，再過一些時候，隨着集體農莊底鞏固，隨着集體農莊底機器化，這種遺毒是一定會消滅的。可是，把集體農莊整個拿來說，把它的矛盾和缺點都一起拿來說，集體農莊這個經濟因素在基本上是農村發展底新道路，是農村發展底社會主義道路，是和富農資本主義道路相對立的道路，這難道可以否認麼？在我國條件下，集體農莊（我所指的，是真正的集體農莊，而不是冒牌的集體農莊）是農村中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底根據地和策源地，是在與資本主義份子作生死決鬥中發展起來的根據地和策源地，這難道可以否認麼？

有些同志企圖辱沒集體農莊而把它稱為資產階級經濟底形式，是沒有任何根據的，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在一九二三年，我們還沒有羣衆的集體農莊運動。當時，列寧在他所著論合作制一書中指出的，是合作社底一切形式，包括低等形式（供給的，銷售的合作社）和高級形式（集體農莊）在內。他當時關於合作社問題，關於合作企業問題究竟說了些什麼話呢？請看列寧所著論合作制一書中的一段話吧：

『在我們的現存制度下，合作企業與私人資本主義企業不同，因為合作企業是集體企業，但它與社會主義企業沒有區別*，因為它是建立在屬於國家，即屬於工人階級的土地上，是建立在屬於國家，即屬於工人階級的生產資料上』（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六頁）。

可見，列寧在觀察合作企業時，並不是把它當作一個孤立的東西看待，而是把它拿來與我國現存制度聯繫起來觀察，注意到合作企業是在生產資料屬於國家的國家裏，在屬於國家的土地上面經

*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營的；列寧既然這樣觀察合作企業，所以他斷定說合作企業與社會主義企業是沒有區別的。

這就是列寧關於一般合作企業的言論。

關於目前的集體農莊，更可以這樣說，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列寧認為在我國條件下『單純的合作制發展就等於社會主義發展』，其原因之一也就在此。

由此可見，上面所講的那位發言人辱沒集體農莊，就是犯了極嚴重的反列寧主義的錯誤。

由這個錯誤中，也就產生了他的另一個錯誤，即關於集體農莊內階級鬭爭問題的錯誤。這個發言人把集體農莊內的階級鬭爭誇張到如此地步，以致可以得出結論，說集體農莊內的階級鬭爭是與集體農莊外的階級鬭爭沒有區別的。甚至於還可以得出更進一步的結論，說集體農莊內的階級鬭爭要比集體農莊以外更殘酷。而且，不只是這位發言人犯了這個錯誤。妄談什麼階級鬭爭，囂嚷胡說集體農莊內部的階級鬭爭，這在現時是我們的一切『左的』叫喊者底通病。而最可笑的，就是這些囂嚷者在沒有或差不多沒有階級鬭爭的地方『看見』階級鬭爭，而在有階級鬭爭和階級鬭爭很厲害的地方，却又看不見階級鬭爭。

集體農莊內有階級鬭爭成份麼？是的，是有的。既然集體農莊內還保存有個人主義心理，甚至富農心理的遺毒，既然在集體農莊內還有某些不平等，那末集體農莊內也就不會沒有階級鬭爭底成份。可以說集體農莊內的階級鬭爭與集體農莊以外的階級鬭爭是相同的麼？當然是不可這樣說的。我們的『左的』清談家的錯誤，正在於他們看不見這個區別。什麼是集體農莊以外的，成立集體農莊以前的階級鬭爭呢？這就是與那些佔有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而藉以盤剝貧民的富農作鬭爭。這是拚死命的鬭爭。而什麼是集體農莊基礎上的階級鬭爭呢？第一，這就是說，富農已被擊破了，已被剝奪了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第二，這就是說，貧農和中農已在基本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公有

化基礎上聯合成爲集體農莊。最後，這就是說，這裏發生的是集體農莊莊員內部的鬭爭，其中一部份人還沒有擺脫個人主義和富農心理的遺毒，想利用集體農莊內某些不平等情形來圖利營私；另一部份人却想要剷除這種遺毒和不平等情形。只有瞎子才看不見集體農莊基礎上的階級鬭爭與集體農莊外的階級鬭爭之間的區別，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如果以爲有了集體農莊，就算『定了』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要的一切，那就錯誤了。如果以爲集體農莊莊員已變成了社會主義者，那就更其錯誤了。其實，還要做很多工作來改造集體農民，消除他們的個人主義心理，使他們成爲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勞動者。集體農莊機器化進行得越快，集體農莊拖拉機化進行得越快，我們達到這個目的也就會越迅速。但這絲毫也不能減少集體農莊是農村裏社會主義改造事業槓桿的極大意義。集體農莊底偉大意義，正在於它是農業中採用機器和拖拉機的主要基礎，是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精神去改造農民，改造農民心理的主要基礎。

列寧說得對：

『改造小農，改造小農底全部心理和習慣，是需要有幾代工夫的事情。要解決這個小農問題，要健全小農底全部心理，就要有物質基礎，要有技術，要在農業中大規模採用拖拉機和機器，大規模實行電氣化』（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三九頁）。

集體農莊就是這樣一個社會主義經濟形式，只有經過這個形式，數千百萬小農才能廣泛採用機器和拖拉機，作爲保證經濟高漲和保證農業按社會主義道路發展的槓桿，這難道可以否認麼？

我們的『左的』清談家，竟把所有這些都忘掉了。我們的這位發言人，也把這些忘掉了。

(六) 階級的變動和黨政策中的轉變

最後，就要說到階級的變動和社會主義向農村資本主義份子進攻的問題。

我們最近一年來工作底特徵，就是我們黨，我們蘇維埃政權：第一，開展了向農村資本主義份子實行的全線進攻；第二，這個進攻——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已經獲得並繼續獲得很具體的優良效果。

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我們已從限制富農剝削趨向的政策，過渡到了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這就是說，我們已經實行而且還在繼續實行我們整個政策中一個有決定意義的轉變。

直到最近以前，黨始終是主張限制富農剝削趨向的。大家知道，這個政策是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就宣佈了的。在施行新經濟政策時以及在我們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又把這個政策重復宣佈過了。大家還記得，列寧在他給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那封有名的信裏（一九二二年），又重復說到必須實行這個政策的問題。最後，這個政策又由我們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追認過了。而我們一直到最近以前所實行的，正是這個政策。

這個政策是不是正確呢？是的，絕對是正確的。五年以前或三年以前，我們能這樣進攻富農麼？當時我們能實行這樣一種進攻而指望獲得成功麼？當然是不能的。當時實行這樣一種進攻，便是最危險的冒險行動，便是把進攻當作兒戲的一種危險之至的舉動。因為我們如果這樣輕舉妄動，便一定會遭失敗，結果就會使富農底陣地鞏固起來。爲什麼呢？因為當時我們在農村中還沒有可能以向富農實行堅決進攻的支撐點，即密佈各地的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因為當時我們還沒有可能用社會主義的生產形式，即用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去代替富農的資本主義生產。

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的時期，季諾維也夫託洛茨基反對派拼命強迫黨來採取立刻進攻富農的政策。可是黨並沒有採取這種危險的冒險辦法，因為黨知道，認真的人是不會輕舉妄動，把進攻當作兒戲的。進攻富農是要認真幹的事情。不可把進攻富農與空口反對富農混爲一談，也不可把對富農的進攻與季諾維也夫託洛茨基反對派拼命強迫黨來採取的那種同富農搔扯的政策混爲一談。進攻富農是要擊破富農，並消滅它這個階級。沒有這些目的，那末進攻就是空談，就是搔扯，就是空砲，隨便怎樣稱呼都可，只是絕對不可叫作真正的布爾塞維主義的進攻。進攻富農就是準備去實際行動，並把富農打得一敗塗地，打得他再也不能翻身。這在我們布爾塞維克方面就叫作真正的進攻。五年以前或三年以前，我們能實行這樣一種進攻而指望獲得成功麼？當然是不能的。

底確，富農在一九二七年所生產的穀物，共達六萬萬普特以上，其中運往農村以外出賣的，約有一萬萬三千萬普特。這是一個頗爲嚴重而不可忽視的力量。而我們的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當時生產了多少呢？約有八千萬普特，其中運往市場的（即商品穀物）約有三千五百萬普特。請你們自己去判斷一下，我們當時是否能夠用我們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底生產和商品穀物去代替富農底生產和商品穀物呢？顯然是不能夠的。在這種條件下向富農實行堅決進攻，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一定會遭失敗，一定會加強富農陣地，而得不到穀物。正因爲如此，所以不管季諾維也夫託洛茨基反對派如何從事冒險主義的空談，我們當時不能夠而且也不應當向富農實行進攻。

現在呢？現在的情形怎樣呢？現在我們已有充分的物質基礎來打擊富農，來打破富農反抗，消滅富農階級，並用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生產來代替富農生產了。大家知道，在一九二九年，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底穀物產量，總共不下四萬萬普特（比一九二七年富農經濟底總產量少二萬萬普特）。其次，大家知道，在一九二九年，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底商品穀物，共有一萬萬三千萬普

特以上（即是比一九二七年富農底商品穀物多些）。最後，大家也知道，在一九三〇年，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底穀物總產量，將不下於九萬萬普特（即是比一九二七年富農底總產量多些），其中商品穀物，將不下於四萬萬普特（即是比一九二七年富農底商品穀物多得不_可比擬）。

這就是我國現在的情形，同志們。

這就是在我國經濟中所發生的變動。

這就是我國最近所發生的階級力量的變動。

由此可見，現在我們已具備有物質基礎來用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生產代替富農生產了。正因爲如此，所以我們現在向富農的進攻，已有不容置疑的成功。你們看，如果是說真正的進攻，而不限於空洞的反富農清談，那就須這樣進攻富農。

正因爲如此，所以我們近來已從限制富農剝削趨向的政策，過渡到了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

那末，對於剝奪富農財產的政策又是怎樣呢，可以容許在全盤集體化區域裏剝奪富農財產麼？——許多人這樣問道。真是一個可笑的問題！從前我們還主張限制富農剝削趨向，我們還沒有可能實行堅決進攻富農，還沒有可能用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生產代替富農生產，當時剝奪富農財產的辦法，是不可容許的。當時，不容許剝奪富農財產的政策，是必需而且正確的。現在呢？現在已是另一回事了。現在我們已有可能來實行堅決進攻富農，打破富農反抗，消滅富農階級，並用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生產來代替富農生產了。現在，剝奪富農財產是由實行全盤集體化的貧農中農羣衆自己來幹的。現在，在全盤集體化區域裏剝奪富農財產，已經不是什麼簡單的行政辦法了。現時在這些區域裏剝奪富農財產，是建立和發展集體農莊這一事業底組成部份。正因爲如此，所以現在來贅述剝奪富農財產問題，便是可笑而不莊重了。既然割下了腦袋，也就不必憐惜頭髮了。

還有一個問題，即能否容許富農加入集體農莊的問題，也是很可笑的。當然不能容許富農加入集體農莊，其所以不能，是因為富農是集體農莊運動底死敵。看來是很明白了。

(七) 結論

同志們，以上就是我們的馬克思主義土地問題專家在理論工作中所絕對不可忽略的六個樞紐問題。

這些問題底意義，首先就在於用馬克思主義精神來闡明這些問題，就可以連根剷除所有一切資產階級理論，這些理論，有時——真使我們丟臉——竟被我們共產黨員同志散佈起來，而模糊我們的實際工作者底頭腦。其實，老早就應當把這些理論連根剷除和摒棄的了。因為馬克思主義土地問題專家底理論思想，是只有與這些理論作無情鬭爭，才能增長和鞏固起來的。

末了，這些問題底意義是在於它們使過渡時期經濟中的舊的問題具有了新的面貌。

現在，新經濟政策問題，階級問題，集體農莊問題，過渡時期經濟問題，都有了新的提法。有些人把新經濟政策解釋為退却，而且解釋為僅僅是退却，這種錯誤見解是必須揭穿的。其實，列寧還在着手施行新經濟政策時就說過，新經濟政策並不只是退却，而且是準備向城鄉資本主義份子作新的堅決進攻的政策。有些人以為我們需要新經濟政策，只是為了城鄉間的聯繫，這種錯誤見解是必須揭穿的。我們所需要的，並不是城鄉間隨便一種聯繫。我們所需要的，是能保證社會主義勝利的那種聯繫。我們主張新經濟政策，只是因為它効勞於社會主義事業。當它不復効勞於社會主義事業時，我們就把它拋到九霄雲外去。列寧說新經濟政策是認真而長期施行的。但他從來也沒有說新經濟政策是永久施行的。

還必須提出普遍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再生產論的問題，必須研究我們國民經濟對照表編製格式問題。中央統計局在一九二六年當作國民經濟對照表公佈的東西，並不是什麼對照表，而是一種玩弄數字的把戲。巴查羅夫和格羅曼對於國民經濟對照表問題的見解，也是不符實用的。蘇聯國民經濟對照表格式，應當由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製定出來，如果他們一般願意仔細研究過渡時期各經濟問題的話。

如果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指定一部份專門工作人員，根據過渡時期經濟問題底新提法來專門研究這些問題，那就很好了。

選自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一九四八年莫斯科版第三七七至四〇〇頁

論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問題

紅星報第十六期上所載消滅富農階級一文，一般說來，無疑是正確的，可是它有兩種不確當的說法。我認爲這兩種不確當的說法是必須糾正的。

(一) 在該文中說道：

『在恢復時期中，我們執行了限制城鄉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從改造時期開始起，我們就從限制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過渡到排擠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了』。

這種說法是不對的。限制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與排擠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並不是兩個不同的政策，而是一個政策。排擠農村資本主義份子，是限制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限制富農剝削趨向的政策，而是一個結果和組成部份。排擠農村資本主義份子，這還不是排擠富農階級。排擠農村資本主義份子，就是排擠和克服那些受不住賦稅壓制，受不住蘇維埃政權所施行的限制辦法的個別富農隊伍。顯而易見，限制富農剝削趨向的政策，限制農村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結果不能不排擠個別富農隊伍。因此，排擠個別富農隊伍，不能不看作是限制農村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底必然結果和組成部份。

我們不僅在恢復時期中執行了這個政策，而且在改造時期中，而且在我們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以後時期中，而且在我們黨第十六次代表會議（一九二九年四月）時期中，以及在這次代表會議以後，一直到一九二九年夏季爲止，也都執行了這個政策；而從一九二九年夏

季起，我們已進到全盤集體化的階段，已轉變到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

如果看一看黨底各個最重要文件，例如從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第十四次代表大會起（根據中央工作總結報告通過的決議），至一九二九年四月第十六次代表會議止（關於農業高漲道路問題的決議）的文件，那就不能不看見，『限制富農剝削趨向』或『限制農村資本主義發展』的提綱，總是與『排擠農村資本主義份子』，『克服農村資本主義份子』的提綱，同時並提的。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說，黨並沒有把排擠農村資本主義份子的事情，與限制富農剝削趨向的政策，即限制農村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分開。

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也如第十六次代表會議一樣，完全是站在『限制農業資產階級剝削趨向』這一政策基礎上（見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關於農村工作問題的決議），站在『採取新辦法來限制農村資本主義發展』這一政策基礎上（同上），站在『堅決限制富農剝削趨向』這一政策基礎上（見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關於五年計劃問題的決議），站在『進攻富農』，即『更進一步，更有系統和更堅決限制富農和私商』這一政策基礎上（同上），站在『更堅決在經濟上排擠』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份子』這一政策基礎上（見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根據中央工作總結報告通過的決議）。

所以，第一，該文作者把限制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與排擠他們的政策看作兩種不同的政策，是不正確的。事實說明：這裏只有一個共同的政策，即限制資本主義的政策，而排擠個別富農隊伍就是這一政策底組成部份和結果。

所以，第二，該文作者說直到改造時期，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時期才開始排擠農村資本主義份子，也是不正確的。其實，無論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以前，即恢復時期，亦無論在第十五次代表大

會以後，即改造時期，都是有過排擠的。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時期中，限制富農剝削趨向的政策不過是因採取新的補充辦法而更其加強，因而對於富農個別隊伍的排擠也就更其加強罷了。

(二) 在該文中說道：

『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完全是從排擠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中產生出來的，它是後一政策在新階段上的繼續』。

這個說法是不確當的，因而也就是不對的。當然，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是不能從天上落下來。它是由整個前一時期，限制農村資本主義份子，亦即排擠農村資本主義份子的時期所準備起來的。但這還不是說這個政策不是與限制（和排擠）農村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根本不同，而似乎是限制政策底繼續。像這位作者那樣說，便是否認從一九二九年夏季起在農村發展中所發生的轉變。像他那樣說，便是否認在這個時期中，我們在我們黨的農村政策上實行了轉變。像他那樣說，便是替我們黨內的右傾份子造成一種思想上的護符，因為右傾份子現在正是企圖利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底決議來反對我們黨底新政策，也好似福龍金曾企圖利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底決議來反對設立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的政策一樣。

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在宣佈加強那限制（和排擠）農村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時，是以什麼為出發點的呢？其出發點，就是認為雖然這樣限制富農，但富農階級在相當時期內還是應當繼續存在的。根據這一點。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就決定保留租地法，明明知道絕大多數承租人都富農。根據這一點，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就決定保留農村僱傭勞動法，並要求切實實行這個法律。根據這一點，就再度宣佈不准剝奪富農財產。這些法律和決議是不是與限制（和排擠）農村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相抵觸呢？絕對是不相抵觸的。這些法律和這些決議是否與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相抵觸呢？絕對是相抵觸的。

觸的！所以，現時在全盤集體化區域內，也就只好把這些法律和決議拋棄，而全盤集體化區域之擴大，却不只是與日俱增，而且是與刻俱增。況且，這些法律和決議已被全盤集體化區域集體農莊運動進程本身所拋棄了。

既然這樣，試問怎樣可以說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是限制（和排擠）農村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底繼續呢？顯然是不可以的。

該文作者忘掉了：如果仍然把生產資料和土地自由使用權保留在富農階級手裏，如果在我們的實踐中仍然保留農村僱傭勞動法和租地法，禁止剝奪富農財產，而只採用抽稅辦法及其他限制手段，就會無法排擠富農這個階級。作者忘掉了：在進行限制富農剝削趨向的政策時，只可指望排擠富農個別隊伍，——這不僅不與暫時保留富農階級的情形相抵觸，反而是預定要暫時保留富農這一階級的。為要排擠富農階級，單用限制和排擠富農個別隊伍的政策還不夠。為要排擠富農階級，就要在公開的戰鬥中擊破這個階級底反抗，剝奪它所藉以生存，藉以發展的一切生產條件（土地自由使用權，生產工具，租地權，僱傭勞動權等等）。而這正是轉變到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否則所有關於排擠富農階級的議論，都不過是對於右傾份子愜意而有利的無謂空談。否則便不會有什麼嚴重的農村集體化，更談不到全盤集體化了。這一點是我們農村裏那些粉碎着富農，實行着全盤集體化的貧農中農已懂得很清楚的。而我們某些同志却大概還不懂得這一點哩。

所以，黨現時在農村中實行的政策，並不是繼續舊時的政策，而是由限制（和排擠）農村資本主義份子的舊政策轉變到消滅富農階級新政策。

本文選自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一九四八年莫斯科版第四〇一至四〇五頁

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一日發表於紅星報第十八期

勝利衝昏頭腦

——論集體農莊運動問題——

現在，大家都在說蘇維埃政權在集體農莊運動方面的勝利了。甚至敵人也不得不承認我們有嚴重的勝利哩。而這些勝利確實是偉大的。

事實指明說，到今年二月二十日，蘇聯全國百分之五十的農戶已經集體化了。這就是說，到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日，我們已把五年計劃超過執行了一倍多。

事實指明說，到今年二月二十八日，集體農莊就已經給春種事業收藏三千六百萬公担種子，即等於整個計劃百分之九十多，即約近二萬二千萬普特。不可不承認：單是在集體農莊方面順利執行了糧食採辦計劃後就收藏了二萬二千萬普特種子的事實，是一個極大的成績。

所有這些是說明什麼呢？

就是說明，農村向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轉變，可說已有保障了。

這些勝利對於我國命運，對於我國領導力量的整個工人階級，以及對於我們黨本身，都有極大的意義，這是無須證明的。姑且不說這些勝利底直接的實際結果，而這些勝利對於我們黨本身內部的生活，對於我們黨底教育，也有巨大的意義。這些勝利使我們黨具有奮發的精神，確信自身力量的信心。這些勝利利用確信我們事業必勝的信念來武裝工人階級。這些勝利把千百萬新興後備力量吸

引到我們黨底週圍來。

所以，黨底任務就是要鞏固既得的勝利，有計劃地運用這些勝利來謀更進一步的發展。

可是，勝利，特別是較爲『輕易』得到的勝利，『出乎意料以外』的勝利，也有其陰暗的方面。這樣的勝利有時使人發生自誇自大的心理，以爲『我們什麼都能做！』，『我們什麼都不在乎！』這些勝利往往使人心醉，使人們因有勝利而頭昏眼花起來，喪失權衡輕重的知覺，喪失瞭解實際情況的能力，一味誇大自己的力量，輕視敵人的力量，冒險來企圖『一舉』而解決社會主義建設底一切問題。於是人們也就絲毫不設法鞏固既得的勝利，不注意於有計劃地運用這些勝利來謀更進一步的發展。爲什麼我們要來鞏固既得的勝利呢，橫直我們都能够『一舉』而跑到社會主義完全勝利，因爲『我們什麼都能做！』，『我們什麼都不在乎！』。

所以，黨底任務就是要堅決反對這種有害於事的危險情緒，要把這種情緒從黨裏驅除出去。

不可說，這種有害於事的危險情緒在我們黨隊伍內有什麼廣泛的流行。可是，這種情緒在我們黨裏面畢竟是有的，而且不能斷定說這種情緒不會加強起來。如果這種情緒在我國得到大家的公認，那末集體農莊運動事業是一定會大大削弱，而這運動陷於破壞的危險就一定會成爲事實了。

所以，我們報章底任務，就是要有系統地揭穿這一類反列寧主義的情緒。

舉幾件事實來說吧。

(一) 我們集體農莊政策所以獲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就在這個政策是倚據於集體農莊運動自願原則和估計到蘇聯各個不同區域內特殊條件的原則。決不可用強力來設立集體農莊。如果這樣做，那就是愚蠢而反動了。集體農莊運動應以農民基本羣衆積極擁護爲倚據。決不可把先進區集體農莊建設方面的模範，機械地搬到落後區裏去。如果這樣做，那就是愚蠢而反動了。這樣的『政策』一

下子就會糟踏掉集體化思想。在規定集體農莊建設速度和方法時，必須仔細估計到蘇聯各個不同區域內的特殊條件。

在集體農莊運動方面，我們的穀物區比我們所有其他各區都要先進些。爲什麼呢？第一，因爲在這些區域內，我們有較多的已經強固的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所以農民已有可能來確信新技術底力量和意義，新的集體的經濟組織底力量和意義。第二，因爲這些區域在糧食採辦運動中有了兩年反富農鬭爭的經驗，結果不能不使集體農莊運動事業易於進行。最後，因爲這些區域最近幾年來從工業中心方面得到了極多的優秀幹部。

是否可以說在其他區域內，比方在那些消費區內，例如我國北方各省，或是在那些還落後的民族區內，例如土耳其斯坦，也具備有這種特別順利的條件呢？

當然是不可這樣說的。

很明顯的，估計到蘇聯各個不同區域內特殊條件的原則，也和集體農莊運動自願性的原則一樣，是發展健全集體農莊運動的最重要前提之一。

而事實上有時又是怎樣呢？是否可以說自願性和估計地方特點的原則沒有在某些區域裏被違背呢？可惜不可這樣說。大家知道，例如在北方某些消費區內，本來不如穀物區內那樣有立刻組織集體農莊的順利條件，而人們却往往不去進行組織集體農莊的準備工作，却一味發佈強迫實行集體農莊運動的官僚主義命令，通過發展集體農莊的紙上決議，組織紙上虛文的集體農莊；這些集體農莊在實際上還沒有，可是妄說這些集體農莊『已經存在』的吹牛決議，却已製出一大堆了。或者是拿土耳其斯坦某些區域來說，這些區域內是比北方消費區更少有立刻組織集體農莊的順利條件的。大家知道，在土耳其斯坦某些區域內，有人曾企圖『趕上並超過』蘇聯先進區域，其方法就是以武力

威脅此刻還不願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民，說誰不立刻加入集體農莊，便得不到灌溉水和工業品。

這種普力施巴也夫上士式的『政策』，究竟與黨倚據於集體農莊運動自願原則和估計到各地特點的政策，有什麼相同處呢？當然是沒有而且也不能有絲毫相同處的。

誰需要這種曲解呢？誰需要用這種官僚主義的命令方法來處理集體農莊運動呢，誰需要這樣無理威脅農民呢？除了我們的敵人而外，是誰也不需要！

這種曲解能產生什麼結果呢？結果只能加強敵人底力量，而糟踏集體農莊運動的思想。

這些以『左派』自居的曲解家在事實上是幫助右傾機會主義者，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二) 我們黨政治戰略底最大長處之一，就是它善於在每一個時機中選出整個運動底基本環節，抓住這個環節，便能把整個鏈條拖向一個總目標去解決任務。可以說黨在集體農莊建設體系中已選定了集體農莊運動底基本環節麼？是的，可以而且必須這樣說。

這個基本環節是什麼呢？

也許是共耕社吧？不，不是共耕社。共耕社是還不實行把生產資料公共化的，它是集體農莊運動中已往的階段。

也許是農業公社吧？不，不是農業公社。農業公社暫時在集體農莊運動中還是少見的現象。農業公社是不僅把全部生產實行公共化，而且把分配也實行公共化的，現在把它作為主要形式來實現的必要條件，還沒有成熟。

在現今時機中，集體農莊運動底基本環節，集體農莊運動底主要形式，即現時必須努力抓住的一環，就是農業勞動組合。

在農業勞動組合中，基本的生產資料，主要是穀物經濟方面的基本生產資料，即勞動，土地使

用權，機器和其他農具，耕畜以及經濟建築等是公共化了的。在農業勞動組合中，屋旁園地（小菜園，小菜園），住宅，某一部分產乳牲畜、小牲畜、家禽以及其他等等，是不公共化的。農業勞動組合現在是集體農莊運動的基本環節，因為它是解決穀物問題的最妥當形式。而穀物問題又是整個農業體系中的基本環節，因為不解決穀物問題，就不能解決牲畜（小牲畜和大牲畜）問題，也不能解決為工業供給主要原料的技術作物和專門作物問題。正因為如此，所以農業勞動組合現在是整個集體農莊運動體系中的基本環節。

最終規定並於今天公佈了的集體農莊模範章程，就是從這一點出發的*。

我們的黨工作人員和蘇維埃工作人員也應當從這一點出發，而把切實研究這個章程和澈底實行這個章程當作自己的任務之一。

這就是黨在現今時機的方針。

可以說黨這個方針是被確切實行，而沒有被人違背和曲解麼？可惜不可這樣說。大家知道，在蘇聯某些區域內，爭取集體農莊生存地位的鬭爭還遠沒有完結，農業勞動組合還沒有鞏固，但是有人已在企圖超出農業勞動組合範圍，而一下子跳到農業公社那裏去。農業勞動組合還沒有鞏固，但他們已在實行把住宅、小牲畜和家禽「公共化」，而這種「公共化」也就變成了紙上的官僚主義的命令，因為現在還沒有一種使公共化成為必要的條件。人們這樣胡作亂為，彷彿穀物問題在集體農莊中已經解決了，彷彿穀物問題已經是已往的階段，彷彿現今時機的基本任務不是解決穀物問題，而是解決養畜問題和養禽問題。試問誰需要這種把集體農莊各種形式混為一談的魯莽「工作」呢？

* 見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的真理報。

誰需要這種有害於事，跑得太前的愚蠢行動呢？當穀物問題還沒有解決，集體農莊農業勞動組合形式還沒有鞏固時，竟把住宅、一切產乳牲畜、一切小牲畜和家禽實行「公共化」，藉以欺侮集體農民，——這樣的「政策」祇能使我們可恨的敵人得到方便和益處，這難道不很明白麼？在這些急燥的「公共化主義者」當中，有一個人甚至於弄到了這樣的地步，竟向農業勞動組合下命令：「限定三天以內將每個農戶所有的家禽按隻計算出來」，並指定專門「指揮官」來指揮計算和監督事宜，「佔領農業勞動組合中的險要陣地」，「指揮社會主義戰團，不得離開崗位」，而——當然的事——把整個農業勞動組合一拳握住。這是什麼呢——是領導集體農莊的政策，還是瓦解集體農莊和破壞集體農莊信用的政策？至於那些以取消教堂神鐘來開始組織農業勞動組合的所謂「革命家」，那更不必說了。取消教堂神鐘，你看這是多麼革命啊！

爲什麼在我們的隊伍裏竟能發生這種「公共化主義」的魯莽兒戲，這種企圖跳過自身的可笑行爲，這種企圖迴避階級和階級鬭爭，而事實上却替我們的階級敵人帮忙的行動呢？這種行動只有當我們在集體農莊建設戰線上獲得「輕易」勝利和「意外」勝利的空氣中，才能發生。這種行動之所以能發生，只是因爲黨內一部份人懷有魯莽情緒，以爲「我們什麼都能做！」，「我們什麼都不在乎！」。這種行動之所以能發生，只是因爲我們有些同志被勝利衝昏了頭腦，暫時失去了明確的理智和清醒的眼光。

爲了糾正我們在集體農莊建設方面的工作路線，就必須消滅這種情緒。
黨底當前任務之一，就在這裏。

領導的藝術是一件嚴重事情。不可落在運動後面，因爲落在後面，就是脫離羣衆。可是，也不可跑得太前，因爲跑得太前，就是喪失自己與羣衆的聯繫。誰願意領導運動，同時又願意保持自己

與千百萬羣衆的聯繫，那他就應進行兩條戰線上的鬭爭：既反對落在後面的份子，又反對跑得太前的份子。

我們黨之所以強而有力，不可戰勝，就是因爲它領導着運動，同時又善於保持並增加它與千百萬工農羣衆的聯繫。

本文選自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一九四八年莫斯科版第四〇六至四一二頁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發表於真理報第六十期

給集體農莊工作同志們的答覆

大家從報上知道，斯大林所著的勝利衝昏頭腦一文，和中央所通過的反對歪曲我黨集體農莊運動路線的有名決議，在集體農莊運動實際工作者中引起了許許多多的回聲，所以，近來我接到了集體農莊工作同志們許多來信，要我答覆他們在信內所提出的問題。我本應當用私人通信方式回答每個來信同志。可是，這竟是辦不到的，因為來信同志大半沒有寫明自己的通信處（忘記註明通信處了）。而且信內所涉及的問題，又是對於我們全體同志都有莫大政治興趣的。此外，對於那些忘記註明自己通信處的同志，也當然不能不給以答覆。因此，我不得不把信內所有緊要的問題總合起來作一個公開的答覆，即在報紙上答覆。況且中央對此已有直接的決議，所以我也就更樂意這樣來作了。

第一·個·問·題·，在農民問題方面所犯錯誤底根本原因·是·什·麼·呢·？

答·覆·。是因爲對中農採取了不正確的態度。是因爲在與中農的經濟關係上採用了強力。是因爲忘記了與中農羣衆的經濟結合決不可倚靠於強力手段，而應當倚靠於與中農協定，倚靠於與中農聯盟。是因爲忘記了，現今集體農莊運動底基礎是工人階級與貧農聯合中農去反對一般資本主義份子，特別是反對富農。

當進攻富農的鬭爭還是與中農結成統一戰線來進行時，本來是一切都很順手的，可是，當某些同志因被成功所薰醉，而漸漸由進攻富農的路上滾到反對中農的路上時，當他們因貪求集體化高度百分數而向中農採用強制手段，即褫奪中農選舉權，並像剝奪富農那樣去剝奪中農財產時，於是進

攻路線就被曲解，與中農結成的統一戰線就被破壞，而富農當然也就獲得了企圖恢復他們勢力的可能。

他們忘記了：在進行反對階級敵人的鬭爭中，強力是必要的，是有益處的；可是，如果用這種強力來對待我們同盟者的中農，那就是不可容許，而且極端有害的了。

他們忘記了：在解決軍事性作戰任務時，輕騎突擊手段是必要的，是有益處的；可是，如果用這種輕騎突擊手段來解決集體農莊建設任務，而且是聯合中農來進行的建設任務，那就是藥不對症，而且極端有害的了。

這就是在農民問題上所犯錯誤底根本原因。

請看列寧論到與中農的經濟關係問題時所說的話吧：

『我們所應首先倚據的真理，就是這裏採用強力方法，其實是什麼也做不到的。這裏的經濟任務，是按完全另外一個方式擺着的。這裏並沒有什麼上層可以拆去，而把整個屋基和整個屋宇都保留起來，這裏並沒有如在城市裏所有過的那種上層，即資本家。在這裏採用強力，就等於葬送全部事業……誰想在中農經濟關係方面採用強力，那他就是在再愚昧不過的了』（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六八頁）。

其次：

『用強力對待中農，是極有害的。中農是人數衆多的，數千百萬人的社會階層。甚至在西歐方面，雖然那裏中農勢力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沒有這樣巨大，雖然該處技術與文化、都市生活與鐵路交通特別發達，雖然該處本來最易發生用強力對待中農的思想，——可是，無論什麼人，無論那一個最革命的社會主義者，也沒有主張過用強力手段對待中農』（見列寧全集，第

二十四卷，第一六七頁）。

看來是很明白了。

第二個問題。集體農莊運動中的主要錯誤是什麼呢？

答覆。這種錯誤，至少有三個。

第一，在建設集體農莊時違背了列寧的自願原則，違背了黨底基本指示以及農業勞動組合模範章程對於集體農莊建設自願原則問題的規定。

列寧主義教導說：必須按照自願原則，用說服農民相信公共集體農業優越於個體農業的方法來引導農民走上集體農業的軌道。列寧主義教導說：只有在農民面前具體表明，並用事實，用經驗證明了集體農莊確實優於個體農莊，集體農莊確實是比個體農莊有利些，集體農莊確實能使農民——貧農和中農——擺脫貧窮困苦狀況時，才可說服農民相信集體農莊底優越。列寧主義教導說：沒有這些條件，集體農莊便不能穩固。列寧主義教導說：企圖用強力來建立集體農莊，企圖用強迫手段來設立集體農莊，結果是只能壞事，使農民離開集體農莊運動的。

事實果然如此，當這個基本規則尚被遵照執行時，集體農莊運動是獲得節節勝利的。可是，有些爲成功所薰醉的同志，竟開始忽略這個規則，表現過分急躁，且因貪求集體化高度百分數而用強迫手段設立集體農莊，無怪乎這種「政策」底惡果很快就暴露出來了。一下子產生的集體農莊，也就一下子瓦解了，而一部份昨天還很信任集體農莊的農民，今天就開始離開集體農莊了。

這就是集體農莊運動中的第一個錯誤，而且是主要的錯誤。

請看列寧說明集體農莊建設自願原則的一段話吧：

「現在我們的任務，就是要過渡到公共耕種制，過渡到巨大公共農莊。可是，任何強迫手

段都是蘇維埃政權所不可採用的；任何法律都不強迫這樣辦。農業公社是按照自願原則成立的；過渡到公共耕種制只能是自願的，在這一方面，任何強迫手段，都是工農政府所不可採用的而且法律所不容許的。如果你們中間有人看見過這樣的強迫，那末你們就應當知道，這是濫用威權，這是違反法律，這是我們正在竭力糾正而且定會要糾正的現象」*（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四三頁）。

其次：

『掌握國家政權的工人階級，只有當它在事實上向農民表明了公共的，集體的，共耕制的，勞動組合制的耕種方法底優越時，只有當它用共耕制的，勞動組合制的經濟來幫助了農民時，它才能真正向農民證明自己正確有理，才能把數千百萬農民羣衆吸收到自己方面來，堅實可靠地真正吸收到自己方面來。因此，無論那一種促進共耕制，勞動組合制農業辦法底意義，都不可過分誇大。我國有千百萬分散於各個窮鄉僻壤的個體農戶；只有在實踐上根據農民切近的經驗來證明了必須而且可以過渡到共耕制的，勞動組合制的農業時，我們才可以說，在俄羅斯這樣幅員廣大的農民國家裏，我們在社會主義農業道路上已經有了嚴重的進步』*（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五七九至五八〇頁）。

最後，還要引證列寧著作中的下段話：

『蘇維埃政權代表們在鼓勵各種共耕社以及中農農業公社時，不應當容許在建立這種共耕社和農業公社方面採用任何強迫手段。只有那些由農民本身自由發起，而其益處已由農民本身

實際考驗過的聯合，才是有價值的。在這件事情上的過份的急燥，是有害的，因為這只能加強中農守舊惡新的成見。凡是擅敢實行強迫——不消說直接強迫，那怕是間接強迫——農民加入公社的蘇維埃政權代表，都應受到極嚴厲的處分，而被撤銷其在農村中担任的工作」*（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七四頁）。

看來是很明白了。

顯然用不着證明：黨是會十分嚴格實行這些列寧指示的。

第二，人們在處理集體農莊建設問題時，違背了必須注意蘇聯各個不同區域特殊條件的列寧原則。人們忘記了：在蘇聯有彼此極不相同的區域，各有彼此不同的經濟結構和文化水準，人們忘記了：這中間有先進的區域，有中等的區域，也有落後的區域。人們忘記了：集體農莊運動底速度和集體農莊建設底方法，在這些遠不一樣的區域裏，是不能彼此一樣的。

列寧說：

『如果我們簡單地按着死板格式來為俄國各地抄襲千篇一律的法令，如果那些在烏克蘭和頓河區工作的布爾塞維克共產黨員，蘇維埃工作人員，竟不分青黃皂白，籠籠統統把這些法令推行到其他各地去，那就錯誤了』……因為『我們無論如何也不應用千篇一律的死板格式來拘束自己，無論如何也不可一勞永逸地決定，說我們的經驗，俄國中部的經驗，可以完全搬到一切邊區去』（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二五至一二六頁）。

其次，列寧又說：

* 蕭雷點是我加的。

——斯大林註

『用死板方式把俄國中部，烏克蘭以及西伯利亞混爲一談，使其服從於一定的死板格式，那就是愚蠢萬分了』（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四三頁）。

最後，列寧責成高加索共產黨員說，他們

『要懂得他們的那種特殊情形，他們的共和國與俄羅斯共和國情形和條件有所不同的那種特殊情形；要懂得決不可機械地抄襲我們的策略，而要深思熟慮變更這一策略底形式，以求適合於特殊的具體條件』（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一九一頁）。

看來是很明白了。

我們黨中央根據列寧這些指示，便在它論集體化速度的決議中（見一九三〇年一月六日的真理報），按集體化速度的標準來把蘇聯各區分成三類：北高加索，窩爾加河中游，窩爾加河下游的集體化工作，大體上能於一九三一年春天完結；其他穀物區（如烏克蘭，中部黑土省，西伯利亞，烏拉爾，卡查赫斯坦等等）集體化工作，大體上能於一九三二年春天完結；其餘各區集體化工作完結期限，可以延到五年計劃時期末，即延到一九三三年。

看來是很明白了。

而事實上又是怎樣呢？事實上，我們某些同志因迷戀於集體農莊運動中的第一批成功，竟把列寧指示和中央決議都安然忘記了。莫斯科省因拚命貪求集體化虛張數字，竟責成自己的工作人員在一九三〇年春天結束集體化，雖然莫斯科省擁有不下三年的時間（到一九三二年底爲止）。中部黑土省因不願『落後他人』，竟責成自己的工作人員到一九三〇年上半年時就結束集體化，雖然中部黑土省擁有不下兩年的時間（到一九三一年底爲止）。而南高加索人和土耳其斯坦人爲拚命『趕上並超過』先進區域起見，竟決定在『最短期內』結束集體化，雖然南高加索和土耳其斯坦擁有整整四

年的時間（到一九三三年底爲止），那些對於集體農莊運動的準備程度較少的區域，既然採取這樣匆忙的集體化『速度』，以圖『超過』那些對於集體農莊運動較有準備的區域，當然就不能不加緊採用行政壓制手段，企圖用自己的行政主義怒火來填補集體農莊運動迅速發展速度所缺少的因素，其結果是大家皆知的。大家知道，在這些區域內結果是弄出了一團糟，後來只好由中央來干涉才解開這一團糟。

這就是集體農莊運動中的第二個錯誤。

第三，人們在處理集體農莊建設問題時，違背了列寧認爲決不可跳過運動尙未完結形式的原則，違背了列寧認爲決不可跳過羣衆發展程度，決不可命令羣衆運動，決不可脫離羣衆，而要和羣衆一塊前進，並推動羣衆前進，把他們引到我們的口號下面來，幫助他們根據本身經驗來深信我們口號正確的這個原則。

列寧說：

『當彼得格拉無產階級和彼得格拉防軍兵士奪取政權時，他們已經明白知道農村中的建設事業是會遇到巨大困難的；在這裏必須採取比較漸進的步驟；在這裏企圖用法令，用法律來施行共耕制，是極荒謬的；當時只有很少數覺悟農民能夠同意實行共耕制，而大多數農民却還沒有立意這樣辦。因此，我們當時僅僅採取了革命發展所絕對必要的辦法：無論如何都不跳過羣衆發展程度，而是要等待從這些羣衆本身經驗中，從他們本身鬭爭中長成前進的運動』（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五二頁）。

中央在它那個有名的論集體化速度的決議中（見一九三〇年一月六日的真理報），根據列寧這些指示，認為：（1）農業勞動組合現時是集體農莊運動底主要形式；（2）因此必須擬定一個關於農業勞動組合這種集體農莊運動主要形式的模範章程；（3）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決不可採取從上面『下令施行』集體農莊運動的辦法，決不可『把集體化當作兒戲』。

這就是說，我們現在所應抱定的方針不是建立農業公社，而是建立農業勞動組合，作為集體農莊建設底主要形式；這就是說，決不可超過農業勞動組合階段，逕直跳到農業公社，決不可用『下令施行』集體農莊的手段和『集體農莊的兒戲』去代替農民羣衆的集體農莊運動。

看來是很明白了。

而事實上又是怎樣呢？事實上，我們某些同志因迷戀於集體農莊運動中的第一批勝利，竟把列寧指示和中央決議都安然忘記了。這些同志不去組織成立農業勞動組合的羣衆運動，却把個體農民逕直『轉上』公社章程。他們不去鞏固運動底勞動組合形式，却用強迫手段把豬羊、家禽、自用乳牛和住房等等實行『公共化』。列寧主義者所不容有的這種急躁態度所引起的惡果，是大家都已知道的。穩固的農業公社，通常當然是沒有建立成功。可是許多農業勞動組合却輕易放棄了。固然，『好的』決議是剩下來了，可是，它們有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集體農莊運動中的第三個錯誤。

第三個問題。為什麼會發生這種錯誤呢，黨應當怎樣來糾正這種錯誤呢？

答覆。這種錯誤是因我們在集體農莊運動方面獲得迅速勝利而發生的。勝利有時能衝昏人們底頭腦，勝利往往產生出一種自誇自大的心理。執政黨中的人特別容易患這種毛病。特別是像我們黨這樣具有無限力量和威望的政黨中的人，更容易患這種毛病。列寧所痛斥的那種共產黨員誇大狂的

表現，在這裏是很有可能發生的。相信法令萬能、決議萬能和訓令萬能的心理，在這裏是很有可能發生的。黨底革命設施在我們廣闊國家某個角落裏變為黨個別代表底空洞官僚式命令手段的危險，在這裏是很實在的。我所指的，不僅是地方工作人員，而且是個別省委工作人員，而且是個別中央委員。列寧說：『共產黨員誇大狂，就是說有一些個身於共產黨內而還沒有被清洗出去的人，竟妄想用共產黨員名義來發號施令，便能解決他自己的一切任務』（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五〇至五一頁）。

集體農莊運動中的錯誤，歪曲我黨集體農莊建設事業路線的行動，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發生的。如果讓這種錯誤和行動繼續下去，如果不將其速即肅清無餘，那末它們就會有什麼危險呢？

其危險就在這種錯誤會使我們逕直去糟踏集體農莊運動，去與中農紛爭，使貧農隊伍紊亂，使我們的隊伍錯亂，使我們全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削弱下去，使富農恢復起來，簡而言之，這種錯誤是要我們離開鞏固與基本農民羣衆聯盟的道路，離開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而走上與這些羣衆決裂的道路。走上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

這種危險在二月下半月就已暴露出來了，當時我們有一部份同志迷戀於先前的勝利，竟與列寧主義路線背道而馳。黨中央注意到這個危險，所以立刻就來實行干涉，委託斯大林在專論集體農莊運動的文章中，給那些輕舉妄動的同志們一個警告。有些人以為勝利衝昏頭腦這篇論文是斯大林個人的創舉。這當然是廢話。我們黨中央之所以存在，並不是要讓什麼人在這種事情方面來表現個人的創舉。其實，這是中央所採取的一個仔細探查的辦法。而當錯誤底深度與範圍都已查明時，中央就立刻把它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五日通過的那個有名決議公佈出來，用它的全部威權來打擊這些錯誤。

要使瘋狂奔馳者懸崖勒馬，轉入正軌，自是困難的事情。可是，我們中央之所以叫做列寧黨底中央，就是因為它善於克服困難，即使困難比這更大，也是能克服的。而且它在大體上已把這種困難克服了。

在這種情形下，對於黨內整批隊伍，要止住自己的奔馳脚步，及時轉入正軌，及時改編自己的隊伍，自是困難的事情。可是，我們黨之所以叫做列寧黨，就是因為它具有充分敏捷性來及時克服這種困難。而且它在大體上已把這種困難克服了。

這裏的主要問題，就在於要有承認自己錯誤的勇氣，要有立刻消滅這種錯誤的本事。因沉醉於不久以前獲得的勝利而害怕承認自己的錯誤，害怕自我批評，不願迅速和堅決改正錯誤，——這就是主要的困難。只要一克服這個困難，只要一拋棄虛張聲勢的數目字和例行公事的官僚主義最高限度主張，只要轉而注意於執行集體農莊建設方面組織上經濟上的任務，就能使這種錯誤消滅無餘。毫無疑義，黨在大體上已把這個危險困難克服了。

列寧說：

『從前所有一切革命黨陷於滅亡，就是因為它們自傲，而看不見自己力量之所在，害怕說出自己的弱點。而我們是不會滅亡的，因為我們不怕說出自己的弱點，並且能學會克服弱點』*（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六〇至第二六一頁）。

列寧這一段話，是不可忘記的。

第四個問題、與歪曲黨路線的行動作鬭爭，這是不是後退，是不是退却呢？

答覆。當然不是！只有那些把繼續錯誤和繼續歪曲當作進攻，把改正錯誤當作退却的人，才能說這是退却。用加深錯誤和加緊歪曲來實行進攻，該是多麼好的『進攻』啊。

我們把農業勞動組合提出來作為現時集體農莊運動底基本形式，並規定了相當的模範章程作為集體農莊建設工作的指南。我們是不是在離開這件事情而退却呢？當然不是！

我們提出了鞏固工人階級和貧農方面與中農的生產結合，作為現時集體農莊運動底基礎。我們是不是在離開這件事情而退却呢？當然不是！

我們提出了消滅富農階級的口號，作為我們現時農村實際工作底主要口號。我們是不是在離開這件事情而退却呢？當然不是！

我們還在一九三〇年一月間就已規定蘇聯農業集體化的一定速度，並把蘇聯各區分成幾類，而為每一類規定了特別的速度。我們是不是在離開這件事情而退却呢？當然不是！

試問怎能說黨在『退却』呢？

我們是想使那些犯了錯誤和歪曲了黨路線的人從他們的錯誤中退出來，我們是想使那些魯莽從事者從他們的魯莽思想中退到列寧主義立場上來。我們之所以想這樣，是因為只有如此，才可以繼續向我們的階級敵人進行真正的進攻。這是不是說，我們這樣做就是後退呢？當然不是！這只是說，我們想實行正確的進攻，而不肯把進攻作為魯莽的兒戲。

只有那些糊塗人和『左傾』過火份子才能把黨底這個立場看作退却，這難道不很明白麼？妄談什麼退却的人至少是不懂得兩件事情。

第一，他們不知道進攻法則。他們不懂得：實行進攻而不鞏固既得的陣地，就是實行必遭失敗的進攻。譬如在軍事方面，怎樣的進攻才可以成為勝利的進攻呢？為要使進攻成為勝利的，那末進

攻的軍隊就不可一味前進，而是還要努力鞏固既得的陣地，隨作戰環境變遷而重新配置自己的力量，提上後方機關，調上後備軍。爲什麼要這樣辦呢？是爲了防範意外，消滅任何一次進攻所不能絕對避免的個別失陷，並以此而準備完全消滅敵人。一九二〇年波蘭軍隊底錯誤，如果單就軍事方面來說，就在於他們忽視了這個規則。也就是因爲這個原故，所以當他們接連不斷地打到基輔時，隨後就不得不接連不斷地退到華沙。一九二〇年蘇維埃軍隊底錯誤，如果也單就軍事方面來說，就在於他們在進攻華沙的過程中踏了波蘭軍隊底覆轍。

關於階級鬪爭戰線上的進攻法則，也要這樣說。不鞏固既得的陣地，不重新配置自己的力量，不用後備力量保證前線，不提上後方機關等等，就不能實行順利進攻，以求消滅階級敵人。

全部問題就在於魯莽從事者不懂得進攻法則。全部問題就在於黨是懂得並實行着這些法則的。第二，他們不懂得進攻底階級本質。他們只知高喊進攻。究竟是向那個階級進攻，聯合那個階級去進攻呢？我們是聯合中農向農村資本主義份子實行進攻，因爲我們只有這樣去進攻，才能獲得勝利。可是，如果這個進攻竟因黨內個別隊伍醉心於個別勝利而開始離開正軌，並轉移自己火力去反對我們的同盟者，反對中農，那又怎樣辦呢？難道我們所需要的是隨便一種進攻，而不是和一定階級聯盟去打擊一定階級的進攻麼？須知吉訶德先生也是以爲他衝擊磨坊就是進攻敵人哩。可是，大家知道，他在這種所謂進攻中，是把自己弄得頭破血流了的。

我們的『左傾』過火份子，大概是不肯讓吉訶德先生專美於前哩。

第五個問題。什麼危險在我們這裏是主要危險？是右傾危險，還是『左傾』危險呢？

答覆。右傾危險在我們這裏是主要危險。右傾危險在我們這裏會是而且現在還是主要危險。這個說法，是不是與中央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五日決議上認爲『左傾』過火份子底錯誤和歪曲行

爲是目前集體農莊運動中主要障礙的那個著名提綱相抵觸呢？不，絲毫也不相抵觸。因爲『左傾』過火份子，在集體農莊運動方面的錯誤，造成使右傾在黨內加強和鞏固起來的順利環境。爲什麼呢？因爲這些錯誤把黨底路線歪曲起來，結果就會便利着破壞黨威信的企圖，就會便利着右傾份子進行反對黨領導的鬭爭。破壞黨領導底威信，也就是右傾份子進行反黨鬭爭的基本條件。『左傾』過火份子，他們的錯誤和歪曲黨路線的行動，就是爲右傾份子造成這樣的條件。因此，要戰勝右傾機會主義，就須克服『左傾』機會主義者底錯誤。『左傾』過火份子在客觀上是右傾份子底同盟者。

『左傾』機會主義與右傾主義間的特殊聯繫，就是如此。

正因爲有這種聯繫，所以就有一些『左傾』份子時常說要與右傾份子結成同盟的事實。也正因爲有這種聯繫，所以就有一種特殊現象，就是有一部份『左傾』份子，昨天還『實行』一味進攻，企圖在兩三星期內就把蘇聯全國集體化，而今天却消極起來，袖手旁觀，把鬭爭地盤安然讓給右傾份子，因而實行真正在富農面前退却（沒有括弧的退却！）的路線。

目前時局底特點，就在於進行反『左傾』過火份子錯誤的鬭爭，是進行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順利鬭爭底條件和特殊形式。

第六個問題。應怎樣估計一部份農民退出集體農莊的事實呢？

答覆。一部份農民退出集體農莊的事實，就是說明最近在我們這裏產生了一些不堅固的集體農莊，這些集體農莊現時正在清出不穩定的份子。這就是說，有名無實的集體農莊將消失，而堅固的集體農莊一定會繼續保存並日益強固。我認爲這是完全正常的現象。有些同志一看見這點，就悲傷不已，張惶萬分，拚命抓住那種誇大的百分數。而另外一部份人則幸災樂禍，預言集體農莊運動『失敗』。這兩種人都是非常錯誤的。這兩種人都遠不是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瞭解集體農莊運動實

質的。

退出集體農莊的，首先是那些所謂紙上掛名者。這甚至不能說是退出，而不過是暴露空架子而已。我們需要紙上掛名者麼？當然不需要。我認爲北高加索人和烏克蘭人解散紙上的集體農莊而組織真正實在，真正穩固的集體農莊，是做得完全對的。這樣做法只是使集體農莊運動獲益不淺。

其次，退出集體農莊的是那些異己份子，直接敵視我們事業的份子。很明顯的，把這種份子驅除得愈快，集體農莊運動也就會獲益愈多。

末了，退出集體農莊的是那些動搖份子，他們既不能叫作異己份子，也不能叫作紙上掛名者。這是我們今天還沒有說服他們相信集體農莊專業正確，但我們明天就一定會說服他們的一些農民。這種農民退出集體農莊，是集體農莊運動所受到的一個嚴重損失，雖然這個損失不過是暫時的。因此，爭取集體農莊中的動搖份子，就是現時集體農莊運動最迫切的任務之一。

由此可見，一部份農民退出集體農莊，並不僅是一種壞現象。由此可見，這種退出，既然清出集體農莊中的紙上掛名者和直接異己份子，所以它是使集體農莊趨於健全鞏固的一種有益過程。

一個月以前，有人以爲穀物區中的集體化已達到百分之六十以上。現在已很明白，如果拿真正的多少穩定的集體農莊來說，那末這個數目字顯然是過甚其詞。如果在一部份農民退出集體農莊以後，穀物區內集體化百分數能保留到百分之四十，——而這是一定可以做到的，——也就是目前集體農莊運動中的極大成績了。我只拿穀物區內的平均數來說，雖然我很知道我們有個別的全盤集體化區，其集體化百分數已達到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穀物區內集體化達到百分之四十，——這就是說，到一九三〇年春天，我們就把原定五年集體化計劃超過完成了一倍。

誰敢否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發展方面這個歷史成績底決定意義呢？

第七個問題。動搖的農民退出集體農莊，是不是作得正確呢？

答覆。當然是作得不正確的。他們退出集體農莊，是違反了他們本身利益的，因為只有集體農莊才能使農民能擺脫貧困黑暗的狀況。他們退出集體農莊，就是把自己放在較壞的地位，因為他們使自己得不到蘇維埃政權所給予集體農莊的優待和便利。集體農莊中的錯誤和歪曲行為，決不能成為退出集體農莊的理由。必須留在集體農莊內來通力合作地糾正錯誤。何況蘇維埃政權將用全力反對這些錯誤，所以糾正這些錯誤是容易做到的。

列寧說：

『商品生產下的小經濟制度，決不能使人類免除羣衆生活貧困與遭受壓迫的狀況』（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一二二頁）。

列寧說：

『靠小農經濟是擺脫不了貧困境遇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五四〇頁）。

列寧說：

『如果我們仍舊依靠小農莊來生活，那怕是以自由土地上的自由公民資格來生活，也是不免要滅亡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四一七頁）。

列寧說：

『只有採用共同的，勞動組合制的，共耕制的勞動，才可逃出帝國主義戰爭把我們逼進去了的那種絕境』（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五三七頁）。

列寧說：

『必須過渡到巨大模範農莊中的共耕制』，因為『否則不能擺脫俄國現在所處的那種經濟

破壞的狀況，那種簡直是絕望的狀況』（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四一八頁）。所有這些是說明什麼呢？

這就是說明集體農莊是使農民能擺脫貧困黑暗境遇的唯一工具。

很明顯的，農民退出集體農莊，是作得不正確的。

列寧說：

『你們大家當然都從蘇維埃政權底全部工作中知道，我們非常重視農業公社，勞動組合以及一切力求把細小個體農業轉變為公共耕作農業或勞動組合農業，並逐漸促進這個轉變過程的組織』（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五七九頁）。

列寧說：

『蘇維埃政權把農業公社和共耕社放到了第一位，而給了它們直接優先權』（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九九頁）。

這是說明什麼呢？

這就是說明蘇維埃政權將優待集體農莊，給它們優先權，而這是個體農戶享受不到的。這就是說明蘇維埃政權無論在分發土地方面，無論在供給機器、拖拉機和種子等方面，無論在減輕賦稅方面，無論在發給貸金方面，都是要優待集體農莊的。

爲什麼蘇維埃政權優待集體農莊，給它們優先權呢？

因爲集體農莊是使農民能免除貧困境遇的唯一工具。

因爲用優待辦法幫助集體農莊是幫助貧農中農的最切實的方式。

幾天以前，蘇維埃政權已決定把集體農莊內一切公有的工作牲畜（馬匹和牯牛等等），以及集體農莊公共所有或各莊員個人所有的乳牛，豬，羊，家禽等等，概行免稅兩年。

此外，蘇維埃政權已決定把集體農莊莊員所欠國家貸金，展期至年底償付，並把加入了集體農莊的農民在四月一日以前被判處的一切罰款和法庭處分概行取消。

最後，蘇維埃政權已決定在本年度內必須借給集體農莊莊員以五萬萬盧布貸金。

這種優待辦法是爲了幫助集體農民。這種優待辦法是爲了幫助用中流砥柱精神擋住了退潮，在反對集體農莊敵人鬪爭中受到了鍛鍊，保住了集體農莊並緊緊撐持着集體農莊運動偉大旗幟的那些集體農民。這種優待辦法是爲了幫助現時是我們集體農莊基本中堅，將鞏固並澈底形成我們集體農莊，並把千百萬農民爭取到社會主義方面來的那些集體貧農和中農。這種優待辦法是爲了幫助現時是集體農莊基本幹部，完全值得稱爲集體農莊運動英雄的那些集體農民。

退出了集體農莊的農民是得不到這些優待的。

農民退出集體農莊，是作錯了，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他們只有回到集體農莊以後，才能享受這些優待，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第八個問題。怎樣處置農業公社呢，是不是應當把它們解散呢？

答覆。不，並不應當把它們解散，而且用不着解散。我所指的是真正的農業公社，而不是紙

上的農業公社。在蘇聯穀物區裏，有一些值得獎勵贊助的很好的農業公社。我所指的是舊有的農業公社，這些農業公社已經過了多年考驗，受過了鬪爭鍛鍊，早已完全證實它們有存在的資格。至於不久以前成立的那些新的農業公社，那就一定要它們是按自願原則組織起來，並得到農民羣衆積

極贊助而並不強迫實行日常生活公共化，才能維持下去。

成立和主持農業公社，是一件複雜而困難的事情。一定要有經驗豐富的幹部和久經鍛鍊的領導者，才可保證巨大而穩定的農業公社存在和發展下去。如果匆忙從事，一下子由農業勞動組合章程過渡到農業公社章程，那就只能使農民離開集體農莊運動。所以，我們對於這件事情應當特別鄭重處置，絲毫不可急躁。農業勞動組合是比較容易作到的事情，是廣大農民羣衆比較容易懂得的。因此，農業勞動組合是現時集體農莊運動最流行的形式。只有隨着農業勞動組合日益鞏固和穩固，才能造成使農民羣衆趨向於農業公社的基礎。因此，農業公社這個集體農莊運動最高形式，只有在將來才能成爲集體農莊運動底主要環節。

第九個問題。怎樣處置富農呢？

答覆。我們以上所說的，都是關於中農的話。中農是工人階級底同盟者，因此我們對中農的政策應當是親善的政策。富農却是另一回事了。富農是蘇維埃政權底敵人。我們是沒有與富農講和平，而且也不能與他們講和平的。我們對富農的政策，是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這當然不是說我們一下子就能够消滅富農階級。但這是說我們將力謀包圍並消滅富農階級。

請看列寧關於富農怎樣說：

「富農是最殘忍，最橫暴，最野蠻的剝削者，他們在其他各國歷史上屢次恢復過地主、皇帝、神父和資本家底政權。富農人數比地主和資本家多些。但富農在人民中間到底還是佔少數：這些吸血鬼在戰時利用民衆生活困苦而發了大財，他們用提高糧食及其他農產物價格的手段刮得了成千累萬的金錢。這些蜘蛛專靠吸取戰時破產農民底脂膏，專靠吸取饑餓工人底脂膏養肥了。這些吸血鬼吮吸了勞動羣衆底血液，而且城市和工廠裏的工人越是饑餓，他們也就越

加發財。這些吸血鬼過去和現在都把地主土地抓到自己手裏，再三盤剝貧農」（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〇六至二〇七頁）。

當我們還在實行限制這班吸血鬼和蜘蛛們剝削趨向的政策時，我們是曾容忍過他們的。其所以容忍了他們，是因為我們當時沒有什麼可以用來代替富農經濟，代替富農生產。現在我們已有可能用我們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經濟來代替富農經濟，而且綽綽有餘了。現在已用不着再容忍這班蜘蛛和吸血鬼了，如果再容忍這班放火焚燒集體農莊、刺殺集體農莊活動家並企圖搗亂播種運動的蜘蛛和吸血鬼，那就是違反工農利益了。

因此，我們應當用我們布爾塞維克所固有的全部堅毅精神和澈底精神，來實行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

第十個問題。集體農莊底最近實際任務是什麼呢？

答覆。集體農莊底最近實際任務，就是要為播種而奮鬥，為儘量擴大播種面積而奮鬥，為正確組織播種事宜而奮鬥。

現在，集體農莊其他一切任務，都須適應於播種任務。

現在，集體農莊中其他一切工作，都須服從於組織播種工作。

這就是說，集體農莊及其非黨員積極份子究竟如何穩固，集體農莊領導者及其布爾塞維克中堅幹部究竟有多大才幹，將不是按響亮決議和堂皇祝詞，而是按播種事業是否組織得當的具體事實來檢查。

可是，要光榮實現這個實際任務，就要使集體農莊工作人員轉而注意集體農莊建設事業底經濟問題，集體農莊內部建設問題。

直到最近的時候，集體農莊工作人員總是專心注意於貪求集體化高度百分數，而且不願意看見真正集體化與紙上集體化間的區別。現在，這種貪求數字的心理是應該拋棄了。現在，集體農莊工作人員應當專心注意於鞏固集體農莊，在組織上完善集體農莊，在集體農莊裏面組織切實工作。

直到最近的時候，集體農莊工作人員始終是專心注意於組織巨大集體農莊，組織所謂『巨型農場』，而這些『巨型農場』，往往變成在鄉村裏沒有什麼經濟根基的笨重的紙上機關。於是，外表工作就往往代替了切實工作。現在，這種傾心於外表的心理是應該拋棄了。現在，工作人員應當專心於鄉村集體農莊組織方面和經濟方面的工作。當這個工作獲到應有成績時，『巨型農場』就會自然而然地出現的。

直到最近的時候，人們始終是很少注意吸收中農來參加集體農莊領導工作。可是在中農中間有許多出色的主管人材，他們能够成爲集體農莊建設方面的很好的經濟工作者。現在，我們工作中的這一個缺點是應該剷除了。現在的任務就是要吸收中農優秀份子來擔任集體農莊領導工作，讓他們在這個事業中發揮他們的才能。

直到最近的時候，人們始終是沒有充分注意農婦中的工作。過去這一時期的事實表明農婦中的工作是我們工作中最弱的部份。現在，這個缺點是應該堅決澈底剷除的了。

直到最近的時候，某些區裏的共產黨員始終是認爲他們能够單獨解決集體農莊建設事業上的一切任務。他們由這一觀點出發，所以也就沒有充分注意吸收非黨員份子來參加集體農莊裏的負責工作，提拔非黨員份子來參加集體農莊裏的領導工作，在集體農莊裏組織廣大非黨員積極份子。我們黨底歷史已經證明，而集體農莊建設事業過去這一時期的事實，又再度表明這種立場是根本不正確的。共產黨員如果閉關自守而與非黨羣衆隔絕，便會葬送整個事業。共產黨人在爲社會主義鬥爭中

獲得了勝利，榮光遍體，而共產主義底敵人却已被打得落花流水，其原因之一，也就是因為共產黨善於吸收非黨員羣衆中的優秀份子來參加工作，因為他們善於在廣大非黨員羣衆中間吸取力量，因為他們善於把廣大非黨員積極份子團結在自己黨底周圍。現在，我們在非黨員羣衆中間工作上的這個缺點，是應該堅決澈底剷除的了。

糾正我們工作中的這些缺點，根本剷除這些缺點，也就是把集體農莊底經濟工作引上軌道。

總之：

- (1) 正確組織播種工作，就是現在的任務。
- (2) 把注意力集中於集體農莊運動底經濟問題，就是為解決這個任務所必要的手段。

本文選自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一九四八年莫斯科版第四一三至四三五頁

一九三〇年四月三日發表於真理報第九十二期

社會主義建設不斷地發展和蘇聯底內部情形

——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一日——

現在來講蘇聯底內部情形。

在各資本主義國家裏，現在流行着經濟的恐慌和不斷增加的失業，而我們國家的內部情形却好相反，是國民經濟不斷興旺和失業不斷地減少。大工業發展起來，並且加快了發展的速度。鞏固了重工業。社會主義部份的工業已經大大的前進了。在農業中發展了新的力量，就是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倘若兩年前我們有過五穀生產的危機，在收買糧食方面主要的全靠個人經濟，那末，到了現在，重心已經移到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上去了，而五穀的危機大體上可以說是解決了。農民中間的基本羣衆，澈底的轉到集體農場方面來了。富農的反抗已被打退。蘇聯的國內地位更其堅固了。現在蘇聯國內的一般情形，就是這樣。

我們來考察一下具體的統計。

(一) 整個國民經濟底發展

一，如果一九二六——二七年裏，即黨的第十五次大會前，全部鄉村經濟連木材業、漁業等等

都在內，它的總生產，照戰前盧布計算總共有一百二十三萬萬七千萬盧布，即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零六點六；那末下一年，即一九二七——二八年，就是百分之一百零七點二；一九二八——二九年，是百分之一百零九點一，到了今年，一九二九——三〇年，根據鄉村經濟發展的情形來算，將至少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十三到百分之一百十四。

這裏我們說到整個鄉村經濟不斷的增長，雖然它的速度是比較慢些。

一九二六——二七年，即黨的第十五次大會以前，全部工業大小都在內，連麵粉工業也在內，總的生產品，照戰前盧布計算有八十六萬萬四千一百萬盧布，就是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零二點五；第二年，一九二七——二八年，是百分之一百二十二，一九二八——二九年，是百分之一百四十二點五；到了今年，一九二九——三〇年，根據工業發展的情形來說，至少將要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八十。

這裏我們見到整個工業空前的發展。

二，一九二六——二七年裏，即黨的第十五次大會前，我們所有鐵路上的貨物轉運量是八百一十萬萬七千萬啓羅米突噸，即戰前的百分之一百二十七；到了第二年，一九二七——二八年，是百分之一百三十四點二；一九二八——二九年，是百分之一百六十二點四；今年，一九二九——三〇年，根據所有的統計，將要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九十三以上。至於說到新鐵路的建築，那末，在報告所包括的時間內，即從一九二七——二八的年度開始，鐵路從七萬六千啓羅米突增加到了八萬啓羅米突，這就是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三十六點七。

三，倘若把一九二六——二七年裏國內商品買賣的流轉，當做一百（三百一十萬萬盧布），那末，一九二七——二八年裏，流轉的數量就增到了百分之一百二十四點六；一九二八——二九年

裏，增到了百分之一百六十點四；到了今年，根據所有的統計，流轉的數量就將等於百分之二百零二，這就是說，等於一九二六——二七年的兩倍。

四，倘若把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我們全部信用借貸機關的總賬目算做一百（九十一萬萬七千三百萬盧布），那末，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就增加到百分之一百四十一；到一九二九年十月一日就增加到百分之二百零一點一，即等於一九二七年的兩倍。

五，倘若把一九二六——二七年裏的國家總預算算做一百（六十三萬萬七千一百萬盧布），那末，一九二七——二八年，國家預算增加到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五點五；一九二八——二九年裏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四十六點七；到了一九二九——三〇年，就增到了百分之二百零四點四，即等於一九二六——二七年度的兩倍（一百二十六萬萬零五百萬）。

六，倘若一九二六——二七年我們對外貿易的流轉量（進出口）是等於戰前百分之四十七點九；那末，一九二七——二八年，我們見到對外貿易的流轉量增到了百分之五十六點八；一九二八——二九年裏增到了百分之六十七點九；到了一九二九——三〇年，根據所有的統計，將要至少等於戰前百分之八十。

七，總計在報告所包括的時期中全部國民收入增加的情形（按一九二六——二七年的不變價格計算），根據國家計劃局的統計，是：一九二六——二七年的國民收入等於二百三十一萬萬二千七百萬盧布；一九二七——二八年等於二百五十三萬萬九千六百萬盧布，增加了百分之九點八；一九二八——二九年等於二百八十五萬萬九千六百萬盧布，增加了百分之十二點六；一九二九——三〇年，根據所有的統計，國民收入應該至少等於三百四十萬萬盧布，那就是一年中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年來平均每年的增加超過百分之十五以上。

倘若我們注意一下美、英、德等國的國民收入，平均每年祇增加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八，那末，應該承認，蘇聯國民收入增加的速度真正要算是破天荒的了。

(二) 工業化的成績

我們國民經濟的發展不是盲目的，而是朝着一定的方向的，就是正朝着工業化方面的，是在增加工業在全部國民經濟系統中的比重的目標之下進行的，是在把我們國家從農業國變成工業國的旗幟之下發展的。

一，從工業在全部國民經濟的總生產量中的比重來說，全部工業和全部鄉村經濟之間互相關係的變動，在報告所包括的時期中有如下的情形：戰前，工業在全部國民經濟總生產量中所佔的部份是百分之四十二點一，鄉村經濟所佔的部份是百分之五十七點九；一九二七——二八年工業所佔的部份等於百分之四十五點二，鄉村經濟佔百分之五十四點八；一九二八——二九年工業佔百分之四十八點七，鄉村經濟佔百分之五十一點三；一九二九——三〇年，根據一切的統計，工業應該佔百分之五十三以上，鄉村經濟應該佔百分之四十七。

這就是說，工業的比重，已經開始超過鄉村經濟的比重了，我們現在已經處在變農業國為工業國的前夜。(鼓掌聲)

二，從工業在國民經濟的商品生產中的比重方面說來，工業的比重更要大。倘若在一九二六——二七年，工業的商品生產，在國民經濟商品生產的總數內所佔的部份，是等於百分之六十八點八，鄉村經濟所佔的部份是百分之三十一點二；那末，一九二七——二八年裏，工業就佔百分之七十一點二。鄉村經濟佔百分之二十八點八；一九二八——二九年，工業佔百分之七十二點四，鄉

村經濟佔百分之二十七點六，到了一九二九——三〇年，根據一切的統計，工業將要佔百分之七十六，鄉村經濟佔百分之二十四。

在鄉村經濟這種不利的條件中，其中有一點是因爲鄉村經濟的小農性和商品生產量少。由此很明顯了，用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的方法去鞏固鄉村經濟，去增加它的商品，這種情形必有相當的變更。

三，但是，一般工業的發展，還不就表明工業化速度的全景。爲要見到全景，就必須再確定輕重工業間的關係。所以，生產工具的生產（重工業）在全部工業生產中所佔的比重不斷增加，應該算是工業化發展的最明顯的表徵。倘若一九二七——二八年裏生產工具的生產在全部工業中所佔的部份是百分之二十七點二，大衆消費品的生產佔百分之七十二點八；那末，在一九二八年——二九年裏，生產工具的生產就要佔百分之二十八點七，消費品佔百分之七十一點三；一九二九——三〇年，生產工具的生產，根據一切統計要佔百分之三十二點七，消費品佔百分之六十七點三。

倘若不拿全部工業來看祇拿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所計劃的、一切基本生產部門的工業來看，那末，生產工具的生產和大衆消費品的生產之間的關係，就要更好些：一九二七——二八年，生產工具的生產佔百分之四十二點七，消費品佔百分之五十七點三；一九二八——二九年，生產工具佔百分之四十四點六，消費品佔百分之五十五點四；一九二九——三〇年，根據一切的統計，生產工具生產將要佔百分之四十八以上，而消費品的生產佔百分之五十二。

我們國民經濟的發展，是在工業化的表徵之下、是在鞏固和發展本國重工業的表徵之下進行的。

這就是說，我們已經提高了，並繼續發展着我們經濟獨立的基礎——我們的重工業。

(三) 社會主義工業底指導地位和它發展的速度

我們國民經濟的發展，是在工業化的表誌之下進行的。但並不是隨便什麼工業化我們都需要。我們所需要的工業化，是要它能保證社會主義式的工業不斷地超過小商品式的工業，尤其是資本主義式的工業。我們工業化的特點，就在它是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它能够保證社會化部份的工業戰勝私人經濟式的部份，戰勝小商品的和資本主義的部份。

下面就是關於各部份經濟中的投資和總出產量的幾個總計。

一，倘若拿各部份工業中投資數量的增加來看，那末，我們就可以見到下列的情形。社會化部份：一九二六——二七年裏爲十二萬萬七千萬盧布；一九二七——二八年爲十六萬萬一千四百萬盧布，一九二八——二九年爲二十萬萬四千六百萬盧布；一九二九——三〇年爲四十二萬萬七千五百萬盧布。私人經濟和資本主義部份：一九二六——二七年爲六千三百萬盧布；一九二七——二八年爲六千四百萬盧布；一九二八——二九年爲五千六百萬盧布，一九二九——三〇年爲五千一百萬盧布。

第一，這就是說，社會化部份工業中投資的數量增到了三倍以上（百分之三百三十五）。

第二，這就是說，私人經濟和資本主義部份的投資，在這個時期中減少了五分之一（等於百分之八十一）。

私人經濟和資本主義部份，是依靠着舊資本過活，並在走向滅亡。

二，倘若按部份來看工業的總出產，那末，我們見到下列的情形。社會化的部份：一九二六——二七年是一百十九萬萬九千九百萬盧布；一九二七——二八年是一百五十三萬萬八千九百萬

盧布；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是一百八十九萬零三百萬盧布；一九二九——三〇年是二百四十七萬萬四千萬盧布。私人經濟和資本主義部份：一九二六——二七年是四十萬萬四千三百萬盧布；一九二七——二八年是三十七萬萬零四百萬盧布；一九二八——二九年是三十三萬萬八千九百萬盧布；一九二九——三〇年是三十三萬萬一千萬盧布。

第一，這就是說，社會化部份工業的總生產，在三年內增到了兩倍以上（百分之二百零六又二）。

第二，這就是說，私人經濟和資本主義部份工業的總出產，在同一時期減少了五分之一（百分之十八點九）。

倘若不拿全部工業的生產來看，祇拿大工業來看，並且把它分兩部分來看，那末，我們就見到社會主義部份和私人經濟部份間的關係有以下的情形。社會化部份在本國大工業生產中所佔的比重：一九二六——二七年是百分之九十七點七；一九二七——二八年是百分之九十八點六；一九二八——二九是百分之九十九點一；一九二九——三〇年是百分之九十九點三。私人經濟在本國大工業生產中的比重：一九二六——二七年是百分之二點三；一九二七——二八年是百分之一點四；一九二八——二九年是百分之九；一九二九——三〇年是百分之七。

你們可以見到，資本主義的份子在大工業中，已經走向末路去了。

很明顯的，『誰勝誰』的問題，工業中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份子，還是他們戰勝社會主義的問題，基本上已經是向着社會主義式的工業勝利方面解決了。澈底地解決了，再不會變更了。（鼓掌聲）

三，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所計劃的國有工業，在報告所包括的時期中的發展速度的總計更可注

意。倘若把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所計劃的社會主義工業，在一九二六——二七年時候的總生產算是一百，那末，一九二七——二八年，這種工業的總出產，就增到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七點四；一九二八——二九年增到了百分之一百五十八點六；而到了一九二九——三〇年，它將增加到百分之二百零九點八。

這就是說，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計劃下的社會主義工業，包含一切主要工業部門和全部重工業，在這三年之中，已經達到了戰前的兩倍以上。

不得不承認，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底大工業的發展有過這樣快的速度。

這種情形就使我們有根據說到五年計劃四年完成。

四，有些同志對於『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口號抱着懷疑的態度。不久以前，有一部份同志，把第五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所通過的五年計劃當作幻想看待，我且不講資產階級的著作家，他們一聽見『五年計劃』四個字，就驚訝得目瞪口呆。倘若我們從實行五年計劃第一二兩年的情形來說，事實是怎樣呢？審查執行是高度的五年計劃的結果，告訴我們什麼呢？這不但證明我們能够把五年計劃四年來完成；而且這還證明，在許多工業部門中，我們能够三年完成甚至二年半完成。在機會主義營壘裏的懷疑論者看來有這好像是不會的。但這是事實，要爭論這點，就簡直是愚蠢，可笑。

你們自己來評判吧。

照五年計劃，煤油業在一九三二——三三年，應該出產九萬萬七千七百萬盧布的生產品。而實際上，一九二九——三〇年已經能出產八萬萬零九百萬盧布的生產品了，即等於五年計劃內預定在一九三二——三三年出產的百分之八十三。所以，我們大概在兩年半以內，就能完成煤油工業的五

年計劃。

按照五年計劃，泥炭工業到一九三二——三三年應該出產一萬萬二千二百萬盧布的生產品。實際上，在一九二九——三〇年，它已經能出產一萬萬一千五百萬以上盧布的出產品了，即等於五年計劃所預定在一九三二——三三年所出產的百分之九十六。所以，我們在兩年半內（倘若不早些的話）完成泥炭工業的五年計劃。

照五年計劃，一九三二——三三年全部機器製造工業要出產二十萬萬五千八百萬盧布的生產品。但實際上，在一九二九——三〇年裏它已經能出產十四萬萬五千八百萬盧布的生產品了，即等於五年計劃預定在一九三二——三三年出產的百分之七十。所以，我們在二年半或三年內就完成全部機器製造業的五年計劃。

照五年計劃，農業機器製造業在一九三二——三三年裏應該出產六萬萬一千萬盧布的產品。但實際上，在一九二九——三〇年裏，已經能出產四萬萬盧布的產品了，即五年計劃所預定在一九三二——三三年應該出產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所以，我們在三年內（倘若不早些的話）就能完成農業機器製造業的五年計劃。

照五年計劃，電機工業，到一九三二——三三年時，應該出產八萬萬九千六百萬盧布的產品。實際上，在一九二九——三〇年裏，就已經出產五萬萬零三百萬盧布的產品了，即五年計劃預定在一九三二——三三年出產的百分之五十六以上。所以，我們在三年以內就完成電氣工業的五年計劃。

我們社會主義工業發展的空前速度，就是這樣。

我們加速的前進，在技術經濟方面趕上資本主義的先進國家。

五，這當然並不是說，在生產的規模上說來我們已經趕上了他們，或我們的工業已經趕上了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工業發展的程度了。不，還差得遠哩，不應該把工業發展的速度和工業發展的程度混爲一談，許多人把它們混淆起來，以爲倘若我們達到了工業發展的空前速度，因此，我們就已經達到了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工業發達的程度了。但是，這是根本不對的。

譬如，舉電力生產做例子，那裏的速度是很快。我們電力的生產，從一九二四——一九二九年，差不多增加了百分之六百；而美國在同時期內，電力的生產，祇增加到百分之一百八十一；加拿大祇增加到百分之二百一十八；德國祇增加到百分之二百四十一；意大利祇增加到百分之二百二十二。你們看，這裏我們的速度是向來沒有過的，它超過了一切其他國家的速度。但是，倘若考察一下這些國家中電力生產發展的程度，例如一九二九年的程度，把它和蘇聯的發展程度比較一下，那末，蘇聯的情形是很不可以安心的。蘇聯電力生產的發展雖然有空前的速度，可是在一九二九年，祇有六十四萬萬六千五百萬啓羅瓦特小時；而美國却有一千二百六十萬萬啓羅瓦特小時；加拿大有一百七十六萬萬二千八百萬啓羅瓦特小時；德國有三百三十萬萬啓羅瓦特小時；意大利有一百零八萬萬五千萬啓羅瓦特小時。

你們看，差別是很大的。

結果就是，照發展的程度來說，我們還落在這些國家後面。

或者學生鐵的生產做例子。倘若把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的生鐵出產當做一百（二百九十萬噸），那末，三年來，即從一九二七——二八年度到一九二九——三〇年度，生鐵的生產差不多增加到兩倍，增加到百分之一百九十（五百五十萬噸）。你們看，發展的速度是很高的。但是，倘若從我們生鐵的生產程度來看，把蘇聯生鐵生產和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生產的規模比較一下，那末，情

形就不十分可以安心了。開始先說到，我們到今年（一九二九——三〇年度）才趕上和超過戰前生鐵生產的程度。就這一點，就使我們得出一個確定的結論，就是說，倘若不加速五金發展的速度，我們就會使全部工業生產的命運發生危機。至於說到我們的和西方的生鐵生產的程度，那末，我們見到下列的情形：一九二九年美國生鐵的出產，等於四千二百三十萬噸；德國等於一千三百四十萬噸；法國等於一千零四十五萬噸；而蘇聯生鐵的出產在一九二九——三〇年裏，總共祇有五百五十萬噸。

你們看，差別是不少哩！

因此，結果就是，在生鐵出產發展的程度方面，我們是落在這些國家後面的。

這些情形是什麼意思呢？

裏就是說：

（一）不應該把工業發展的速度和工業發展的程度混在一起：

（二）在我們工業發展的程度方面，我們是比資本主義先進國家落後得很多：

（三）祇有繼續加緊我們工業發展的速度，我們才能够在技術經濟方面趕上和趕過資本主義國

家：

（四）噪嚷着要減低我們工業發展的速度底人們，就是社會主義的敵人，是我們階級敵人的好

細。（鼓掌聲）

（四）鄉村經濟和穀類問題

上面我講到全部鄉村經濟的情形，連林業、漁業等等都在內，並沒有把鄉村經濟按部門的來劃分。倘若我們從全部鄉村經濟中劃分出基本的部門，例如穀類經濟、畜牧、原料植物，那末，照蘇

聯人民農業委員部和國家計劃局的總計，就得到以下的情形。

一，倘若把一九一三年五穀田的面積當做一百，那末，每年穀田變動的情形如下：一九二六——二七年等於百分之九十六點九；一九二七——二八年等於百分之九十四點七；一九二八——二九年等於百分之九十八點二；到今年（一九二九——三〇年），根據所有的材料，將要等於戰前的百分之一百零五點一。

你們看到，一九二七——二八年的五穀田是減少了。這種減少，並不是像右傾機會主義營壘中的庸人關於這點的胡喊那樣，說是因為五穀經濟退化了；這乃是因為七百七十萬海克脫秋麥田（蘇聯秋麥田的百分之二十）凍死的緣故。

倘若再把一九一三年五穀的總出產當做一百，那末，所得到的情形如下：一九二七年等於百分之九十一點九；一九二八年等於百分之九十點八；一九二九年等於百分之九十四點四；一九三〇年，根據一切的總計，將要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一十。

這裏也應該注意一九二八年五穀總出產的減少，這是因為烏克蘭和北高加索底秋麥凍死的緣故。

至於說到五穀總出產中的商品部份（鄉村外的流通），那末，我們見到更有意思的情形。假定把一九一三年五穀總出產的商品部分當做一百，那末，結果就是：一九二七年的商品出產等於百分之三十七；一九二八年等於百分之三十六點八；一九二九年等於百分之五十八；而一九三〇年，根據一切的統計，將要等於戰前百分之七十三以上。

因此，結果就是耕田面積和五穀總生產方面，祇到一九三〇年才達到戰前的程度，並稍稍的超過了一些。

再就是，在五穀的商品生產方面，我們離戰前程度還遠得很，今年還要差百分之二十五。我們糧食缺乏的根源就在這裏，這在一九二八年尤其緊張。

五穀問題的基礎也就在這裏。

二，牧畜方面的情形差不多也是這樣，不過尤其使人驚訝。

倘若把一九一六年各種牲口的頭數當做一百，那末，每年的情形就如下：一九二七年的馬匹，等於一九一六年的百分之八十八點九，牛等於百分之一百十四點三，綿羊、山羊等於百分之一百十九點三，豬等於百分之一百十一點三；一九二八年馬等於百分之九十四點六，牛等於百分之一百十八點五，綿羊、山羊等於百分之一百二十六，豬等於百分之一百二十六點一；一九二九年馬等於百分之九十六點九，牛等於百分之一百十五點六，綿羊、山羊等於百分之一百二十七點八，豬等於百分之一百零三；一九三〇年馬等於百分之八十八點六，牛等於百分之八十九點一，綿羊、山羊等於百分之八十七點一；豬等於百分之六十點一。

你們看，倘若注意到最後的一年，那末，很明顯地我們見到牧畜業有了開始縮小的表徵。

從牧畜業的商品生產上說來，尤其在肉和油類方面情形更使我們不安。倘若把每年肉和油的總出產當作一百，那末每年肉和油的商品生產，在一九二六年就等於百分之三十三點四，一九二七年等於百分之三十二點九，一九二八年等於百分之三十點四，一九二九年等於百分之二十九點二。

因此，我們見到牧畜業中小經濟和小商品性的經濟，帶着明顯的不堅定和經濟上不可靠的表徵。

結果，沒有超過一九一六年的牧畜業的程度，而最後一年倒有了很明顯的不斷減少的表徵。

因此，在我們已經大體上順利地解決了五穀問題之後，又擺着肉類問題，這個問題的緊張程

度，現在已經表現出來了，這個問題正需要解決。

三，我們工業的原料植物的種植，就另是一種情形了。假定把一九二三年原料植物的耕種面積當做一百，那末我們就見到：在棉花方面，一九二七年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零七點一，一九二八年等於百分之一百三十一點四，一九二九年等於百分之一百五十一點四，一九三〇年等於百分之二百十七；蔗的種植，一九二七年等於戰前百分之八十六點六，一九二八年等於百分之九十五點七，一九二九年等於百分之一百十二點九，一九三〇年等於百分之一百二十五；糖蘿蔔，一九二七年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零六點六，一九二八年等於百分之一百二十四點二，一九二九年等於百分之一百二十五點八，一九三〇年等於百分之二百六十九；油類，一九二七年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七十九點四，一九二八年等於百分之二百三十點九，一九二九年等於百分之二百十九點七，一九三〇年等於百分之二百六十以上。

原料植物的總出產同樣也有這樣好的情形。假定把一九一三年的總生產當作一百，那末我們就有：棉花，在一九二八年等於百分之一百一十點五，一九二九年等於百分之一百十九，一九三〇年，根據一切的統計，將要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八十二點八；蔗，一九二八年等於百分之七十一點六，一九二九年等於百分之八十一點五，一九三〇年，根據一切的統計，將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零一點三；糖蘿蔔，一九二八年等於百分之九十三，一九二九年等於百分之五十八，一九三〇年，根據所有的統計，將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三十九點四；油類：一九二八年等於百分之一百六十一點九，一九二九年等於百分之一百四十九點八，一九三〇年，根據所有的統計，將等於戰前百分之二百二十。

因此，在原料植物方面我們見到比較好一些的情形，這裏我們把一九二九年糖蘿蔔除外不算，

因為那次收成被害蟲所損害了。

可是，就在原料植物方面，將來還有可能並必會發生嚴重的動搖和不穩定的表現，像已講過的蘇和油類植物的數目字所表示的那樣，因為那裏小經濟佔優勢，而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的影響很小。

因此，在鄉村經濟上在我們面前擺着下列的問題：

(一)鞏固原料植物的地位底問題，其方法就是保證在那些區域有足量的賤價的糧食生產品。

(二)提高牧畜業和解決肉類問題，其方法就是保證那些區內有充分的五穀產品和草料。

(三)澈底解決五穀問題，這是現在鄉村經濟的主要問題。

這樣看來，五穀問題是鄉村經濟中的基本問題，是解決一切其他問題的鑰匙。

但是解決五穀問題和引導鄉村經濟走上長足發展的道上——這就是根據消滅農村經濟的落後，供給它拖拉機和農業機器，供給他們科學工作人材，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商品出產量。沒有這些條件，就用不着夢想解決五穀問題。

以個人的小農經濟為基礎，是否能夠實現這些條件呢？不，不能夠。這是不能夠的，因為小農經濟不能使用和佔有新技術，不能夠充分的提高勞動生產率，不能夠充分的增加鄉村經濟的商品生產量。留下來祇有一條路，這就是擴大農村經濟的路，設立那種具備有現代技術的大經濟的路。但是蘇維埃國家，不能夠走那種組織資本主義大經濟的道路，它可以而且祇應該着手組織社會主義式的大經濟，應用現代的新技術。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就是這類的經濟。

因此就發生一種任務，設立蘇維埃農場，聯合小農經濟成為大的集體農場，這是解決一般鄉村

經濟問題尤其是五穀問題唯一的方法。

自從第十五次大會以後，尤其是在一九二八年初發現了糧食的嚴重困難之後，黨就在日常實際工作中跑上了這條道路。

應該指出，我們黨在第十五次大會的時候，就把這種根本的任務提在面前當作實際上的任務，那時候我們還沒有遇到糧食的嚴重困難。在第十五次大會底著名的『關於鄉村中工作問題』的決議，很明白地說：

『在現在這個時期中，應該把聯合和改造個人小農經濟爲大的集體經濟，作爲黨在鄉村中的基本任務。』

把第十五次大會上中央委員會報告中論到這個問題的地方引證一下，也許算不得是多餘的事。那裏鄭重的、肯定的提出用集體化的方法消滅鄉村經濟落後的問題來。請聽那裏所說的話：

『出路在那裏，出路是把散漫的小經濟轉變爲共同耕田的大的聯合經濟，轉變爲用新式高級技術來集體耕田的經濟。出路就是要使小的和最小的經濟漸漸的、不屈不撓的、不是用壓制的方法而是用證明和說服的方法聯合成爲公共的、聯合的、集體耕種的大經濟，使用農業機器和拖拉機，應用科學方法提高農業的強度，旁的出路是沒有的。』

(五) 農民之轉向社會主義和蘇維埃農場集體農場發展的速度

農民的轉向集體化不是一下子開始的。這種轉變是不會一下子開始的。在第十五次大會時，黨的確已經喊出集體化的口號。但是要農民羣衆大批的轉向社會主義，僅僅喊出口號是不夠的，要達到這種轉變，至少還需要一個條件，就是要農民羣衆自己相信所提出的口號是對的，接受它，當它

是自己的口號。所以這種轉變是漸漸準備起來的。這種轉變的養成，是靠我們發展的全部過程，首先是供給農業機器和拖拉機的工業全部發展的過程。這種轉變的準備成功，是靠著堅決反對富農的政策和一九二八年及一九二九年新式收買糧食工作的過程，因為這種形式是使富農經濟受貧農中農羣衆的監督。這種轉變的成熟，是靠鄉村經濟合作社的發展，這類合作社教育個人農民學會了集體的進行事業。這種轉變的成熟，是靠集體農場的發展，農民在那裏看出了集體式農場比個人經濟優越的地方。最後，這種轉變的成熟，是靠散處全蘇聯的、具備新技術的蘇維埃農場的發展，在那裏農民有可能認識了新技術的力量和優點。倘若認為我們蘇維埃農場祇是糧食的來源，那就錯了。實際上蘇維埃農場和它的新技術、它的空前的經濟規模對附近農民的幫助，都是一種引導的力量，能促進農民羣衆的轉變，推動農民走上集體化的道路。

就是在這種基礎上發生了幾百萬貧農中農的集體農場運動。這種運動是從一九二九年下半年開始的，它在我們國家的生活中打開了偉大轉變的時期。

中央委員會用過什麼方法去全力的應付和領導這種運動呢？

中央委員會的方法，是由三方面進行的：組織和接濟蘇維埃農場，組織和接濟集體農場，組織製造拖拉機和農業機器，經過拖拉機器站、經過拖拉機隊等等，把機器供給鄉村。

一，一九二八年四月，中央政治局已經通過關於在三四年中組織新的蘇維埃農場的決議，要使這些蘇維埃農場，能够在三四年後出產一萬萬普特以上的商品糧食。後來這條決議經過中央全體會議批准、曾經創設了『五穀託拉斯』，委任這個託拉斯執行這條決議。同時，通過決議，鞏固蘇維埃農場，擴大他們的耕地、曾經組織了蘇維埃農場總局，委託它實行這條決議。

這裏不得不指出，這些決議是遇到我們黨內的機會主義份子方面的反抗然後通過的。曾經有一

種論調，說投到蘇維埃農場的款子是『丟掉了』的款子。還有一種『科學』家方面的說法，這種說法會得到黨內機會主義份子的擁護：說組織蘇維埃大農場是不可能和無意義。但是中央進行了自己的路線，不顧一切的進行到底。

一九二七——二八年付出接濟蘇維埃農場的款子，除流轉的短期借貸外，總共有六千五百七十萬盧布。一九二八——二九年，付出了一萬萬八千五百八十萬盧布。最後，在今年付出了八萬萬五千六百二十萬盧布。在報告所包括的時期中，供給蘇維埃農場使用的拖拉機有一萬八千架，共等於三十五萬馬力。

這些辦法的結果是怎樣呢？

五穀託拉斯耕地的面積，在一九二八——二九年有一十五萬海克脫，一九二九——三〇年有一百零六萬海克脫，一九三〇——三一年有四百五十萬海克脫，一九三一——三二年將有九百萬海克脫，一九三二——三三年，即五年計劃底將有一千四百萬海克脫。蘇維埃農場總局的耕地面積，在一九二八——二九年等於四十三萬海克脫，一九二九——三〇年有八十六萬海克脫，一九三〇——三一年是一百八十萬海克脫，一九三一——三二年是二百萬海克脫，一九三二——三三年將有二百五十萬海克脫，烏克蘭蘇維埃農場大聯合的耕地面積，在一九二八——二九年有十七萬海克脫，一九二九——三〇年有二十八萬海克脫，一九三〇——三一年有五十萬海克脫，一九三二——三三年將有七十二萬海克脫。糖業聯合的耕地面積（穀類的），在一九二八——二九年有七十八萬海克脫，一九二九——三〇年有八十二萬海克脫，一九三〇——三一年將有八十六萬海克脫，一九三一——三二年將有九十八萬海克脫，一九三二——三三年將有九十九萬海克脫。

第一，這就是說，祇一家五穀託拉斯，到五年計劃底就將要等於現在整個阿根廷所有的五穀田

的面積。(鼓掌聲)

第二，這就是說，把所有的蘇維埃農場合在一起，到五年計劃底，將要比現在整個加拿大所有的五穀田多一百萬海克脫。(鼓掌聲)

至於說到蘇維埃農場的五穀總出產和商品的生產，那末我們見到每年的變動如下：一九二七——二八年，蘇維埃農場的總生產有九百五十萬担，其中商品生產佔六百四十萬担；一九二八——二九年有一千二百八十萬担，其中商品是七百八十萬担；一九二九——三〇年，照所有的統計，將有二千八百二十萬担，其中商品為一千八百萬担（等於一萬萬零八百萬普特）；一九三〇——三一年將有七千一百七十萬担，其中商品將佔六千一百萬担（三萬萬七千萬普特）。

這就是我們黨在蘇維埃農場政策上現有的和希望的成績。

照一九二八年四月中央政治局關於組織新蘇維埃農場的決議，我們在一九三一——三二年，應該從新蘇維埃農場得到一萬萬普特的商品糧食。但實際上，一九三一——三二年中，祇從一種新的蘇維埃農場那裏，就已經可以取到二萬萬普特以上的糧食了。結果是超過計劃兩倍。

這樣一來，譏笑中央政治局底決議的人們，是自己狠狠地嘲笑自己了。

照蘇維埃代表大會所批準的五年計劃，我們到五年計劃底，所有蘇維埃農場，總共應該有五百萬海克脫的耕田。可是實際上，今年蘇維埃農場的耕田，就已經有三百八十萬海克脫，明年，即五年計劃第三年，將要有八百萬海克脫的耕田。

這就是說，我們將在三年內完成並超過蘇維埃農場建設的五年計劃。

照五年計劃，我們到五年計劃底，蘇維埃農場的五穀總生產應該有五千四百三十萬担。可是實際上，今年蘇維埃農場的五穀總生產就有二千八百二十萬担，而明年將有七千一百七十萬担。

這就是說，在五穀總生產方面，我們在三年內完成計劃而且超過計劃。五年計劃三年完成。

現在讓資產階級的江湖客和它的機會主義的附和者去胡嚷吧，說什麼不能在三年內完成和超過蘇維埃農場建設的五年計劃吧。

二，至於我們的集體農場建設的情形，還要好些。

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央已經關於集體農場建設通過了以下的決議：

『堅持的實行第十五次大會所提出的任務：「聯合和改造個人小農經濟爲大的集體經濟」；這種集體經濟，是自願的聯合，是根據新技術而建設的聯合，他們在社會主義改造鄉村經濟方面和保證猛烈的提高生產率 and 商品量方面，都是代表高級的五穀經濟。」（見一九二八年中央七月全會的決議：『論一般經濟狀況下的收買糧食的政策』）

後來，這條決議，得到第十六次黨代表會議決議中的批准後，又得到一九二九年中央十一月全會關於集體農場運動的決議中的批准。一九二九年下半年，正是農民根本轉向集體農場的時候，正是中農大批加入集體農場的時候，中央政治局就在那時候通過了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公佈的一個專門的決議：即論『集體化的速度和國家幫助集體農場建設的方法』的決議。

中央在這個決議中：

（一）認爲農民現在確是大批的轉向集體農場了，可以在一九三〇年春季超過集體農場建設的五年計劃；

（二）認爲確是存在着一切必須的物資條件和其他的條件，可以用集體農場的生產去替代富農的生產，因此必須從限制富農的政策變爲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

(三) 指出一種前途，就是在一九三〇年春天，用社會化的方法來耕種的土地就要大大的超過三千萬海克脫；

(四) 把蘇維埃分爲三種區域，規定出每區在基本上完成集體化的一種大概的時期；

(五) 重新審查了土地營造的方法，使它有利於集體農場，重新審查了接濟鄉村經濟的形式，規定了一九三〇——三一年借給集體農場的信用借貸至少須有五萬萬盧布；

(六) 規定了組合式的集體農場運動，是現在集體農場系統中的基本形式；

(七) 責備了黨內機會主義份子，因為他們企圖藉口機器和拖拉機的缺乏去妨礙集體農場運動；

(八) 最後，曾預先警告黨的工作人員，預防集體農場運動中可能的過火行動，自上命令集體農場建設的危險，把集體化作爲兒戲而不努力真正的大批集體化所引起的危險。

這裏應該指出，中央這次決議遇到黨內機會主義份子方面比不親善還要壞些的舉動。曾發生過『大談小論』，說中央被幻想所迷住了，中央把人民的金錢『浪費』到『不存在的』集體農場中去。右派份子洗了自己的手，預言『不免』場台。但是中央堅決的進行了自己的路線，不顧右派份子愚蠢的嗤笑，不顧『左傾』份子的過火和昏頭昏腦，不顧一切的進行到底。

一九二七——二八年裏，支出了七千六百萬盧布去接濟集體農場；一九二八——二九年裏，交出了一萬萬七千萬盧布；最後，在今年，支出了四萬萬七千三百萬盧布。此外，又支出了六千五百萬盧布作爲集體化的基金。規定給集體農場的優待條件，這樣就使集體農場在財政上的積蓄增加了二萬萬盧布。把破壞了的富農經濟上的財產，大約價值四萬萬盧布以上，都交給了集體農場。三萬多架拖拉機，計有四千萬以上的馬力，交給集體農場的田地使用；還有拖拉機總局供給集體農場使

用的七千架拖拉機，蘇維埃農場用來幫助集體農場的拖拉機，都沒有算在裏面。今年曾借給和幫助集體農場一千萬担（六千一百萬普特）穀種。最後，又直接的在組織上幫助集體農場，成立機器馬匹站，這種機器馬匹站的數目現在已經有七千處以上，所使用的馬在一百三十萬匹以上。

這些辦法的結果是怎樣呢？

一九二七年集體農場春耕的地面等於八十萬海克脫；一九二八年為一百四十萬海克脫；一九二九年為四百三十萬海克脫；一九三〇年，春秋兩季的耕種面積都算在內，不得少過三千六百萬海克脫。

第一，這就是說，在三年以內，集體農場的耕地面積增加到四十倍以上。（鼓掌聲）

第二，這就是說，我們集體農場所有的耕地面積等於法意兩國合在一起那麼多了。（鼓掌聲）至於說到他們五穀的總生產和商品量，那末，我們見到下列的情形。一九二七年集體農場出產四百九十萬担，其中二百萬担是商品的；一九二八年出產八百四十萬担，其中三百六十萬担是商品的；一九二九年出產二千九百一十萬担，其中商品是一千二百七十萬担；一九三〇年，根據所有的統計，將出產二萬萬五千六百萬担（十五萬萬五千萬普特），其中商品將有八千二百萬担（五萬萬普特以上）。

應該承認，一般地說來，算是發展得十分快的工業，其中沒有一個部門發展的速度有過集體農場建設那樣快。

這些數目字表明什麼呢？

這首先表明，集體農場中五穀的總生產，在三年內增加到五十倍以上，而商品量增加了四十倍以上。

第二，這是表明，我們今年能夠向集體農場取得全國五穀商品生產的一半以上。

第三，這是表明，從今以後，決定鄉村經濟和它的基本問題的命運的，不是個人農民的經濟而是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

第四，這是表明，消滅富農階級的口號，是開足馬力的前進。

最後，這是表明，國內已經發生了經濟的變動，使我們有完全的根據可以肯定的說，我們已經把鄉村推上了新的道路，即推上了集體化的道路，因此，不僅是在城市裏，而且在鄉村裏也保證了順利的建設社會主義。

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的決議裏，規定到一九三〇年春季為止，根據社會化的方法耕種的集體農場的耕地計劃要有三千萬海克脫。但結果超過了中央的這個計劃。

結果，嘲笑中央決議的人們，自己却狠狠的嘲笑了自己。集體農場運動中小資產階級的盲目性和過火，都救不了機會主義的胡喊。

照五年計劃，我們到五年計劃底，集體農場的耕地面積應該等於二千零六十萬海克脫。但是在實際上，集體農場今年的耕地面積已經有三千六百萬了。

這就是說，我們在兩年之內已經超過了集體農場建設的五年計劃的一倍半以上。（鼓掌聲）

照五年計劃，我們到五年計劃底，集體農場五穀的總生產應該有一萬萬九千零五十萬担。但是在實際上，今年集體農場五穀的總生產，已經有二萬萬五千六百萬担了。

這就是說，我們在兩年之內已經超過了集體農場五穀生產的五年計劃百分之三十以上。

五年計劃兩年完成。（鼓掌聲）

現在讓機會主義份子去胡嚷，說兩年以內不能夠完成和超過集體農場建設的五年計劃吧！

(六) 改良工農的物質條件和文化條件

由此可見，工業和農業方面社會化部份積極的增加，是一件無可懷疑的事實。

從勞動者的物質條件說來，這可以說是什麼呢？

這就是說，從此就放下了根本改良工農物質條件的基礎。

爲什麼？怎樣的？

第一，社會化部份的增長，首先就是表明城市和鄉村中剝削份子的減少和他們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底低落。這又是說，工農在全國國民收入中所佔的份數，必然因了剝削階級份數的減少而增加起來。

第二，因爲在社會化部份增長的時候，一向供養剝削階級和它的僕人們的那部份國民收入，從此以後就必將留在生產內，用來擴大生產，建築新工廠，改良勞動者的生活。這又是說，工人階級的數目和力量，又要增加，失業必將減少和消滅。

最後，因爲社會化部份的增長能促進改良工人階級的條件，所以這就使國內市場購買力積極的提高，使工農對於工業品的要求增加，這又是說，國內市場的擴大將要趕過工業的發展，推動它前進，督促它不斷的擴大。

所有這類的情形，都能使工農的物質條件和文化條件不斷的改良。

一、開始先講工人階級人數的增加和失業工人的減少。

倘若僱傭勞動者的數量（除失業者外）在一九二六——二七年等於一千零九十九萬人，那末，一九二七——二八年就有一千一百四十五萬六千人，一九二八——二九年有一千一百九十九萬七千

人，一九二九——三〇年，根據所有的統計，將要有一千三百十二萬九千人。其中體力勞動者（連鄉村經濟工人和季候工人在內），在一九二六——二七年是七百零六萬九千人，一九二七——二八年是七百四十萬四千人，一九二八——二九年裏是七百七十五萬八千人，一九二九——三〇年是八百五十三萬三千人。其中大工業中的工人（除職員外），在一九二六——二七年為二百四十三萬九千人，一九二七——二八年為二百六十三萬二千人，一九二八——二九年為二百八十五萬八千人，一九二九——三〇年為三百零二萬九千人。

這就是說，我們所見到的情形是工人階級不斷的增加，再，假使僱傭勞動人數的百分數在三年內增加了百分之十九點五，而體力勞動的人數是增加了百分之二十點七，那末，產業工人增加的百分數是百分之二十四點二。

現在講失業問題。我們應該說，在這方面，人民勞動委員部和蘇聯職工中央蘇維埃都有很多莫明其妙的地方。一方面，根據這些機關的統計，我們大約有一百萬的失業者，其中有最低限度的熟練程度的佔百分之十四點三，還有大約百分之七十三是所謂知識勞動者和不熟練勞動者，而且其中大多數是婦女和未成年的人，他們與工業生產都是沒有關係的。另一方面，根據同樣的統計，我們看到熟練勞動力可怕的缺乏，勞動介紹所不能滿足我們企業所需要的勞動力底百分之八十，因此我們不得不很快的、真正是飛快的訓練完全沒有技能的人們，從他們中間養成熟練的工人，這樣去滿足我們企業中最低限度的要求。試一試解釋這種莫明其妙的情形。無論如何有一點是很明顯的，這些失業者，並不是後備軍，更不是我們產業中的經常失業者。這是什麼呢？甚至按照人民勞動委員會部的統計，近來失業工人的數目，比去年也要減少了七十萬人以上。這就是說，到今年五月一日止，失業工人數目減少了百分之四十二。

我們國民經濟中社會主義部門的發展，還有一個成績。

二，倘若站在按階級分配國民收入的觀點上來考察情形，結果還要動人。站在工農物質條件和文化條件的觀點上來說，按階級分配國民收入的問題是一切根本的問題。德、英、美等國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爲着資產階級的利益盡量想模糊這個問題，爲着這個，他們才公佈關於這個問題的什麼『完全客觀的』研究。

照全德統計局的統計，工資在德國國民收入內所佔的份數，在一九二九年等於百分之七十，而資產階級的收入佔百分之三十。照『聯合商務委員會』和『全國經濟調查部』的統計，工人在美國國民收入內所佔的部份，在一九二三年等於百分之五十四，而資本家的份數佔百分之四十五以上。最後，照經濟學家波立和斯頓勃的統計，英國工人階級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份數，在一九二四年，差不多要等於百分之五十，而資本家的份數佔百分之五十（多一些）。

很明顯的，這些調查的結果是不足信的。它們不足信，是因爲除純粹經濟上的差錯外，在這些調查中，還有另一種錯誤，他們的目的是局部的隱瞞資本家的收入，少說一些；同時，又局部的誇大工人階級的收入，把薪水很大的官僚，都算做工人。此外，在這些調查中往往不計算農戶的收入，不計算一般的鄉村資本家的收入，這一點我已經不去講他了。

法爾格用批評的態度分析了這些統計。他得到下列的結果。工人和城市不剝削他人勞動的其他勞動者底收入，在德國是佔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五，美國是佔百分之五十四，英國是佔百分之四十五；資本家的份數，德國是佔百分之四十五，美國是佔百分之四十六，英國是佔百分之五十五。

最大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情形，就是這樣。

蘇聯內的情形是怎樣呢？

你們看國家計劃局的統計，請看：

(一) 工人和不剝削人家勞動的勞動者底收入份數，在一九二七——二八年，佔全部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五點二（其中城鄉工人佔百分之三十三點三），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為百分之七十六點五（其中城鄉工人佔百分之三十三點二），一九二九——三〇年；為百分之七十七點一（其中城鄉工人佔百分之三十三點五）。

(二) 富農和城市資本家，在一九二七——二八年佔百分之八點一；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佔百分之六點五；一九二九——三〇年佔百分之一點八。

(三) 手藝人（大部份是勞動份子）的份數，在一九二七——二八年佔百分之六點五；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佔百分之五點四，一九二九——三〇年佔百分之四點四。

(四) 國家部份的份數（也是工人階級和一般勞動羣衆的收入），在一九二七——二八年佔百分之八點四；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佔百分之十；一九二九——三〇年佔百分之十五點二。

(五) 最後，所謂其他各項（指一切的郵金）的份數，在一九二七——二八年佔百分之一點八；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佔百分之一點六；一九二九——三〇年佔百分之一點五。

因此，在資本主義先進國家中，剝削階級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份數大約要佔百分之五十，而在我們國家中，剝削階級的份數佔不到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二。

這也就可以說明一件驚人的事實：照美國資產階級作者鄧尼的話，一九二二年美國『百分之之一的私有者，在自己的掌握中集中了全國財富的百分之五十九』；照鄧尼的話，英國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不到百分之二的私有者佔有了全國財富的百分之六十四』。（見鄧尼著的『美國戰

勝英國」)

在蘇聯，在蘇維埃國家裏，能不能夠發生同樣的事實呢？當然是不能夠的。蘇聯已經好久沒有這樣的『私有者』了，並且是不會有這樣的私有者。

但是，倘若在一九二九——三〇年蘇聯總共大約祇有百分之二的國民收入落到剝削階級方面去，那末餘下來的國民收入到那裏去了呢？

很明顯的，這是留在工農掌握中的。

這就是蘇維埃政權在幾千萬工人階級羣衆和農民中間所有的力量和威權的根源。

這就是蘇聯工農物質幸福繼續改良的根源。

三，既有了這些重要的事實，就非常容易瞭解工人的實際工資* 不斷的增加，工人社會保險預算案的增加，對貧農中農經濟幫助的加緊，建築工人住所的款子的增加，改良工人生活的用款的增加，保護產母和嬰兒的費用的增加，同時也更容易瞭解蘇聯人口很快的增加，死亡率減少，尤其是嬰兒死亡率的減少等等的事實了。

大家都知道，譬如工人的實際工資，連社會保險費和利潤上扣下來作為改良工人生活的基金在內，已經增加到戰前百分之一百六十七了。最近三年來，僅僅工人社會保險金的預算，在一九二七——二八年是九萬萬八千萬盧布，到一九二九——三〇年裏，便增加到了十四萬萬盧布。最近三年來（一九二七——二八年度到一九二九——三〇年度），為保護產母和嬰兒化了四萬萬九千四百萬盧布。在同一時期內，化在兒童入學年齡前的教育上的（幼稚園、兒童遊戲場等等）計有二萬萬

* 實際工資，就是根據工資所能夠買到的生活品的數目來計算。假定實際工資增加，那末工人的生活就好了——譯者

零四百萬盧布。化在建築工人住所上的計有十八萬萬八千萬盧布。

這當然不是說，凡是努力的增加實際工資所應做的事情都已經做到了，再也不能把實際工資提得更高些了。但倘若真沒有做到的地方，那末，這就是我們一般供給機關中官僚主義的過錯，首先特別是消費合作社的官僚主義。照國家計劃局的統計，在一九二九——三〇年裏，國內貿易的社會化部份，經理着百分之九十九的批發和百分之八十九以上的零售。這就是說，消費合作社有系統的排擠私人部份，在貿易方面，站了壟斷的地位。這當然是很好的，但所不好的，是有的時候，這種壟斷是有害於消費者的。原來商業上雖然差不多是站了壟斷的地位，可是消費合作社總願意把『收入』較多的、利潤較多的商品（時髦貨等等）去供給工人，不去把『收入』較少而為工人所更需要的商品供給工人（農產品等等）。因此，估工人所消費的百分之二十五的鄉村經濟產品，工人就不得不不出高價向私人的市場去購買。這我還可以說到，消費合作社機關總是多注意於收支的差額，因此，中心的領導機關方面雖然下了嚴厲的指令，可是零售價格的減低還是很慢。結果，消費合作社的活動，在現在的時候不像一個社會主義的部門，而像傳染了相當新資本家習氣的特別部門。試問，倘若消費合作社不執行嚴格的改良工人實際工資的任務，誰要這種消費合作社呢，它對於工人有什麼好處呢？

倘若雖然有上述的情形可是實際工資還是年年不斷的增加，那末，這就是說，我們的制度，國民收入的分配機關，工資方面的整個立場，都能削弱和抵償合作社方面各式各樣的缺點。

假使除此以外再加上許多其他的條件，譬如像公共飯廳作用的提高、工人住所的減價、給工人和工人子女的大量津貼、文化設備的改良等等，那末，可以很勇敢的說，工人工資的增加，比我們有些機關的統計所提出的要多得多。

所有這些事實，合在一起，加上八十三萬以上產業工人（百分之三十三點五）的七小時工作制，加上一百五十萬以上產業工人（百分之六十三點四）的轉為五天工作周，加上廣大的工人休養所、養病所、避暑處的制度（最近三年來曾派去了一百七十多萬工人），所有這些設備為工人階級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了很好的條件，使我們能够養成下一代健康的、活潑的工人，能够把蘇維埃國家的能力提高到應有的高度，用自己的胸膛來擁護它，使它不受敵人的進攻。（鼓掌聲）

至於說到給個人農民和集體農民的幫助，連幫助貧農在內，那末，最近三年來（一九二七——二八年度到一九二九——三〇年度），它的數目是等於四十萬萬盧布，都是由信用借貸和國家預算中支出的。大家都知道，僅僅這三年來，就幫助了農民一萬萬五千四百萬盧布以上的穀種，

所以一點沒有什麼奇怪的，工農一般的生活並不壞，人口死亡率比戰前減少了百分之三十六，兒童死亡率比戰前減少百分之四十二點五，而每年人口的增加有三百萬人以上。（鼓掌聲）

至於說到工農的文化條件，那末，這方面我們也得到了相當的成績，可是絕對不能使我們滿意，因為成績並不大。倘若拋開各種各樣的俱樂部、閱書室、圖書館、識字處等等在今年所吸引的一千零五十萬人不算外，那末文化教育情形就是如下：初級學校今年有一千一百六十三萬學生；中學校有一百九十四萬五千人；工業技術學校、交通學校、農業學校、羣衆生產技能養成所共有三十三萬三千一百人；各種技術專門學校和同等的職工學校共有二十三萬八千七百人；大學校和技術大學共有十九萬零四百人。因為有這些設備，所以戰前識字者祇佔百分之三十，而現在便增到了百分之六十二點六。

現在主要的事情，就是採用義務的初級教育。我說這是『主要的』，因為這樣的轉變是文化革命的緊要步驟。而轉變到這種制度很早就該幹的，因為現在我們在蘇聯最大多數的區裏，有了實行

普及初級教育所必須的一切條件。一向我們必須『到處節省，甚至於節省學校』以『拯救和恢復重工業』。(列寧)可是近來，我們已經恢復了重工業並且繼續前進。因此，已經到了時候，我們已經應該着手組織普及的初級義務教育了。

我想，如果大會關於這點能通過一定的極堅決的決議，這是很正確的。(鼓掌聲)

(七) 發展中的困難，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在整個戰線上的進攻

我已經講過我們國民經濟中發展的成績了。我已經講過工業方面，農業方面，根據社會主義原則改造全部國民經濟方面的成績。我還講過改良工農物質條件方面的成績。

倘若有人以為，我們是『很容易很平安』的得到這些成績的，是所謂自流的，毫無特別努力和意志緊張、毫無鬪爭和震動就得了這些成績，那就錯了。這樣的成績不會自己跑來的，實際上，我們是堅決的向困難作鬪爭，是在嚴重的、長期的征服困難的鬪爭中，才得到了這些成績。

這裏誰都講到我們的困難。但是不是誰都顧計到了這些困難的性質，可是困難的問題對於我們有很大的意義。

這裏就發生問題：我們困難的特點是什麼，這些困難後藏着那些敵人的力量並怎樣的來克服他們呢？

一、在說明我們困難的時候，應該至少注意到下列情形。

第一，應該估計到，現在我們的困難，是改造時期的困難。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這些困難根本和我們經濟的恢復時代中的困難不同。倘若在恢復時期中，問題是在使舊工廠工作和在舊基礎上幫助鄉村經濟，那末，現在的問題是根本重造、改造工業農業，更換它們的技術基礎，供給它

們現代的技術。這就是說，我們面前擺着改造國民經濟全部技術基礎的任務。這種任務，又需要新的、大批的投資到國民經濟中去，需要新的更有經驗的人材，能够指揮新技術，推動它前進。

第二，應該注意，改造國民經濟不限於改良它的技術基礎，恰好相反，同時還需要改造社會經濟底關係。我這所講的，主要的是講鄉村經濟。已經聯合起來了的社會化了的工業中，技術的改造大體上算已經有了現成的社會經濟基礎。改造的任務，就是加緊在工業中排擠資本主義份子的過程，鄉村經濟中的情形，却不是這樣簡單，改造鄉村經濟的技術基礎，當然也是爲着同樣的目的。但是，我們鄉村經濟的特點，在於那裏還多半是小農經濟，小農經濟不能夠佔有新技術，因此，改造農村經濟技術基礎而不同時改造舊社會經濟制度，不聯合小經濟爲大集體經濟，不掃除鄉村經濟中資本主義的根源，那就是不可能的。很明顯的，這些情形不會不使我們的困難更加複雜，不會不使我們戰勝這些困難的工作更加複雜。

第三，應該注意到，我們社會主義改造國民經濟的工作，已破壞了資本主義的經濟聯繫，顛覆了舊世界的一切力量，就必然引起這些力量拚命的反抗。大家都知道，實在就是這樣。上層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在我們工業各部門中的陰險的危害行爲，富農像野猪般反對鄉村中集體式的經濟，各機關中官僚份子（是階級敵人的奸細）對蘇維埃政權各種命令的怠工，——這就是現在我們國內的臨死階級底反抗的主要形式。很明顯的，這些環境不能使我們改造國民經濟的工作輕易的進行。

第四，應該注意到，我們國內底臨死階級的反抗，不是和外界隔絕的，它是受周圍資本主義世界所援助的。周圍資本主義世界並不是簡單地理論上的觀念。周圍資本主義世界——這就是說，在蘇聯的周圍有仇視的階級敵人，準備着在精神上、在物質上用財政封鎖的方法，有的時候甚至於用武裝干涉的方法來援助我們蘇聯內部的階級敵人。現在已經證實，我們底專門家的危害行爲，富農

的反蘇維埃行動，焚燒和炸毀我們的企業和設備，都是得到國外津貼的，都是由外國所指使的。帝國主義的世界，不願意蘇聯站定脚跟，能够趕上和趕過資本主義先進的國家。這樣，它們就幫助蘇聯國內的舊勢力。很明顯的，這當然也是不會促進我國的改造工作的。

但倘若不注意另一件事情，那末，我們困難的特點，是不會完全明瞭的。問題是在說到我們困難的特性。問題是在說，我們底困難不是衰落中的困難或者停滯中的困難，而是發展中的困難，高漲中的困難，前進中的困難。這就是說，我們的困難是根本和資本主義中的困難不同。當我們講到美國的困難時，講的是衰落中的困難，因為美國現在遇到恐慌，即經濟的衰落。當我們講到英國的困難時，講的是停滯中的困難，因為英國現在已經有幾年的停滯，即停止前進。當我們講到我們的困難時，我們講的不是衰落，不是發展的停滯，而是我們力量的增長，我們力量的高漲，我們經濟的往前進展。到某時期能前進幾多，能多製造出百分之幾的產品，能多耕種幾百萬海克脫土地，能早幾星期造成工廠、製造廠、鐵路等等，——這就是我們講到困難的時候的問題。因此，我們的困難和美國或英國的困難不同，是發展中的困難，是前進時的困難。

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我們的困難是本身包含着戰勝困難的可能性的困難。這就是說，我們困難的特點就在於它們本身帶着戰勝困難的基礎。

由此可以得到些什麼結論呢？

第一，我們的困難不是細小的和偶然的『麻煩』，而是階級鬭爭的困難。

第二，在我們困難後面隱藏着我們的階級敵人，這些困難，又因為我們國內的臨死階級的拚命反抗，國外對這些階級的援助，我們自己機關中存在着官僚主義份子，我們黨內有些份子的不信任和遲疑而更複雜起來。

第三，爲要克服困難，首先就必須打退資本主義份子的進攻，壓服他們的反抗，這樣去肅清道路，飛步的前進。

最後就是，我們發展上的困難的性質給了我們壓服階級敵人所必須的一切可能。

但是爲要利用這些可能，把他們變成行動來壓服階級敵人的反抗，克服困難，那祇有一種方法：組織由各面向資本主義份子進攻，隔絕自己隊伍中的機會主義份子，因爲他們妨害進攻，手忙腳亂的東奔西竄，將不相信勝利的思想引到黨裏來。（鼓掌聲）

沒有其他的方法。

祇有丟了腦袋的人們，才會從布哈林的資本主義份子能和平底生長入社會主義的幼稚的公式中去找出路。我們的發展，却不是照布哈林的公式前進的。我們的發展是照列寧的『誰勝誰』的公式前進的。我們戰勝他們剝削者，壓服他們，還是他們戰勝我們蘇聯的工農，壓迫我們，——同志們，問題就是這樣。

所以，社會主義向各方面組織進攻——這就是在發展改造全部國民經濟的工作的時候，在我們面前擺着的任務。

黨正好是這樣的瞭解自己的任務，實行進攻我們國內的資本主義份子。

二，但是，一般說來，在存在着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下，是不是准許進攻，尤其是可否向各方面進攻呢？

有些人以爲，進攻和新經濟政策是不能並立的，新經濟政策實際上是退守，不久退守已終結了，新經濟政策當然應該撤消。這當然是傻話。這種傻話或者是從託洛茨基主義者方面說出來的，他們什麼列寧主義都沒有懂得，以爲『一下子』就可以『取消』新經濟政策；或者是右傾機會主義

者的話，他們也是一點列寧主義不懂，胡嚷『取消新經濟政策的危險』，想爲自己放棄進攻來講一講價。倘若新經濟政策祇是退守，那末，列寧在第十一次黨大會上在澈底進行新經濟政策的時候，就不會說『退守完結了』。列寧說退守完結的時候，難道他同時沒有說過我們將『嚴格的長期的』進行新經濟政策嗎？祇要提出這個問題，就可以懂得胡嚷新經濟政策和進攻不能並存的話怎樣的無聊了。實際上，新經濟政策不僅要退守，要允許私人貿易復興，在國家的調節作用的保證之下允許資本主義復興起來（新經濟政策的開始階段）。實際上，新經濟政策在發展的某一個階段上，同時便促進社會主義進攻資本主義份子，要縮小私人貿易的活動範圍，相對的和絕對的減少資本主義份子，社會化部份的繼續超過非社會化部份，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新經濟政策的現在階段）。新經濟政策，是爲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份子而採用的。我們轉向各方面進攻，還沒有取消新經濟政策，因爲私人貿易和資本主義份子還存在，商品流轉和貨幣經濟還存在，但是我們一定要取消新經濟政策的初期，發展它的下一個階段，現在的階段，也就是新經濟政策最後的階段。

列寧在採用新經濟政策後一年，在一九二二年曾經說過下面一段話：

『我們現在後退，但是我們這樣幹去，爲的是開始是後退以後再奔跑起來，和更有勁的向前跳躍。祇有在這個條件之下，我們才在實行新經濟政策中向後退了。我們現在應該在什麼地方並且怎樣改排隊伍，適應，改組，以便退守以後，開始更勇猛的向前進攻——這我們還不知道。要順次序的實行所有這些動作，就應該不祇幾十次的而是幾百次的測量，然後再決定。』

（『列寧全集』，第十八卷，下冊，第一〇三頁）

大概清楚了吧。

現在有一個問題：轉入進攻的時候是不是已經到了，進攻的時期是否成熟了呢？

列寧一九二二年就在另一個地方說：

『聯合農民羣衆，聯合尋常的勞動農民，開始不可思議的、無邊的、比我們夢想還要慢些的前進，但是要全體羣衆真正的和我們一起前進』……『那時候，這種運動的加速，到了一定時候就發生，它的速度也將是我們現在所夢想不到的。』（『列寧全集』，第十八卷，下冊，第二九——三〇頁）

現在還是這個問題：這種加速運動，這種加緊我們發展的速度的是不是已經到了，我們選擇時期，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開始向各方面作堅決的進攻，這是不是正確呢？

對於這個問題，黨已經給了明確的答覆。

是的，這樣的時期已經到了。

是的，黨所選擇的開始向各方面進攻的時期是正確的。

證明這一點，有工人階級積極性的繼續提高，在幾千百萬勞動羣衆中間，黨的威信空前的增加。證明這一點的，有貧農中農羣衆積極性的提高，這些羣衆的根本轉向集體農場建設。

證明這點的，就是我們現在不僅能夠用蘇維埃農場與集體農場來代替富農生產，而且能夠超過它幾倍。

證明這點的，就是我們已經能夠大體上解決了五穀問題，積聚了一定糧食儲蓄，把穀類商品生產的重心，從個人生產方面轉到了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方面。

這些證據，證明黨正確的選定了向各方面進攻和提出消滅富農階級的口號的時機。

倘若我們聽信了布哈林右傾機會主義的話，倘若放棄了進攻，顛覆了工業發展的速度，阻礙了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的發展，依靠個人的鄉村經濟，那末結果怎樣呢？

我們就一定破壞了我們的工業，葬送了社會主義改造鄉村經濟的事業，落得沒有糧食，並替富農肅清了道路。我們大概就已經坐在破鍋的旁邊了。

倘若我們聽信了託洛茨基、季諾維埃夫派「左傾」機會主義者的話，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年開始了進攻的火線，那時候，我們還沒有一點兒的可能去用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來代替富農生產，那末，結果是怎樣呢？

我們大概已經在這方面破了產，表示了我們自己的軟弱，加強了富農和一般資本主義份子的地盤，把中農推入了富農的懷抱中，打翻了我們社會主義的建設，落得沒有糧食。我們大概就已經坐在破鍋的旁邊了。

結果是一樣。

怪不得我們工人說：「向「左」去，就走到右邊來。」（鼓掌聲）

有些同志們以為，社會主義進攻中最主要的東西就是壓力，倘若壓力不加緊，那就是沒有進攻。這對不對呢？這當然不對。

壓力是進攻的必要份子，但這是輔助的份子，而不是主要的份子。在現在的條件之下，社會主義進攻中最主要的，就是加緊我們工業發展的速度，加緊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發展的速度，加緊在經濟上排擠城鄉資本主義份子的速度，發動羣衆建設社會主義，發動羣衆反對資本主義。你們可以拘捕和流放幾萬或幾十萬的富農，但是，倘若你們同時不用盡一切的方法去加緊建設新式的經濟，去用新的經濟形式代替舊的資本主義的形式，去剷除和消滅他們生產的根源，使鄉村資本主義份子不能生存和發展，那末，富農還是要重新產生出來、長大起來的。

另一些人以為社會主義進攻是一種無顧忌的前進，用不着相當的準備，用不着在進攻過程中重

新配置各種力量，用不着鞏固奪到的地盤，用不着利用積蓄來擴充勝利，而且如果有部份的農民退出集體農場的現象，那末，這就是說我們已遇到『革命的退潮』，運動的低落，進攻的停止。

這是對不對的呢？這當然是不對的。

第一，沒有一種進攻，無論它是怎樣的順利，會沒有某條戰線上的破陣和陷陣的。根據這點而說進攻停止或進攻失陷，這就是不懂得進攻的實質。

第二，在進攻過程中不重新配置力量，不鞏固奪到的地盤，不利用積蓄來擴張勝利，不澈底進攻，那末這種進攻是從來不會而且也不會勝利的。毫無顧忌的進攻，這就是說，不遵守這些條件，進攻必然要化為烏有和失敗。我們國內戰爭的豐富經驗都證明了這點。

第三，『革命的退潮』往往因為運動的低落而發生；但現在，是在運動繼續高漲的時候，是在我們全部社會主義建設、工業和集體農場繼續興旺的時候，是在我們革命繼續發展的時候，而有一部份農民退出集體農場；在這兩件事情之間，怎樣能有什麼相像的地方呢？在這兩個完全不同的表徵之間，怎樣能有共同之點？

二，在我們現在的條件之下，布爾塞維克進攻的本質是什麼呢？

布爾塞維克的進攻的本質，首先就是發動羣衆的注意力和革命的積極性去反對我國的資本主義份子；發動羣衆的創造性和獨立性去反對我們機關和企業中的官僚主義，因為他們埋沒許多後備軍，把他們隱藏在我們制度的中心裏，不讓他出來應用；組織社會主義競賽和羣衆的勞動熱潮，去提高勞動生產率，擴張社會主義建設。

布爾塞維克的進攻的本質，第二，就是着手改造職工會、合作社、蘇維埃和一切其他羣衆組織的全部實際工作，使它適合改造時代的需要；在那裏造成最積極、最革命的工作人員的中堅份子，

排擠和隔絕機會主義份子、職工主義份子、官僚主義份子；剷出其中異己和蛻化份子，自下提拔新的工作人員。

布爾塞維克的進攻的本質，還有就是盡量的收集款子去接濟我們工業，接濟我們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派送我們黨的最好的人們去擴張這種事業。

最後，布爾塞維克的進攻的本質，就是發動黨本身，去組織全部進攻事業；鞏固和整頓黨的組織，趕走那裏的官僚主義份子和蛻化的現象；隔絕和排擠脫離列寧黨路線的「左」右派的說客，提拔真正的堅定的列寧主義者到上面去做工。

這就是現在布爾塞維克的進攻的基礎。

黨怎樣的實行這種計劃。

你們知道，黨是最堅決的實現這種計劃的。

開始是黨推展廣大的自我批評，集中羣衆的注意力去注意我們建設的缺點，注意我們組織和企業的缺點。第十五次大會上就已經提出了加緊自我批評的必要。一方面，煤礦事件和各部門工業中的危害行爲發覺了各級黨部的沒有革命感覺。另一方面，與富農的鬭爭揭穿了我們鄉村組織的缺點，——這兩種現象，繼續的推動了自我批評。中央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二日的通告裏，澈底的形成了自我批評的運動，號召全黨和工人階級底一切力量來發展自我批評，「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不顧什麼面子」。黨攆斥了那些站在巷戰防壘對面的、企圖破壞和削弱蘇維埃政權的託洛茨基派的「批評」，並宣告無情的揭破我們工作中的缺點，以改造我們底建設，以鞏固蘇維埃政權，作爲自我批評的任務。大家都知道，黨的號召引起了工人階級和農民羣衆非常活潑的回音。

此外，黨組織廣大的運動去反對官僚主義，提出實行清洗黨、工會、合作社和蘇維埃底組織去

除異己份子和官僚化的份子。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一九三〇年三月十六日的決議，決定提拔工人階級到國家機關內做工，決定大批工人監督蘇維埃機關（工廠的輔助），就是這種運動的繼續。大家都知道，這種運動，引起了工人羣衆偉大的興奮和積極性。這種運動的結果，就是黨在勞動羣衆中間的威信偉大的提高，工人階級對黨信仰的增加，成千成萬的工人加入共產黨，整間和整廠的工人決然願意加入黨。最後，這種運動的結果，就是肅清了我們組織內一切暮氣沉沉的份子和官僚份子，解除了蘇聯職工中央委員會中舊的機會主義領導。

黨又組織了廣大的社會主義競賽，工廠中羣衆勞動的熱潮。黨的第十六次代表會議關於競賽的宣言，把工作推上了正軌。模範隊更推着他繼續前進。列寧共產青年團所領導的青年工人，在競賽上和模範隊運動上得到很多的勝利。我們應該承認，我們革命的青年，在這方面，起了特別重大的作用。現在已經沒有什麼可以懷疑，各工廠的社會主義競賽，幾十萬工人關於社會主義競賽所得到的成績的互相報告，互相號召，模範隊運動廣大的發展，如果不是最重要的事實，那至少也是最重要的事實之一。祇有瞎子，才看不到羣衆心理上和對勞動的態度上已經起了一種根本的根本的改變了我們工廠的面目。在不久以前，還有人喊出競賽和變化，模範隊運動的『杜撰』和『不中用』。現在這些『聰明人』，甚至於引不起大家的一顧了，大家都當他們是上世紀的『聰明人』了。現在競賽和模範隊運動的事業，是奪到了的和鞏固了的事業。社會主義競賽吸收了二百萬以上的工人，加入模範隊的有一百萬以上的工人，這是事實。

競賽的好處，就是競賽在人們對待勞動的觀點上造成一種根本的轉變，因為它使勞動從以前認爲是卑鄙的煩重的重担變爲榮耀、光榮、英勇和勇敢的事業。在資本家那裏，人們所最希望的，最受社會讚揚的，就是有地租，依靠利息過生活，不作被輕視的勞動，在我們蘇聯，正好相反，最希

望的，最受社會所讚揚的事情，就是能够成爲勞動的英雄，能够成爲模範隊運動的英勇，能够在幾千百萬勞動羣衆中被崇敬的最高榮譽。

在競賽中還有一件事情可以算是一樣可以注意的，就是競賽開始在鄉村中散佈起來，已經蔓延到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大家都知道，在幾百萬蘇維埃農場農民和集體農民羣衆中間真正的勞動熱情的事實。

誰能够在二年前夢想競賽和模範隊運動有這樣的勝利呢？

黨又收集了全國的財源去發展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的事業，供給蘇維埃農場最好的組織者，幫助集體農場二萬五千工人，提拔集體農民中最好的去領導集體農場，設立集體農民補習學校，因此，安置下了基礎，好去養成堅定的、老練的集體農場運動的人材。

最後，黨改造了自己的隊伍，改編成同行軍一樣的嚴整，改編了報紙，進行兩條戰線的鬭爭，搗毀託洛茨基派的餘孽，當頭打碎了右傾份子，隔絕了調和派，因此就保證了順利進攻所必須的條件，即黨的隊伍在列寧路線的基礎上的一致，和對進攻工作的實際正確的領導，拿住了並且設法處理了集體農民運動方面右派營壘中的漸進派人們和「左」傾份子。

這就是黨的基本辦法，用來實行向各方面進攻的。

大家都知道，這種進攻在我們工作中各方面都得到了勝利。

我們能够克服我們國民經濟改造時代中許多困難的原因，也就是在這裏。

我們能够勝利的戰勝我們建設中的最大困難，基本農民羣衆轉向社會主義方面的困難，其原因也在這裏。

外國人有的時候問到蘇聯國內的情形。蘇聯國內情形是堅固的，不動搖的，這難道還可以懷疑

嗎？你們看一看資本主義國家，看一看這些國家裏恐慌和失業的增加，看一看罷工和歇業，看一看反政府的示威，——在這些國家內的情形和蘇聯的國內情形，有什麼地方可以比較呢？

我們應該承認，蘇維埃政權是現在世界上一切存在着的政權中最堅固的政權。（鼓掌聲）

（八） 資本主義制度還是社會主義制度？

因此，我們已經看到了蘇聯國內情形的全景。

同時我們也看到了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內情形。

無意中就發生一個問題：倘若把兩種國家相互對比起來，把這兩種景象比較起來，結果是怎樣呢？

這個問題之所以特別有趣，就是因為各國的資產階級行動家，各式各樣的資產階級報紙，從公開的資產階級報紙一直到孟塞維克託洛茨基派為止，都異口同聲的呼喊資本主義的『興旺』，蘇聯的『滅亡』，蘇聯『財政上和經濟上的破產』等等的話。

這樣，分析我們蘇聯的情形和資本主義國家的情形，結果是怎樣呢？

我們現在指出主要的、大家都知道的幾件事實。

在他們資本家那裏，工業和農業中都有經濟恐慌和生產衰落。

在我們蘇聯，國民經濟的各種部門中，都是經濟的高漲和生產的發展。

在他們資本家那裏，勞動者物質條件惡化，工人工資減低，失業工人增加。

在我們蘇聯，勞動者物質條件提高，工人工資增加，失業工人減少。

在他們資本家那裏，罷工和示威的數目增加，因此就喪失幾千百萬的工作日。

在我們蘇聯，沒有罷工，工農勞動熱情高漲，給我們的建設以數千百萬額外的工作日。在他們資本家那裏，國內形勢緊張，工人階級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運動繼續高漲。

在我們蘇聯，國內地位鞏固，千百萬工人階級羣衆團結在蘇維埃政權周圍。

在他們資本家那裏，民族問題緊張起來，印度、安南、東印度羣島、菲列濱羣島等地的民族解放運動一天天的高漲，變成民族戰爭。

在我們蘇聯，民族親善的基礎鞏固起來，保證民族的和平，團結蘇聯各民族幾千百萬羣衆在蘇維埃政權周圍。

在他們資本家那裏，驚惶失措，並且情形還有繼續惡化的前途。

在我們蘇聯，相信自己的力量，情形有繼續改良的前途。

人們呼喊蘇聯的『滅亡』，資本主義國家的『興旺』等等。那些『意料不到的』，忽然落在經濟恐慌的漩渦裏而還不能夠脫離一落千丈的危險的那些國家，就必然的要滅亡，——這樣說法不是更正確些嗎？

他們資本家那裏嚴重的失敗和我們蘇聯嚴重的勝利，這些原因究竟在那裏呢？

人們說，國民經濟的局面與資本的多少很有關係。這當然是對的，資本的缺乏，是不是能夠說明資本主義國家的恐慌，資本多餘，是不是能夠說明我們蘇聯的興旺呢？不，當然不能。誰都知道，蘇聯的資本比資本主義國家要少得多。假使這裏問題是靠積累的情形來決定，那末，我們應該是恐慌，而資本主義國家應該是興旺了。

人們說，經濟情形要看經濟人材在技術上和組織上的準備來決定。這當然是對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恐慌是不是可以由技術人材的缺乏來說明，蘇聯的興旺是不是可以用技術人材的多餘來解釋

呢？不，當然不能。誰都知道，資本主義國家裏的熟練的技術人材，比我們蘇聯要多得多了。我們從來沒有隱瞞過，而且也不預備隱瞞，在技術方面，我們是德國人、英國人、法國人、意大利人、首先，最主要的就是美國人的學生。不，雖然人材問題對於國民經濟的發展是有很多的意義，但這個問題，不是靠技術人材的多餘或缺乏來決定的。

也許問題的解答，是在我們文化程度比資本主義國家高吧？又不是。大家都知道，我們羣衆的一般文化程度，比美國、英國和德國等等要低。不，雖然文化程度對於國民經濟的發展有很嚴重的影響，但問題不在乎羣衆文化程度。

也許原因是在乎資本主義國家領導人的個人能力吧？又不對，恐慌是和資本主義統治的進攻同時產生的。資本主義定期的經濟恐慌，已經發生了一世紀多，每過十二年、十年或八年重複一次。資本主義的一切政黨，資本主義的一切多少有名的行動家，從最有『天才的』起，一直到最普通的爲止，試用過全部的精神去『預防』或『消滅』恐慌。但是，他們都失敗了。胡佛*和他的黨徒也失敗了，這有什麼奇怪呢？不，雖然資本主義的領導者和政黨在這裏有很大的意義，但問題不在於資本主義的領導者和政黨。

那末，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

蘇聯雖然文化落後，資本缺乏，技術上鍛鍊過的經濟人材的缺少，可是，經濟還是處在繼續發展的狀態，在經濟建設方面有重大的勝利；而資本主義先進的國家，雖然資本多餘，技術人材多餘，文化程度比較要高，可是，還是處在繼續加緊的經濟恐慌情形之下，在經濟發展方面敗了一陣

* 胡佛是美國的現任總統。

又一陣——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原因是在乎我們和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不同。

原因在乎資本主義經濟的制度不用。

原因是在乎蘇維埃經濟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比較起來，有他的優點。

什麼叫做蘇維埃經濟制度呢？

蘇維埃經濟制度就是：

(一) 資產階級的政權已經被推翻，由工人階級的政權來替代；

(二) 生產工具、土地、工廠、製造廠等等，從資本家那裏奪下來，轉交給工人階級和勞動羣衆佔有；

(三) 生產的發展不受競爭的原則和保證資本主義利潤的原則所支配，而受有計劃的指導和有系統的提高勞動者物質條件和文化程度的原則所支配；

(四) 國民收入的分配，不是使剝削階級和他們許多的寄生蟲發財，而是爲有系統的提高工農的物質地位和擴大城市和鄉村中社會主義的生產；

(五) 有系統的改良勞動者的物質條件，他們需要（尤其是購買力）的增加（是擴大生產的經常增加的根源）担保工人階級不遭受生產過剩的恐慌和失業者增加等等的苦痛。

(六) 工人階級是國家的主人，他們不是爲資本家而做工，而是爲本階級做工。

什麼叫做資本主義制度呢？

(一) 國家的政權是屬於資本家的；

(二) 生產工具是集中在剝削者手中；

(三) 生產不是受改良勞動羣衆的物質條件的原則所支配而是受担保資本主義高度利潤的原則所支配；

(四) 國民收入的分配，不是爲改良勞動者的物質地位而是保證剝削者的高度利潤；

(五) 資本主義合理化和生產很快的發展，目的爲的是担保資本家高度的利潤，這樣就遇到障礙，遇到千百萬勞動羣衆窮苦的境地和物質保證的減少，他們往往不能滿足自己的需要，甚至最低限度的需要都不能滿足，這樣就必然立刻的產生生產過剩的恐慌，失業者的增加等等；

(六) 工人階級是被剝削的階級，他們不是爲自己而做工，是爲另一個階級即剝削階級來做工。蘇維埃經濟制度和資本主義組織比較起來，就有這些優點。

我們蘇聯羣衆消費（購買力）的增加，總是超過生產的擴張，推動生產前進；在資本家那裏，情形恰恰相反，羣衆消費（購買力）的增加，總是趕不上生產的擴張，總是落在後面，這樣就使生產轉入恐慌。原因就在這裏。

在資本家那裏，在恐慌時候，消滅商品的『剩餘』，燒燬農產品的『多餘』，以維持高價和保證高度利潤；而在蘇聯，犯這樣罪的人，就送他到瘋人院裏去了。（鼓掌聲）原因就在這裏，

在資本家那裏，工人罷工，示威，組織革命鬪爭，反對現存的資本主義政權；而在我們蘇聯，我們見到幾千萬工農偉大的勞動競賽，預備用自己的胸膛去保護蘇維埃政權。

蘇維埃國內情形的穩固堅定，資本主義國內情形的不穩固和動搖，它的原因就在這裏。

我們應該承認，不知道那裏去安放生產的『多餘』，而不得不在羣衆窮困和失業的時候去燒燬『多餘』的那種經濟制度，應當自己替自己定死罪。

最近幾年是實際試驗的時期，是蘇維埃和資本主義兩種經濟制度考試的時期。在這幾年來，蘇

維埃制度『滅亡』和『破產』的預言，已經是說得太充分了。資本主義『興旺』的論調和讚美，還要多些。怎麼呢？這幾年却更重複的證明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是不中用的制度，蘇維埃經濟制度則有許多的優點，這些優點，無論是那一個資產階級的國家，不論是最『民主的』也好，最『全民的』也好，以及其他的也好，都不敢夢想的。

列寧在一九二一年五月聯共代表會議上的演說中說：

『現在我們用自己的經濟政策作爲促進世界革命的主要工具。大家都注意蘇維埃俄羅斯共和國，世界上各國的勞動者，毫無例外的，毫無誇大的，都注意蘇俄，這一點，已經達到了。資本家既不能不作聲，又不能掩蓋，因此，他們就最注意我們的經濟錯誤和我們的弱點，在這方面，鬭爭轉移到全世界上去了。我們解決了這種任務，那末，我們大概就澈底的在全世界上得到了勝利。』（『列寧全集』，第十八卷，上冊，第二八二頁）

我們應該承認，列寧所提出的任務我們黨已經很順利地完成了。

（九）目前的任務

A 一般的

一，首先就是在蘇聯正確地分佈工業的問題。無論我們怎樣的發展國民經濟，但要是不正確的分佈國民經濟中各主要部門的工業是不行的。現在的問題，就在於我們的工業和我們的國民經濟，主要的是依靠烏克蘭的煤礦和五金工業的基礎，很明顯的，沒有這種基礎，是不能使國家工業化的。我們烏克蘭的燃料和五金基礎。就是這樣的基礎。可是祇這一個基礎，將來是不是能夠滿足蘇聯南部、中部、北部、東北部、遠東、土耳其斯坦的需要呢？所有的材料都告訴我們，這是不能夠的。

我們經濟發展中的新現象之一，就是這個基礎對於我們已經是不够了。新的工作就是盡量的發展這個基礎，同時，即刻開始創造第二個石煤五金的基礎。烏拉爾·苦慈聶茨的『康平納脫』（大聯合）就是這種基礎，它把苦慈聶茨的焦煤和烏拉爾的鐵礦聯合起來。（鼓掌聲）尼日聶建造汽車廠，却亮平斯克建造拖拉機廠，斯維得洛夫斯克在設立機器製造廠，沙拉託夫和新西伯利亞設立『康拜因』廠；西伯利亞和哥薩克斯坦有色金屬業的發展，需要在東方設立修理機器的工場和主要的五金工廠；最後，決定在新西比司克和土耳其斯坦建造紡織工廠，——因為這些情形，所以急切需要立刻着手進行在烏拉爾組織第二個石煤五金基礎。

你們都知道，我們黨的中央，對於烏拉爾五金工廠的問題，就是根據這種精神在決議裏決定的。

二，再，就是在蘇聯正確的分佈鄉村經濟基本部門的問題，照農作物的種類和部門而使我們各州專門化的問題。很明顯的，在小農經濟之下，嚴格的實行專門化是不可能的。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小經濟是不穩固的經濟，沒有必需的積蓄，不得不在自己田上分種各種各樣的植物，為的是如果在一種植物上受了損傷，還可以從別的植物上得着補償。大家都都很明白，在國家掌握中，倘若沒有相當穀類的積蓄，那就不能做專門化的工作。現在，當我們轉到大經濟和在國家掌握中有了穀類的積蓄的時候，我們可以而且應該提出正確的按照植物和部門實行專門化的任務來，而澈底的解決五穀問題，却是這種工作的起點，我說這是『起點』，因為不解決五穀問題和在畜牧區、棉花區、油區、麻區和煙草區設立糧棧，那就不能夠把牧畜業和原料植物的耕種向前推進，就不能保證在我們各州裏按植物種類和部門來實行專門化。

這裏的任務是要利用一切已經開關的可能性，推動這件工作前進。

三、還有工農業中的幹部人材問題。大家都知道，我們的經濟幹部人材、我們的專門家、技術家、經濟工作人員等底技術準備的薄弱。又因爲一部份專門家和從前的主人發生關係，受國外的慫恿，領導賊害事業，因此問題就複雜了。問題又因爲另外一個原因就弄得尤其複雜了。這個原因，就是我們許多作經濟工作的共產黨員，在這方面不表示他底革命警備心，時常成爲賊害份子精神上的俘虜。可是在我們面前，擺着偉大的改造全部國民經濟的任務，需要大批新的人材來指揮新的技術。因此，我們的人材問題，就變成真正最可注意的問題了。

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是用的下列的辦法：(一) 堅決地與賊害份子奮鬥；(二) 極端注意和機警的去對一切與賊害份子無關的大多數的專門家、技術家（我們說的不是烏斯特略洛夫一類的花言巧語、賊頭狗腦的東西，我說的是真正科學人材，和工人階級一心一意做工，不賣弄『鬼聰明』的人們）；(三) 組織國外來的技術幫助；(四) 派送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到外國去學習和學到技術經驗；(五) 把技術學校轉交給相當的經濟機關，爲的是從工人階級中間最快的養成足量的技術家和專門家。

這裏的任務，就是推廣這種工作，實現這些辦法。

四、反對官僚主義的問題。官僚主義的危險，要先，就是官僚主義埋沒了隱藏在我們系統中的無數可能，不利用他們，企圖把羣衆的創造性化爲烏有，關在事務房裏，使黨的每種新的發端都變成細小無聊的的貪慾。第二，官僚主義的危險，就是官僚主義經不起關於執行情形的審查，它企圖把領導機關的主要指示變成紙上的、和實際生活完全脫離關係的空話。不僅那些鑽在我們機關中的舊官僚是有危險的，而新的官僚份子、蘇維埃的官僚份子也是危險的，並且比舊官僚更危險，至於在蘇維埃官僚中間，『共產黨員』的官僚份子還起很大的作用。我說的是有些『共產黨員』，他們用

辦公處的命令、『吩咐』（他們相信這些東西的力量，好像相信偶像一樣）的方法，去代替幾千萬工農羣衆的創造性和自動性。

這裏的任務，就是打倒我們機關中和組織中的官僚主義，消滅官僚主義的『道德』和『習慣』，肅清道路，好去利用我們系統中的可能，發展羣衆的創造性和獨立性。

這種任務並不容易，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解決的，倘若我們想根據社會主義的原則來真正改造我們國家，那末，我們無論如何需要把它解決。

在反對官僚主義的鬭爭中，黨的工作向四方面進行：發展自我批評，審查各種工作執行的程度，清洗機關，從工人階級中自下提拔忠實的工作人員到機關中去。

這裏的任務，就是要努力實行這些辦法。

五，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問題。倘若不在工農業中有系統的提高勞動生產率，那末，我們就不能解決改造的任務，我們不但是不能趕上和趕過資本主義先進的國家，而且甚至於不能保持自己的獨立存在。因此，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問題對於我們有頭等意義。

黨在這個問題解決方面的辦法，是向三方面進行的：有系統的改良勞動者的物質條件，在工業和鄉村經濟企業中確定同志式的勞動紀律，組織社會主義競賽和模範隊運動。所有這些辦法，都要依靠技術的改良和合理的組織勞動。

這裏的任務，就是繼續擴張羣衆運動去實行這些辦法。

六，供給問題。這是關於充分的供給城市和鄉村的勞動者必須商品的問題，合作社機關適應工農需要的問題，有系統的增加工人實際工資的問題，降低工業品和農產品價格的問題。關於合作社的缺點，我已經講過了。必須消滅這些缺點，實行降低價格的政策。至於說到商品的缺乏（商品饑

荒)，那末，我們現在可以擴充很堅固的輕工業的基礎，推進羣衆消費品的生產。糧食的供給可以算是已經有了保障。肉類、牛奶製造品和菜蔬的供給比較困難些。可惜這種困難不能在幾個月之內消滅它。爲要戰勝這種困難，至少必須一年。一年以後，因爲有了特別組織的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我們就能夠完全保證肉、牛奶製造品和菜蔬的供給。當我們在自己的掌握中，已經有了糧食的積蓄、紡織品、加緊工人住屋的建築、廉價的市政設備的時候，再去解決其他的貨品供給的問題，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去調理決定工人預算和工人實際工資的一切基本原素。這就是要澈底的保證工人實際工資迅速的增加。

這裏的任務，就是在這方面發展我們一切組織底工作。

七，信用借貸和貨幣流通問題。合理的組織信用借貸事業，正確的處置貨幣積蓄，這對於國民經濟的發展有很嚴重的意義。黨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是按兩方面進行的：在國家銀行中集中一切短期借款，在社會部份中組織不用現款的支付。因此，第一，國家銀行變成計算生產和生產品分配的全國機關；第二，從流通中即閑出許多錢。毫無疑義的，這些辦法會促進（現在已經促進了）全部信用借貸事業的就緒，鞏固我們的『切爾達涅赤』*。

八，積蓄問題。我們已經講過好幾次，現在用不着再來重複了，一般的國家，尤其是我們的國家，不能夠沒有積蓄的。我們在糧食、商品、現金方面都有相當的積蓄，我們的同志們現在可以感覺到這些積蓄的好作用了。但是，『相當的』積蓄，對於我們是不足用的。我們在各方面都需要更結實的積蓄。

* 『切爾達涅赤』等於十個盧布，蘇維埃新金本位的單位。

B 工業方面

一，主要的問題，就是加緊發展鋼鐵業。你們要注意，祇到今年，一九二九——三〇年，我們才達到了戰前產鐵的程度和超過它。對於全部國民經濟，這是一種很大的危險。爲要消滅這種危險，應該着手加緊的發展鋼鐵業。到五年計劃底，我們不是應該像這個五年計劃所規定的那樣，祇有一千萬噸鐵，而是應該有一千七百萬噸。倘若我們願想認真的發展我們國家工業化的事業，那末我們無論如何應該完成這種任務。

布爾塞維克應該表示他們是能够應付這種任務的。

這當然不是說，我們應該拋棄輕工業。不，不是這樣說。至今我們到處節省，其中也節省了輕工業，爲的是要恢復重工業。但是，我們現在已經恢復了重工業。現在祇要繼續向前發展就好了。現在我們可以注意輕工業，加速度的推動它前進。我們工業發展中的新現象之一，就是，我們現在能够加速的同時發展重工業和輕工業。今年超過了耕種棉花、麻和糖蘿蔔底計劃，順利的解決了「根頭兒」*和人造絲的問題，——這都是證明我們能够真正的推進輕工業。

二，合理化、減低成本費、改良生產品質的問題。在合理化方面的破綻，降低成本費方面的虧空，許多企業中生產品質的惡劣，是再不能忍耐了。這些虧空和缺點，到處箝制我們的國民經濟，不讓它前進。早已到了結束這些可恥的污點的時候了。

布爾塞維克應該表示他們是能够應付這種任務的。

三，專責制的問題。在各企業中，破壞實行專責制的情形也是受不了的。工人呢，却在發怨言

*「根頭兒」是蘇的一種，產在中亞細亞。

說：『工廠裏沒有做主的』，『工作中沒有秩序』。再也不能忍耐使我們的企業從生產機關變為國會了。最後，我們黨和工會機關，應該懂得，沒有專責制，不嚴格地規定誰對工作負責，我們就不能夠解決改造工業的任務。

C 農村經濟方面

一，牧畜和原料植物問題。現在，當我們已經能夠根本解決五穀問題的時候，我們可以開始解決牧畜問題（這在現在真正迫切的問題），同時也可以開始解決原料植物的問題了。在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們應該照着解決五穀問題的方向做去。這就是說，用組織蘇維埃農場的方法（這是我們政策的基本點），逐漸改造現在小農牧畜和小農原料植物的技術基礎和經濟基礎。『牧牛業』，『牧羊業』，『養豬業』，『牛油牛奶託拉斯』，加上牧畜業集體農場原料植物方面的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這就是解決當前問題的出發點。

二，繼續發展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建設的問題。用不着申說，這個問題是我們全部鄉村建設中的頭等問題。現在就是瞎子也看到，農民根本的從舊制度轉向了新制度，從富農的奴役轉向了自由的集體農場底生活。再也不會回復到舊制度去了。富農的命運是必被消滅。留下來祇有一條路，集體農場的道路。集體農場的道路已經不是馬馬虎虎的東西。它們已經由農民羣衆自己千百次地試驗過和審查過了。試驗過和審查過，當它是新的東西，它能够解放農民脫離富農的奴役，不至於貧乏，反能脫離黑暗。我們的成績就在這裏。

鄉村中的新運動將怎樣的繼續發展下去呢。蘇維埃農場繼續的前進，它是改造農村中舊制度的主要骨幹。許多的集體農場，繼續的前進，它是改造農村中舊制度的主要骨幹。許多的集體農場，就好像農村中新運動的根據地，跟在蘇維埃農場後面前進。這兩種系統底統一的工作，造成了蘇聯

各州完全集體化的條件。

集體農場運動中最可注意的成績之一，就是它能够從農民自身中間，順利的提出成千的集體農場的組織者和成萬的集體農場的鼓動者。現在已經不祇是我們熟練的布爾塞維克，而是集體農場中的農民自己，集體農場事業的成千萬的農民組織者和鼓動者來掌管集體化的旗幟前進。而農民的鼓動者是集體農場運動中最好的鼓動者，因為他們找到特別的說法，使其他農民羣衆容易懂得，容易接受，這是我們熟練的布爾塞維克所夢想不到的。

有些地方喊出必須放棄統盤集體化的聲音來。這裏有材料，證明甚至於我們黨內也有這種『思想』的同情者。但是，祇有不自覺地或自覺地和共產主義底敵人打成一氣的人們，才能說這樣的話。統盤集體化的方法是必要的方法，沒有這種方法就不能夠完成全蘇聯各州集體化的五年計劃。若想不叛賣共產主義以及工人階級和農民的利益，怎樣可以放棄這種方法呢？

這當然不是說，在集體農場運動方面，什麼都是『平安的』和『舒適的』。集體農場內部還要動搖。加入和退出還要發生。但是，這不能也不應該激怒集體農場運動的建設者。這更不能够算是集體農場運動強大發展上的嚴重障礙。像集體農場運動那樣健全的運動，當然是無論如何，不顧任何的和各別阻礙困難，總是要達到自己的目的。

這裏的任務就是，準備力量，安排事業，使集體農場運動繼續發展。

三，使各機關盡量地接近各區和各鄉的問題。毫無疑義的，倘若我們不實行分區，我們是不能夠舉行改造鄉村經濟和發展集體農場運動底偉大工作的。擴大各鎮，把它改變為區，消滅省，把它變為比較小的單位（府），最後，成立州，作為中央直接的根據地。這是分區的總形勢。分區的目的，就是使黨、蘇維埃、經濟機關和合作社機關接近區和鄉，使它們能够按時的解決鄉村經濟中、

它的發展中、它的改造中的緊急問題。再說一遍，在這方面，分區對於我們全部建設有很大的幫助。

要使各機關真正的接近，認真的接近各區和各鄉，在這方面是不是已經什麼都做到了呢？不，還沒有都做到。現在集體農場建設的重心轉到區的組織去了。從這裏發出集體農場和鄉村中一切其他經濟工作的線索，無論是合作社方面，蘇維埃方面，信用借貸機關方面，收買方面，都是這樣。我們是否充分供給了必須的、必要的工作人員給各區的組織來舉行所有這些各種各樣的工作呢？毫無疑義的，供給他們的工作人員是太不充分了。但有些什麼辦法呢？爲要改正這些缺點，保證各區組織內我們各部門工作中得有足量的必要工作人員，應該做些什麼呢？現在應該做兩件事：（一）取消府，（鼓掌聲）它變了州和區之間沒有用處的中間物，從府裏解放出來的工作人員，用去加緊各區的工作；（二）各區組織直接和州（和邊疆委員會、民族共和國的中央委員會）發生關係。這就是澈底實行分區，澈底實行使各機關接近各區和各鄉。

在我說到取消府的前途的時候，大家鼓了掌。府當然應該取消。但是以爲因此我們便可以嘲笑府，好像有位同志在『真理報』上所幹的那樣，那就錯了。不應該忘掉，省區曾經負過很偉大的工作，起過很大的作用。（鼓掌聲）我們以爲過分着急地取消府，也是錯的。中央委員會通過決議取消府。但中央委員會並不是以爲這件事情應該立刻舉行。很明白的，在取消府之前應該進行必須的準備工作。

D 運輸方面

最後就是運輸的問題，用不着詳細來說運輸對於全部國民經濟有如何重大的意義。並且不僅對於國民經濟，大家都知道，運輸對於國防上也有很大的意義。運輸的意義雖然重大，可是運輸業以

及運輸業的改造，還是落在一般發展速度的後面。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有一種危險，就是會把運輸變成國民經濟中的『窄路』，能够妨礙我們的前進，——這還需要證明嗎？還沒有到結束這種現象的時候嗎？

河上運輸的情形特別壞。事實是：伏爾加河輪船的運行，差不多不能達到戰前的百分之六十，第列泊爾河上達到百分之四十。達到戰前百分之六十和四十，這就是河上運輸所能寫入它的『成績』表上的東西。不必說，這是很大的『成績』。不是到了消滅這種可恥情形的時候嗎？（呼聲：『到了！』）

最後，這裏的任務就是用布爾塞維克的精神來進行運輸業，推動它前進。
這就是黨的當前任務。

實行這些任務，需要些什麼呢？

首先，主要的，需要繼續在整個戰線上發展向資本主義份子的進攻，澈底進攻到底。
我們政策的中心點和基礎就在這裏。（鼓掌聲）

選自斯大林選集第四卷一九三九年解放社版

『聯共（布）第十六次大會上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與總結』第一七八至二四五頁

論經濟工作人員底任務

——一九三一年二月四日在第一次全蘇聯

社會主義工業工作人員代表會議上的演說——

同志們！你們的代表會議工作快要結束了。現在你們要通過決議了。我相信你們的決議草案一定會一致通過的。在這些決議中——你們的決議，我是略知大概的——你們將贊同一九三一年工業發展大綱，並擔負起完成這個大綱的責任。

布爾塞維克所說的話，不是說得好玩的。布爾塞維克總是約許了就要執行的。可是，担起完成一九三一年大綱的責任，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保證把工業生產總量增加百分之四十五。而這乃是一個很大的任務。不僅如此。你們担起這樣的責任，那就是說你們不僅約許要在四年內完成我們的五年計劃，——這是已經解決的事情，再不須要有什麼決議，——而且約許要在三年內完成我決定意義的基本工業部門方面的五年計劃。

代表會議的約許完成一九三一年計劃，約許在三年內完成五年計劃，這當然很好。但我們已經受過『辛酸經驗』的教訓。我們知道，約許並不是時常都被履行的。在一九三〇年初，也曾約許過完成該年度的計劃。當時必須把我們的工業生產額增加百分之三十一，百分之三十二。但這個約許是沒有完全履行的。事實上，一九三〇年的工業生產額只增加百分之二十五。我們應當問一問：今年不會重複這種情形麼？現在，我們的工業領導者，我們的工業工作人員約許在一九三一年度把工業生產量增加百分之四十五。可是，有什麼東西能担保這次約言一定會實現呢？

爲要完成大綱，爲要把生產額增加百分之四十五，爲要不是在四年內，而是在三年內完成有決定意義的基本部門方面的五年計劃，就要有什麼條件呢？

爲此就要有兩個基本條件：

第一是要有實在的可能性，或如我們通常所謂『客觀的』可能性。

第二是要有領導各企業的志願和技能，以便把這些可能性變爲現實。

我們去年有過完成計劃的『客觀的』可能性麼？是的，是有過的，關於這一點，有許多不容置辯的事實可以證明。這些事實就是去年三四月間，工業生產額超過前年百分之三十一。試問我們爲什麼沒有完成全年計劃呢？什麼東西阻礙了這一點呢？什麼東西不夠呢？就是利用現有可能性的技能不夠。正確領導工廠礦井的技能不夠。

我們有了第一個條件，即完成計劃所必要的『客觀的』可能性，可是我們却沒充分具備有第二個條件，即領導生產工作的技能。而正因爲領導生產工作的技能不夠，所以計劃也就沒有完成。我們沒有把工業生產額增加百分之三十一，三十二，而僅僅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

當然，百分之二十五的增長額已算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在一九三〇年，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底生產量都沒有什麼增長，而且現在也沒有什麼增長。相反的，無論那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底生產都是一落千丈的，在這樣的條件下，百分之二十五的增長額已算是一大進步。可是，我們本來能夠增加得更多，因爲我們曾有一切必要的『客觀』條件。

那末，要怎樣才可担保不致又重復去年的怪事，才可担保完全完成計劃，才可使所有的可能性都被我們儘量利用，才可使你們的約言不致有一部份仍舊成爲紙上空文呢？

在各國家歷史中，在各國度歷史中，在各軍隊歷史中，往往有這樣一種情形：當時雖有得勝奏

捷的一切可能性，可是這些可能性並沒有加以利用，因為領導者沒有看見這些可能性，沒有善於利用這些可能性，於是軍隊也就遭受了失敗。

我們有為完成一九三一年大綱所必需的一切可能性麼？

是的，我們有這種可能性。

這種可能性是什麼呢，要有什麼條件才可把這種可能性變為現實呢？

首先，就要我國具備有充足的天然富源：鐵礦，煤炭，石油，糧食和棉花。我們有這些東西麼？是有的。而且比任何其他國家都多些。就拿烏拉爾來說吧，烏拉爾是任何一國都沒有的富源匯集區，鐵礦，煤炭，石油，糧食，都是樣樣俱全，應有盡有！我國除橡皮以外，是連什麼都有的。而且再過一兩年，我們就連橡皮也會有了。在這方面說來，就天然富源來說，我們是完全有保障，甚至綽綽有餘的。

還要有什麼呢？

還要有一個願意而且能夠推動利用這些巨大天然富源來謀人民福利的政權。我們有這樣一個政權麼？是有的。固然，我們在利用天然富源方面的工作，有時不免遇到我們自己工作人員中間的磨擦。譬如，蘇維埃政權去年在建立第二個煤鐵根據地的問題上，不得不作一些鬭爭，而我們沒有第二個煤鐵根據地，是不能繼續向前發展的。可是我們已把這些障礙克服了。我們在最近將來就會有這個根據地了。

還要有什麼呢？

還要這個政權受着千百萬工農羣衆的擁護。我們的政權受着這種擁護麼？是的，受着這種擁護。在全世界上再沒有那一個政權，是如蘇維埃政權這樣深受工農擁護的。我不來援引種種事實，

如社會主義競賽的增長，突擊運動的發展，以及工人羣衆爲迎展工業財政計劃而奮鬥的運動。所有這些顯然證明千百萬羣衆擁護蘇維埃政權的事實，是盡人皆知的。

爲要完成並超過一九三一年大綱，還要有什麼呢？

還要有一個不患資本主義那種無可醫治的病症，而又大大優越於資本主義的制度。危機，失業，浪費和大眾貧困，這就是資本主義無可醫治的病症。而我們的制度却不患這種毛病，因爲政權是握在我們手裏，握在工人階級手裏，因爲我們進行着計劃經濟，有計劃地積累資源，並按國民經濟各部門來加以正確分配。我們不患資本主義所患的那種無可醫治的病症。這就是我們和資本主義不同的地方，這就是我們優勝於資本主義制度的地方，而這種優勝處是有決定一切的意義的。請看資本家是想怎樣擺脫危機吧。他們盡量減低工人工資。他們盡量減低原料和糧食價格，可是他們不願多少認真減低工業品價格。這就是說，他們想用剝削主要商品消費者，用剝削本國工農羣衆，剝削原料糧食出產國的勞動羣衆的辦法來擺脫危機。資本家自己掘毀自己立足的基地。所以結果就不是擺脫危機，而是加深危機，造成一種新的前提來釀成新的更劇烈的危機。我們的優勝處就在於我們根本沒有什麼生產過剩危機，我們沒有而且不會有幾百萬失業工人，我們沒有生產無政府狀態，因爲我們進行着有計劃的經濟。不僅如此。我們的國家是工業最集中的國家。這就是說，我們能够用最優良的技術來建設我們的工業，因而保證空前未有的勞動生產率，空前未有的積累速度。我們過去的弱點就在於我國工業是以渙散狹小農業爲根據的。可是這已成爲過去了。現在情形已經不同了。在不遠的將來，也許再過一年，我們就會成爲世界上農業規模最大的國家。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而它們也就是大農業形式——在今年出產的穀物商品，已等於全國穀物商品總額半數。這就是說，我們的制度——蘇維埃制度——使我們能按任何一個資產階級國家都夢想

不到的速度前進。

爲要一日千里地向前猛進，還要有什麼呢？

還要有一個充分團結一致，能把工人階級一切優秀份子底努力都集中於一個目標上去，富有經驗，不會見難而退，而能一貫實行正確的革命的布爾塞維主義的政策的政策。我們有這樣一個政黨麼？是的，是有的。它的政策正確麼？是的，是正確的，因爲這個政策使我們獲得重大的成功。這一點，現在不僅是工人階級底朋友，就連工人階級底敵人也承認了。請看吧，大家皆知的『高貴』先生——美國的菲詩，英國的邱吉爾，法國的普恩加賚是如何向我們黨拚命狂吠呀。爲什麼他們這樣拚命狂吠呢？就是因爲我們黨底政策正確，因爲這政策使我們獲得節節不斷的勝利。

同志們，這就是使我們易於實現一九三一年大綱，使我們能在四年內，而在有決定意義部門中，甚至能在三年內完成五年計劃的一切可能性。

這樣，爲完成計劃所必需的第一個條件，即『客觀的』可能性，我們是具備了。

我們有沒有第二個條件，即利用這種可能性的技能呢？

換句話說，我們有對於工廠礦井的正確領導麼？在這裏是百事大吉麼？

可惜不是百事大吉。我們既是布爾塞維克，就應當爽直而坦白地說出這一點。

什麼是領導生產呢？我們有些人並不是常常用布爾塞維克觀點來看待企業領導問題的，我們有些人往往以爲領導就是簽署文件。這當然是令人痛心的，但這是事實。有時候令人不得不起謝德林小說中的瞎知事。你們記得瞎知事太太怎樣教訓瞎知事兒子的故事吧。太太對兒子說：不要用功學習啊，不要誦通事理啊，讓別人去幹這種事情吧，這不是你的事情呀，——你的事情就是領導，就是簽署文件。使我們丟臉的，就是甚至在我們布爾塞維克中間，也有不少的人是專靠簽署文件

來進行領導的。如果你要他們諳通事理，精通技術，變成內行，那他們就會連說幾個「不」字了。

試問：我們布爾塞維克是幹過三次革命的人，是在殘酷國內戰爭中獲得了勝利的人，是把最大的工業建設任務解決了的人，是把農民引上了社會主義道路的人，爲什麼在領導生產工作方面竟會屈服於文件呢？

原因就在於簽署文件要比切實領導生產工作容易得多。於是許多經濟工作人員也就走上這條阻力最少的道路。這裏並且有我們的過谷，中央機關底過谷。在十年以前提出了一個口號：「既然共產黨員還不充分瞭解生產技術，既然他們還須要學習管理經濟，那末就讓舊技師、舊工程師和舊專門家去管理生產吧，而你們共產黨員則不要去干預工作技術；可是，雖說不干預，但同時務必努力研究技術，努力研究生產管理學，以便將來能與忠於我們的專門家一同成爲真正的生產領導者，真正的內行」。口號曾是這樣。而在實際上又是怎樣呢？結果，這個公式後一部份是被拋棄了，因爲學習是比紙上署名難些，而這個公式前一部份則被人庸俗化了，「不干預」幾字竟被人曲解爲拒絕研究生產技術。結果竟釀成一種胡說，危險而有害的胡說，這種胡說是擺脫得愈快愈好的。

實際生活本身再三警告過我們說，在這方面的情形不好。沙赫特案件就是第一個警號。沙赫特案件已經指明黨組織和職工會底革命警覺性是不够的。這一事件指明我們經濟工作人員在技術知識方面，實在是落後得不成樣子；許多舊工程師和舊技師，因爲沒有人監督他們的工作，就比較容易滾入暗害道路，尤其是因爲國外敵人又不斷用種種「建議」來纏繞他們。「工業黨」公審案就是第二個警號。

暗害勾當底基本原因當然是階級鬭爭。階級敵人當然是瘋狂反抗社會主義進攻的。可是，單用這一點來解釋暗害勾當如此猖獗盛行的事實，那就不够了。

暗害勾當怎麼會能這樣猖獗盛行呢？這應歸咎於何人呢？這應歸咎於我們自己。如果我們不是那樣處理生產領導事情，如果我們在更早得多以前就已開始研究工作技術，開始精通技術，如果我們更時常而恰當地干預過經濟領導工作，那末暗害份子就會作不出這樣多的暗害事情了。

要我們自己變成專門家，變成工作內行，要我們自己轉而努力學習技術知識，——這就是實際生活推動我們來幹的事情。可是，無論第一個警號，甚至第二個警號，都還沒有保證發生必要的轉變。已經是，而且早已經是面向技術的時候了。已經是拋棄那種過時的不干預技術的舊口號，而要自己成爲專門家，成爲諳通事情者，成爲完全內行的時候了。

有人時常問道：爲什麼在我們企業裏沒有一長制呢？在我們尙未有精通技術以前，我們就沒有一長制，而且不會有一長制。在我們中間，在布爾塞維克中間，還沒有充分數量熟悉技術問題、經濟問題以及財政問題的人材以前，我們就不會有真正的一長制。如果你們不精通工廠礦井底技術、經濟以及財政，那末隨便你們寫多少決議，隨便你們怎樣宣誓，也是無濟於事的，也不會有一長制的。

因此，任務就是要我們自己精通技術，要我們自己成爲工作內行。只有如此，才可以保證我們的計劃完全完成；也只有如此，才可以保證一長制能見諸實現。

● 這當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這是完全可以解決的事情。科學，技術經驗，知識，——凡此種種都是可以求得的東西。今天沒有，明天就會有了。這裏的主要點就是要有布爾塞維克的熱烈志願去精通技術，精通生產學。只要有熱烈志願，那就一切都可辦到，一切都可解決了。

人們有時發問：難道不可稍許減低速度，延緩進展速率麼？不行的，不可以的，同志們！決不可減低速度！恰巧相反，還必須竭力和儘可能增加速度哩。我們在蘇聯工農面前所負的義務要我們

這樣做。我們在全世界工人階級面前所負的義務要我們這樣做。

延緩速度，就是落後，而落後者是要挨打的。但我們不願挨打。不，我們絕對不願意！舊俄羅斯底歷史，其中有一點就是常因落後而挨打。蒙古的可汗打過它。土耳其的貴族打過它。瑞典的封建主打過它。波蘭和立陶宛的地主打過它。英法的資本家打過它。日本的爵士打過它。大家都打過它，就是因為它落後。因為它的軍備落後，文化落後，國政落後，工業落後，農業落後。大家都打過它，就是因為這既可獲利，又不致受到報應。你們記得革命前期的一位詩人底語句吧：『羅斯媽媽啊：你又豐富，你又單薄；你又強大，你又軟弱』。這些老爺們是把舊時詩人底這一段話背得很熟的。他們一面打着，一面又笑罵道：『你既然豐富』，那就不妨靠你發財。他們一面打着，一面又笑罵道：『你既然單薄軟弱』，那就可以隨便打你搶你。打擊落後者，打擊弱者，——這就是剝削者底法則。這就是資本主義弱肉強食的法則。你落後了，你軟弱無力麼，那你就算是無理，於是也就可以打你，可以奴役你。你強大有力麼，那你就算是有理，於是就得小心對待你。

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不可再落後。

在過去，我們是沒有而且也不能有祖國的。但是現在，當我們已推翻資本主義，而我國政權又是工人政權時，我們已有祖國，而且我們將堅持其獨立。你們願不願讓我們社會主義祖國被人打破而喪失獨立呢？如果你們不願意，那你就應當在最短時期內消滅它的落後狀況，而開展其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的真正的布爾塞維克的速度。除此而外，再沒有別的辦法。正因為如此，所以列寧在十月革命時說過：『或是滅亡，或是趕上並超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

我們比先進國家落後了五十以至一百年。我們應當在十年以內跑完這個距離。或者是我們能做到這一點，或者就是我們會被人打翻。

這就是我們在蘇聯工農面前的義務所要求於我們的。

可是，我們還有其他一種義務，更鉅大更重要的義務。這就是我們在世界無產階級面前的義務。這種義務是與第一種義務相符合的。但我們却把這種義務看得更高。蘇聯工人階級是世界工人階級中的一部份。我們所以勝利了，不僅是由於有蘇聯工人階級努力，而且是由於有世界工人階級擁護。如果沒有這種擁護，那我們就會早被粉碎了。人們說，我國是全世界無產階級底突擊隊。這當然說得很好。但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就担负有極重大的義務。國際無產階級爲什麼擁護我們呢？我們爲什麼配受這種擁護呢？就是因爲我們最先動手去與資本主義交鋒，我們最先建立了工人政權，我們最先開始了社會主義社會建設。就是因爲我們所做的事情一經成功，就會翻轉整個世界而解放全體工人階級，可是要怎樣才能達到這個成功呢？就是要剷除我國落後情況，加強布爾塞維克高度建設速度。我們應當如此前進，使全世界工人可以望着我們說道：看哪，這就是我們的先鋒隊，這就是我們的突擊隊，這就是我們的工人政權，我們的祖國，他們幹着他們自己的事情，也就是幹着我們大家的事情，他們幹得好，讓我們大家來幫助他們反對資本人家，並促進世界革命事業吧。我們應當不辜負世界工人階級這種厚望麼，應當履行我們在他們面前的義務麼？是的，是應當的，如果我們不願完全丟臉的話。

這就是我們的義務，我們的國內義務和國際義務。

你們看，就是這些義務要我們採取布爾塞維克的發展速度。

我並不是說我們近幾年來在經濟領導工作方面沒有絲毫成績。有的，而且很多。我們已把工業出產量增加到超過戰前一倍了。我們已創立起世界上最大的農業生產。可是，如果我們在這個時期中努力認真精通了生產，精通了生產技術，精通了生產底財政和經濟，那我們就會能作出更多的成

續來。

我們至多是在十年當中就要跑完我們落後於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距離。我們有一切「客觀的」可能性來做到這一點。所缺乏的，只是真正利用這些可能性的技能。而這是取決於我們自己的。並且只是取決於我們自己的！已經是學會利用這些可能性的時候了。已經是拋棄那不干預生產工作的腐敗方針的時候了。已經是領會另一個方針，即適合現時期的要干預一切的新方針的時候了。你既是個工廠經理，就得干預一切事務，就要熟悉一切而連什麼也不要忽略過去，就得學習，再三學習。布爾塞維克應當精通技術。已經是布爾塞維克自己成爲專門家的時候了。在改造時期，技術決定一切。一個担任經濟工作的人，竟不願意研究技術，不願意精通技術，那就是鬧笑話，而不是經濟工作人員了。

有人說，精通技術是一件困難事情。這是不對的！布爾塞維克是無堅不摧，無攻不克的。我們已解決了許多最困難的任務。我們已推翻了資本主義制度。我們已取得了政權。我們已創立了極大的社會主義工業。我們已把中農引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建設方面最重要的事情，我們已經做成了。剩下來要我們做的事情，已經是不多了：就是要研究技術，精通科學。而當我們做到這步時，我們就會有我們現在夢想不到的速度。只要我們真正願意這樣幹，我們是一定會做到這步的！

新的環境和新的經濟建設任務

——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在經濟工作人員會議上的演說——

同志們！從這次會議所有材料當中可以看出，我們各工業部門執行計劃的情形是十分參差不齊的。在過去這五個月當中，有些工業部門出產量比去年同時期內增加了百分之四十至五十，而有些工業部門却只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最後，還有個別工業部門增加得極少極少，即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十，或且增加得更少。屬於最後這一種工業部門的，有採煤業與黑色金屬冶鑄業。你們看，情形是參差不齊的。

爲什麼有這樣參差不齊的情形呢？爲什麼某些工業部門落後呢？爲什麼某些工業部門只增加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而採煤業與黑色金屬冶煉業增加得更少，因而落後於其他部門呢？

就是因爲近來工業發展條件已經根本改變了，已形成了一種要求採取新式領導方法的新環境，而我們的某些經濟工作人員，却沒有改變工作方法，仍然拘守成規，按照舊方式工作着，所以問題就在於保證工業發展的新條件本來是要求採用新式工作方法，而我們有些經濟工作人員却不瞭解這一點，不瞭解現在有採用新式領導方法之必要。

這就是我國工業某些部門落後的原因。

保證我國工業發展的新條件，究竟是什麼呢？這些新條件是怎樣形成的呢？

這些新條件至少有六個。

現在讓我們來考察這些條件吧。

(一) 勞動力

首先就是要保證各企業勞動力的問題。從前，工人照例都是自動跑進到工廠裏來，所以當時在這件事情方面是有過某種自流动性。其所以如此，是因為當時有失業人口，有農民分化，有貧困，有逼迫人們離鄉進城的飢餓恐怖。你們大概還記得所謂『鄉下佬從鄉下逃進城裏去』的公式吧？當時有什麼東西迫使農民從農村裏跑進城市呢？就是因為有飢餓恐怖，因為有失業，因為當時農民覺得農村是他們的後母，而總想逃開她，隨便逃到什麼地方去，只要找得到一點什麼工作就行了。

在不久以前，我國情形曾是如此，或者幾乎是如此。

可以說我國現在的情形也是這樣麼？當然是不可這樣說的。恰巧相反，現在環境已經根本變更了。正因為環境已經變更了，所以我們也就再沒有勞動力自流动性了，在這一時期期中，究竟發生了什麼變更呢？第一，我們已經消滅了失業現象，因而也就消滅了壓迫『勞動市場』的力量。第二，我們已根本打破了農民分化的現象，因而也就消除了驅使農民由農村逃到城市的普遍貧困現象。最後，我們用數萬架拖拉機和農業機器供給了農村，擊潰了富農，組織了集體農莊，使農民有像人類那樣來生活和工作的可能。現在已經不可把農村叫作農民的後母了。正因為不可把它叫作後母，所以農民便留在鄉裏安居樂業，於是在我們這裏也就沒有『鄉下佬從鄉下逃進城裏去』的現象，也就沒有勞動力自流动性了。

由此可見，我們現在已有了完全新的環境和保證各企業勞動力的新的條件。

但由此就應得出什麼結論呢？

第一個結論，就是現在已不可再指望於勞動力自流性了。這就是說，應當拋棄自流『政策』，而採取有組織地招收工人來供工業需要的政策。可是，要做到這步，就只有一個辦法，即各經濟組織與集體農莊和集體農莊莊員們訂立合同的辦法。你們知道，某些經濟組織和集體農莊已經開始採用這種辦法，而且實際經驗已經表明訂立合同的辦法，無論對於集體農莊或工廠企業，都是很有功效的。

第二個結論，就是必須立刻實行把最繁重的生產手續機械化，並儘量開展這件事情（例如木材工業，建築業，採煤工業，裝卸工作，運輸業，黑金屬冶煉業等等）。這當然不是說要拋棄手力勞動，恰巧相反，手力勞動還會長期在生產中發生極大作用的。但這是說：生產手續機械化，是我們所應實行的一個新穎的和有決定意義的辦法，否則不能支持我們的發展速度，也不能維持我們的新生產規模。

我們還有不少經濟工作人員，他們是『不相信』機械化，也『不相信』各企業與集體農莊訂立合同的。這就是那些不懂得新環境，不願意按新方式去工作，而眷戀着勞動力『自流』到企業中來的『舊日黃金時代』的經濟工作人員。不待說，這種經濟工作人員是與我們在新環境中所負的新的經濟建設任務相隔天壤的。他們大概認為勞動力方面是困難是一件偶然事情，認為缺乏勞動力的現象將會自行消滅，將會按所謂自流方式消滅下去。這是錯誤的想法，同志們。勞動力方面的困難，決不會自行消滅。這種困難是只有靠我們自己努力工作，才可消滅的。

總之，任務是要用與集體農莊訂立合同的辦法，來有組織地招收工人，同時要把生產手續機械化。

保證我國工業發展的第一個新條件問題，就是如此。

現在我們來說第二個條件。

(二) 工人工資

我剛才已經說過了有組織地招收工人來供我們各企業需要的問題。可是，招收工人還不能完全了事。爲要保證我們各企業都有勞動力，還須把工人固定在生產中，使企業裏工人成份相當固定起來。沒有相當精通了技術，熟習了新式機械的固定工人成份，便無法前進，便無法完成生產計劃，這是無待證明的。沒有這種固定工人成份，就會要每次都來重新教導新的工人，就會要把一半時間用去教導新的工人，而不是用去進行生產。現在我們所有的實際情形，究竟怎樣呢？可以說我們各企業裏工人成份是相當固定的麼？可惜還不可這樣說。恰巧相反，在我們各企業裏，還有所謂勞動力流動性。而且在許多企業裏，勞動力流動性不僅沒有消滅，反而增長，反而加強起來了。無論如何，在半年當中，或者甚至在一季當中，沒有至少是百分之三四十的工人成份變更的企業，是不多見的。

從前在工業恢復時期，我們的技術設備還不複雜，生產規模還不宏大，尚可稍許『容忍』所謂勞動力流動性。現在情形却就不同了。現在環境已經根本改變了。現時在擴展改造時期，生產規模已經擴大，技術設備已是極端複雜了，於是勞動力流動性也就成了妨害生產的奇災大禍，足以紊亂我們企業了。在現時還『容忍』勞動力流動性，就會瓦解我國工業，消滅完成生產計劃的可能，破壞改善產品質量的可能。

勞動力流動性底原因何在呢？

就在於工資定得不對，就在於工資標準定得不對，就在於工資方面有一種『左的』平均主義。我們許多企業裏現行的工資標準，幾乎是把熟練勞動與不熟練勞動間的差別，繁重勞動與輕易勞動間的差別完全抹煞了。因為有這種平均主義的現象，於是不熟練的工人也就不樂於變為熟練工人，因而喪失了上進的前途，於是他就覺得自己是這企業裏的『臨時住客』，只是暫時在這裏做做工，『賺幾個錢』，而過後就跑到別處去『尋找幸福』。因為有這種平均主義的現象，於是熟練工人也就不得不從一個企業跑到別一個企業，以便終於找到一個能够真正重視熟練勞動的企業。

由此就有『普遍』流行的那種從一個企業跑到別一個企業的現象，就有勞動力流動性。

要消滅這種禍害，就須取消平均主義，打破舊的工資標準。要消滅這種禍害，就須定出適當的工資標準，注意到熟練勞動與不熟練勞動，繁重勞動與輕易勞動間的差別。熟練展鐵工人所得的工資與掃地工人所得的工資相等的情形，是不可容忍的。火車司機師所得的工資與抄寫人所得的工資相等的情形，是不可容忍的。馬克思和列寧說過：熟練勞動與不熟練勞動間的差別，甚至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甚至在階級消滅以後，也還會存在的；這種差別只有在共產主義制度下才會消滅；因此甚至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工資』也應按各人勞動來發給，而不應按各人需要來發給。可是，我們那些經濟工作人員和工會工作人員中的平均主義者，却不同意這點，而認為在我們蘇維埃制度下，這個差別已經消滅了。究竟是誰說得對呢？是馬克思和列寧呢，還是平均主義者呢？大概是馬克思和列寧吧。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雖在現時忽略熟練勞動與不熟練勞動間的差別，而根據平均主義『原則』來規定工資標準，誰就是離開了馬克思主義，離開了列寧主義。

在每個工業部門中，在每個企業中，在每個車間中，都有一部份主要的被為熟練的工人，我們如果真想保證企業裏有固定的工人成份，就應當首先而且主要是把他們固定在生產中。他們這一部

份主要工人，就是生產工作底基本環節。把他們固定在企業中，固定在車間中。也就是固定全體工人，而根本剷除勞動力流動性。可是，怎樣才可把他們固定在企業中呢？要把他們固定在企業中，就一定要提拔他們上進，提高他們的工資水準，正確規定工資標準，使各工作人熟練程度都能得到應有的報酬。而提拔他們上進，提高他們的工資水準，又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除其他一切而外，還要使不熟練的工人有上進的機會，使他們有力求上進的刺激，力求變為熟練工人的刺激。你們自己知道，我們現在需要有幾十萬幾百萬熟練工人。要培養熟練工人，就須使不熟練的工人有力求上進的刺激和前途。我們愈是大胆這樣辦，結果也就會愈好，因為這是消滅勞動力流動性的基本方法。在這件事情上節省金錢，就等於作惡犯罪，而違反我們社會主義工業底利益。

但這還不能概括一切。

爲要把工人固定在企業裏，還須更加改善工人給養和居住條件。固然，我們近幾年來在住房建築和工人給養方面，已作了不少的事情。可是，我們所已作到的，還完全不够滿足工人們迅速增長的生活需要。決不可藉口說什麼從前住房比現在少些，因此也可以用已有的成績來安慰自己。也不可藉口說什麼從前工人給養比現在不知要壞多少，因此也就可以認爲現有情形已算滿足。只有那些腐化的，完全腐朽了的人，才能藉口往來妄自安慰。不要用往來來做標準，而要拿現在工人日益增長的生活需要來做標準。必須瞭解，我國工人生存條件已根本改變了。現在的工人已不是從前那樣的工人了。現在的工人，我們蘇聯的工人，希望滿足他們自己一切物質和文化的需要，這就是說，他們既要有充足的糧食，又要有安適的住所，而且還要有文化生活以及其他各種需要的保證。他們有享受這些幸福的權利，而我們則負有保證他們這些條件的義務。固然，他們已不復遭受失業痛苦，已擺脫了資本主義桎梏，已不是奴隸，而是自己事業的主人了。可是這還不够。他們還要求

滿足他們一切物資上和文化上的需要，而我們也就應該滿足他們這種要求。你們不要忘掉，現在我們自己也向工人提出一些要求，要求他們遵守勞動紀律，努力工作，實行社會主義競賽，進行突擊運動。你們不要忘掉，絕大多數工人已用無限熱忱接受了蘇維埃政權這些要求，並英勇地執行着這些要求。既然如此，無怪工人們在執行蘇維埃政權這些要求時，也要求蘇維埃政權履行它所負的義務，即更加改善工人物質和文化生活的義務。

總之，現在的任務是要消滅勞動流動性，消滅平均主義，正確規定工資，改善工人生活條件。

保證我國工業發展的第二个新條件的問題，就是如此。

現在我們來說第三個條件。

(三) 勞動組織

上面我已經說過必須消滅勞動流動性，要把工人固定在企業中。可是，單只把工人固定起來，還不能概括一切。單只消滅流動性，還是不够的。除此而外，還須使工人處在相當的勞動條件下，使他們有可能來好好工作，提高生產率，改善產品質量。所以，必須在企業內適當地組織勞動，使生產率能够一月高似一月，一季高似一季。

可以說現在我們企業中的勞動組織實況已適合於現代生產要求麼？可惜還不可這樣說。無論如何，我們總還有一些企業，那裏的勞動是組織得很不好，在那裏並不是秩序井然，工作協調，而是茫無頭緒，雜亂無章；那裏所流行的，並不是各負專責的情形，而是全不負責和無人負責的現象。什麼是無人負責現象呢？無人負責現象就是對所担任的工作，以及對機器、機架和工具不負責任

何責任。在無人負責現象盛行時，當然是談不到什麼真正提高勞動生產率，改善產品質量，愛惜機器，愛惜機架，愛惜工具的。你們知道無人負責現象在鐵路運輸業方面引起了什麼結果，這種無人負責現象在工業中也正引起同樣的結果。我們在鐵路運輸業方面已消滅了無人負責現象，而提高了這方面的工作。我們在工業方面也應當這樣做，以便把這方面的工作提到更高程度。

不正確的勞動組織，是與無人負責以及各人對所担任具體工作不負責任的現象相處得來的。從前，靠這種不正確的勞動組織，還可以勉強『過得去』。現時的情形却不同了。現在環境已經完全不同了。在現今生產規模已經擴大，已經有了許多巨型企業的時候，無人負責現象便是危害我國工業的奇災大禍，能使我們各企業內一切生產上和組織上的成績都受到莫大危險。

為什麼無人負責現象竟能在我們某些企業裏根深蒂固起來呢？它是不正當地跟着不斷生產制混進企業中來的。如果說不斷生產制一定要引起生產中的無人負責現象，那就錯誤了。如果勞動組織得正確，如果每個人都對一定工作負責，如果指定一部份工人來經常使用一定的機器和機架，如果輪流班次安排得正確，各班質量和熟練程度彼此相等，那末不斷生產制就能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改善工作質量，根本剷除無人負責現象。譬如鐵路運輸業中的情形就是如此，現在鐵路運輸業中雖實行着不斷生產制，可是無人負責現象却已不復存在了。可以說我們工業企業裏的不斷生產制實行情形，也是如此順利麼？可惜還不能這樣說。這是因為在我們有些企業裏，把不斷生產制實行得太匆忙了，沒有預備好相當條件，沒有適當地佈置質量和熟練程度多少相等的生產班，沒有使每人都對每一具體工作負責。結果就使不斷生產制聽天由命而變成無人負責現象了。結果在許多企業裏就有紙上的口頭的不斷生產制，以及非紙上的實在的無人負責現象。結果就使人們對工作沒有責任心，不愛惜機器，讓機架大批毀壞，沒有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刺激。無怪工人說：『我們本來很願意

提高勞動生產率，改善工作質量，可是現在既然誰也不對任何事情負責，試問誰會看重我們呢？」。

由此可見，我們某些同志在某些地方把不斷生產制實行得過分匆忙了，因而也就曲解了不斷生產制，把它變成了無人負責現象。要消滅這種情形，要消滅無人負責現象，就只有兩條出路。或者是仿照鐵路運輸業方面的先例，把實行不斷生產制的條件改變，使其不致變成無人負責現象。或者是在現時還沒有實行不斷生產制的順利條件的地方，仿照斯大林格拉拖拉機工廠在不久以前所作出的例子，拋棄紙上的不斷生產制，暫時轉到六日生產制，並準備一些必要條件，以便日後可以再來實行真正的非紙上的不斷生產制，再來實行那不會有無人負責現象的不斷生產制。

其他出路是沒有的。

凡此一切，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當然都是十分懂得的。可是，他們却寧願默不做聲。爲什麼呢？大概是因爲害怕真情。可是，試問布爾塞維克從什麼時候起竟害怕起真情來了呢？在某些企業內，不斷生產制已變成了無人負責現象，於是，不斷生產制也就被曲解到了極點，這難道不是實情麼？試問誰需要這樣的不斷生產制呢？誰敢說，保存這種被曲解了的紙上不斷生產制的利益，是比正確組織勞動的利益重要些，是比發展勞動生產率的利益重要些，是比真正不斷生產制底利益重要些，是比我們社會主義工業底利益重要些？我們把紙上的不斷生產制取消得愈快，我們實現真正而非紙上的不斷生產制也就會愈快，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有些同志認爲只要咒罵一頓，說幾句響亮話，就可剷除無人負責現象。據我所知，有些經濟工作人員反對無人負責現象的時候，只是常常在大會上把無人負責現象咒罵一頓，大概是以爲說罷這些話以後，無人負責現象就會自行消滅，就會按所謂自流方式消滅的。如果他們認爲單靠演說和咒罵，就可從實際工作中剷除無人負責現象，那他們就大錯特錯了。不，同志們，無人負責現象始終

不會自行消滅的。只有我們自己能夠而且應當消滅無人負責現象，因為我們執掌着國家政權，我們對於一切事情都應負責，就連無人負責現象也在其內。我認爲，如果我們的經濟工作領導者不是從事於空談和咒罵，而是親自留在礦場或工廠裏——譬如說——考察一兩個月，研究勞動組織方面的一切細節和『小事』，在事實上把那裏的無人負責現象消滅，然後把這些企業方面的經驗傳佈到其各企業中去，那就會好得多了。就會簡直不知要好多少了。就會是真正爲反對無人負責現象而鬥爭，爲用布爾塞維克的精神正確組織勞動而鬥爭，爲在企業裏正確佈置勞動力而鬥爭了。

總之，現在的任務是要消滅無人負責現象，改善勞動組織，在企業裏正確佈置勞動力。保證我國工業發展的第三個新條件的問題，就是如此。

現在我們來說第四個條件。

(四) 工人階級底生產技術智識界問題

一般工業指揮幹部，特別是工程技術人材的情形也變更了。

從前我國全部工業底基本來源，是烏克蘭煤鐵區，當時，我國所有一切工業區，無論是南俄也好，或莫斯科和列寧格拉也好，都是由烏克蘭供給鋼鐵的。同時，我們蘇聯所有一切基本企業所需要的煤炭，也是由烏克蘭供給的。這裏我把烏拉爾除開不講，因爲烏拉爾當時所有的比重要比頓巴斯小得多。這樣，我們在當時是有三個培養工業指揮幹部的基本策源地：南俄，莫斯科區，列寧格拉區，很明顯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靠我國當時所有的那種最低限額的工程技術人材，是還可以勉強過得去的。

不久以前的情形就是如此。

可是，我們現在已有完全另外一種環境了。我認爲，現在我們要支持現今的發展速度和宏大生產規模，單靠烏克蘭煤鐵根據地，已是顯然不夠了。你們知道，雖然烏克蘭煤鐵出產量日益增多，可是烏克蘭的煤鐵已不能滿足我們的需要了。你們知道，我們因此也就不在東方創立一個新的煤鐵根據地，即烏拉爾—庫茲巴斯區。你們知道，我們現在創立這個根據地，不是沒有成效的。可是這還不夠。我們還須在西伯利亞本地創立冶金業來滿足當地速增的需要。而且我們已在創立它了。此外，我們還須在卡查赫斯坦和土耳其斯坦創立一個新的有色金屬冶煉業根據地。最後，我們還須開展極廣大的鐵路建設工程。這是蘇聯全國利益，各邊疆共和國利益和中心區域利益所要求的。

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我們從前尚覺足夠的那種最低限度數量的工程技術人材和工業指揮人材，現在已經不夠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舊有的培養工程技術人材的策源地已經不夠了，必須在烏拉爾，西伯利亞和中亞細亞一帶，創立一大批新的策源地。如果我們現在真正要實現蘇聯全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計劃，那我們就須使我們有更多三倍五倍的工程技術人材和工業指揮人材。

可是，我們並不是需要隨便一種工業指揮人材和工程技術人材。我們所需要的是能瞭解我國工人階級底政策，能領會這個政策，並決意誠懇把它實現起來的那種人材。而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我國已經走入這樣一個發展階段，此時工人階級應當造就它自己的生產技術智識界，即能維護它這個統治階級在生產中的利益的生產技術智識界。

向來無論那一個統治階級，都一定要有它自己的智識界。蘇聯工人階級當然也一定要有它自己的生產技術智識界。

蘇維埃政權注意到這點，所以極力吸收工人階級份子到國民經濟各部門高級學校去學習。你們

知道，現在我國高級學校裏學習的有幾十萬工農青年。從前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高級學校是少爺公子獨佔的場所，而現時在蘇維埃制度下，工農青年却是高級學校裏的統治力量了。毫無疑義的，我們在最近將來就會能從我們各高級學校裏獲得成千數的新的技師和工程師，我國工業的新的指揮員。

但這還只是問題底一方面。問題底另一方面，就在於組成工人階級底生產技術智識界的，不僅會有高級學校畢業生，而且還會有我們企業裏的實際工作人員，熟練工人，工廠鑛井裏的工人階級文化人材。社會主義競賽底發起人，突擊隊底隊長，勞動高潮底實際提倡人，各部分建設工作底組織者——這就是工人階級底新進階層，這個階層也就應當協同高級學校畢業同志來組成工人階級智識界底核心，我國工業指揮人材底核心。我們的任務就是不要埋沒這些富有首倡精神的同志，而要更大胆提拔他們去擔任指揮職務，使他們有表現其組織才能的機會，使他們有充實其知識的機會，並且不惜花費金錢來給他們造成相當的環境。

這些同志們中間有不少的非黨員同志。但這並不能妨礙我們更大胆提拔他們去擔任領導職務。恰巧相反，正是應當特別關心他們這些非黨員同志，應當提拔他們去擔任指揮職務，使他們根據事實來確信我們黨重視有才幹有本事的工作者。有些同志認為只有黨員同志才可提拔來擔任工廠領導職務。於是他們就往往埋沒那些有才幹有首倡精神的非黨員同志，而把黨員同志提到首位，那怕這些黨員同志才能較少，沒有首倡精神。不消說，這種所謂『政策』是愚蠢而反動到極點的。這種『政策』只能破壞我黨威信，而使非黨員工人離開我黨，這是不必證明的。我們的政策，並不是要把黨變成閉關自守的門閥，我們的政策，是要黨員工人與非黨員工人間保持有『相互信任』的空氣，『相互審查』的空氣（列寧）。我們黨在工人階級中間享有陰重威信的原因之一，也就在於我們

黨正是實行着這樣的政策。

總之，現在的任務是要我們蘇聯工人階級有它自己的生產技術智識界。保證我國工業發展的第四個新條件的問題，就是如此。

現在我們來說第五個條件。

(五) 舊生產技術智識界中轉變的徵象

關於究應怎樣對待舊資產階級生產技術智識界問題，也須有另一種提法。

兩年以前，我國舊技術智識界中最熟練的那一部份，是患着暗害病的。而且當時暗害勾當是一種時髦。有些人親自進行暗害勾當，另外有些人掩護這些暗害份子，有一部份人袖手旁觀和保守中立，還有一部份人則在蘇維埃政權與暗害份子之間動搖不定。當然，舊技術智識界中的大多數人仍然還是多少忠順地工作。但這裏所講的不是大多數，而是技術智識界中最熟練的那一部份人。

暗害運動究竟是由什麼所造成，是由什麼所培植起來的呢？就是由於蘇聯國內階級鬭爭尖銳化，由於蘇維埃政權對城鄉資本主義份子實行進攻政策，由於這些資本主義份子反抗蘇維埃政權政策，由於國際形勢複雜，由於在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建設中有困難。如果說戰鬭部份的暗害份子積極性是由資本主義各國帝國主義者底武裝干涉陰謀以及我們國內的糧食困難所支持，那末另一部份舊技術智識份子向積極暗害份子方面的動搖，却是由那些胡說八道的託洛茨基份子和孟塞維克們底時髦論調所加強起來，他們硬說『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橫直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說『蘇維埃政權橫直是會蛻化而且很快就要倒台的』，說『布爾塞維克自己的政策就是促進武裝干涉的』等等。並且，既然右傾份子中間的某些老布爾塞維克也沒能擋住『時風』而在當時離開了黨，那末從

來沒有聞過布爾塞維主義氣味的一部份舊技術智識份子也蒙上天保佑而誤入了迷途，又何足怪呢。很明顯的，在這種情形下，蘇維埃政權所能對舊技術智識界採取的唯一政策，便是粉碎積極暗害份子，分化中立份子，吸引忠順份子。

一兩年以前的情形，便是如此。

可以說我們現在的環境也與當時完全相同麼？當然是不可這樣說的。恰巧相反，我們現在的環境已經完全不同了。首先，我們已擊破了城鄉資本主義份子，並且正在順利地消滅他們。這當然不能使舊智識界感到歡喜。也許他們還對他們這些已被擊破的朋友們流着同情淚哩。可是，同情者，尤其是中立者和動搖者，在他們這些積極活動的朋友們遭到很厲害的無可挽救的失敗以後，決不會甘願與他們這些朋友遭受同樣的命運。其次，我們已克服了糧食困難，而且不僅克服了困難，並且還輸運大批糧食出口，其數量之多，是蘇維埃政權存在以來所未曾有過的。於是，動搖份子所持有的這一「論據」，也陷於破產了。其次，現在就是瞎子也看得見，我們在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建設方面達到了極大的成功，獲得了確定不移的勝利。於是舊智識界「武庫」中最主要的東西，也就完全顛覆了。至於資產階級智識界對武裝干涉的希望，那就要承認這種希望已成了——至少是暫時成了——海市蜃樓。真的，人們約許實行武裝干涉已經六年了，可是武裝干涉一次也沒有敢於嘗試過。現在已經應當承認，我們的高明的資產階級智識界，不過是受騙上當而已。至於積極暗害份子在有名的莫斯科公審案中的行為，本來應當而且真正已把暗害思想埋葬，那就更不必說了。

所有這些新情況，當然不能不影響到我國舊技術智識界。新的環境本應在舊技術智識界中造成一種新的情緒，而且真正造成了這種新情緒。正因為如此，所以從前同情過暗害份子的那一部份舊智識份子，已有開始轉向蘇維埃政權方面來的一定表現。現在不僅這一部份舊智識份子，而

且那些明顯的昨天的暗害份子，昨天的暗害份子中的頗大一部份人，也開始在許多工廠裏與工人階級協力工作的事實，就是顯然證明舊技術智識界中的轉變過程已經開始了。這當然不是說我們這裏已沒有暗害份子了。當然不是。暗害份子仍然還是有的，而且當我國還有階級存在時，當還有資本主義包圍時，暗害份子在將來也還會有的。但這是說，既然舊技術智識界中頗大一部份從前這樣或那樣同情過暗害份子的人，現在已開始轉向蘇維埃政權方面來，那末剩下的積極暗害份子已是不多，已陷於孤立，而且不得不暫時深深隱藏起來了。

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我們對於舊技術智識界的政策，也應該依此而改變。從前在暗害勾當猖獗盛行時期，我們對待舊技術智識界的態度，主要是表現於粉碎政策，而現時在這個智識界轉向蘇維埃政權方面來的時期，我們對待它的態度，主要就應表現於吸收和關照它的政策了。如果在已經改變的新條件下還繼續實行舊政策，那就是荒謬而不合辯證法了。如果現在幾乎把每個舊專門家和舊工程師當作尚未拿獲的犯人和暗害份子看待，那就是愚蠢而不合理了。在我們這裏，『**反專家主義**』向來都是被看作，而且現在仍然是被看作有害和可恥現象的。
總之，現在的任務是要改變對舊工程技術人材的態度，多多關注和關照他們，更大胆吸收他們來參加工作。

保證我國工業發展的第五個新條件的問題，就是如此。

現在我們來說最後一個條件。

(六) 論經濟核算制

為使情形完全明顯起見，我還要說到一個新條件。這就是供給工業，供給國民經濟的資金積累

來源問題，怎樣加緊這種積累速度的問題。

從資金積累方面看來，我國工業發展中的新的特殊的現象是什麼呢？這種新現象就是舊積累來源已不能充分保證工業繼續發展了。就是我們如果真想保持並加強布爾塞維克的工業化速度，便要找得新的積累來源，加強舊的積累來源。

我們考察資本主義各國歷史，便可知無論那一個想把自己的工業提到更高階級的新起國家，都不免要有外國的幫助，即長期的信貸或借款。西方各國資本家有鑒於此，所以完全不肯給予我國絲毫信貸和借款，以爲我國工業化事業得不到信貸和借款，就一定會遭受失敗的。可是資本家們失算了。他們沒有估計到我們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區別，殊不知我們國家有一種特別的積累來源，足以恢復並繼續發展工業。而且我們確實不僅恢復了工業，不僅恢復了農業和運輸業，並且已在順利實行着改造我國重工業，農業和運輸業的壯舉。當然，我們舉辦這件事情，是花費了幾百萬萬盧布的。試問這幾百萬萬盧布是從何處得來的呢？是從輕工業方面，農業方面，預算上的積累方面得來的。我們不久以前的情形就是如此。

現在情形已經完全不同了。從前，舊的積累來源是足夠來改造工業和運輸業的，而現在這些積累來源，却已顯然不夠了。現在的問題並不是要改造舊工業。現在的問題，是要在烏拉爾、西伯利亞和卡查赫斯坦一帶建立技術設備精良的新工業。現在的問題，是要在蘇聯各穀物區、養畜區和原料出產區建立大規模的新農業生產。現在的問題，是要建築一批橫貫蘇聯東西兩部的新鐵路。舊的積累來源，當然是已不能夠供應這種壯舉了。

不僅如此。此外，還要注意到一點，就是在我們許多企業和經濟組織中，由於用一種浪費辦法來經營的結果，經濟核算的原則已被破壞無餘。事實上，有許多企業和經濟組織中的人早已不復從

事於計算、估價及擬製正確收支對照表的工作。事實上，有許多企業和經濟組織中的人早已忘掉『節省』、『減少無謂費用』和『生產合理化』一類的概念。他們顯然是指靠着國家銀行『橫直會給我們撥發必需的經費』。事實上有許多企業中的生產成本費近來已開始提高。他們不僅沒有依照計劃規定，把成本費減低百分之十以至百分之十以上，反而把成本費提高了。而什麼是減低成本費呢？你們知道：把成本費減低百分之十，就等於在工業內部多積累一萬五千萬至二萬萬盧布。所以很明顯的，提高成本費，就是使工業和整個國民經濟喪失數萬萬盧布。

由此就應得出結論：我們已不可專靠輕工業，專靠預算上的積累，專靠由農業方面得到的收入了。輕工業是一個極豐富的積累來源，而且它現在也大有繼續發展的可能，可是這個積累來源不是沒有止境的。農業也是一種豐富的積累來源，可是在目前農業改造時期，農業本身也需要國家資助。至於國家預算上的積累，那末你們自己知道這種積累是不能够而且也不應當沒有止境的。還有什麼呢，還有重工業。所以，必須設法使重工業——首先是機器製造業——也能拿出積累來。所以，除加強並擴展舊積累來源而外，同時還要設法使重工業——首先是機器製造業——也能拿出積累來。

這就是我們的出路。

爲此就要怎樣辦呢？就要消滅浪費現象，盡量動用工業內部的資源，在我們所有一切企業內施行並鞏固經濟核算制，有系統地減低成本費，在所有一切而無例外的工業部門裏加強工業內部的積累。

這就是達到出路的途徑。

總之，現在的任務是要施行並鞏固經濟核算制，提高工業內部的積累。

(七) 用新的方式來工作，用新的方式來領導

同志們，以上是保證我國工業發展的新條件。

這些新條件底意義，就在於它們爲工業造成了新的環境，要求我們用新的方法來工作，用新的方法來領導。

由此可見：

(1) 現在已不可再像從前那樣指望勞動力自流性了。要保證工業勞動力，就必須有組織地招收工人，並使勞動手續機械化。如果以爲我們不必實行機械化，便能支持我們的建設速度和生產規模，那就等於希望可用匙子吸盡海水了。

(2) 其次，現在已不可再容忍工業中勞動力的流動性了。要免除這個禍害，就必須按新方法來規定工資，使企業裏的工人成份相當固定起來。

(3) 其次，現在已不可再容忍生產工作中無人負責的現象了。要免除這個禍害，就必須按新方式來組織勞動，適當地佈置力量，使每一部份工人都對工作，對機器，機架以及工作質量負責。

(4) 其次，現在已不可再像從前那樣專靠資產階級俄國所遺留給我們的一種爲數極少的舊工程技術人材了。要提高現時的生產速度和生產規模，就必須使工人階級有它自己的生產技術智識界。

(5) 其次，現在已不可再像從前那樣把所有一切舊專門家和舊工程技術人材看成一邱之貉了。要適應已經改變的環境，就必須改變我們在這方面的政策，盡量關注那些顯然轉向到工人階級方面的專門家和工程技術人材。

(6) 最後，現在已不可再像從前那樣專靠舊有的積累來源了。要保證工農業繼續發展，就必須

動用新的積累來源，消除浪費現象，施行經濟核算制，減低成本費，提高工業內部的積累。

這就是保證工業發展的新條件，要求我們採用新的工作方法，採用新的領導經濟建設的方法。爲了實現新式領導，就要怎樣辦呢？

首先，就要我們的經濟工作領導者瞭解新環境，具體研究那些保證工業發展的新條件，適應於新的環境要求來改造我們的工作。

其次，就要我們經濟工作領導者不是『一般地』領導企業，不是『從空中』領導企業，而是具體切實地領導企業！就要他們不是根據一般空談，而是以嚴格求實態度來對待每一個問題；就要他們不限於紙上敷衍搪塞或一般辭藻和口號，而要精通工作技術，熟悉工作詳情，熟悉『小事情』，因爲現在大事情是由『小事情』積成的。

其次，就要把我們現有的龐大的聯合局（現在一個聯合局往往包括有一兩百個企業）立刻分小，分成幾個聯合局。一個聯合局主席兼管着一百個以至一百個以上的工廠，當然是無法切實知道這些工廠及其生產能力和工作狀況的。他既然不知道工廠，當然也就不能領導這些工廠。所以，爲了使各聯合局主席有可能真正研究工廠情形，領導工廠，就須使他們卸脫太多的工廠，就須把一個聯合局分成幾個聯合局，使聯合局與工廠接近。

其次，就要我們各聯合局由集議管理制過渡到一長管理制。現在的情形是聯合局委員會照例都有十個以至十五個委員坐在那裏，寫公文，作辯論。同志們，這樣的管理方法是不可繼續下去的。必須停止紙上的『領導』，而去進行真正切實的布爾塞維克的工作。留下一個主席和幾個副主席來主持聯合局，就完全足夠來管理聯合局了。其他的委員，最好是派到下層去，派到工廠中去。這無論對於他們自己，無論對於事情本身，都會是有益得多的。

其次，就要聯合局主席和副主席常常去巡視各工廠，更多花些時間留在那裏工作，更仔細認識工廠中的工作人員，不僅要教導當地工作人員，而且要向他們學習。如果以爲現時可以坐在遠離工廠的管理處裏，從辦公室裏領導工廠，那就是錯誤的想法了。要領導工廠，就須時常與廠內工作人員接洽，與他們維持活的聯繫。

最後，我要簡略說一說我們一九三一年的生產計劃。有些在我黨周圍渡來渡去的庸人，硬說我們的生產計劃是不實在的，是不能完成的。這正好似謝德林小說中愛說廢話的「怪聰明的小魚」一樣。我們的生產計劃是不是實在呢？是絕對實在的！這個生產計劃是實在的，至少是因爲我們具備有完成這個計劃所必需的一切條件。這個生產計劃是實在的，至少是因爲現在這個計劃底完成，全靠我們自己，全靠我們是否能夠，是否願意利用我們所有的極豐富的可能性。如果不然，那爲什麼許多企業和工業部門已經超過完成了原定計劃呢？如果以爲生產計劃就是一張數字表和工作任務一覽表，那就是愚蠢的想法了。其實，生產計劃是千百萬人民底活的實際行動。我們的生產計劃底實在性，就是創造新生活的千百萬勞動者。我們的生產計劃底實在性，就是活的人，就是我們自己，我們的勞動意志，我們按新方法來工作的決心，我們執行計劃的決心。我們有這種決心麼？是的，有這種決心。所以，我們的生產計劃也就是可能而且應當實現的。（鼓掌多時）。

第一個五年計劃底總結

——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在聯共（布）中央委

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的報告——

（一） 五年計劃底國際意義

同志們！當五年計劃出現的時候，人們未必預料到五年計劃能有偉大的國際意義。反之，當時有許多人都認為五年計劃是蘇聯私自的事情，固然是一件重要的和嚴重的事情，但總是蘇聯私自的一國的事情。

可是歷史表明了，五年計劃有無限偉大的國際意義。歷史表明了，五年計劃不是蘇聯私自的事情，而是整個國際無產階級底事情。

還在五年計劃尚未出現很久以前，當我們還在結束着我們反對武裝干涉者的鬭爭，而開始實行過渡到經濟建設軌道的時期，列寧就已說過：我們的經濟建設是有深刻的國際意義；蘇維埃政權在經濟建設道路上每一步的進展，都在資本主義國家各種各樣的階層中遇到深刻的反應，並把人們分成兩個營壘——一個是擁護無產階級革命者的營壘，另一個是反對無產階級革命者的營壘。

列寧在當時說道：

『目前，我們主要是用我們的經濟政策來影響着國際革命。所有的人，全世界各國所有的

勞動者，都注視着蘇維埃俄羅斯共和國，的確是所有的人，沒有一個例外，而且這絲毫也不是過甚其詞。這一層已經達到了：在這方面的鬭爭是有全世界意義的。我們一解決這個任務，那我們就一定和最終地在國際範圍內獲得了勝利。因此，經濟建設問題對於我們真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在這個戰線上，我們應當用慢慢的，逐漸的，——求速是不行的，——但是一往直前的上升和進展，來取得勝利」（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四一〇至四一一頁）。

列寧說這話的時候，我們還在結束我們反對武裝干涉者的戰爭，我們還在實行反對資本主義的軍事鬭爭過渡到經濟戰線上的鬭爭，過渡到經濟建設的時期。

從那個時候起，已經過去許多年了，而蘇維埃政權在經濟建設方面的每一步驟，每一年，每一季，都燦爛地證實着列寧同志這些話底正確。

可是，把列寧這些萬分正確言論證實得最明顯的，却是我們的五年建設計劃，這一計劃底產生，這一計劃底發展，這一計劃底實現。的確，在我國經濟建設道路上，無論那一個步驟，大概都是都沒有像五年計劃及其發展和實現問題那樣在歐美亞三大洲資本主義國家各種各樣的階層中，遇到如此深刻的反應。

最初，五年計劃在資產階級及其報章方面遇到的是嘲笑。『空想』，『夢囈』，『烏托邦』，——這就是他們當時給予我們五年計劃的稱呼。後來，當他們已開始看見五年計劃實現過程產生出實在結果的時候，便敲起警鐘來，硬說五年計劃會危及資本主義各國底生存，硬說五年計劃底實現將使歐洲市場充滿商品，將使傾銷政策加強，將使失業現象加深。後來，當所利用來反對蘇維埃政權的這套把戲也沒有獲得預期的結果時，便有各種公司、報館、各種社團等等各種各樣的代表，接踵遊歷蘇聯，想親眼看看蘇聯底情形究竟怎樣。我在這裏不說工人代表團，他們是自五年計劃最

初出現時起，就表示欽佩蘇維埃政權底創舉和成功，就表示決意擁護蘇聯工人階級的。

自此時起，所謂輿論界，資產階級出版界，各種資產階級社團等等，就開始發生分裂。有一些人硬說五年計劃已經完全破產，說布爾塞維克已瀕於滅亡。而另外有些人却說：布爾塞維克雖是些壞人，但他們的五年計劃尚能成事，他們大概會達到自己的目的。

說到這裏，也許不妨引證引證資產階級各種機關報底評論吧。

例如，就拿美國的紐約時報來說吧，該報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末寫道：

「五年工業計劃抱有打破任何比例觀念的目的，且無論如何都要達到這個目的，「不管代價如何」，如莫斯科往往傲然自誇的那樣。其實這並不是什麼計劃，而不過是投機的把戲」。這樣說來，五年計劃甚至不是個計劃，而是一種空洞的投機把戲。又如英國資產階級的每日

電訊報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末評論道：

「如果把五年計劃看作實行「計劃經濟」的嘗試，那我們就應當說它已完全失敗了」。紐約時報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評論道：

「集體化事業已遭到可恥的失敗。它已使俄羅斯瀕於饑荒了」。波蘭資產階級的波蘭報在一九三二年夏季評論道：

「按實際情形來看，蘇維埃政府及其農村集體化政策，似已陷入絕境」。

英國資產階級的財政時報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評論道：

「斯大林及其黨所實行的政策，結果已使他們處在五年計劃體系破產及其所應實現的一切任務概遭失敗的面前了」。

意大利的政治雜誌評論道：

「如果以爲一萬六千萬的人民四年來的工作，布爾塞維克制度這樣一個強大的制度四年來在經濟方面和政治方面的非凡努力沒有作出一點事情來，那就荒謬了。相反的，他們已作出了許多事情；可是，奇災大禍畢竟已成爲有目共觀的事實。這是朋友和仇敵，布爾塞維克和反布爾塞維克，左傾反對派和右傾反對派，都已確信無疑的」。

最後，美國資產階級的現代史雜誌評論道：

「所以，吾人考察俄羅斯目前狀況以後，就應得出結論說：五年計劃按其所標榜的目的來說，尤其是按其基本社會原則來說，都已遭失敗」。

這就是一部份資產階級刊物底評論。

對於這些評論的作者，未必值得加以批評吧。我想是不值得的。其所以不值得，是因爲這些「硬頭」人物是如中古時代掘出的頑石一類的東西，在他們看來，事實是沒有意義的，無論我們這裏怎樣實現五年計劃，他們也橫直是要固執己見的。

我們現在再來看這個資產階級營壘裏其他機關刊物上的評論吧。

法國著名的資產階級報紙時報在一九三二年一月評論道：

「蘇聯不藉外資幫助而實行工業化，也就是證明它已贏得了第一局」。

這個時報在一九三二年夏季又評論道：

「共產主義用極快速度完成其改造事業，而資本主義制度却只能緩步前進；法國因爲地產分散於無數小私有者之間，農業機械化是無法實行的；但蘇維埃却使農業工業化而解決了這個任務；布爾塞維克和我們比賽中成了勝利者」。

英國資產階級的圓桌雜誌評論道：

『五年計劃底成績是一種驚人現象、哈爾科夫和斯大林格爾兩城的拖拉機工廠，莫斯科阿摩汽車工廠，尼什涅城汽車工廠，德涅泊爾水電站，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和庫茲涅茨克兩地的大鋼鐵廠，烏拉爾許多機器製造廠和化學廠——烏拉爾日益變成蘇聯的魯爾——所有這一切成績以及全國其他各種工業成績，都證明蘇聯工業好像灌溉優良的植物一樣，不管有何種困難，還是日益增長，日益強固起來；五年計劃為蘇聯將來發展奠定了基礎，非常加強了蘇聯底實力』。

英國資產階級的財政時報評論道：

『機器製造業方面所達到的成績，是絲毫不容置疑的。他們在報章和演說中稱讚這些成績，並不是沒有根據的。不要忘记，從前俄羅斯所出產的，只是些極簡單的機器和工具、固然，就是在目前，機器和工具輸入額絕對數目，也還在增加；可是進口機器與蘇聯本國所製機器數目相比較，却不斷減少。現在，蘇聯製造着本國冶煉工業和電氣工業所必需的一切裝置品。它已經創立了本國的汽車工業。它已創立了製造一切工具和儀器的工業，由很準確的最小儀器起，直到最笨重的壓榨機為止。在農業機器方面，蘇聯已經不依賴於國外輸入了。同時蘇聯政府正設法使五年計劃四年實現的事業不致因煤鐵出產遲誤而受到阻礙。毫無疑義，新建築的巨型工廠是能保證重工業產品大量增加的』。

英國資產階級的新自由報在一九三二年初評論道：

『布爾塞維主義是可以咒罵的，可是必須知道它，五年計劃是一個新的龐然大物，必須加以注意，至少是必須顧到它在經濟方面的意義』。

英國資本家，『領地聯合銀行』總經理基勃遜、札爾維在一九三二年十月評論道：

『我要聲明，我並不是共產主義者，也不是布爾塞維克，而始終是一個資本主義者和個人主義者：俄羅斯正向前進展着，而我們這裏却有大批大批工廠停閉，約有三百萬失業者完全無法找到工作。人們會嘲笑五年計劃，預言它必遭失敗。但你們可以相信，在五年計劃條件下所達到的實際結果，已超過原來的規定：在我所遊歷過的一切工業城市中，都有新區域出現，這些新區域，按照一定計劃築成，其中有用樹木和花園所點綴的寬廣街道，有最新式的樓房，有學校，有醫院，有工人俱樂部，當然免不了還有許多替女工照顧孩子的托兒所和幼稚園：不要輕視俄羅斯人的計劃，不要以為蘇聯政府會遭受失敗：今日的俄羅斯是一個精神煥發，理想深遠的國家，俄羅斯是積極性非常濃厚的國家。我相信俄羅斯所抱定的志向是健全的：也許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於俄羅斯全體青年和全體工人，都具有一件可惜現在各資本主義國家裏所缺少的東西，——這件東西就是希望』。

美國資產階級的民族雜誌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評論道：

『五年計劃在四年內獲得了真正卓絕的成績，蘇聯用戰時強度從事於創造新生活基礎的建設任務，國家面貌簡直已改變到不可認識的地步；莫斯科便是如此，這裏有成百數的新數柏油的街道，新設立的美麗花園，新落成的樓房，附近有新建設的市鎮，有林立於城邊的新工廠。其他較小城市也是如此。甚至在荒原沙漠地帶，也有許多新城市出現，並且不是幾個城市，而至少當在五十以上，其中居民約由五萬至二十五萬人不等。所有這些城市都是最近四年來產生的，每一個城市都有一個或幾個新建的工廠，開發天然富源，製造各種產品。幾百個新區電站以及如德涅泊爾電站一類的許多巨型電站，使列寧所說『社會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上電氣化』這一公式，逐漸見諸實現；蘇聯已設立了無數種新的生產部門，大批出產着舊俄所從未出

產的許多物品：拖拉機，康拜因機，上等鋼，人造橡皮，珠球滑輪，巨型發動機，具有五萬匹發電能力的渦輪機，電話裝置品，供鑛業用的電力機，飛機，汽車，腳踏車以及幾百種新機器等等；在俄國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開採鋁、鎂、磷灰石、碘、鉀以及其他許多貴重礦物。蘇聯平原底指路標，已經不是十字架和教堂圓頂，而是積穀倉與穀草垛。在集體農莊裏建築着房屋，牲畜棚和豬欄。電氣已深入於農村，無線電和報紙已普及於農村。工人正在學習使用最新機器。青年農人在生產方面使用着最新式農業機器，這種機器比美國任何時候所見過的更巨大，更複雜。俄羅斯已開始『用機器來思想』了。俄羅斯正在迅速由木器時代進到鋼、鐵、三合土和摩托時代』。

英國『左派』改良主義的前進雜誌在一九三二年九月評論道：

『特別惹人注目的是蘇聯所進行的偉大建設工作。新的工廠，新的學校，新的電影院，新的俱樂部，新的高大樓房，——到處都有新的建築物。其中許多工程已經落成，還有許多尚在建築中。要把最近兩年來已經完成的工作和繼續進行的工作，都向英國讀者一一敘述出來，是很困難的。要相信這一切，就得親眼去看。吾人在戰時所達到的成績，與蘇聯現時建設工程相比，真是不足掛齒。美國人承認說：即在美國西部各州最興奮的創造時期，也絲毫未嘗有像蘇聯目前這樣熱烈創造努力的地方。蘇聯最近兩年來的變化既然這樣多，那末再經過十年工夫，其進展之偉大，自難設想了：請你們拋棄頑固而盲目造謠誹謗蘇聯的英國報紙所敘說的那些可怕的神話吧！請你們拋棄淺見的知識份子所散佈的那些似是而非的言論和感想吧！這些知識份子完全不知道蘇聯實在情形，却以中產階級眼光來小視蘇聯，以至於散佈這樣似是而非的言論和感想：蘇聯是根據健全原則建設着新社會。爲要實現這個目的，就須不怕危險，就得用世界

上空前所未有的熱忱和毅力來工作，就得設法克服他們力求在與其餘世界隔絕的廣大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時無法避免的莫大困難。可是，我在兩年內第二次遊歷蘇聯以後，却得到了這樣一個印象，就是蘇聯是在切實前進着，努力計劃着，努力創造和努力建設着，而且規模極大，真好像是要和敵對的資本主義世界實行比賽哩」。

這就是資產階級營壘所發生的意見分歧和分裂，其中有些集團主張消滅蘇聯及其照他們說來已經失敗的五年計劃，而另外一些集團顯然是主張與蘇聯實行商業合作，大概是希望由五年計劃成績當中取得一些利益。

至於資本主義各國工人階級對於五年計劃問題，對於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成功問題的態度，却是一個要特別去講的問題。每年都有許多外國工人代表團到蘇聯來參觀，這裏我們只要引證比利時工人代表團底評論做例就夠了。比利時工人代表團所作的這個評論，足以代表任何一國工人代表團所作的評論，無論英國代表團或法國代表團，德國代表團或美國代表團，以及其他各國代表團所作的評論都是如此。這個評論原文如下：

「我們在旅行時所看見的偉大建設，真使我們不勝欽佩。在所有一切城市裏，無論在莫斯科或馬開葉夫克，或哥爾洛夫克，或哈爾科夫以及列寧格勒，到處都是用莫大的熱忱進行着工作。所有一切機器都是最新式的。工廠裏設備清潔，空氣新鮮，光線明亮。我們親眼看見在蘇聯怎樣給工人以醫藥衛生幫助。工人住宅是建築在工廠附近。在工人住區裏設立有學校與托兒所，極仔細地照料兒童。我們看見，新工廠和新住宅與舊工廠及舊住宅迥然不同。我們所看見的一切，都使我們知道共產黨所領導來建設新社會的勞動者具有偉大的力量。我們看見蘇聯人民文化程度澎湃高漲，而其他各國却是滿目蕭條，大批工人失業。我們親眼看見蘇聯勞動者

在前進途中遇到怎樣可怕的困難，因此我們更加瞭解他們以其勝利指明給我們看時所表現的那種自豪態度。我們深信，他們是定能克服一切障礙的」。

這就是五年計劃底國際意義。只須我們在兩三年內進行了一番建設工作，只須我們顯示了五年計劃第一批成功，就使全世界分成了兩個營壘：一個營壘裏的人向我們狂吠不已，另一個營壘裏的人却目視五年計劃成功而感覺驚異；更不必說，在全世界上都有我們自己日益加強起來的營壘，這就是資本主義各國工人階級的營壘，他們因蘇聯工人階級成功而感覺歡樂，決意幫助蘇聯工人階級，而使全世界資產階級胆戰心驚。

這是說明什麼呢？

這就是說，五年計劃底國際意義，五年計劃所有各種成功和成績底國際意義，是不容懷疑的。這就是說，資本主義各國孕妊着無產階級革命，正因為它們孕妊着無產階級革命，所以資產階級便想從五年計劃失敗中吸取反對革命的新證據，而無產階級却力求從五年計劃勝利中吸取，並且實際上已經在吸取新證據去擁護革命，反對全世界資產階級。

五年計劃底成功動員世界各國工人階級革命力量去反對資本主義，這是不容置辯的事實。五年計劃有莫大的國際革命意義，這是不容懷疑的事實。

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應當更加注意五年計劃，這個計劃底內容及其基本任務問題。

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應當更加仔細分析五年計劃底總結，五年計劃執行和實現底總結。

(二) 五年計劃底基本任務和實現這一任務的道路

現在我們就要說到五年計劃問題本身。

什麼是五年計劃呢？

五年計劃底基本任務是什麼呢？

五年計劃底基本任務，就是要將我們這個技術落後，往往是落後到中世紀程度的國家，移到新技術，現代技術軌道上來。

五年計劃底基本任務，就是要將我們蘇聯由一個依賴於資本主義各國意旨的貧弱農業國家，變成爲毫不依賴於世界資本主義意旨而完全獨立的富強工業國家。

五年計劃底基本任務，就是要在實行把蘇聯變爲工業國家時，澈底排除資本主義份子，擴大社會主義經濟戰線，並造成經濟基礎來在蘇聯消滅階級，建成社會主義社會。

五年計劃底基本任務，就是要在我國創立一種不僅能把全部工業，而且能把運輸業和農業都按社會主義原則改造改組過來的重工業。

五年計劃底基本任務，就是要將散漫細小個體農業移到巨大集體農業軌道上，藉以保證社會主義在鄉村中的經濟基礎，並這樣來消滅資本主義在蘇聯恢復的可能性。

最後，五年計劃底任務，就是要在國內造成一切技術上經濟上的必要前提來最大限度提高國防能力，以至於能澈底打退所有一切外來的武裝干涉企圖，澈底打退所有一切外來的武裝侵犯企圖。

五年計劃底這個基本任務，是由什麼所決定的呢，是以什麼理由爲根據的呢？

其理由就是必須消滅那種使蘇聯處於難堪地位的技術經濟落後狀況，必須在我國創立一種使我國能够在技術經濟方面不僅趕上，而且經過相當時候能超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前提。

其理由就是蘇維埃政權決不能在落後工業基礎上長久支持下去，因爲只有那不僅不遜於，而且過些時候能够超過資本主義各國工業的現代大工業，才能成爲蘇維埃政權底真正可靠基礎。

其理由就是蘇維埃政權決不能長久建立在兩個對立的經濟基礎上，一方面建立在消滅資本主義份子的巨大社會主義工業上，另一方面建立在產生資本主義份子的細小個體農業上。

其理由就是當我們還沒有為農業奠定大生產基礎時，還沒有把細小農戶聯合成爲巨大集體農莊時，蘇聯國內資本主義恢復的危險是一切可能危險中最實在的危險。

列寧說過：

「革命所已做到了的，是俄國按其政治制度說來，在幾個月以內便趕上先進國家了。

可是這還不够。戰爭是鐵面無情的，它用毫不容情的嚴厲方式提出問題：或是滅亡，或是在經濟方面也趕上並超過先進國家……或是滅亡，或是開足馬力向前猛進。歷史就是這樣提出問題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九一頁）。

列寧說過：

「當我們還生活在小農國家時，資本主義在俄國比共產主義有更堅固的經濟基礎。這是必須記着的。凡細心考察過農村生活，而把它與城市生活作過比較的人，都知道我們還沒有拔除掉資本主義底根帶，還沒有打破國內敵入底基礎和根基。國內敵人是支持在小經濟上面的，我們所能用以打破這個敵人基礎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全國經濟，包括農業在內，轉移到新技術基礎上，轉移到現代的大生產技術基礎上來……只有國家電氣化了時，只有我們已爲工業、農業和運輸業建立起現代的大工業技術基礎時，我們才會獲得最終的勝利」（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四六至四七頁）

黨規定五年計劃和決定五年計劃基本任務時所持的理由，就是以這些原理爲基礎的。五年計劃底基本任務，就是如此。

可是，爲要實行這種偉大計劃，決不可茫無頭緒，隨便動手來作。爲要實行這種計劃，首先就要找到計劃中的基本環節，因爲只有找到並抓住這個基本環節以後，才可把這計劃其他一切環節拖出來。

五年計劃底基本環節是什麼呢？

五年計劃底基本環節，就是重工業和它的核心，即機器製造業。因爲只有重工業，才能把全部工業、運輸業以及農業都改造過來，振興起來。因此也就必須從重工業來着手實行五年計劃。所以也就必須把恢復重工業當作實現五年計劃的基礎。

關於這點，我們也有列寧底指示：

『爲要挽救俄國，單靠農民經濟收成豐盛還不够，而且單靠供給農民消費品的輕工業情況興旺也還不够，我們還要有重工業……不挽救重工業，不恢復重工業，我們就不能建成任何工業，而沒有工業，我們就根本不能維持我們爲獨立國家的地位……重工業是需要有國家補助金的。我們如果找不到這種補助金，便不能成爲文明的國家，更不必說成爲社會主義的國家了』
（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四九頁）。

可是，恢復和發展重工業，特別是在像五年計劃開始時我們這樣一個落後而不富裕的國家裏，原是一件極困難的事情，因爲大家知道，重工業需要巨量的資金和相當數量的熟練技術人材，否則根本不能恢復重工業。黨知道這一點並估量到了這一點麼？是的，是知道這一點的。它不僅知道，並且當衆宣佈了這一點。黨知道在英德美等國重工業是怎樣建成的。他知道這些國家裏的重工業所以能建成，是因爲得到了大批借款，或是因爲掠奪了其他國家，或是因爲同時採用了這兩種手段。黨知道這兩種手段都是我們國家所不可採用的。那末，它當時所依靠的，究竟是什麼呢？它所

指望的，是我國本身的力量。它是指望我們既有蘇維埃政權，並依據於土地，工業，運輸業，銀行和商業國有制，便能夠實行極嚴格的節省辦法，來積蓄為恢復和發展重工業所必需的資金。黨當時爽直地說過：這件事情需要有重大犧牲，如果我們真想達到目的，就應公開和自覺地去承受這種犧牲。黨是指望用我國內部力量實現這個任務，而不要外來的苛刻信貸和借款。

請看列寧如何說明了這個問題吧：

「我們所應當努力建成的國家，是要工人能夠保持他們對於農民的領導，保持農民對於他們的信任，並以極大節省辦法把自己社會關係中任何一種浪費現象的任何遺跡剷除乾淨。

我們應當把我們國家機關儘量節省。我們必須把國家機關中所有的一切浪費現象的遺跡剷除乾淨，而沙皇俄羅斯及其官僚資本主義機關所遺留在我們國家機關中的這種遺跡，尙是很多的。

這不會是農民的狹隘眼界麼？

決不是。我們只要能保持工人階級對於農民的領導，就能在我們國家裏用極嚴格節省的辦法把任何一點貯蓄都保存起來，藉以發展我們的大機器工業，發展電氣化，加緊開採泥炭，完成瓦爾霍夫水電站建設工程等等。

我們的希望就在這裏，而且僅僅在這裏。只有如此，我們才能够——拿個比喻來說——從一匹馬上跨到另一匹馬上，由農民的，莊稼漢的，窮苦的馬上，由倚靠於破產農民國家的種種節省辦法的馬上，跨到無產階級所努力尋求，而且不能不尋求的馬上去，跨到巨大機器工業，電氣化，瓦爾霍夫水電站等等的馬上去」（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一七頁）。

從窮苦莊稼漢的馬上，跨到巨大機器工業的馬上去，——這就是黨製定五年計劃和努力實現五

年計劃時所想達到的目的。

規定極嚴格節省的辦法，積蓄為資助我國工業化所必需的經費，——這就是我們為達到恢復重工業和實現五年計劃目的所應走的道路。

是個大膽的任務麼？是條困難的道路麼？可是，我們黨所以叫做列寧的黨，也就是因為它沒有權利害怕困難哩。

不僅如此。黨十分相信五年計劃可能實現，信任工人階級力量，所以它認為可以力求在更短期間完成這件困難事業，就是說不是在五年內，如五年計劃所要求的那樣，而是在四年內，實在講起來（如果把特別季算進去的話），是在四年零三個月內完成這件困難事業。

由此就提出了『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這個有名的口號。
結果怎樣呢？

後來事實表明了：黨原來是對的。

事實表明了：如果黨沒有這種勇氣，如果它不是這樣相信工人階級力量，就會不能達到我們現在所能引以自豪的勝利。

（三） 五年計劃在工業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

現在我們來說五年計劃實現的總結問題。

五年計劃在工業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怎樣呢？

我們在這方面達到了勝利麼？

是的，達到了勝利。不僅達到了，而且超過了我們所期待的，超過了我們黨內那些具有最熱頭

麼的人所能期待的程度。現在，甚至敵人也不否認這一點了。我們的朋友，當然更是不能否認這一點。我們從前沒有黑金屬冶煉業，即全國工業化底基礎，而我們現在却有了。

我們從前沒有拖拉機製造業，而我們現在却有了。

我們從前沒有汽車製造業，而我們現在却有了。

我們從前沒有機架製造業，而我們現在却有了。

我們從前沒有重大的現代化學工業，而我們現在却有了。

我們從前沒有真正的重大的現代農業機器製造業，而我們現在却有了。

我們從前沒有航空工業，而我們現在却有了。

我們從前在電力製造業方面是佔最末位，而我們現在却已升到首位之一了。

我們從前在煤油品和煤炭出產量方面是佔最末位，而我們現在却已開到首位之一了。

我們從前只是在烏克蘭有一個煤鐵根據地，而且我們當時就連這個根據地也沒有把它充分佈置好。而我們現在不僅振興了這個根據地，並且在東部創造了我國所能引以自豪的一個新的煤鐵根據地。

我們從前只是在我國北部有一個紡織工業根據地。而我們現時很快就會有中亞細亞和西西伯利亞的兩個新的紡織業根據地了。

我們不僅創立了這些新的巨大工業部門，並且使這些部門具有了遠非歐洲工業所能比上的規模和範圍。

由於有這一切，結果就把資本主義份子最終和永遠排除出工業範圍以外，而使社會主義工業成了蘇聯唯一的工業形式。

由於有這一切，結果就使我們國家由農業國變成了工業國，因為工業出產量底比重，與農業出產量相較，已由五年計劃初（一九二八年）的百分之四十八，增至五年計劃第四年度（一九三二年）末的百分之七十了。

由於有這一切，結果我們就能在五年計劃第四年度末，把全部工業原定在五年內完成的出產大綱執行到百分之九十三點七，使工業出產總量超過戰前水準兩倍以上，超過一九二八年水準一倍以上。至於重工業出產大綱，那麼我們已把五年計劃執行到百分之一百零八。固然，我們的全部工業五年計劃大綱，還有百分之六沒有完成。但這是因為鄰邦拒絕同我們簽訂互不侵犯公約，又因為在遠東方面發生了糾紛，所以我們為加強國防起見，不得不立刻把一批工廠實行改組來製造現代國防武器。因為這種改組需要經過相當準備時期，所以這些工廠停止出產至四個月之久，而這種情形當然不能不影響到五年計劃所定整個生產大綱在一九三二年的執行。由於實行這個辦法的結果，我們已完全彌補了國防能力方面的缺陷。可是，這個辦法却不能不使五年計劃所定出產大綱執行時受到不良的影響。如果沒有這種外來的情況，那末我們就會不僅已經完成，而且一定會超過完成了五年計劃原定的數目。

最後，由於有這一切，結果就使蘇聯由國防準備不足的弱國變成了國防能力雄厚的強國，變成了能夠隨時應付一切意外事件的國家，變成了能夠大批製造一切現代國防武器，並將其供給自己軍隊去抵禦外侮的國家。

五年計劃在工業方面四年實現的總結，大體上就是如此。

現在請你們自己來判斷一下：既然有這一切，那末資產階級報章說什麼五年計劃在工業方面遭受『失敗』的廢話，究竟還有什麼價值呢？

現在遭受嚴重危機的資本主義國家，按其工業產品增長情形來說，又是怎樣呢？請看人所共知的官方統計吧。

蘇聯工業出產總量，在一九三二年末已比戰前水準增加到了百分之三百三十四，而美國工業出產總量在同一時期內降到了百分之八十四，英國降到了百分之七十五，德國降到了百分之六十二。

蘇聯工業出產總量在一九三二年末已比一九二八年水準增加到了百分之二百一十九，而美國工業出產總量在同一時期內降到了百分之五十六，英國降到了百分之八十，德國降到了百分之五十五，波蘭降到了百分之五十四。

這些統計難道不是證明資本主義工業制度與蘇維埃工業制度競賽時沒有經得住考驗，而蘇維埃工業制度是比資本主義工業制度優越得多麼？

有人向我們說道，好吧，你們建成了許多新工廠，奠定了工業化底基礎，可是，你們如果拋棄了工業化政策，拋棄有擴大生產資料製造業的政策，或者至少是把這件事情放到了末位，而多製造些布疋、皮鞋、衣服以及其他各種日用品，那就會更好得多了。日用品製造得不够用，結果也就引起了相當的困難。

可是，必須知道，必須想一想，這種把工業化任務放在末位的政策能使我們得到怎樣的結果。當然，我們能從這時期內耗費於重工業設備方面的十五萬萬金盧布中，拿出半數來向國外購買棉花、皮革、羊毛和橡膠等等。那時我們就會有更多的布疋，皮鞋和衣服。可是，那時我們就會沒有拖拉機製造業，也沒有汽車製造業，就會沒有多少嚴重的黑金屬冶煉業，就會沒有金屬來製造機器，結果也就會在擁有新式技術武裝的資本主義國家包圍面前陷於手無寸鐵的狀況。那時，我們就

會沒有可能用拖拉機和各種農業機器來供給農業，結果也就會落得沒有糧食。那時，我們就會無法戰勝國內資本主義份子，結果也就會大大增加資本主義復辟的機會。那時，我們就不能有一切新式國防武器，而使我國底國家獨立地位不能維持下去，使我國變成外敵用武的對象。那時，我們的地位就會與現在中國所處地位多少相同，中國因為沒有自己的重工業，沒有自己的軍事工業，而被一切逞性妄為的人所蹂躪着。

總而言之，我們那時所有的，就會是武裝干涉，就會不是互不侵犯公約，而是戰爭，而且是個有致命危險的戰爭，實力懸殊的流血戰爭，因為我們在這個戰爭中就會幾乎是沒有武裝，而敵人却擁有一切現代的進攻武器。

事情就是這樣變化的啊，同志們。

自重的國家政權，自重的黨，當然是不能採取這種亡國主張的。

正是因為黨排斥了這種反對革命的立場，所以黨在工業方面實現五年計劃事業中達到了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黨在實現五年計劃和組織工業建設勝利時，實行了加緊速度發展工業的政策。黨好似是鞭策了國家，督促它向前突飛猛進。

黨實行這種最高速度的政策，是不是作得正確呢？

是的，是絕對正確的。

落後了一百年並因落後而有滅亡危險的國家，是不能不加以督促的。當時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國趕快用新式技術來重新武裝自己，而終於走上康莊大道。

其次，我們不能知道帝國主義者究竟會在那一天來進攻蘇聯，打斷我國建設；而他們隨時都能

利用我國技術經濟弱點來進攻我們，却是不容置疑的。所以，黨不得不鞭策國家前進，以免放過時機，而盡量利用暫息時間，趕快在蘇聯建立工業化基礎，即蘇聯富強底根基。黨在當時沒有可能等待什麼機會和玩弄什麼手腕，而應當實行最高速度的政策。

最後，黨應當在最短期間消滅我國國防底弱點。時局的條件，資本主義各國武裝的增長，裁軍思想的失敗，國際資產階級對蘇聯的仇視，——凡此種種都迫使黨來迅速加強國防能力，作為國家獨立底基礎。

可是，黨有過實現最高速度政策的實際可能麼？是的，是有過這種可能的。它所以有這種可能，不僅是因為它及時發動了我們國家迅速前進，而且首先是因為它在實行新的擴大建設中能夠倚靠舊有的工廠或革新的工廠，這些工廠既為工人和工程技術人員所熟習，也就給了我們實行最高發展速度的可能。

我們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所有的那種迅速的新建設的高漲、擴大建設的熱潮，努力從事新建設的英雄和突擊隊員，洶湧澎湃的發展速度，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生長起來的。

可以說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也還要實行完全同樣的最高發展速度的政策麼？
不，決不可這樣說。

第一，由於五年計劃順利實現的結果，我們在基本上已完成了五年計劃底主要任務，即是為工業、運輸業和農業創立現代新技術基礎的任務。既然如此，試問是否還要鞭策和督促國家呢？很明顯的，現在已沒有這種必要了。

第二，由於五年計劃順利完成的結果，我們已把國防能力提到了應有的高度。既然如此，試問是否還要鞭策和督促國家呢？很明顯的，現在已沒有這種必要了。

最後，由於五年計劃順利完成的結果，我們已新建成了成十成百擁有新式複雜技術的大工廠和聯合廠。這就是說，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的工業出產量方面起基本作用的，不是那些技術已經熟習的舊工廠，如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那樣，而是那些技術還沒有熟習而必須熟習的新工廠。可是，熟習新企業和新技術，要比利用那些技術已經熟習的舊工廠或革新工廠的事情困難得多。這需要更多的時間來提高工人和工程技術人員底熟練程度，來獲得完全利用新技術的新技能。既然如此，那末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特別是在五年計劃頭兩三年，即使我們想要實行，也不能實行最高發展速度的政策，這難道不很明顯麼。

正因為如此，所以我認為我們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必須採取較慢的工業出產量增長速度。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工業出產量是每年平均增加百分之二十二。我認為我們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必須實行工業出產量每年平均增長百分之十三至十四的標準。這樣的工業出產量增長速度是資本主義國家夢想不到的。且不說這樣的速度，就是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五的標準，也是它們現在夢想不到的。而這也就是它們之為資本主義國家的本色哩。具有蘇維埃經濟制度的蘇維埃國家，却就是另一回事了。在我國經濟制度下，我們完全可以，而且應當實現出產量每年增長百分之十三至十四的標準，作為最低限度。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我們組織了進行新建設的熱忱和熱潮，達到了有決定意義的成功。這是很好的。可是，現在這已經不夠了。現在，除此而外，我們還要有熟習新工廠新技術的熱忱和熱潮，還要認真提高勞動生產率，認真減低成本費。

現在主要點就在這裏。

因為我們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够大約到第二個五年計劃後半期開始的時候，無論是在建設

方面或在工業產量增長方面，都實行一個新的迅速的跑步。

最後，還要簡略說說我們的速度和每年產量增長百分率所包含的內容問題。我們的工業家是很少研究這個問題的。而這却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問題。什麼是產量增長的百分數呢，每個增長的百分所包含的內容怎樣呢？例如，拿一九二五年，即恢復時期來說吧。那時一年出產增長額是等於百分之六十六。當時工業產品總值為七十七萬萬盧布。當時增長百分之六十六，按絕對數目說就是增加三十餘萬萬盧布。所以，當時每個增加的百分是等於增加四千五百萬盧布。再拿一九二八年來說。一九二八年產量增長額是百分之二十六，按百分數說是幾乎比一九二五年少到三倍。當時工業產品總值為一百五十五萬萬盧布。所以，全年增長額絕對數目是三十二萬八千萬盧布。所以，當時每個增加的百分，是等於增加一萬二千六百萬盧布，即幾乎比一九二五年（該年增加百分之六十六）多至三倍。最後，拿一九三一年來說。一九三一年產量增長額是百分之二十二，即幾乎比一九二五年少到三倍。當時工業產量總值為三百零八萬萬盧布。該年增長額絕對數目是六十六萬萬餘盧布。所以，當時每個增加的百分是等於增加二萬五千萬盧布以上，即比一九二五年（該年增加百分之六十六）多至六倍，比一九二八年（該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六強）多至兩倍。

所有這些是說明什麼呢？就是說明，在研究產量增長速度時，決不可以考察一般增長額百分數為限，而是還要知道每個增長的百分所包含的內容和全年產量增長的總數。例如，我們決定把一九三三年產量增加百分之十六，即比一九二五年產量增長的百分數少到四倍。但這還不是說這年產量增長的絕對數目也會少到四倍。一九二五年產量增長的絕對數目是三十餘萬萬，每個增長的百分是等於四千五百萬盧布。毫無疑義的，一九三三年產量既然增長百分之十六，那末絕對增長數目就會不下五十萬萬盧布，即幾乎比一九二五年多至兩倍，而每個增長的百分，至少也會等於三萬二千萬

至三萬四千萬盧布。即比一九二五年每個增長的百分所包含的數目，至少也會多至七倍。

同志們，如果具體考察增加額速度和百分數問題，那末情形就是如此。

五年計劃在工業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就是如此。

(四) 五年計劃在農業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

現在我們來講五年計劃在農業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問題。

在農業方面，五年計劃是集體化的五年計劃，黨實行集體化時是從什麼出發的呢？

黨所持的出發點，就是認定要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建成社會主義社會，除工業化而外，還須由小規模的個體農業過渡到擁有拖拉機和新式農業機器的大規模的集體農業，作為蘇維埃政權在農村中的唯一堅固基礎。

黨所持的出發點，就是認定不實行集體化，便不能把我國引上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康莊大道，便不能使千百萬勞動農民擺脫貧困愚昧的狀況。

列寧說過：

『靠小農經濟是擺脫不了貧困境遇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五四〇頁）。

列寧說過：

『如果我們仍舊依靠小農莊來生活，那怕是以自由土地上的自由公民資格來生活，也是不免要滅亡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四一七頁）。

列寧說過：

『只有採用共同的，勞動組合制的，共耕制的勞動，才可逃出帝國主義戰爭把我們逼進去

了的那種絕境』（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五三七頁）。

列寧說過：

『必須過渡到巨大模範農莊中的共耕制，否則不能擺脫俄國現在所處的那種經濟破壞的狀況，那種簡直是絕望的狀況』（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四一八頁）。

列寧根據這點，就得出如下的基本結論：

『掌握着國家政權的工人階級，只有當它在事實上向農民表明了公共的，集體的，共耕制的，勞動組合制的耕種方法底優越時，只有當它用共耕制的，勞動組合制的經濟來幫助了農民時，它才能真正向農民證明自己正確有理，才能把數千百萬農民羣衆吸收到自己方面來，堅實可靠地真正吸收到自己方面來』（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五七九頁）。

黨實行農業集體化大綱，實行五年計劃農業發展大綱時，就是從這些列寧原理出發的。

因此，五年計劃在農業方面的任務，就是要那些無法利用拖拉機和新式農業機器的零散細小個體農戶，聯合成爲用一切新式先進農業工具武裝起來的巨大集體農莊，並在所有一切空閒土地上建立國營模範農莊，即蘇維埃農莊。

五年計劃在農業方面的任務，就是要把蘇聯由農業規模狹小的落後國家，變成爲擁有規模巨大，根據集體勞動組織起來而能供給最多商品產物的那種農業的國家。

黨在四年內完成五年計劃所定農業發展大綱時達到了什麼成績呢？黨是把這個大綱實現了呢，還是遭了失敗呢？

黨所達到了的成績，就是它在不過三年的時期內，便組織了二十餘萬個集體農莊和約近五千萬出產穀物和養畜的蘇維埃農莊，同時在四年內把播種面積擴大了二千一百萬海克脫。

黨所達到了的成績，就是集體農莊已包括了全國農戶總數百分之六十以上，以及全國農民播種面積百分之七十以上，這就是說在三年內便把五年計劃超過完成到三倍了。

黨所達到了的成績，就是它現在已能每年採辦十二萬萬至十四萬萬普特穀物，而在個體農民經濟佔主要地位的那個時期，每年祇能採辦五萬萬至六萬萬普特的商品糧食。

黨所達到了的成績，就是我們擊潰了富農階級，不過還沒有完全把它剷除；我們使勞動農民擺脫了富農盤剝和剝削，而在鄉村中爲蘇維埃政權奠定了堅固的經濟基礎，即集體經濟基礎。

黨所達到了的成績，就是蘇聯已由一個小農經濟的國家，變成了世界上農業規模最大的國家。五年計劃在農業方面四年內完成的總結，大體上就是如此。

現在請你們自己來判斷一下：既然這樣，那末資產階級報章說什麼集體化『失敗了』，說什麼五年計劃在農業方面『破產了』的廢話，究竟還有什麼價值呢。

現在遭受嚴重農業危機的資本主義各國農業情形，又是怎樣呢？請看人所共知的官方統計吧。

在各個基本的產穀國家裏，播種面積縮減了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美國棉花播種面積縮減了百分之十五；德國和捷克斯拉伐克的糖蘿蔔播種面積縮減了百分之二十二至百分之三十；立陶宛和拉脫維亞的亞麻播種面積縮減了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三十。

據美國農業部統計，美國農業出產總值由一九二九年的一百一十萬萬美元減少到了一九三二年的五十萬萬美元，即減低了百分之五十以上。美國穀物出產總值由一九二九年的十二萬八千八百萬美元減少到了一九三二年的三萬九千一百萬美元，即減少了百分之六十八以上。美國棉花出產總值由一九二九年的十三萬八千九百萬美元減少到了一九三二年的三萬九千七百萬美元，即減少了百分

之七十以上。

所有這些事實，難道不是證明蘇維埃農業制度優勝於資本主義農業制度麼？這些事實，難道不是證明集體農莊是比個體農莊和資本主義農莊更有生命能力的經濟形式麼？

有人說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是不充分生利的，說它們耗費金錢很多，說保留這種企業是毫無理由的，說最好是解散這些農莊，而只把其中生利者保留起來，可是，只有絲毫不懂國民經濟問題，絲毫不懂經濟問題的人，才能這樣說。幾年以前，紡織工廠大半是不生利的。當時，我們有一部份同志勸我們關閉這些工廠。如果我們聽從了他們的話，那我們就會怎樣呢？我們就會在國家面前，在工人階級面前幹出了極大的罪過，因為我們這樣作，就會破壞了我們當時已在興盛的工業。我們當時是怎樣做了呢？我們等了一年多，結果是把全部紡織工業都變成爲生利的工業了。我們的高爾基城的汽車工廠呢？它暫時也是不生利的哩。難道也要把它關閉起來麼？又如我們的暫時也是不生利的黑金屬冶煉業呢？難道也要把它關閉起來麼，同志們？如果這樣去觀察生利問題，那我們就會只應當盡量發展幾個最能生利的工業部門，如糖菓工業，麵粉工業，化妝品工業，編織品工業和兒童玩具工業等等，我當然不反對發展這些工業部門，恰巧相反，我們應當發展它們，因爲它們也是居民所需要的。可是，第一，它們沒有重工業來供給機器和燃料，便不能發展。第二，它們不能成爲工業化底基礎。同志們，問題就在這裏。

決不可用商人眼光，決不可根據眼前情形來觀察生利問題，而應當從全部國民經濟幾年情況的觀點上來觀察這個問題。只有這種觀點才能稱爲真正列寧主義的觀點，真正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而這種觀點不僅應該用來看待工業，而且尤其應該用來看待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你們只要想一想：在區區三年以內，我們就創立了二十餘萬個集體農莊和五千左右的蘇維埃農莊，即創立了完全

新的大企業，這種企業對於農業的意義，也如工廠對於工業的意義一樣重大。請你們再指出一個國家，說它能在三年內創立若干新的巨大企業，姑且不說二十萬零五千個，就是二萬五千個也好。你們一定指不出來，因為世界上沒有這樣的國家，而且未曾有過這樣的國家。我們在農業方面却創立了二十萬零五千個新企業。而世界上竟有一些人要求這些企業立刻生利，如果不能立刻生利，就要將其破壞，將其解散。這些非常奇怪的人，豈不是顯然不肯讓遺臭萬年的格羅斯特拉德專美於前麼？

我說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不生利時，我的意思絕對不是想說它們一概不生利。絕對不是！大家知道，我們現在已有許多十分生利的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我們現在已有幾千個集體農莊和幾十個蘇維埃農莊是充分生利的。這些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是我們黨底得意之作，蘇維埃政權底得意之作。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當然不是到處都一樣。在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中間，有舊的，有新的，也有完全年輕的。這些還很幼弱，還沒有完全形成的經濟機體。它們在其組織建設中所處的階段，差不多與我們的工廠在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間所處的階段相當。固然，其中大多數還是不能生利的。可是，毫無疑義，它們經過兩三年以後就一定能够生利，也同我們的工廠在一九二一年以後就能生利一樣。如果藉口說它們現在還不是一概都能生利，便不肯予以種種幫助，那就是在工人階級和農民面前幹出滔天的大罪了。只有人民公敵和反革命份子，才能提出用不着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的問題。

黨在農業方面實現五年計劃時是以加緊的速度實行了集體化的。黨實行這種加緊速度進行集體化的政策，是做得正確麼？是絕對正確的，雖然在這方面不免有過一些急燥行動。黨在實行消滅富農階級和剷除富農巢穴的政策時決不能半途而廢，而是應當把這件事情貫徹到底。

這是第一。

第二，黨既擁有大批拖拉機和農業機器，同時又利用我國沒有土地私有的情況（土地國有！），於是就有一切可能來加速進行農業集體化事業。而黨在這方面確實已達到了極大的成功，因為它把五年計劃所定的集體化大綱超過完成到三倍了。

這是不是說我們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也應實行加緊集體化速度的政策呢？當然不是，因為我們在基本上已經把蘇聯各基本區域集體化事業完成了。所以，我們在這方面所做到的，已超過了我們所可預期的程度。我們不僅在基本上完成了集體化，而且已使絕大多數農民認識了集體農莊是最適當的經濟形式。同志們，這是個莫大的成績。既然如此，那末現在是否還有必要急求加緊集體化速度呢？當然是沒有必要的。

現在的問題已經不是加緊集體化速度的問題，尤其不是集體農莊能否存在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早已肯定解決了。集體農莊已經穩穩奠定了，退向個體舊經濟的道路已是永遠截斷了。現在的任務是要在組織上鞏固集體農莊，把暗害份子從這裏驅逐出去，挑選受過審查的真正布爾塞維克幹部來供給集體農莊，使集體農莊成為真正布爾塞維克的集體農莊。

現在，主要點就在這裏。

五年計劃在農業方面四年完成的情形，就是如此。

（五）五年計劃在改善工農物質狀況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

上面我已說明了工業和農業方面的成功，說明了蘇聯工業和農業高漲的情形。從改善工農物質狀況方面看來，這些成功已產生了什麼結果呢？從根本改善勞動者物質狀況方面看來，我們在工業

和農業方面所有成功底基本結果是什麼呢？

第一個基本結果，就是我們剷除了失業現象，消滅了工人中間那種朝不保夕的情形。

第二個基本結果，就是幾乎全體貧農都加入了集體農莊建設，就是在這個基礎上打破了農民分化為富農貧農的過程，並因此而剷除了農村貧窮困苦的現象。

同志們，這是個莫大的成績，是無論那一個資產階級國家——那怕它是最「民主的」國家——所夢想不到的成績。

我們蘇聯的工人早已忘掉失業現象了，大約三年以前，我們還有約近一百五十萬個失業業者，兩年以前，我們便把失業現象剷除了，在這兩年當中，工人已經忘掉了失業現象，忘掉了失業痛苦，忘掉了失業慘狀，而資本主義國家在失業基礎上發生着何等淒慘的事情啊。在這些國家裏，現在至少有三四千萬個失業業者。這是些什麼人呢？普通都說這是一些「走頭無路的人」哩。

他們每天都想法覓得工作，尋找工作，幾乎任何工作條件都情願接受，可是誰也不收容他們，因為他們是些「多餘的」人。同時却又有大批工業品和農產品被那些逞性妄為的地主資本家的富豪子弟任意揮霍。不給失業業者飯吃，因為他們無飯錢可付；不給他們屋住，因為他們無房錢可付。他們怎麼過活，何處棲身呢？他們所藉以糊口的，是從老爺掉上拋下來的微薄的施捨，他們在垃圾堆裏尋找腐爛的殘餘食品，他們住在大城市的貧民窟裏，而且大多數是住在郊外用木箱板和樹皮匆忙架成的茅屋裏。不僅如此。不僅失業工人苦於失業現象。而且在業工人也苦於失業現象。他們所以苦於失業現象，是因為大批工人失業的情形使他們在生產中的地位不穩，使他們朝不保夕。今天他們還在工廠裏面做工，可是他們不敢担保明朝醒來時不會聽說他們已被開除了工作。

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基本成績之一，就是我們已剷除了失業現象，使蘇聯工人免除了失業慘

狀。

關於農民，也要這樣說，他們也已忘掉了分化爲富農貧農的情形，忘掉了富農剝削貧農的情形，忘掉了每年都迫使幾十萬幾百萬貧農變爲乞丐的破產情形。三四年以前，在我國農民人口中間，貧農至少佔百分之三十，即有一千餘萬人，而在更早的時候，在十月革命以前，貧農至少佔農民人口百分之六十。什麼是貧農呢？這就是在經營農業時照例都缺乏種子，或缺乏耕馬，或缺乏農具，或是連所有這一切東西都缺乏的人，貧農就是過着半饑半飽生活，通常都受富農剝削，而在舊俄時代是既受富農盤剝，又受地主盤剝的人。在不久以前的時候，還約有一百五十萬貧農，有時甚至整整二百萬貧農，每年跑到南部，跑到北高加索和烏克蘭去謀生，受富農僱用，而在更早的時候，是受富農和地主僱用。他們每年跑到工廠門口來補充失業者的隊伍的人數更多。當時不僅貧農處於這種惡劣地位，而且中農也大半是如貧農一樣受着貧窮困苦的。關於所有這一切苦況，農民都早已掉忘了。

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結果，給予了貧農和下層中農一些什麼呢？它打破和擊碎了富農階級，使貧農和大部分中農擺脫了富農盤剝，它把貧農和大部分中農吸入了集體農莊，並爲他們造成了穩固的地位，於是就剷除了農民分化爲剝削者（富農）和被剝削者（貧農）的可能。它把加入集體農莊的貧農和下層中農變成了生活有保障的人，而剷除了農民破產貧困的過程。現在我國已經沒有幾百萬農民每年離鄉背井跑到遠方去謀生的現象了。現在要農民離開自己的集體農莊，被吸收到什麼地方去做工，就須和集體農莊訂立合同，而且還要送給集體農莊莊員免費車票。現在我國已經沒有幾十萬幾百萬農民陷於破產，站在工廠門口哀求工作的現象了。這種事情從前是有過的，但它早已成爲過去了。現在農民是生活有保障的主人，是擁有拖拉機、農業機器、存種和存糧等等的集體農莊中

的莊員。

這就是五年計劃給予了貧農和下層中農的一些東西。

這就是五年計劃在改善工農物質狀況方面的基本成績。

由於在改善工農物質狀況方面達到了這些基本的成績，所以我們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就有了如下的事實：

(1) 大工業方面的工人和職員人數，已比一九二八年增加到兩倍，即超過了五年計劃百分之五十七；

(2) 國民收入，也就是說工農收入，在一九三二年增加到四百五十一萬萬盧布，即比一九二八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五；

(3) 大工業方面的工人和職員全年平均工資，比一九二八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七，即超過了五年計劃百分之十八；

(4) 社會保險基金比一九二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九十二（一九三二年為四十一萬二千萬盧布，而一九二八年為十萬零五千萬盧布），即超過了五年計劃百分之一百一十一；

(5) 公共飯堂迅速增加，共包括各最主要工業部門工人百分之七十以上，即超過了五年計劃六倍。

固然，我們還沒有達到完全滿足工農物質需要的地步。而且我們在最近幾年內也未必會達到這個地步。可是，我們毫無疑義已達到逐年改善我國工農物質狀況的地步了。只有蘇維埃政權底死敵，也許還有某些資產階級報界份子，包括資產階級報界一部份駐莫通訊員在內，才能懷疑這一點，而他們對於國民經濟和勞動者狀況的瞭解，是未必勝過阿比西尼亞國王對於高等數學的瞭解程

度的。

資本主義各國工農狀況，又是怎樣呢？

請看官方統計吧。

資本主義各國的失業人數已增加到駭人聽聞的地步。美國據官方統計來看，單是製造業中的在業工人數目，就由一九二八年的八百五十萬人減少到了一九三二年的五百五十萬人；而按美國勞動同盟所作的統計，美國全部工業中的失業工人數目，在一九三二年末已達一千一百萬人。英國據官方統計來看，失業人數已由一九二八年的一百二十九萬人增至一九三二年的二百八十萬人。德國據官方統計來看，失業人數由一九二八年的一百三十七萬六千人增加到了一九三二年的五百五十萬人。其他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情形也是如此，而且官方統計照例都是故意減少了失業工人的數目字，其實資本主義各國失業人數總共已達三千五百萬以至四千萬人。

工人工資是一貫減低的。據官方統計，美國工人每月平均工資比一九二八年水準減低了百分之三十五，英國工人每月平均工資在同一時期內減低了百分之十五，而德國工人每月平均工資，甚至減低了百分之五十。據美國勞動同盟統計，由於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年減低工資的結果，美國工人所受損失，等於三百五十萬萬美元以上。

英德兩國本來很低的工人保險基金大大減少了。在美法兩國完全沒有或者幾乎完全沒有任何失業保險形式，因此美國無家可歸的工人和無人照料的兒童人數，也就增加得特別快。

資本主義各國農民羣衆狀況也是很壞的，那裏的農業危機根本破壞農民經濟，使數千百萬破產農民和法麥爾變成乞丐。

五年計劃在改善蘇聯勞動者物質狀況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就是如此。

(六) 五年計劃在城鄉間商品流轉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

現在我們就來說說五年計劃在城鄉間商品流轉額增長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

工業和農業產量的大大增長，工業和農業所有商品剩餘量的增長，以及工農需要額的增加，——所有這一切都不能不使城鄉間商品流轉活躍和擴大起來，而且真正使它活躍和擴大起來了。

城鄉間的生產結合是基本的結合形式。可是，單靠生產結合還不夠。必須用商業結合來補充生產結合，使城鄉聯繫成爲堅固而不可分離的聯繫。爲要達到這步，就絕對必須發展蘇維埃商業。如果認爲單只經過某一條溝道，例如經過合作社，便可發展蘇維埃商業，那就不正確了。爲要發展蘇維埃商業，就必須利用所有一切溝道：合作社體系，國營商業體系，集體農莊商業。

有些同志以爲發展蘇維埃商業，尤其是發展集體農莊商業，便會是回復到新經濟政策第一階段。這種想法是完全不對的。

蘇維埃商業，包括集體農莊商業在內，是與新經濟政策第一階段上的商業根本不同的。

在新經濟政策第一階段上，我們容許過資本主義的活躍，容許過私人的商品流轉，容許過私商、資本家和投機者底『活動』。

這是一種多少自由的商業，不過是由國家調節作用來加以限制。當時在國內商品流轉方面，私人資本主義部份還佔頗大的地位。更不必說我們當時既沒有像現時這樣發展的工業，又沒有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按計劃而工作並供給國家巨量的後備農產品和工業品。

可以說我們現在的情形也是這樣麼？當然不可這樣說。

第一，決不可把蘇維埃商業和新經濟政策第一階段上雖然是由國家所調節的那種商業相提並

論、新經濟政策第一階段上的商業，是容許資本主義活躍，容許私人資本主義部份在商品流轉方面活動的，而蘇維埃商業却是以不許資本主義活躍，不許私人資本主義部份在商品流轉方面活動爲出發點的。什麼是蘇維埃商業呢？蘇維埃商業就是沒有大小資本家參加的商業，沒有大小投機商人參加的商業。這是特種商業，這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而只有我們布爾塞維克才在蘇維埃制度發展條件下加以實行的商業。

第二，我們現在有頗發展的國家工業與整批的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供給國家巨量後備農產品和工業品來擴展蘇維埃商業。這是在新經濟政策第一階段條件下所沒有，而且是當時所不能有的。

第三，我們在最近時期以來已把私販、私商和各種中介人完全逐出商品流轉範圍以外了。這當然不是說私販和投機商人已絕對不會利用他們最方便的場所，即利用集體農莊商業而按隔世遺傳律重新出現於商品流轉範圍了。況且，集體農莊莊員自己有時也甘願做一做當然不會使他們臉上增光的投機生意哩。可是，我們有蘇維埃政府不久以前所頒佈的制止投機和懲罰投機商人辦法的法律，來反對這種惡劣現象。你們當然知道，這個法律是不很柔和的。你們當然懂得，這樣的法律是在新經濟政策第一階段條件下所沒有，而且是當時所不能有的。

既然如此，如果還妄說什麼回復到新經濟政策第一階段上的商業，那難道不顯然是表示絲毫不懂得，真是絲毫不懂得我們蘇維埃經濟麼。

有人向我們說：沒有健全的金融和健全的貨幣，便無法擴展商業，縱然這種商業是蘇維埃商業，也是無法擴展的；必須預先醫治我國金融和我們蘇維埃貨幣，因爲據說我們蘇維埃貨幣是沒有絲毫價值的。資本主義各國經濟學家就是這樣對我們說的。我認爲：這些尊貴的經濟學家對於政治

經濟學的認識，並不勝過——舉例來說——肯特爾伯尼主教對於反宗教宣傳的認識。怎能說我們蘇維埃貨幣沒有什麼價值呢？難道我們不正是用這種貨幣建築了馬格尼托工廠，德涅泊爾電站，庫茲涅茨工廠，斯大林格拉拖拉機工廠，哈爾科夫拖拉機工廠，高爾基城汽車工廠，莫斯科汽車工廠以及幾十萬集體農莊和幾千蘇維埃農莊麼？這些老爺們莫非認為這一切企業都是由麥草或泥土，而不是由具有一定價值的實際材料築成的麼？如果估計到在我國商品流轉中具有決定意義的是有組織的市場，而不是那只有附屬作用的無組織的市場，那末我國貨幣穩定性是由什麼所保證的呢？當然不僅是黃金準備。保證我國貨幣穩定性的，首先就是國家所支配的巨量商品，這些商品是按照穩定價格加入商品流轉範圍的。試問有那一個經濟學家，能够否認蘇聯所獨有的這種保證要比任何黃金準備更能切實保證貨幣穩定性呢？資本主義各國經濟學家是否終究會懂得，他們已經是完全被那把黃金準備當作貨幣穩定性唯一保證的理論弄糊塗了呢？

對於與擴展蘇維埃商業有關的種種問題，就是如此。

由於五年計劃實現的結果，我們在發展蘇維埃商業方面達到了什麼成績呢？

我們在五年計劃總結中有如下的成績：

(1) 輕工業產量比一九二八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七；

(2) 合作社商業與國營商業零售額，按一九三二年價格計算已增加到三百九十六萬萬盧布，就是說，零售商品量比一九二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五；

(3) 國營商業與合作社商業網，比一九二九年增加了十五萬八千個舖子和商店；

(4) 集體農莊商業日益擴展，個別國家機關和合作社機關所採辦的農產品數量日益增加。

事實就是如此。

資本主義各國內部商品流轉情況却就完全不同了，在那裏，由於經濟危險的結果，商業萬分減縮，大批企業關閉，中小商人破產，巨大商號倒閉，商店貨棧充斥的存貨無法銷售出去，而勞動羣衆底購買力却不斷降低。

五年計劃在商品流轉發展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就是如此。

(七) 五年計劃在與敵對階級餘孽鬭爭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

由於五年計劃在工業、農業以及商業方面完成的結果，我們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中都已剷除了資本主義份子，而奠定了社會主義原則。

這種情形對於資本主義份子應當產生什麼結果，而且確實產生了什麼結果呢？

結果，垂死階級底最後餘孽，即工業家及其從僕，商人及其走卒，從前的貴族和神父，富農和富農走狗，從前的白衛軍官和警佐，從前的警察和憲兵，各種沙文主義資產階級智識份子以及其他一切反蘇維埃份子，都已被打翻了。

這些從前的人物既被打翻，散落在蘇聯各地，便設法鑽進到我們的工廠、我們的機關和商業組織、鐵路運輸和水上運輸企業中來，特別是鑽進到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中來。他們戴上『工』『農』假面具，鑽進到這裏隱藏起來，其中有些人甚至鑽進黨裏來了。

他們是帶着什麼東西鑽進這些地方來的呢？當然是帶着仇視蘇維埃政權，痛恨新式經濟、新式生活及新式文化的心理鑽進來的。

這些老爺們已經是沒有力量來直接進攻蘇維埃政權了。他們和他們的階級屢次舉行過這種進攻，可是他們已被擊潰，已被打散了。因此，他們現在還能採取的唯一辦法，便是實行危害和暗害

工人，集體農民，蘇維埃政權和黨。於是他們就用暗中拆台手段來竭力進行危害勾當，放火焚燒倉庫，破壞機器，組織怠工事件，在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裏面組織暗害工作，而且其中有些人，其中還有某些大學教授，瘋狂般地進行暗害工作，以至於實行在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的牲畜中間散份瘟疫和炭疽熱，在馬匹中間散佈腦膜炎等等。

可是，主要點還不在此。這些從前人物底主要『活動』，就是組織大批偷竊侵吞國家財產，合作社財產以及集體農莊財產的勾當。在工廠裏進行偷竊侵吞勾當，在鐵路上實行偷竊侵吞貨載，在堆棧和商店裏進行偷竊侵吞勾當，尤其是在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裏進行偷竊侵吞勾當，——這就是這班從前人物底基本『活動』形式。他們憑靠着自己的階級本能，覺察到公有制是蘇維埃經濟底基礎，所以爲要危害蘇維埃政權，就必須動搖這個基礎，而他們也就實行用組織大批偷竊侵吞勾當的手段來動搖公有制。

爲了組織侵吞勾當，他們便利用昨天還是個體農民，今天已是集體農民的那些集體農莊莊員底私有主義習慣和遺毒。你們是馬克思主義者，當然知道人們意識底發展是落後於人們底實際地位的。就地位講，集體農民已不是個體份子，而是集體份子了，但他們的意識暫時還是舊有的意識，私有主義的意識。於是剝削階級出身的那些從前的人物就利用集體農民私有主義習慣，來組織侵吞公產的勾當，以求動搖蘇維埃制度底基礎，即公有制。

我們有許多同志竟寬容這種現象，不懂得這種大批偷竊侵吞公產的事實底意思和意義。他們好像瞎子一樣，看不見這些事實，以爲『這裏並沒有什麼特別了不得的事』。但這些同志們是大錯而特錯了的。也如資本主義底基礎是私有制一樣，我們蘇維埃制度底基礎就是公有制。如果說資本家當時用宣佈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辦法，而達到了鞏固資本主義制度的目的，那末我們共產黨人

就更加應當宣佈公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來鞏固一切生產部門與商業部門方面的社會主義新經濟形式。容許偷竊公有財產，容許侵吞公有財產，不管是國家財產也好，或合作社和集體農莊財產也好，而不理會這種反革命的胡行，便是幫助敵人來破壞我們這個以公有制為基礎的蘇維埃制度。我們蘇維埃政府不久以前所公佈的關於保護公有制的法律，就是根據這一點出發的。這個法律是現時革命法制底基礎。每個共產黨員，每個工人和每個集體農民底主要職責，就是必須極嚴格地執行這個法律。

有人說：現時的革命法制和新經濟政策第一時期的革命法制毫無區別，現時的革命法制是恢復新經濟政策第一時期的革命法制。這種說法是完全不對的。新經濟政策第一時期的革命法制底主要鋒芒是要反對戰時共產主義過火成份，反對『非法的』沒收和捐稅。新經濟政策第一時期革命法制在私有主，個體經濟者和資本家嚴格遵守蘇維埃法律的條件下，保障了他們財產的安全。而現時革命法制却就完全不同了。現時革命法制底主要鋒芒並不是反對戰時共產主義過火成份，因為這種成份早已不存在了，而是要反對公共經濟中的盜賊和暗害份子，反對惡棍和侵吞公產的人。由此可见，現時革命法制底基本關注是要保護公有財產，而不是其他什麼事情。

因此，為保護公有制而鬭爭，用蘇維埃政權法律所規定的一切方法和手段去作鬭爭；就是黨底基本任務之一。

堅強有力的無產階級專政，——這就是我們現在為粉碎那些垂死階級最後餘孽並打破其盜竊勾當所必需的東西。

有些同志把消滅階級，建立無階級社會以及國家消亡的提綱，瞭解為辯護苟且偷安和泰然自安態度的論據，瞭解為辯護階級鬭爭熄滅和削弱國家政權的這一反革命理論的論據。這種人當然是

不能與我們黨有什麼相干的。這是應被逐出黨外的變節份子或兩面派。階級的消滅不是經過階級鬭爭熄滅的道路，而是經過階級鬭爭加强的道路達到的。國家的消亡不是經過國家政權削弱，而是經過國家政權最高限度加强的道路到來的；只有最高限度加强國家政權，才可以最終剷除垂死階級底餘孽，並組織國防去抵禦還沒有被消滅掉，而且還不是很快就會被消滅掉的資本主義包圍。

由於五年計劃完成的結果，我們已完全把敵對階級底最後餘孽從他們的生產陣地上趕走了，我們已把富農階級擊破，並準備好了消滅富農階級的基礎，這就是五年計劃在與資產階級最後隊伍作鬭爭方面的總結。但這還不够。現在的任務是要把這些從前的人物從我們自己的企業和機關中趕出去，使其永遠不能爲害。

當然不可說這些從前的人物能用暗害與偷竊手段來絲毫改變蘇聯現今的狀況。他們要與蘇維埃政權底設施對立，已經是無能爲力了。可是，如果我們的同志不用革命警覺性武裝起來，如果我們的同志不從實踐中拋棄那種寬容偷竊侵吞公產事實的庸人泰然自安態度，那末從前的人物便能作出不少的害處來。

要知道，蘇維埃國家威力越增長，垂死階級最後餘孽底抵抗也就會愈猛烈。垂死階級底最後餘孽正因爲他們已在死亡，奄奄待斃，所以必將採用愈趨劇烈的反抗手段，唆使和發動居民中落後階層來反對蘇維埃政權。這些從前的人物用盡各種陷害和誣蔑手段來反對蘇維埃政權，企圖發動落後份子。在這個基礎上，各種舊時的反革命黨，即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中部和邊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底所有一切殘兵敗將，反革命的託洛茨基反對派與右傾反對派餘孽份子，是能復活和蠢動起來的，這當然沒有什麼可怕的地方，可是，我們如果願意迅速剷除這些份子而免受特別犧牲，便

必須注意到這一切情形。

正因為如此，所以革命警覺性就是布爾塞維克現在特別必需的品性。

(八) 一般結論

這就是五年計劃在工業和農業方面，在改善勞動者生活和發展商品流轉方面，在鞏固蘇維埃政權方面和擴展反對垂死階級餘孽及遺毒的階級鬭爭方面完成的基本總結。

這就是蘇維埃政權在最近四年來所獲得的成功和成績。

如果根據這些成功而認為我們百事大吉，那就錯誤了。當然，我們還不是百事大吉的。在我們的工作中還有許多缺點和錯誤。我們的實踐方面還有浪費現象和糊塗從事的情形。可惜我現在不能說明這些缺點和錯誤，因為委託我做的總結報告範圍不容許我來暢談這些問題。可是，現時問題並不在此。問題是在於雖然有各種缺點和錯誤，——而我們沒有一個人是否認有這些缺點和錯誤的，——可是我們終究達到了使全世界工人階級欽佩喜躍的嚴重成功，終究達到了真正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

試問有什麼東西能夠而且確實表現了主要作用，使我們黨不管有各種錯誤和缺點，而終究達到了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偉大成功呢？

究竟是什麼基本因素使我們不顧一切而達到了這個有歷史意義的勝利呢？

首先就是千百萬工人和集體農民所表現的積極性和捨己精神，熱忱和首倡性，他們和工程技師人員一起施展巨大力量來發展了社會主義競賽和突擊運動。沒有這個情況，我們就會不能達到目的，就會不能前進一步，這是無可懷疑的。

其次，就是黨和政府所實行的堅強領導，它們號召羣衆前進，並克服了前進途中的一切困難。最後，就是蘇維埃經濟制度所特有的種種長處和優勢，它包含有克服一切困難所必需的雄厚能力。

這就是保證蘇聯獲得了歷史勝利的三個基本因素。

一般結論：

(1) 五年計劃底總結推翻了資產階級活動家和社會民主黨活動家妄說什麼五年計劃是幻想，是夢話，是不可實現的夢想的那種斷語。五年計劃底總結表明五年計劃是已經完成了。

(2) 五年計劃底總結，打破了妄說工人階級只能破壞舊制度，而不能建設新制度的那個著名的資產階級『信條』。五年計劃底總結表明工人階級也如它善於破壞舊制度那樣善於建設新的制度。

(3) 五年計劃底總結打破了社會民主黨人說什麼在單獨一個國家裏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那個提綱。五年計劃底總結表明在一個國家裏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是完全可能的，因為這個社會底經濟基礎在蘇聯已經建成了。

(4) 五年計劃底總結推翻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說什麼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是最好體系，而其他一切經濟體系都不穩固，都不能克服經濟發展中的困難的那種斷語。五年計劃底總結表明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是腳根動搖而不穩固的東西，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已在衰頹，而應當讓位於別的更高的經濟體系，即蘇維埃的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只有蘇維埃經濟體系，才是不怕危機而能克服資本主義所不能解決的種種困難的唯一經濟體系。

(5) 最後，五年計劃底總結表明只要黨選定有正確的方針而不害怕困難，那它便是不可戰勝

的。

（經久不息的熱烈鼓掌，轉為歡呼，全場起立，向斯大林同志致敬）。

選自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

一九四八年莫斯科版卷四八五至五三〇頁

論農村中的工作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一日在聯共（布）中央

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的演說——

同志們！我認爲各位發言同志已把我黨農村工作狀況，工作缺點和工作優點，特別是把工作缺點，作了一個正確的敘述。可是，我總覺得他們還沒有把我們農村工作缺點方面的最主要點說出來，還沒有把這些缺點底根源揭露出來。而這一點却是我們所最應注意的。因此，就讓我來發表我對於我們農村工作缺點的意見，用布爾塞維克所固有的全部爽直精神來發表我的意見。

在去年，在一九三二年，我們的農村工作方面的主要缺點是什麼呢？

主要缺點就是我們去年的糧食採辦工作遇到了比前年，即比一九三一年更大的困難。

決不可說這是由於收成不好，因爲去年收成不僅不比前年壞些，而且要比前年好些。誰也不能否認，一九三二年糧食收穫總量是比一九三一年多些，一九三一年因爲蘇聯東北五個基本區域發生過旱災的結果，糧食數量是大大減少了的。固然，我們在一九三二年的收成，也因爲庫班和特勒克以及烏克蘭幾個區域內氣候條件不好而受到了某些損失。可是，毫無疑義，去年所受的損失還沒有

一九三一年因東北各區發生旱災所遭受的損失一半那樣多。所以，我國一九三二年份的糧食收成是要比一九三一年多些。雖然如此，而我們在一九三二年糧食採辦工作方面，還是遇到了比前年更大的困難。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我們的工作爲什麼有這個缺點呢？這種矛盾現象應怎樣來解釋呢？

(一) 這首先是因爲我們的地方工作同志，我們的農村工作人員，沒有估計到農村中因宣佈實行集體農莊糧食貿易所形成的新環境。正因爲他們沒有估計到這個新環境，所以他們也就沒有根據新環境來從新改變工作方式。在還沒有實行集體農莊糧食貿易時，在沒有國家所定價格與市場價格這兩種糧食價格並存時，農村中的環境是一回事。自從宣佈集體農莊糧食貿易時起，農村中的環境就必定要急劇變更了，因爲宣佈集體農莊貿易就是承認較高於國家所定價格的市場糧食價格爲合法價格。這種情況當然也就使農民在向國家交納糧食時表現着一種吝嗇態度。農民當時這樣盤算着：『集體農莊糧食貿易已宣佈實行了，市場價格已經合法化了，於是我把同等數量的糧食拿到市場上去賣，就能比交納給國家時得到較多的錢，所以我如果不是傻子，當然就要把糧食留一手，少交納一些給國家，多留一些來做集體農莊貿易，以便在出賣同等數量的糧食時可以多賺一些錢』。

這本來是最簡單而自然的邏輯！

可是不幸我們的農村工作人員，至少是其中許多人，竟沒有懂得這個簡單而自然的事情。在這個新環境中，爲要不致破壞蘇維埃政權所定糧食採辦計劃，共產黨員本來是應當在收穫開始時，即在一九三二年七月時，就竭力加緊和督促糧食採辦工作。這是客觀環境所要求的。而他們在事實上又是怎樣幹了呢？他們並沒有督促糧食採辦工作，反而督促實行各種貯存，結果就使糧食交納者在履行其對國家所負義務時更加吝嗇起來。他們既沒有懂得新環境，於是他們就不來顧慮農民在交納糧食方面的吝嗇態度能障礙糧食採辦工作，反而來焦急農民會想不到要留下一些糧食，以便後來運到市場上去做集體農莊的貿易，焦急農民會不幸而把自己全部糧食統統交給國家倉庫。

換句話說：我們的農村共產黨員，至少是其中的多數人，只看見了集體農莊貿易底長處，只懂

得，只領會了集體農莊貿易底長處，却完全沒有懂得，沒有領會集體農莊貿易底短處，——他們沒有懂得，如果他們這些共產黨員不是從收穫糧食最初幾天起就極力督促糧食採辦運動，那末集體農莊貿易底短處是會使國家大受其害的。

而且不僅集體農莊工作人員犯了這種錯誤，許多蘇維埃農莊經理也犯了這種錯誤，他們竟犯罪式地把應該交納給國家的糧食留下來，却按較高價格賣給旁人。

人民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在其關於發展集體農莊貿易的著名決議中，是不是顧到了實行集體農莊糧食貿易所形成的這種新環境呢？是的，是顧到了的。在決議上直接說過：只有把糧食採辦計劃完全執行並把種子收齊以後，才可以開始實行集體農莊糧食貿易。在決議上直接說過：只有把糧食採辦工作和收藏種子的工作結束以後，大約是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五日的時候把這些條件都執行完結後，才可以開始實行集體農莊糧食貿易。人民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當時簡直是用它們的這個決議來警告我們的農村工作人員說：不要因顧慮種種貯蓄和貯存而模糊自己的視線，不要離開主要任務，而應當從糧食收穫最初幾天起就開展糧食採辦工作，並特別加緊這個工作，因為第一個任務是完成糧食採辦計劃，第二個任務是貯藏種子，你們只有把這些條件執行完結後，才可以開始實行和發展集體農莊糧食貿易。

也許中央政治局和人民委員會是錯在沒有充分剴切強調這一點，沒有充分嚴厲預告我們農村工作人員關於集體農莊貿易所包含的危險。可是，它們毫無疑義是把這些危險情形預告了我們的農村工作人員，而且預告得十分明白。老實說，中央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對於我們各地方工作人員——不僅是區工作人員，而且某些省工作人員——所具有的列寧主義鍛鍊和明達性，未免估量得有點過份了。

也許本來是不應該宣佈施行集體農莊糧食貿易的吧？尤其是因為集體農莊糧食貿易不僅有其長處，而且還有一些短處，那末宣佈實行集體農莊糧食貿易也許是個錯誤吧？

不，這並不是個錯誤。無論那一個革命辦法，如果它實行得不正確，都是不能担保沒有某些短處的。集體農莊糧食貿易也是如此。集體農莊貿易，無論對於農村或城市，無論對於工人階級或農民，都是同樣需要而且有利的。正因為它是有利的，所以必須加以施行。

人民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在施行集體農莊糧食貿易時是根據什麼理由出發的呢？

首先，就是因為要擴大城鄉間商品流轉基礎，改善供給工人們農產品和供給農民們城市製造品的事業。毫無疑義，單靠國營貿易和合作社貿易，是做不到這一層的。除了這些商品流轉溝道而外，還要利用新的溝道，即集體農莊貿易。我們施行集體農莊貿易，也就造成了這些新的溝道。

其次，就是因為要經過集體農莊糧食貿易來給予集體農莊莊員一種附加收入的源泉，鞏固他們的經濟狀況。

最後，就是因為要靠施行集體農莊貿易來更加推動農民去改善集體農莊工作，改善播種和收穫方面工作。

你們知道，人民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所持的這些理由，是由近來集體農莊生活中的具體事實所完全證實了的。集體農莊更加鞏固了，退出集體農莊的現象停止了，個體農民加入集體農莊的意向加強了，集體農莊莊員力求按更嚴格選擇的原則來接受新莊員，——所有這一切以及其他許多類似的事實，都是顯然證明集體農莊貿易不僅沒有使集體農莊地位減弱，反而使集體農莊地位加強和鞏固起來了。

所以，我們農村工作方面的缺點，並不是由於施行了集體農莊貿易，而是因為我們的工作人員

沒有始終正確實行集體農莊貿易，因為他們不善於顧到宣佈實行集體農莊糧食貿易所形成的新環境，不善於適應這個新環境來改造自己的隊伍。

(二)我們農村工作方面的缺點所由發生的第二個原因，就是我們的地方工作同志——而且不僅這些同志——沒有瞭解我們農村工作條件因集體農莊在基本穀物區內統治地位奠定而發生了變更的情形。在我國穀物區裏，集體農莊經濟形式已經成爲統治形式，——這件事實是我們大家都感覺高興的，至於這個情況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我們在發展農業方面的關注和責任這一點，却就不是大家都懂得的了。許多人認爲：既然集體化在某區某省已達到百分之七八十左右，那就是說一切事情都已妥貼了，我們也就可以不必管事，而聽其自然，聽其自然，以爲集體化自然會解決一切，自然會提高農業的。但這是一種很大的錯誤，同志們。其實，集體農莊成爲我國農業中統治形式的事實，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我們對於農業的關注；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共產黨員在提高農業方面的領導作用。在目前這時候，自流態度對於農業發展事業的危險，比任何時候都要嚴重些。在目前這時候，自流態度是能葬送一切的。

當個體農莊主人還在農村中佔主要地位時，黨對於農業發展事業的干預，尙能以個別的幫助辦法，個別的忠告或警告爲限。當時，個體農民只得各自關照自己的經濟，因爲這個經濟只是他們的經濟，他不能把經營這個經濟的責任推諉到其他人身上；當時他除了自己而外，是再沒有什麼人可以依靠的。當時，個體農民如果不願意挨餓，不願意餓死，就得親自照料播種收穫以及其他一切耕作手續。而一經轉入集體經濟時，情形就根本改變了。集體農莊不是個體經濟。所以，集體農莊莊員現在這樣說：『集體農莊是我的，又不是我的；集體農莊是我的，但同時又是張三李四王五及其他集體農莊莊員的，集體農莊是大家公有的』。現在集體農莊莊員，昨天還是個體農民，

今天已是集體農民的莊員，已經能把責任推諉到本集體農莊其他莊員身上了，已經能指靠其他莊員了，因為他知道集體農莊是不會使他挨餓的。因此，集體農莊莊員所有的關注，也就比他過去經營個人經濟時少些了，因為現在對於集體農莊經濟的關注和責任，是由全體莊員分担的。

從這裏就應得出什麼結論呢？從這裏所應得出的結論，就是對於處理經濟所負責任的重心，已經由個別農民身上移到集體農莊底領導機關，集體農莊底領導中堅身上來了。現在，農民並不是要求自己，而是要求集體農莊領導機關，或更確切一點說，與其說是要求自己，不如說是要求集體農莊領導機關來關注經濟和正確處理事務了。而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黨現在已不能以對農業發展過程採取個別干預辦法爲限了。它現在應當親身担起集體農莊領導責任，應當親自担起對於工作的責任，並幫助集體農莊莊員根據科學技術成績來推進自己的經濟。

不僅如此。集體農莊是巨大經濟，而巨大經濟沒有計劃是不能經營的。包含有幾百個農戶，有時甚至包含有幾千個農戶的巨大農莊，是一定要按計劃指導才可經營的。它沒有計劃指導，就會破壞，就會瓦解。你們看，這就是集體農莊制度下的另一個新條件，這個條件是與經營個體細小經濟的條件根本不同的。可以把經營這種巨大農莊的事宜交給所謂事物自然行程，自流過程麼？當然是不可以的。爲要經營這種經濟，就須保證集體農莊某種最低限度數量的具有普通常識的人材，這些人材應能計劃經濟並有組織地經營之。很明顯的，除非由蘇維埃政權來經常干預集體農莊建設事業，除非由蘇維埃政權來經常幫助這一事業，便無法辦好這個經濟。

從這裏就應得出什麼結論呢？從這裏所應得出的結論，就是集體農莊制度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黨和政府對於農業發展事業的關注與責任。從這裏所應得出的結論，就是黨如果願意領導集體農莊運動，便應當熟悉集體農莊生活和集體農莊領導中的一切詳情。從這裏所應得出的結論，就

是黨不應當減少，而應當增加它和集體農莊的聯繫。應當知道集體農莊裏所發生的一切事情，以便能及時幫助集體農莊，並預防那些威脅着集體農莊的危險。

而我們的事實上所看見的情形又是怎樣呢？我們的事實上所看見的，是有一些區組織和省組織竟與集體農莊生活隔離，不知道集體農莊底需求。人們在辦公室內坐着，自滿自足地寫東寫西，殊不知集體農莊是在官僚主義辦公室外面發展着的。有時，他們竟與集體農莊完全隔離了，某些邊委委員竟不是從本邊疆內相當區組織方面，而是在莫斯科從中央委員方面得到關於本邊疆集體農莊內情形的消息、同志們，這是很痛心的，但這是事實。由個體經濟過渡到集體農莊，本應使共產黨員在農村中的領導作用加強起來，而在事實上這一過渡却往往使共產黨員專以集體化高度百分數自誇，以至於高枕而臥，漠不關心，聽其自流，聽其自然。必然對集體農莊經濟實行有計劃領導的問題，本應加強共產黨員在集體農莊裏的領導作用。而事實上呢，共產黨員却往往袖手旁觀，讓那些從前的白衛軍官，從前的皮特柳爾份子以及一般工農敵人去把持集體農莊。

我們的農村工作方面缺點所由產生的第二個原因，就是如此。

(三) 我們的農村工作方面缺點所由產生的第三個原因，就是我們許多同志過份估計了集體農莊這個新經濟形式底作用，結果竟把集體農莊看作偶像。他們認定：既然有了集體農莊這一社會主義經濟形式，於是一切事情都已妥貼了，於是集體農莊事務底正確進行，集體農莊經濟底正確設計，集體農莊變為模範社會主義的農莊，都有保證了。他們沒有瞭解：集體農莊按其組織結構來說還很幼弱，而需要黨方面的重大幫助，需要黨給予它們一些堅定而爾塞維克的幹部，需要黨對集體農莊事務實行日常的領導。但這還不能概括一切，甚至不是主要之點。這裏的主要缺點，就是我們許多同志過份估計了集體農莊這種新農業組織形式底力量和可能性。他們沒有瞭解：集體農莊雖然

是社會主義經濟形式，可是它還遠遠沒有免除各種危險，還沒有免除各種反革命份子鑽進集體農莊領導機關裏來的危險，還沒有免除反蘇維埃份子在某種條件下爲了自己的目的來利用集體農莊的危險。

集體農莊是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形式，正如蘇維埃是社會主義的政治組織形式一樣。無論集體農莊和蘇維埃，都是我國革命底極大成果，工人階級底極大成果。但集體農莊和蘇維埃不過是個組織形式，固然是社會主義的組織形式，但終究是個組織形式。一切都依這個形式包含有什麼內容爲轉移。我們知道有工兵代表蘇維埃在一定時期內幫助反革命來反對過革命的事實。在我們蘇聯有過這樣的事實，例如在一九一七年七月間，蘇維埃是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所領導的，所以蘇維埃當時掩護反革命來反對過革命。一九一八年末在德國也有過這樣的事實，蘇維埃當時是社會民主黨人所領導的，所以蘇維埃當時掩護反革命來反對過革命。所以，問題不僅在於蘇維埃這個組織形式，雖然這個形式是個極大的革命成果。問題首先就在於蘇維埃底工作內容，問題是在於蘇維埃底工作性質，問題是在於蘇維埃究竟是由誰所領導，——是由革命者所領導，抑是由反革命者所領導。正因爲如此，所以反革命者並不是時時都表示反對蘇維埃的。例如大家知道，在喀琅施塔得暴時，俄國反革命魁首米留可夫曾經表示贊成蘇維埃，但不要共產黨人參加。『擁護不要共產黨人參加的蘇維埃』——這就是俄國反革命魁首米留可夫當時所提出的口號。反革命者懂得：問題不僅在於蘇維埃本身，而且首先是在於由誰領導蘇維埃。

集體農莊也是如此。集體農莊這個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形式，如果是由真正的革命者，即布爾塞維克，即共產黨員所領導的，那它就能顯出經濟建設奇蹟來。反之，集體農莊如果是由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皮特柳爾的軍官和其他白衛份子，從前的鄧尼金份子和高爾察克份子所把持的，

那它在一定時期內就能變成各種反革命罪行底掩護物。同時還要注意到，集體農莊這個組織形式不僅沒有免除反蘇維埃份子鑽進來的危險，而且在第一個時期甚至使反革命份子有一種暫時加以利用的方便的機會。當農民還在進行個體經濟時，他們是散居各處，彼此分立，因此反蘇維埃份子在農民中間的反革命陰謀還不能發生多大的效果。而在農民過渡到了集體農莊經濟以後，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這裏農民已經有現成的羣衆組織形式，即集體農莊。因此，反蘇維埃份子鑽進集體農莊和進行反蘇維埃活動，也就能獲得比較大得多的效果了。反蘇維埃份子一定是顧到了這一切情形的。大家知道，例如在北高加索一帶，有一部份反革命份子自動設法建立一種類似集體農莊的組織，並利用這些組織作爲掩護他們祕密組織的合法護符。同樣大家知道，反蘇維埃份子在他們還沒有被揭破，還沒有被擊潰的那些區域裏，樂意加入集體農莊，甚至於還讚美集體農莊，以便在集體農莊內建立反革命工作底巢穴。同樣大家知道，現在有一部份反蘇維埃份子自動表示贊成集體農莊，但以不要共產黨員參加集體農莊爲條件。『擁護不要共產黨員參加的集體農莊』——這就是反蘇維埃份子們現在所擬製的口號。所以，問題不僅在於集體農莊這個社會主義組織形式本身，而首先是在於這個形式包含着什麼內容，——問題首先是在於誰主持集體農莊，誰領導集體農莊。

從列寧主義觀點看來，集體農莊這個組織形式，也如蘇維埃一樣，乃是一個武器，而且僅僅是一個武器。在某種條件下，這個武器是可以用來反對革命的。這個武器是可以用來反對反革命的。它能服務於工農。在某種條件下，它能服務於工農敵人。全部問題是在於這個武器究竟握在誰手中，這個武器究竟是被利用去反對誰。

工農敵人根據他們的階級本能，已開始瞭解這一點了。

可惜我們有些共產黨員還沒有瞭解這一點。

正因為我們有些共產黨員沒有瞭解這件簡單事情，所以現時就有些善於隱藏原形的反蘇維埃份子在某些集體農莊裏把持一切，並在那裏組織着暗害工作和怠工勾當。

(四)我們的農村工作方面缺點所由產生的第四個原因，就是我們許多地方工作同志不善於改變反富農鬭爭的戰綫，不瞭解階級敵人底面目近來已經改變了，不瞭解農村中階級敵人底策略已經變更了，不瞭解因此必須改變我們自己的策略以求達到成功。敵人已瞭解這種變更了的環境，已瞭解農村新制度底力量和威勢，因此他們也就改變了自己的工作方法，改變了自己的策略，即是由直接衝擊集體農莊的策略，過渡到了暗中拆台的策略。而我們却沒有瞭解這一點，沒有看透這個新環境，却還繼續在已經沒有敵人的地方去尋找敵人，繼續採用那和富農作簡易鬭爭的舊策略，雖然這個策略早已陳舊不堪了。

人們竟在集體農莊以外尋找敵人，以為敵人還是些面孔兇惡，牙齒巨大，頸項肥胖，持着半截槍的人。人們還在尋找我們在標語上所看見的那樣的富農。可是，這樣的富農早已不存在於地面上了，現時的富農及其走狗，現時的農村反蘇維埃份子，大多數都是『沉默寡言的』，『很和氣的』人，幾乎是些『潔白君子』。他們用不着你到集體農莊很遠以外去找，他們是坐在集體農莊裏面担任管倉人，庶務員，會計員，祕書等等職務的。他們無論何時也不會說『打倒集體農莊』。他們是『贊成』集體農莊的。可是，他們在集體農莊裏面進行非常厲害的怠工勾當和暗害工作，使集體農莊將會大吃其虧。他們無論何時也不會說『打倒糧食採辦工作』。他們是『贊成』糧食採辦工作的。他們『只是』進行蠱惑勾當，要求集體農莊劃出超過實際需要多倍的養畜存糧，要求集體農莊劃出超過實際需要多倍的保險存糧，要求集體農莊按每個工作者一日六磅至十磅糧食的標準發給公共伙食等等。經過這種『貯存』和公共伙食頒發以後，經過這一番狡詐蠱惑勾當以後，集體農莊底

經濟勢力，當然是要大受損傷，而糧食採辦工作當然也就沒有進行餘地了。

要看透這種狡猾敵人，而不落入蠱惑圈套，就要具有革命警覺性，就要有本事來揭破敵人底假面具，而向集體農莊莊員指明敵人底反革命真面目。可是，我們在農村中不是有很多具備這種品質的共產黨員呢？共產黨員往往不僅沒有揭破這種敵人，反而自行落入了敵人底狡詐蠱惑圈套，甘做敵人底尾巴。

我們有些同志既沒有看破這已經戴着新假面具的敵人，既不善於揭穿他們的撞騙手腕，就往往妄自安慰，以為世上已經沒有了富農，以為農村中的反蘇維埃份子已因消滅富農階級政策實行的結果而被剷除了，以為因此也就可以讓『中立的』集體農莊存在，這種『中立的』集體農莊既不是布爾塞維克的，也不是反蘇維埃的，而是一定會按所謂自然方式轉到蘇維埃政權方面來的。但這是個很大的錯誤。同志們，富農是被打破了，可是還遠遠沒有剷除乾淨，而且，如果共產黨人竟打起瞞睡來，泰然自安，以為富農會按所謂自然發展方式跑到墳墓裏去，那末富農是不會很快就被澈底消滅的。至於說到『中立的』集體農莊，那在天地間根本就沒有這種集體農莊，而且也不會有這種集體農莊。『中立的』集體農莊是雖有眼睛而毫無視力的人所臆想出來的。在現時我們蘇維埃國家發生這種尖銳階級鬭爭的條件下，『中立的』集體農莊決沒有存在的餘地；在這種環境中，集體農莊或者是布爾塞維克的，或者就是反蘇維埃的。如果某個集體農莊不是我們所領導的，那它就會是反蘇維埃份子所領導的了。這一點是絲毫不容置疑的。

(五)末了，還要說到我們的農村工作方面缺點所由產生的最後一個原因。這個原因就是有人看輕了共產黨員在集體農莊建設事業中的作用和責任，看輕了共產黨員在糧食採辦工作中的作用和責任，說到糧食採辦困難時，共產黨員通常都把責任卸到農民頭上，硬說一切都是農民底過失。但

這是完全不對的，是絕對不公平的。農民與此毫不相干。如果說到責任和過失，那末責任是完完全全要由共產黨員來担負，而全部過失都是我們共產黨員底過失。

世界上沒有而且未曾有過如像我們蘇維埃政權這樣一個強大而富有威信的政權。世界上沒有而且未曾有過如像我們共產黨這樣一個強大而富有威信的政黨。誰也沒有阻礙，而且誰也不能阻礙我們按照集體農莊底利益，按照國家利益底要求來進行集體農莊事業。如果我們並不是時時都按照列寧主義底要求來進行集體農莊事業，如果我們往往作出了許多不可寬恕的嚴重錯誤，例如在糧食採辦方面，那末這裏的過失就是我們的過失，而且只是我們的過失。

我們的過失，就是我們沒有看出集體農莊糧食貿易底短處，而犯了一些極嚴重的錯誤。我們的過失，就是我們有不少的組織脫離了集體農莊生活，却高枕而臥，聽其自然。我們的過失，就是我們有不少的同志還在過分估計集體農莊這個羣衆組織形式底作用，却不懂得主要點並不是這個形式，而是要親自担負起領導集體農莊的重任，並把反蘇維埃份子從集體農莊領導機關中驅逐出去。我們的過失，就是我們沒有看破新環境，沒有瞭解階級敵人用暗中折台手段來動作的新策略。

試問這與農民有什麼相干呢？

我知道有許多多集體農莊都在向前發展，日益繁榮，按時確切執行國家所規定的任務，並在經濟上日益鞏固起來。另一方面，我又知道，有些集體農莊，雖然是與上面那些集體農莊爲隣，雖然是與那些集體農莊有同樣的收成和同樣的客觀條件，但它們却日見衰弱和腐化下去。原因何在呢？原因就在於第一種集體農莊是由真正的共產黨員所領導，而第二種集體農莊是由癡斃子所領導的，這些癡斃子雖也帶有黨證，但終究是些癡斃子。

試問這與農民有什麼相干呢？

人們由於看輕了共產黨員底作用與責任，也就往往不是到應當尋找的地方去尋找我們農村工作缺點的原因，而缺點也就因此而仍然沒有剷除。

不要在農民中間尋找那阻難糧食採辦工作的原因，而要在我們自己中間，要在我們本身隊伍中間來尋找這個原因。因為我們執掌着政權，我們擁有國家資具，我們担負有領導集體農莊的使命，於是我們也就應當對農村工作負完全責任。

我們農村工作方面缺點所由發生的各種主要原因，就是如此。

也許有人以為我所描寫的情形未免太糟了，以為我們的農村工作盡是一些缺點。但這當然是不對的。其實，除這些缺點而外，我們的農村工作還有許多有決定意義的重大成績。可是，我在開始發言時就已經說過，我並不立意來敘述我們的成績，而只來講一講我們在農村工作中的缺點。

這些缺點可以糾正麼？是的，是絕對可以糾正的。我們在最近將來就會糾正這些缺點麼？是的，是絕對會糾正的。關於這一點，是絲毫不容置疑的。

我認為，農業機器站政治部和蘇維埃農莊政治部，就是我們所能用來在最短期間消滅這些缺點的最重要工具之一。（經久不息的熱烈鼓掌）。

選自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一九四八年莫斯科版。第五三一至五四四頁

在第一次全蘇聯集體農莊

突擊隊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九日——

集體農莊男女莊員同志們！我本沒有打算在你們代表大會上來發言。其所以沒有打算，是因為在我以前發言的各位同志，已經把所有要說的話都講過了，而且說得很好，說得很中肯。既然如此，是不是還值得出來發言呢？可是因為你們定要我出來說話，而權力又在你們手裏（鼓掌多時），我也就只好唯命是聽了。

現在我就關於個別問題說幾句話。

（一） 集體農莊道路是唯一正確的道路

第一問題——集體農民所走上的道路是不是正確呢，集體農莊道路是不是正確呢？

這個問題並不是一個沒有意思的問題。你們集體農莊突擊隊員，關於集體農莊站在正確道路上這一點，大概是不會懷疑的。所以，這個問題在你們看來也許是個多餘的問題。可是，並非個個農民都像你們這樣想法。有不少的農民，其中也有集體農莊莊員，還懷疑集體農莊道路是條正確的道路。而這是毫不足怪的。的確，數百年來，大家都過着舊的生活，走着舊的道路，替富農和地主，

替高利貸者和投機者出力生利。雖不可說這條舊道路，這條資本主義道路得到過農民方面的贊同。可是，這條舊道路總是一條已經走熟了走慣了的道路，而且雖也沒有實地證明可以過另外一種生活，過較好的生活。何況現時在所有一切資產階級國家裏，人們仍然還過着舊生活哩……而布爾塞維克却像狂風暴雨一般，突然衝進這個舊的暗淡無光的生活裏來說道：已經是拋棄舊道路的時候了，已經是開始來過新生活，來過集體農莊生活的時候了，已經是不照現在資產階級國家裏大家那樣生活，而來過新生活，來過勞動組合制的生活的時候了。而雖知道這新生活究竟是怎樣一種生活呢。恐怕它比舊生活更壞哩。無論如何，新道路總是一條沒有走慣的道路，是一條沒有走熟的道路，是一條還沒有完全熟悉的道路。倒不如留在舊道路上吧？倒不如等待一下，然後進到新道路，即集體農莊道路上去吧？是不是值得冒險呢？

這就是現在一部份勞動農民所懷着的疑問。

我們應該消除這些疑問麼？我們應該揭露這些疑問而指明其毫無價值麼？當然是應該的。所以，上面所提出的那個問題，也就不可說是個沒有意思的問題。

那末，集體農民所走上的道路是不是正確呢？

有些同志以為我們過渡到新道路，過渡到集體農莊道路，是在三年以前開始的。這種意見只是局部正確。固然，廣大的集體農莊建設是在三年以前開始的。大家知道，這個過渡底特徵就是富農被擊潰，千百萬貧農中農羣衆加入集體農莊。所有這一切都是對的。可是，爲要使這種廣大集體農莊建設能夠開始實行起來，就要具備一些預備條件，否則廣大集體農莊運動就會是根本不可能的。首先就需要有一個幫助了，並且繼續幫助着農民走上集體農莊道路的蘇維埃政權。第二，必須趕走地主和資本家，剝奪他們的工廠和土地，並宣佈工廠和土地爲人民公產。第三，必須壓制富農，剝

奪他們所有的機器和拖拉機。第四、必須宣佈，只有加入集體農莊的貧農中農才能享用機器和拖拉機。最後，必須使全國工業化，設立新的拖拉機工業，建成新的農業機器製造廠，以使用數量充足的拖拉機和機器來供給集體農民。沒有這些預備條件，便根本談不到三年前所開始的那個廣大集體農莊運動。

所以，要過渡到集體農莊道路，首先就得實現十月革命，推翻資本家和地主，剝奪他們所有的土地和工廠，創立新工業。

過渡到新道路，過渡到集體農莊道路的運動，是從十月革命時起就開始了的。這個運動所以直到三年前才大大擴展起來，是因為十月革命底經濟果實直到那個時候才完全顯露了出來，因為我們直到那個時候才推進了全國工業化的事業。

在各國人民史上有過不少的革命。它們和十月革命不同的地方，就是它們都是些片面性的革命。對勞動者剝削形式是新陳代謝了，但剝削制本身仍然存在。剝削者和壓迫者是新陳代謝了，但剝削者和壓迫者本身仍然存在。只有十月革命才抱定了消滅任何剝削制，消滅所有一切剝削者和壓迫者的目的。

奴隸革命是把奴隸主消滅了，是把奴隸主對勞動者的剝削形式廢除了。可是，這革命用農奴主來代替了奴隸主，用農奴主剝削勞動者的形式來代替了奴隸主剝削勞動者的形式。一種剝削者是由別一種剝削者所代替了。在奴隸制度下，『法律』允許奴隸主打死奴隸。在農奴制度下，『法律』只允許農奴主出賣農奴。

農奴革命是把農奴主消滅了，是把農奴制的剝削形式廢除了。可是，這革命用資本家和地主來代替了農奴主，用資本家和地主剝削勞動者的形式來代替了農奴制的剝削形式。這一種剝削者是由

別一種剝削者所代替了。在農奴制度下，『法律』允許出賣農奴。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法律』只允許使勞動者陷於失業和貧困，陷於破產和餓死。

只有我們蘇維埃革命，只有我們十月革命，才力求不是用一種剝削者來代替別一種剝削者，不是用一種剝削形式來代替別一種剝削形式，而是根本剷除任何剝削制，根本剷除所有一切剝削者，所有一切富豪和壓迫者，不管他們是新的也好，舊的也好。（鼓掌多時）。

正因爲如此，所以十月革命是使農民能過渡到新道路，即過渡到集體農莊道路的預備條件和必要前提。

農民幫助十月革命，是不是作得正確呢？是的，他們是作得正確的。其所以作得正確，是因爲十月革命幫助他們擺脫了地主和資本家，高利貸者和富農，商人和投機者。

但這還只是問題底一方面。趕走壓迫者，趕走地主和資本家，壓制富農和投機者，——這當然是很好的。但這還不够。爲了最終擺脫舊時羈絆，僅僅擊潰剝削者還是不够的。爲了這一點，還要建立新生活，還要創造出一個使勞動農民能改善他們的物質狀況和文化狀況，一天比一天，一年比一年增進他們的幸福的生活。爲了這一點，就要在農村中建立新制度，即集體農莊制度。這就是問題底另一方面。

舊制度與集體農莊的新制度有什麼區別呢？

在舊制度下，農民們總是單獨做工，用古老的方法，用舊式的農具做工，替地主和資本家，替富農和投機商人做工，替他們生財致富，而自己却是一輩子忍飢受餓。而在新制度下，在集體農莊制度下，農民們却是共同做工，按勞動組合方式做工，用新式農具，用拖拉機和農業機器做工，大家都是爲自己，爲自己的集體農莊做工，過着沒有資本家和地主，沒有富農和投機者插足的生活，他

們做工，是爲了一天比一天改善自己的物質和文化狀況。在舊制度那裏，政府是資產階級的，是幫助富豪來反對勞動農民的。而在新制度這裏，在集體農莊制度這裏，政府却是工農的，是幫助工農來反對所有一切富豪的。舊制度引向於資本主義，而新制度引向於社會主義。

你們看，這裏是有兩條道路：一條是資本主義的道路，另一條是社會主義的道路。一條是向前走到社會主義的道路，另一條是向後退到資本主義的道路。

有人以爲有什麼第三條道路可走。有些同志猶豫不決，表示動搖，不完全相信集體農莊道路是條正確道路，而特別喜歡援引這誰也不知道的第三條道路。他們想要我們恢復舊制度，恢復個體經濟，不過是不要地主和資本家而已。同時，他們要我們「只」容許富農以及其他各種小資本家存在，作爲我國經濟制度中的正當現象。其實，這並不是第三條道路，而是第二條道路，即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請問什麼是恢復個體經濟，恢復富農呢？這就是恢復富農剝削，恢復富農對農民的剝削，使富農佔有勢力。可是，難道可以恢復富農，而同時保持蘇維埃政權麼？當然是不可以的。恢復富農，結果就會成立富農政權，取消蘇維埃政權，於是就會成立資產階級政府。而成立資產階級政府，結果就會恢復地主和資本家，恢復資本主義。所謂第三條道路，其實就是第三條道路，就是恢復資本主義制度的道路。請你們問一問農民，——問他們是不是願意恢復富農剝削，是不是願意恢復資本主義，是不是願意取消蘇維埃政權而恢復地主資本家政權吧？你們只須問一問農民，就會知道大多數勞動農民究竟是把那一條道路看作唯一正確的道路了。

所以，只有兩條道路：或者是向前走，向上走到新制度，即集體農莊制度；或者是往後退，向下走到舊制度，即富農資本家制度。

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

勞動農民拒絕資本主義道路而走上集體農莊建設道路，是作得正確的。

有人說，集體農莊道路雖是一條正確道路，但它同時又是一條困難道路。這種說法只是局部正確。當然，在這條道路上是有困難的。優美生活是不能憑空得到的。可是，問題是在於主要困難已經渡過了，而現在擺在你們面前的困難，甚至值不得認真去說。無論如何，你們各位莊員同志面前所有的困難，與工人在十年至十五年前所經受的那些困難比較起來，是很小很小的。你們的發言人在這裏講話時，稱讚了列寧格拉，莫斯科，哈爾科夫和頓巴斯的工人。他們說：他們工人那裏有各種各樣的成績，而我們集體農莊莊員這裏所有的成績，却就少得多了。我覺得，你們的這些發言人在演說中甚至流露出一些同志態度的羨妒心：如果我們集體農莊莊員也和你們列寧格拉，莫斯科，頓巴斯和哈爾科夫工人一樣有這種成績，那就很好了……所有這些都是對的。但你們知道列寧格拉和莫斯科工人是用很大的代價換得這些成績，是經受過許多痛苦，才達到這些成績的麼？我可以告訴你們一些關於一九一八年工人生活情形的事實。當時，往往是一整個星期沒有發給工人一塊麵包，更不必說肉類和其他食品了。當時只要能發給列寧格拉和莫斯科工人一兩半黑麵包——而且一半還是油渣，——就算是最好的日子了。而這種情況不僅是繼續了幾個月，不僅是繼續了半年，而且繼續了整整兩年之久。但工人們總是忍耐着，並沒有灰心喪氣，因為他們知道好時光必會到來，他們必會達到決斷的成績。結果怎樣呢，——你們自己知道工人果然沒有想錯哩。你們只須把你們的困難痛苦和工人們所受過的困難痛苦比較一下，便知道你們的困難痛苦甚至值不得認真去說了。

究竟要有一件什麼條件，才可推進集體農莊運動和儘量擴展集體農莊建設呢？

首先，就要集體農莊擁有十分穩定而適於耕種的土地。你們有這種土地麼？是的，有這種土地。大家知道，一切優良土地都已轉交集體農莊，而且是穩固地留歸集體農莊了。所以，集體農莊

莊員儘可安心來耕種和改良這些土地，而不必害怕這些土地會落到別人手裏去。

第二，就要集體農莊莊員能享用拖拉機和機器。你們有這些東西麼？是的，有這些東西。大家知道，我們的拖拉機製造廠和農業機器製造廠，首先而且主要是爲了用一切新式工具供給集體農莊而工作的。

最後，還要政府實行用人材和經費來儘量幫助集體農民，而不讓敵對階級餘孽破壞集體農莊。你們有這樣的政府麼？是的，有這樣的政府。這個政府就叫做工農蘇維埃政府。請你們指給我，究竟還有那一個國家的政府不是幫助地主和資本家，不是幫助富農以及其他富豪，而是幫助勞動農民的呢。天地間再沒有這樣一個國家，而且從來也沒有過這樣一個國家。祇有我們蘇維埃國家裏的政府，才是竭力保護工人和集體農民，保護城鄉一切勞動者，而反對一切富豪和剝削者的。（鼓掌多時）。

所以，你們具有擴展集體農莊建設和完全擺脫舊時羈絆的一切必要條件。

現在所要求於你們的，只是要誠懇工作，按勞動分配集體農莊收入，保護集體農莊財產，保護拖拉機和機器，仔細照料馬匹，執行你們工農國家所定的計劃，鞏固集體農莊，把混進集體農莊來的富農和富農走狗驅逐出去。

你們想必同意我的意見，認爲要克服這些困難，就是說要誠懇工作和保護集體農莊財產，是很難作到的。何況你們現在又不是爲富豪作工，不是爲剝削者作工，而是爲自己，爲自己集體農莊作工哩。

由此可見，集體農莊道路，社會主義道路，對於勞動農民是條唯一正確的道路。

(二) 我們最近的任務，是要把一切集

體農莊莊員都變成爲生活豐裕的人

第二個問題——我們在新道路上，在集體農莊道路上，已達到了什麼成績，以及最近兩三年內又想達到什麼成績呢？

社會主義是一件好事情。幸福的社會主義生活當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可是，所有這些都是將來的事情。現在的主要問題，並不是我們將來能達到什麼成績的問題，而是我們現時已達到了什麼成績的問題。農民已走上集體農莊道路了。這當然很好。可是，農民在這條道路上達到了什麼成績呢？我們在集體農莊道路上前進時，究竟達到了什麼具體成績呢？

我們所達到的成績，就是我們幫助千百萬貧農羣衆加入了集體農莊。我們所達到的成績，就是千百萬貧農羣衆已因加入集體農莊和在集體農莊裏享用優良土地和優良農具而昇到中農水準了。我們所達到的成績，就是千百萬從前忍飢挨餓的貧農羣衆，現時在集體農莊裏已成爲中農，成爲生活有保障的人了。我們所達到的成績，就是我們已打破了農民分化爲貧農富農的過程，擊潰了富農，並幫助貧農成爲集體農莊裏本身勞動主人翁，成爲中農了。

四年以前，在集體農莊建設事業尙未擴展以前的情形是怎樣呢？當時富農日益豪富，向上昇進，而貧農日益貧窮破產，遭受富農盤剝。當時中農想爬上去變成富農，但每次都滾落下來變成了貧農，使富農心悅意樂。在所有這些紊亂情形中佔到便宜的，當然只有富農，或者也許還有幾個豐裕農。當時在農村每一百家農戶中有四五家是富農，八家或十家是豐裕農，四十五至五十家中農，以及三十五家是貧農。所以，受富農盤剝的貧農至少要佔農戶總數百分之三十五。我還不說那

些能力單薄的中農，他們在中農總數中佔大半數，他們論地位是與貧農很少區別，也是直接依賴於富農的。

我們擴展集體農莊建設的結果，消滅了這種不公平的紊亂現象，打破了富農盤剝，把所有這些貧農羣衆都吸收到集體農莊裏來了，並在集體農莊裏給了他們有保障的生活，把他們提到了中農水準，使他們能够享用集體農莊土地，享受集體農莊所有的優待權，享用拖拉機以及各種農業機器。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不下二千萬農民，不下二千萬貧農，已擺脫了貧困破產痛苦，擺脫了富農盤剝，並因加入集體農莊而變成生活有保障的人了。

同志們，這是個巨大的成績。這樣的成績是世界上從來沒有見過的，是世界上無論那一個國家都沒有達到過的。

這就是集體農莊建設事業所達到的實際的具體的結果，這就是農民走上集體農莊道路的結果。但這還只是我們在集體農莊建設道路上所達到的第一個步驟，第一個成績。

如果以為我們應當停留在這第一個步驟上，停留在這第一個成績上，那就不正確了。不，同志們，我們決不可停留在這個成績上。要繼續推進並最終鞏固集體農莊，我們就應實行第二個步驟，就應當達到新的成績。這第二個步驟是什麼呢？這第二個步驟就是要把所有的集體農莊莊員，把從前的貧農和從前的中農地位都提得更高。這第二個步驟就是要把一切集體農莊莊員都變成爲生活豐裕的人。是的，同志們，正是要把他們變成爲生活豐裕的人。（鼓掌多時）。

我們所達到的成績，就是我們倚靠着集體農莊，把貧農提高到中農水準了。這當然很好。但這還不够。我們現在還應當更進一步，還要幫助集體農莊全體莊員，幫助從前的貧農和從前的中農昇到生活豐裕的程度。我們可以達到這一步，而且無論如何都應當達到這一步。（鼓掌多時）。我們

現在有達到我們這個目的所必需的一切條件。現在我們的機器和拖拉機還利用得不好。我們的土地還耕種得不好。我們只須改良機器和拖拉機的使用，只須改良土地的耕種，就能把我們的收成增加一兩倍。這樣就完全能把一切集體農莊莊員都變成爲生活豐裕的集體農莊田場勞動者了。

從前，豐裕農是怎樣一種情形呢？當時要成爲豐裕農，就得欺侮自己的鄰人，就得剝削他們，賣東西給他們要賣貴些，向他們買東西要買賤些，僱傭一些雇農，極力剝削他們，積累一些本錢，然後一經穩固，就可變成富農了。正因爲如此，所以從前在個體經濟制度下，豐裕農也就引起貧農中農方面的不信任和仇恨。現在的情形已經不同了。現在的條件也不同了。現在，集體農莊莊員要變成爲生活豐裕的人，完全不必欺侮或剝削自己的鄰人。而且現在要剝削某一個人也不容易了，因爲我們這裏土地私有制或租佃制已不存在，機器和拖拉機一概是屬於國家的，而擁有資本的人在集體農莊裏面已經不是時髦了。從前是有過這種時髦的，但它已一去不返了。現在，要變成爲豐裕的集體農莊莊員，只要在集體農莊裏誠懇工作，正確利用拖拉機和機器，正確利用耕畜，正確耕種土地，愛護集體農莊財產就行了。

人們有時說：既有了社會主義，何必還要勞動呢？從前勞動，現在又勞動，——難道還沒有到停止勞動的時候麼？這種說法是根本不對的，同志們。這是懶漢底哲學，而不是誠懇勞動者底哲學。社會主義並不否認勞動。恰巧相反，社會主義正是建築在勞動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和勞動是分不開的。我們的偉大導師列寧說過：『不勞動者不得食』。列寧底話是什麼意思，是反對什麼人的呢？就是要反對那些剝削者，反對那些不勞而獲的人，即反對那些強迫他人做工，靠剝削他人來發財致富的人。此外，還要反對什麼人呢？還要反對那些好吃懶做，想靠他人來享福的人。社會主義並不是要大家好吃懶做，而是要大家誠懇勞動，不是替別人去勞動，不是替富豪和剝削者去勞動，而是爲自

己，爲社會而勞動。假使我們誠懇勞動，爲自己，爲自己的集體農莊來誠懇勞動，那我們在最近兩三年內就一定會把一切集體農莊莊員，把這些從前的貧農和從前的中農變成爲生活豐裕的人，變成爲享有豐富產品並過着完全文明生活的人了。

這就是我們最近的任務。這一步是我們能夠做到，而且無論如何都應當做到的。（鼓掌多時）。

（三） 幾點個別的意見

現在讓我來說說幾點個別的意見。

首先就要說說我們的農村中的黨員。你們中間有許多黨員，可是非黨員還要更多。參加這次大會的非黨員比黨員更多，這是種好現象，因爲我們首先要吸收非黨員來參加我們的事業。有些共產黨員用布爾塞維克態度來對待非黨員集體農民的。可是，還有一些共產黨員却以自己的黨員資格自傲，不許非黨員來和他接近。這是不好的，而且是有害的。布爾塞維克所以有力量，共產黨員所以有力量，就是因爲他們善於把千百萬非黨員積極份子團結在我們黨週圍。我們布爾塞維克如果沒能使千百萬非黨員工農羣衆來信任我們黨，便不會有現在這樣的勝利。可是，要怎樣才可做到這一步呢？要做到這一步，就要黨員不與非黨員隔絕，不要閉戶幽居，不要以自己的黨員資格自傲，而要傾聽非黨員底意見，不僅是要教導非黨員，而且要向非黨員學習。

不要忘記，黨員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要記着，所有一切黨員自己都是由非黨員變成黨員的。今天他是一個非黨員，明天他就會成爲黨員了。究竟有什麼可以自傲的地方呢？我們老布爾塞維克當中有許多同志已在黨內做了二三十年的工作。而我們自己過去也有一個時候不會是黨員哩。假使在二三十年以前，當時的黨員也鄙視我們，不許我們接近黨，那我們會有怎樣的情形呢？我們

也許會在黨外多混幾年的。可是，同志們，我們老布爾塞維克並不是一些最不中用的人哩。（聽衆笑容滿面，鼓掌多時）。

正因爲如此，所以我們的黨員，我們的現時還很年輕而有時瞧不起非黨員的那些黨員，就應當記着這一切情形。應當記着：使布爾塞維克增光的，不是驕傲，而是謙遜。

現在，我要說說婦女問題，說說集體農莊女莊員問題。同志們，集體農莊中的婦女問題是個大問題。我知道，你們中間有許多輕視婦女，甚至於嘲笑婦女。可是，同志們，這是一個錯誤，這是一個嚴重錯誤。這裏，問題不僅在於婦女佔人口半數。問題首先是在於集體農莊運動已提拔出許多出色的能幹的婦女來擔任領導職務。你們只要看看這次代表大會，看看代表成份，就知道婦女早已由落後者升爲先進者了。婦女在集體農莊中是個巨大的力量。埋沒這個力量，就是犯罪了。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在集體農莊中提拔婦女，運用這個力量。

固然，蘇維埃政權在不久以前是與集體農莊女莊員發生過一點小小的誤會。這就是關於乳牛問題。可是，現在，乳牛問題已經妥當解決了，於是這個誤會也就消釋了。（長時間的鼓掌）。我們已經做到使大多數集體農莊莊員每家都有一條乳牛了。再過一兩年，就不會再有一個集體農莊莊員沒有自家的乳牛了。我們布爾塞維克總是要設法使我們的集體農莊莊員每家都有一條乳牛的。（長時間的鼓掌）。

至於集體農莊女莊員自己，她們就應當記着集體農莊對於婦女的作用與意義，應當記着她們祇有在集體農莊裏面才有可能獲得與男子平等的地位。沒有集體農莊，就沒有平等；而在集體農莊裏面，就有男女平等。請集體農莊女莊員同志們記着這一點，請她們要像愛護明珠一樣來愛護集體農莊制度。（長時間的鼓掌）。

現在，我要說說集體農莊中的男女青年團員問題。同志們，青年是我們的將來，是我們的希望。青年將來應當替換我們這些老頭子。青年將來應當把我們的旗幟捧到最終的勝利。在農民當中有不少的老頭子懷着舊見解，抱着舊習慣，思慕舊生活。當然，這樣的老頭子不是時常都能跟得上黨，跟得上蘇維埃政權的。我們的青年就不同了。我們的青年並沒沾染有什麼舊見解，所以最容易瞭解列寧遺訓。正因為青年最容易瞭解列寧遺訓，所以青年就有引導落後份子前進，引導動搖份子前進的使命。固然，青年還缺乏知識。可是，知識是可以求得的東西。今天沒有知識，明天就會有知識了。因此，你們的任務就是要學習和再三學習列寧主義。男女青年團員同志們！學習布爾塞維主義和引導動搖份子前進吧！少講空話，多做工作，——那你們便一定會有成功的。（鼓掌）。

現在，我要說說個體農民問題。這裏很少說到個體農民問題。但這還不是說個體農民已不復存在於人世了。決不是這樣一回事。個體農民還存在着，決不可忽略他們，因為他們是我們明天的集體農莊莊員。我知道，有一部份個體農民已經完全墮落，跑去作投機事業了。大概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們的集體農莊莊員在接收個體農民加入集體農莊時，總是實行嚴格挑選，有時甚至完全不接收他們。這當然是正確而不容有異議的。可是，除此而外，還有其他更大一部分的個體農民，他們沒有作投機事業，而是專靠誠懇工作來維持生活。這些個體農民也許是不拒絕加入集體農莊的。可是，他們至今還沒有加入進來，一則因為他們還懷疑集體農莊道路底正確，二則因為現在集體農莊莊員中間有一種仇恨個體農民的心理。

當然，要瞭解集體農莊莊員，要諒解他們。他們近幾年來受到了個體農民方面不少的侮辱和嘲笑。可是，侮辱和嘲笑在這裏不應有決定的意義。一個領導者竟不肯忘掉這種侮辱，却把自己的感情看得比集體農莊事業利益還高，那他就不是一個不好的領導者了。你們如果想作領導者，就應當忘

記個別個體農民所加於你們的侮辱。兩年以前，我接到了一位寡居農婦從窩爾加區域寄來的一封信。她對我訴說人家不願意接收她加入集體農莊，並且要我幫助她。我當時就寫信去問這個集體農莊。這個集體農莊給我回信說，他們不能夠接收她加入集體農莊，因為她侮辱過集體農民大會。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原來是在一次農民大會上，集體農莊莊員號召個體農民加入集體農莊，而這位寡婦聽了這個號召後，就掀起自己的裙子來說道：「唯！把你們的集體農莊拿去吧！」（全場大笑）。這位寡婦當然作得不對，而且確實是侮辱了大會。可是，既然她經過一年以後已經誠懇悔過和承認了錯誤，是否還可拒絕她加入集體農莊的請求呢？我認爲是不可拒絕的。於是我就把這種意見寫給那個集體農莊。而他們馬上就把這位寡婦接受了。結果怎樣呢？原來，她現時在集體農莊裏做工做得很好，不僅沒有落後，而且是站在前列哩。（鼓掌）。

你們從這個例子中又可以看出：一個身居領導者地位的人，如果想成爲真正的領導者，那末他爲着事業利益計，在必要時就得忘掉他所受到的侮辱。

關於一般個體農民，也要這樣說。我並不反對經過選擇來接受個體農民加入集體農莊。可是，我反對那種不分青黃皂白，籠統不許個體農民加入集體農莊的辦法。這不是我們布爾塞維克的政策。集體農莊莊員不應當忘記，他們自己在不久以前也曾是些個體農民哩。

最後，我還要說說別金楚克區集體農莊莊員所寫來的一封信。這封信已在報紙上發表過了，你們大概都已讀過。這封信確實是很好的。這封信證明，我們的集體農莊莊員中間已有許多很有經驗，很有覺悟的集體農莊專業組織者和鼓動者，真是我國可以引以自豪的人。可是，這封信裏也有一點不正確的地方，對於這一點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贊同的。原來別金楚克區的同志們把他們在集體農莊中的勞動看作是平凡的勞動，幾乎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勞動，而把那些往往說得滔滔不斷的演說

家和領袖們底勞動看作偉大的勞動，創造性的勞動。可以贊同這種意見麼？不，同志們，無論如何也是不可贊同這種意見的。別金楚克區的同志們在這裏犯了一個錯誤。他們也許是因講客氣而犯了這個錯誤。可是，錯誤並不因此而成其為錯誤。把領袖看作唯一的歷史創造者，而把工人和農民看得一錢不值的那種時候，是早已過去了。現在民族和國家底命運不只是由領袖來決定，而首先和主要是由千百萬勞動羣衆來決定的。工人和農民埋頭苦幹，毫不聲張地建設工廠和製造廠，建設礦井和鐵路，建設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創造一切生活品，把衣食供給全世界，——這就是真正的英雄和新生活的創造者。我們的別金楚克區的同志們大概是把這一點忘記了。誇大本身力量，誇功自傲，這當然是不好的。這就會弄到妄自尊大，而妄自尊大却是一種不好的事情。可是，小視自己的力量，不知道自己所幹的『平凡的』『不顯著的』勞動在事實上正是決定歷史命運的偉大和創造性的勞動，那就更壞了。

我希望別金楚克區的同志們接受我對他們那封信所作的這個小小的修正。

同志們，我們就講到這裏為止吧。

（長時間的鼓掌，轉為歡呼。全場起立向斯大林同志致敬，大呼『烏啦』。會場中高呼：『斯大林同志萬歲，烏啦！先進的集體農莊莊員萬歲！我們的領袖斯大林同志萬歲！』）

蘇聯國民經濟繼續高漲和內部狀況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現在我來講蘇聯內部狀況問題。

從蘇聯內部狀況方面看來，報告時期是無論國民經濟或文化方面的高漲都日益加強的時期。這個高漲，不只是單純的數量上的力量積累。這個高漲特別顯著的地方，就是它使蘇聯結構發生了原則上的變更，使蘇聯全國面目根本改變了。

蘇聯在這個時期內已經根本改變樣子了，它已經拋棄了落後的中世紀的面貌。它已由農業國變成了工業國。它已由一個小規模個體農業的國家，變成了大規模機械化集體農業的國家。它由一個黑暗無知，居民不識字，不文化的國家，變成了——更確切一點說，正在變成——人人識字的文化國家，到處設立有用蘇聯各民族語言教授的高級學校，中等學校和初等學校的國家。

創立了許多新的生產部門：機架、汽車、拖拉機、化學、發動機、飛機、康拜因機、巨型渦輪機、發電器、上等鋼、化合鐵、人造橡皮、淡氣、人造纖維等等的製造業。（鼓掌多時）。

在這個時期內建成和開始出貨的，有幾千個完全現代化的新企業。新建成了許多巨型企業，如德涅泊爾電站、馬格尼托聯合廠、庫茲涅茨克工廠、齊略賓斯克聯合廠、波布里克聯合廠、烏拉爾機器聯合廠、克拉姆托爾機器聯合廠等等。有幾千個舊企業都在新技術基礎上改造過了，在蘇聯各

民族共和國和各邊境區域，如在別洛露西亞、烏克蘭、北高加索、南高加索、中亞細亞、卡查赫斯坦、布略特蒙古、韃靼里亞、巴什基里亞、烏拉爾、東西伯利亞、西西伯利亞、遠東邊疆等等地方，建成了許多新企業，創立了許多工業根據地。

成立了二十多萬個集體農莊和五千多個蘇維埃農莊，並為它們創立了新的區域中心和工業地點。

在幾乎荒野的地帶出現了居民衆多的新的巨大城市。舊的城市和工業地點也大大擴大了。

庫茲涅茨克焦煤與烏拉爾鐵鑛連接起來經營的烏拉爾、庫茲涅茨克聯合廠底基礎，已經奠定了。於是，東方的新冶金業根據地，可說是已由理想變成事實了。

在烏拉爾山脈西南斜面區，即是在烏拉爾省，巴什基里亞和卡查赫斯坦一帶的新的強大的煤油根據地基礎，已經奠定了。

顯然的，國家在報告期內投入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共達六百餘萬萬盧布的鉅量資金，並沒有白費，而是已開始產生果實了。

由於這些成績的結果，蘇聯底國民收入已由一九二九年的二百九十萬萬盧布，增加到了一九三三年的五百萬萬盧布，而所有一切資本主義國家裏的國民收入在同一時期却大大降低了。

這一切成績與這全部高漲，當然要——而且已真正——使蘇聯內部狀況更加鞏固起來。

為什麼一個技術落後，文化落後的廣大國家，在區區三四年內就發生了這樣巨大的變更呢？這不是一件怪事麼？如果這種增長是在資本主義和個體小經濟基礎上發生，那就真會是一件怪事。可是，如果注意到我國這一增長是在擴展社會主義建設基礎上發生的話，那就不可把它叫做怪事了。當然，這種雄強的高漲是只有在順利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基礎上，只有在數千萬人共同勞動的基

基礎上，只有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優勝於資本主義和個體農民經濟制度的基礎上，才能開展起來的。因此，無怪乎蘇聯在報告期內的雄強經濟文化高漲，同時也就是消滅資本主義份子和把個體農民經濟排擠到後面去的過程。事實是如此：現時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底比重在工業方面佔百分之九十九，在農業方面，按穀物播種面積來說，佔百分之八十四點五，而個體農民經濟底比重却只佔百分之十五點五。

由此可見，資本主義經濟在蘇聯是已被消滅，而個體農民經濟在農村中是被排擠到次等地位了。

列寧在着手施行新經濟政策時說在我國有五種社會經濟結構成份：（一）宗法經濟（多半是自給經濟），（二）小商品生產（出賣糧食的農民中的大多數），（三）私人經營的資本主義，（四）國家資本主義，（五）社會主義。列寧認為，在這五種經濟結構中，結果一定是社會主義結構佔統治地位的。我們現在可以說：第一種，第三種和第四種社會經濟結構已不存在了，第二種社會經濟結構是被排擠到次等地位了，而第五種社會經濟結構，即社會主義結構，已成了在全部國民經濟中獨佔統治的唯一指揮力量。（熱烈鼓掌多時）。

總結就是如此。

這個總結就是蘇聯內部狀況穩固基礎，就是蘇聯在資本主義包圍環境中前方障地和後方障地強固基礎。

現在我們就來看看蘇聯經濟政治狀況個別問題的具體材料。

(一) 工業高漲

在我們國民經濟所有一切部門中，發展快的部門是工業。在報告期內，即是從一九三〇年起，我國工業已增加了一倍有餘，即增加了百分之一百零一點六，而與戰前水準比較起來，却已增加到約近三倍，即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九十一點九。

這就是說，我國工業化是進行得非常迅速的。

由於工業化迅速增長的結果，工業產量在全部國民經濟總產量中已佔首要地位了。請看相當的統計表吧。

工業在國民經濟總產量中所佔百分比重表（按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度價格計算）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 工業（小工業除外）	四二·一	五四·五	六一·六	六六·七	七〇·七	七〇·四
(二) 農業	五七·九	四五·五	三八·四	三三·三	二九·三	二九·六
總計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這就是說，我們國家已堅實可靠地最終變成工業國家了。

在工業化事業方面有決定意義的，是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製造業在全部工業發展總和中的比重增長。報告期內的統計材料，指明這一項底比重已在全部工業總和中佔居主要的地位。

請看相當的統計表吧。

大工業兩種基本部門產量比重表（按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度價格計算）

		總產量（單位十萬萬盧布）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全部大工業		二一・〇	二七・五	三三・九	三八・五	四一・九
（甲）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		一〇・二	一四・五	一八・八	二二・〇	二四・三
（乙）消費品		一〇・八	一三・〇	一五・一	一六・五	一七・六
		比重（百分率）				
（甲）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		四八・五	五二・六	五五・四	五七・〇	五八・〇
（乙）消費品		五一・五	四七・四	四四・六	四三・〇	四二・〇
總計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這統計表顯然是無須解釋的。

在我們這個技術還幼稚的國家裏，工業負有特別重大的任務。它不僅應當用新技術來改造自己，不僅應當改造各個工業部門，包括輕工業，食品工業和木材工業在內。它還應當改造各種運輸業和一切農業部門。可是，只有當機器製造業，即國民經濟改造事業底基本槓桿在它中間佔居主要地位時，它才能完成這一個任務。報告期內的統計材料，正是指明我國機器製造業已在我國全部工業總和中獲得主導作用了。

請看相當的統計表吧。

全蘇聯各個工業部門比重表（各部門對工業總產量的百分比）

工業部門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一九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石煤業	二二·九	二二·一	一七·七	二二·〇
焦煤業	〇·八	〇·四	〇·五	〇·六
煤油開採業	一·九	一·八	一·五	一·四
煤油製造業	二·三	二·五	二·九	二·六
黑金屬冶煉業	未詳	四·五	三·七	四·〇
有色金屬冶煉業	未詳	一·五	一·三	一·二
機器製造業	一·〇	一四·八	二五·〇	二六·一
基本化學業	〇·八	〇·六	〇·八	〇·九
棉織業	一八·三	一五·三	七·六	七·三
毛織業	三·一	三·一	一·九	一·八

這就是說，我們工業是在健全的基礎上發展着，而改造事業底關鍵，即機器製造業，是完全操於我們掌握的。只是必須好好利用它，合理地利用它。

報告期內工業發展情形，按各社會部份來說，是很值得注意的。請看相當的統計表吧。

大工業總產量按各社會部份的分佈情形（按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度價格計算）

全部產量	總產量（單位百萬廣布）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公有工業	二一,〇二五	二七,四七七	三三,九〇三	三八,四六四
其中 國營工業	一〇,八九一	二七,四〇二	未詳	三八,四三六
其中 合作工業	一九,一四三	二四,九八九	未詳	三五,五八七
私人工業	一,七四八	二四,一三	未詳	二,八四九
	一三·四	七·五	未詳	二·八

全部產量		百分率	
公有工業	100.0	100.0	100.0
其 國營工業	99.4	99.7	99.93
其 合作工業	91.1	90.9	92.52
中 私人工業	8.3	8.8	7.41
	0.6	0.3	0.70
		未詳	0.07

從這個統計表中可以看出，工業中的資本主義份子已被消滅，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現在已成爲我國工業中獨佔統治的唯一體系。（鼓掌）。

但工業在報告期內所獲得的一切成績中，最重要的成績是工業在這時間內造就和鍛鍊了成千成萬的新人材和新工業領導者，大批大批的新工程師和技師，以及幾十萬精通了新技術並推動我們社會主義工業前進的青年熟練工人。毫無疑義，沒有這些人材，我國工業就不會有我們現在所能引以自豪的這種偉大成功。統計材料指明，在報告期內，工業從工廠藝徒學校裏調入生產的較熟練的工人，約有八十萬；從高等專門學校、大學及中等技術學校調入生產的工程技術人員有十八萬餘人。如果說幹部問題確實是我國發展中最大的問題，那就要承認我們工業已在切實解決這個問題。

這就是我國工業底基本成績。

可是，如果以爲我國工業只是有成績，那就不對了。不，它也有缺點。其中主要的缺點便是：

- (1) 黑金屬冶煉業仍然落後；
- (2) 有色金屬冶煉業還沒有整理就緒；
- (3) 沒有充分估計到，發展地方煤礦開採事業（如莫斯科附近礦區，高加索，烏拉爾，卡拉

甘達，中亞細亞，西伯利亞，遠東，北方邊疆等等）對於全國燃料出產總量有極重大的意義；

- (4) 沒有充分注意到在烏拉爾，巴什基里亞和恩巴等區建立新煤油根據地的問題；
- (5) 沒有認真注意擴充輕工業和食品工業以及木材工業方面的日用品的生產；
- (6) 沒有充分注意到擴展地方工業的問題；
- (7) 完全不容許地忽視了改善產品質量的問題；
- (8) 提高勞動生產率，減低成本費和施行經濟核算制方面的工作，仍然落後；
- (9) 勞動和工資組織得不好的現象，工作中的無人負責現象和工資制中的平均主義現象，還沒有剷除；

(10) 在各經濟人民委員部——包括輕工業人民委員部和食品工業人民委員部在內——及其所屬各機關中的官僚形式主義的領導方法，還遠未消滅。

這一切缺點當然是絕對要趕快剷除的。大家知道，黑金屬冶煉業與有色金屬冶煉業，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內沒有完成自己的計劃，它們在第二個五年計劃第一年度內也沒有完成自己的計劃。如果它們今後還是繼續落後，那它們就會成爲妨礙工業發展的障礙物和引起工業虧空的原因。至於建立石煤業和煤油業新根據地問題，那末我們若不解決這個刻不容緩的任務，就一定會使工業和運輸業都陷於擱淺了。日用品生產和發展地方工業的問題，以及改良產品質量，提高勞動生產率，減低成本費和施行經濟核算制等等的問題，也是無庸解釋的。至於勞動和工資組織得不良的現象，以及官僚形式主義的領導方法，那末頓巴斯方面的實例，以及輕工業和食品工業企業方面的實例，都已表明這個危險病症流行於一切工業部門中，並妨礙着們它的發展。如果我們不把這個病症剷除掉，那末工業就會寸步難移了。

當前的任務是：

- (1) 要保持機器製造業現時在全部工業中的主導作用。
- (2) 要剷除黑金屬冶煉業底落後情形。
- (3) 要整頓有色金屬冶煉業。
- (4) 要盡量擴展各個查明了的煤礦區中的地方煤礦開採事業；建立新的採煤區（例如在遠東的布萊區），並把庫茲巴斯克變成頓巴斯第一。（鼓掌多時）。
- (5) 要在烏拉山脈西南斜面各區認真着手創立煤油根據地。
- (6) 要在各經濟人民委員部所轄企業中擴展日用品的生產。
- (7) 要發展地方蘇維埃工業，使其能積極製造日用品，並儘量用原料和經費幫助這個工業。
- (8) 要改良產品質量，停止出產不完備的物品，不顧情面地懲罰一切違背或迴避蘇維埃政權關於出產美質和完備產品的法律的那些同志。
- (9) 要一貫提高勞動生產率，減低成本費和施行經濟核算制。
- (10) 要澈底剷除工作中的無人負責現象和工資制中的平均主義現象。
- (11) 要消滅各經濟人民委員部一切環節中的官僚形式主義的領導方法，有系統地審查各下級機關執行各中央領導機關決議和指示的情形。

(二) 農業高漲

農業方面的發展情形，是稍有不同的。農業基本部門在報告期內高漲速度，要比工業遲慢許多倍，但總比個體經濟佔主要地位時快些。而在養畜業方面我們却甚至有過後退的情形，即牲畜數量減少的現象，而是直到一九三三年時，並且只是在養豬業方面，才表現出一些向上高漲的徵象。

農業高漲速度的遲慢，牲畜業發展方面較為長期的低落，顯然是由許多原因所必然預決了的，這些原因便是：把散漫細小農戶合併為集體農莊，在幾乎荒野地帶創立許多大規模穀物農莊和養畜農場的事情是很困難的；並且改造個體農業和把個體農業轉上集體農莊新軌道的改組時期，根本就需要花費許多時間與大批成本。

按實質說來，報告時期與其說是農業迅速高漲和飛快進展的時期，不如說是造成種種前提來保證在最近時期發生這種高漲和這種進展的時期。

如果拿一切農作物播種面積增加情形的統計來看，特別是拿技術作物播種面積增加情形的統計來看，那末報告期內農業發展情形，便如下表。

蘇聯全國所有農作物播種面積統計表（單位百萬海克脫）

全部播種面積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一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三年
	穀物	一〇五・〇	一一八・〇	一二七・二	一三六・三	一三四・四
其中						
技術作物	九四・四	九六・〇	一〇一・八	一〇四・四	九九・七	一〇一・五
蔬菜瓜類	四・五	八・八	一〇・五	一四・〇	一四・九	一一・〇
飼料	三・八	七・六	八・〇	九・一	九・二	八・六
	二・一	五・〇	六・五	八・八	一〇・六	七・三
蘇聯全國技術作物播種面積統計表（單位百萬海克脫）						
棉花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一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三年
長稈亞麻	〇・六九	一・〇六	一・五八	二・一四	二・一七	二・〇五
糖蘿蔔	一・〇二	一・六三	一・七五	二・三九	二・五一	二・四〇
油類作物	〇・六五	〇・七七	一・〇四	一・三九	一・五四	一・二一
	一・〇〇	五・一〇	五・二二	七・五五	七・九八	五・七九

這兩個統計表所反映的是農業中的兩條基本路線：

第一條路線是在農業改組工作最熾烈時期，當成千累萬集體農莊相繼建立起來的時候，當這些集體農莊把富農驅逐於土地以外，而把那些空閒出來的土地拿到自己手裏來的時候，竭力擴大播種面積；

第二條路線是拒絕籠統擴大播種面積的辦法，拋棄籠統擴大播種面積的手段，轉而採用改良耕種工作，正確輪種制和預耕制，提高收成率，在有實際必要時，暫且縮小現有播種面積的辦法。

大家知道，第二條路線，即農業中的唯一正確路線，是在一九三二年宣佈實行的，當時農業改組時期快要完結，而提高收成率問題已成為保證農業高漲的基本問題之一了。

可是，關於播種面積增加情形的統計，還不能完全表明農業發展情形。有時候，播種面積雖有增加，而出產量却沒有增加，或且降低下去，這是因為耕種工作變壞，每畝面積收成率降低之故。因此，除關於播種面積的統計而外，還必須看看關於總產量的統計。

請看相當的統計表吧。

蘇聯全國穀類作物和技術作物總產量統計表（單位百萬公担）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一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穀類作物	八〇一·〇	七二七·四	八三五·四	六九四·八	六九八·七
棉花	七·四	八·六	一一·一	一一·九	一二·七
亞麻纖維	三·三	三·六	四·四	五·五	五·〇
糖蘿蔔	一〇九·〇	六二·五	一四〇·二	一二〇·五	六五·六
油類作物	二一·五	三五·八	三六·二	五一·〇	四五·五

從這個統計表中可以看出：農業改組工作最熾烈的年份，即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是穀物產量縮減得最厲害的年份。

其次，從這個統計表中可以看出：因為在蘇棉產區裏，農業改組工作速度較慢，所以蘇棉出產幾乎完全沒有受到損失，而是比較平整地和一往直前地向高漲，並保存其高度發展水準。

第三，從這個統計表中可以看出：油類作物只受到少許的波折，與戰前水準相較，始終是保持了高度發展水準；而糖蘿蔔種植業却不是如此，因為糖蘿蔔產區裏的農業改組工作速度最高，而且進入改組時期最晚，所以在農業改組最後一年，即一九三二年，糖蘿蔔的出產有過最厲害的低落，把出產量降到了戰前水準以下。

最後，從這個統計表中可以看出：一九三三年，即改組時期完結後第一年，是穀類作物和技術作物發展過程中轉變的一年。

這就是說，從今以後，穀類作物以及技術作物，就會腳踏實地，勇往直前地洶湧高漲起來了。在改組時期感到最大困難的，是農業中的養畜部門。

請看相當的統計表吧。

蘇聯全部牲畜統計表（單位百萬頭）

	一九二六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三年
(甲) 馬	三三·一	三四·〇	三三·二	二六·二	一九·六	一六·六
(乙) 牛	五八·九	六八·一	五二·五	四七·九	四〇·七	三八·六
(丙) 騾羊和山羊	一一五·二	一四七·二	一〇八·八	七七·七	五二·一	五〇·六
(丁) 豬	二〇·三	二〇·九	一三·六	一四·四	一一·六	一一·二

從這個統計表中可以看出：我國牲畜數量在報告期內不僅沒有增加，反而繼續低於戰前水準。顯然，一方面，當時農業各養畜部門中含有最多巨大的富農成份，另一方面，富農在改組年份乘機加緊煽惑農民大殺牲口的事實，都在這個統計表內反映出來了。

其次，從這個統計表中可以看出：從改組第一年起（一九三〇年），牲畜數量已開始減少，一直繼續到一九三三年，並且減少程度在頭三年最大，而在一九三三年，即改組時期終結後第一年，當穀類作物已向上高漲起來的時候，牲畜數量減少率就縮到最低限度了。

最後，從這個統計表中可以看出：在養豬業方面已開始了相反的過程，並且在一九三三年已表現出逕直高漲的徵象。

這就是說，一九三四年應當，而且能够成爲全部養畜業轉變到向上高漲的一年。我國農戶集體化在報告期內是怎樣發展了的呢？請看相當的統計表吧。

集 體 化 統 計 表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集體農莊（單位一千）	五七·〇	八五·九	一一一·一	二二一·〇五	二二四·五
集體農莊內農戶（單位百萬）	一·〇	六·〇	一三·〇	一四·九	一五·二
農戶集體化百分數	三·九	二二·六	五二·七	六一·五	六五·〇

按各部份來說，穀物播種面積變動情形又是怎樣呢？

請看相當的統計表吧。

穀物播種面積按各部份的分佈情形統計表

(穀物播種面積，單位百萬海克脫)

部 份	各部份在一九三三年播種面積總數中所佔百分數				
	一九一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蘇維埃農莊	一·五	二·九	八·一	九·三	一〇·八
集體農莊	三·四	二九·七	六一·〇	六九·一	七五·〇
個別農民	九一·一	六九·二	三五·三	二一·三	一五·七
全蘇聯穀物播種面積	九六·〇	一〇一·八	一〇四·四	九九·七	一〇一·五

這些統計表是說明什麼呢？

這些統計表是說明農業改組時期，即集體農莊及其莊員數目湧湧增長的時期，已經結束，並且是在一九三二年時就已經結束了。

所以，今後的集體化過程，將是由集體農莊來漸漸吸收和重新教育個體農戶殘餘的過程。

這就是說，集體農莊已經是最終地和永遠地勝利了。(熱烈鼓掌多時)。

其次，這些統計表說明，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總共佔有蘇聯全國穀物播種面積總數百分之八十四點五。

這就是說，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總和起來，已成了決定全部農業及其各部門命運的力量。

其次，這些統計表說明加入了集體農莊的農戶，即佔全國農戶總數百分之六十五的農戶，一共佔有全國穀物播種面積總數百分之七十三點九，至於所剩下佔全國農戶人口總數百分之三十五的全體個體農戶，却只佔有全國穀物播種面積總數百分之十五點五。

此外，還要注意到一件事實，就是集體農莊在一九三三年所交給國家的各項糧食共有十萬萬餘

普特，而個體農民雖也完全執行了糧食採辦的計劃，可是他們所交給國家的糧食却只有一萬三千萬普特左右，但從前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度，個體農民交給國家的糧食約有七萬八千萬普特，集體農莊當時交給國家的糧食不過一萬二千萬普特。這件事實便是十分明顯地說明，在報告期內，集體農莊和個體農民雙方的作用已經完全改換了，集體農莊在這時期內變成了農業中的統治力量，而個體農民變成了次要力量，不得不服從集體農莊制度，不得不適應集體農莊制度。

必須承認：勞動農民，我們蘇聯的農民，已經是最終地和永遠地站在社會主義紅旗下面來了。
 （鼓掌多時）。

讓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的閒談婦，資產階級和託洛茨基主義的閒談婦信口亂談，說什麼農民有反革命天性，說什麼農民担任有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的使命，說什麼農民不能成爲工人階級在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事業中的同盟者，說什麼在蘇聯不能建成社會主義吧。事實說明：這些老爺們原來是誣蔑蘇聯，誣蔑蘇聯農民的。事實說明：我們蘇聯的農民已經是最終地離開了資本主義邊岸，而與工人階級聯合一致向着社會主義進展了。事實說明：我們在蘇聯已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底基礎，我們現在所還要做的事情不過是在這個基礎上建成上層建築物，而這件事情毫無疑義是要比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基礎容易得多。

可是，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底力量不僅表現於它們播種面積和出產總量底增長上，而且表現於它們所有的拖拉機數量和機器數量底增長上。毫無疑義，我們的集體農莊與蘇維埃農莊在這方面已有了長足的進展。

請看相當的統計表吧。

蘇聯全國農業所有拖拉機數量統計表（折損數目除外）

		架數（單位千架）			
拖拉機總數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三四·九	七二·一	一二五·三	一四八·五
其中		二·四	三一·一	六三·三	七四·八
屬於農業機器站者					
屬於一切部門蘇維埃農莊者		九·七	二七·七	五一·五	六四·〇
馬力（單位一千）					
拖拉機馬力總數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三九一·四	一,〇〇三·五	一,八五〇·〇	二,二二五·〇
其中		二二·九	三七二·五	八四八·〇	一,〇七七·〇
屬於農業機器站者					
屬於一切部門蘇維埃農莊者		二二三·四	四八三·一	八九二·〇	一,〇四三·〇

可見，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已擁有二十萬零四千架拖拉機和三百一十萬馬力，這個力量顯然是很不小的，它能完全剷除鄉村中的一切資本主義根蒂。這個力量已超過了列寧當時作爲遙遠前途說過的那個拖拉機數量一倍。

關於各農業機器站和蘇維埃農莊人民委員會部所轄各蘇維埃農莊中的農業機器數量，有如下的統計表可以說明。

屬於各農業機器站者

康拜因機 (單位千架)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三年
發動機和蒸汽發動器 (單位千架)	七架	〇・一	二・二	一・一・五
複式和半複式打穀機 (單位千架)	〇・一	四・九	六・二	一七・六
打穀機發電器	二・九	二七・八	三七・〇	五〇・〇
農業機器站中修理場數量	一六八	二六八	五五一	一, 二八三
載重汽車 (單位千輛)	一〇四	七七〇	一, 二二〇	一, 九三三
輕便汽車 (單位一輛)	〇・二	一・〇	六・〇	一三・五
	一七	一九一	二四五	二, 八〇〇

屬於蘇維埃農莊人民委員會部所轄各蘇維埃農莊者

康拜因機 (單位千架)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三年
發動機和蒸汽發動器 (單位千架)	一・七	六・三	一一・九	一三・五
複式和半複式打穀機 (單位千架)	〇・三	〇・七	一・二	二・五
發電器	一・四	四・二	七・一	八・〇
基本修理場	四二	一一二	一六四	二二二
中等修理場	七二	一三三	二〇八	三〇二
臨時修理場	七五	一六〇	二一五	四七六
載重汽車 (單位千輛)	二〇五	三一〇	五七八	一, 一六六
輕便汽車 (單位一輛)	二・一	三・七	六・二	一〇・九
	一一八	三八五	六二五	一, 八九〇

我認爲這些統計是無須解釋的。

在農業機器站和蘇維埃農莊成立政治部，用熟練工作人員供給農業，也是對於發展農業有了重要的作用。現在大家都承認，政治部工作人員在改善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的工作方面，起了莫大的作用。大家知道，黨中央委員會在報告期內一共派了二萬三千餘黨員到鄉村中去鞏固農業幹部，其中有三千餘人擔任農業部工作，有兩千餘人擔任蘇維埃農莊工作，有一萬三千餘人擔任農業機器站政治部工作，有五千餘人擔任蘇維埃農莊政治部工作。

用新的工程技術人員和農學專家供給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的問題，也是如此。大家知道，在報告期內，這種工作人員被派到農村中去的計有十一萬一千餘人。

在報告期內所造就並派去工作的拖拉機手，康拜因機正副司機和汽車夫，單就農業人民委員會部一個系統來說，就有一百九十萬人以上。

在同一時期內所造就和補習過的集體農莊管理部主席和委員，耕作隊長，養畜隊長和簿記員，有一百六十萬人以上。

這當然還不能滿足我國農業底要求。但這總算是有了一些了。

可見，國家已造成了各種各樣的條件，使農業人民委員會部和蘇維埃農莊人民委員會部所屬各機關，都易於領導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建設事業。

可以說這些條件是儘量利用了麼？

可惜還不可這樣說。

首先，這兩個人民委員會部，比之其他各人民委員會部更患有用官僚形式主義態度處置事情的毛病，它們只是決定着問題，可是並沒有想到要審查執行情形，沒有想到要制止違背領導機關指示和

命令的人，沒有想到要提拔忠實誠懇執行指示的人。

本來，拖拉機和農業機器既然這樣多，各農業機關是應當好好保管這些貴重機器，及時加以修理，比較合理地加以使用的，它們在這一方面究竟做了一些什麼呢？可惜做得很少。拖拉機和農業機器是沒有好好保管的。修理工作也做得不好，因為它們至今還不願意明白，主要的修理工作是臨時修理和中等修理，而不是基本修理。至於利用拖拉機和一般機器的情形，那末，它之不能令人滿意，更是盡人皆知，無庸證明的。

農業方面的當前任務之一，就是要採用正確的輪種制，擴展預耕制以及改良各農業部門的選種工作。在這方面做了一些什麼呢？可惜暫時還做得很少。穀種和棉種方面的情形真是亂七八糟，還要花費許多時間，才可把它整理就緒。

供給技術作物以肥料，是提高技術作物收成的有效辦法之一。在這方面做了些什麼呢？暫時還做得很少。肥料是有的，可是農業人民委員部所屬各機關却不善於加以接收，而接收以後，又不設法把它按時送往各地去合理利用。

至於蘇維埃農莊，它們是至今都還沒有勝任的。我絕對不輕視我們蘇維埃農莊所有的那種巨大的革命化的作用。可是，如果把國家投入蘇維埃農莊事業的巨量資金與蘇維埃農莊工作現有的實際結果對照一下，那就可以看見一種很不相稱而使蘇維埃農莊大有遜色的情形。其所以有這種不相稱的情形，主要是因為我們穀物蘇維埃農莊規模過分龐大，經理人無力應付龐大的蘇維埃農莊，而蘇維埃農莊本身又過於專門化，沒有採用輪種制和預耕制，沒有養畜業的部分。顯然是必須把各個蘇維埃農莊規模縮小，取消它們那種過分專門化的性質。有人也許以為蘇維埃農莊人民委員部一定是及時提出了這個問題，並力謀把它解決的了，其實不然。這個問題是與蘇維埃農莊人民委員部毫不

相干的那些人所發起提出，並加以解決了的。

最後，就要講到養畜業問題。關於養畜業底嚴重狀況，我已經報告過了。也許有人以為我們各農業機關已在極力設法剷除養畜業恐慌，以為它們已發出警號，動員工作人員去力求解決養畜業問題的了。可惜絲毫沒有過這麼一回事，而且現在也沒有這麼一回事。他們關於養畜業方面的嚴重狀況，不但沒有發出警號，反而極力抹煞了問題，有時甚至在報告中企圖蒙蔽全國輿論，隱瞞養畜業底真相，而這種行為是布爾塞維克所完全不應有的。既然如此，如果還希望農業機關會把養畜業引上發展大道和提到應有高度，那就是畫餅充飢了。養畜業應當由我們全黨擔任起來，應當由我們全體黨員工作者和非黨員工作者擔任起來，因為養畜業問題是目前最主要的問題，也好像我們所順利解決過的穀物問題是昨天最主要的問題一樣。蘇聯的人是在前進途中不止一次打破過嚴重障礙的人，他們當然是連這個障礙也定能打破的。（掌聲如雷）。

這就是我們所必須剷除的種種缺點的一個簡略而很不完全的目錄，以及必須在最短期內加以解決的種種任務的目錄。

但這些任務還不能概括一切。除此而外，在農業方面還有一些任務也要稍許說說。

首先就要注意到，先前把我國各省區劃分為工業區和農業區的那種舊分法，已失去時效了。現在我國已沒有什麼專把穀物、肉類以及蔬菜供給工業區的純粹農業區，同樣現在我國也沒有什麼能專靠外面，專靠他區來供給一切必需食品的純粹工業區了。發展底趨勢是使我國所有各區都成為多少是工業的區域，而且愈往前去，它們也就會愈加成為工業區域。這就是說，烏克蘭，北高加索，中央黑土省及其他許多舊有農業區，已不能像過去那樣把大批食品運往他處，運往工業中心，因為它們現在已不得不供給本地日益增加的城市和工人了。但由此所應得出的結論，是每一區都應建立

自己本地的農業基礎，能够出產供給自己的蔬菜，馬鈴薯，牛油和牛奶，並在某種程度內出產供給自己的穀物和肉類，免得陷入困難地位。你們知道，這件事情完全做得到，而且現時已在進行中。任務就是無論如何都要把這件事情做到底。

其次，還要注意到，先前把我國各區劃分為消費區和生產區的那種有名分法，現在也開始失去其特別意義了。莫斯科省和高爾基省這樣的『消費』區，今年已交給了國家約達八千萬普特的穀物。這當然不是一件小事情。在所謂消費地帶內約有五百萬海克脫灌木叢生的荒地。大家知道，這一帶地方的氣候並不惡劣，雨水充足，沒有旱災危險。如果把這些土地上的灌木除去，並施行一些組織辦法，那就可以造成一個莫大的穀物產區，它在這些地方通常的那種豐收條件下，將能每年糶出大宗穀物，其數量將不少於窩爾加河下游或窩爾加河中游現在所能糶出的數量。這就會是對於北部各工業中心的一種巨大幫助。

很明顯的，任務就是要在消費地帶各區內造成大規模的穀物產地。

最後，我要說到窩爾加河東岸區的防旱專業問題。在窩爾加河東岸各區培植森林和造成樹蔭地帶，是有莫大意義的。大家知道，這個工作已在進行中，不過還不可說它進行得十分緊張。至於窩爾加河東岸區的灌溉事業，是關係防旱工作極大的一件事情，當然不可長久延擱下去。固然，這件事情是因為有迫使我們耗費了大批人力物力的外界情況而受到了一些阻礙，但現在已沒有什麼理由把這件事情繼續延擱下去了。我們在窩爾加河流域一定要有一個完全穩定，絲毫不受偶然天災影響，而能每年糶出約近兩萬萬普特穀物的重大產穀基地。這是絕對必要的，一方面因為窩爾加河流域的城市數目日益增長，另一方面又因為在國際關係上隨時都有可能發生各種各樣的糾紛。

任務就是要着手進行組織窩爾加河東岸區灌溉事業的嚴重工作。（鼓掌）。

(三) 勞動者物質狀況和文化水準的提高

這樣，我們就說明了我國工業農業狀況，我國工業農業在報告期內發展的情形，我國工業農業在現時的情形。

總結起來。我們所有的成績是：

(1) 無論是工業方面或農業基本部門方面的生產，都有雄強的高漲。

(2) 在這一高漲的基礎上，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無論在工業方面或農業方面，都最終戰勝了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而變成了全部國民經濟底唯一體系，資本主義份子從國民經濟所有各方面都被排擠出去了。

(3) 絕大多數個體農民最終脫離了小商品個體農業，而加入了以集體勞動和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集體農莊，集體農業完全戰勝了小商品的個人農業。

(4) 集體農莊吸收着個體農戶，更加擴展起來，結果便使個體農戶數量一月少於一月，實際上變成爲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底輔助力量。

這個有歷史意義的戰勝剝削者的勝利，當然不能不使勞動者物質狀況及其全部日常生活根本改善起來。

由於消滅寄生蟲階級的結果，人剝削人的現象也消滅了。工農勞動擺脫了剝削。從前剝削者由人民勞動中榨取的那種收入，現在已是完全留在勞動者手裏，其中有一部份用來擴展生產和吸收勞動者新隊伍參加生產，而另一部份則用來直接提高工農收入。

工人階級最感痛苦的那個奇災大禍，即失業現象，已經消滅了。現時在資產階級國家裏有千百

萬失業者因為找不着工作而遭受飢寒痛苦，而我國却已沒有領不着工作和工資的工人了。

隨着富農盤剝制的消滅，於是農村中的貧窮現象也消滅了。現在，隨便那一個農民，不管他是集體農民也好，個體農民也好，只要願意誠懇工作，而不偷懶，不游蕩，不侵吞集體農莊財產，就有享受人生幸福的可能。

剝削制的消滅，城市中失業現象的消滅，鄉村中貧窮現象的消滅，——這就是勞動者物質狀況中的一種有歷史意義的成績，這種成績是無論那一個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家裏的工農所夢想不到的。

我國各大城市和工業中心底面貌已經改變了。資產階級國家各大城市不可避免的特徵，就是那些破爛矮屋，即城郊一帶的所謂工人住區，黑暗的潮濕的破落不堪的處所，大半都是地窖，其中居民照例都是一些輾轉於污泥中，埋怨厄運，吞聲叫苦的窮人。而在我們蘇聯由於革命的結果，這種破爛矮屋已經絕跡，而由那些新建的美麗光亮的工人住區，往往比城中心還要美觀得多的工人住區所代替了。

鄉村底面貌更是改變了。在舊時鄉村中最出風頭的是教堂廟宇，立在前面的的是巡官，神父和富農底樓房，而立在後面的是農民底破爛草屋，——這種舊式鄉村現在已開始消失了。它們日益由一些新式鄉村所代替，這種新式鄉村中有公共的經濟建築，俱樂部，有無線電收音器，電影院，學校，圖書館和托兒所，有拖拉機，康拜因機，打穀機和汽車。舊時的名人，即剝削者的富農，吸血鬼的高利貸者，穀機商人，巡官老爺等，已經絕跡了。而今日的名人，却是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小學校和俱樂部中的活動家，拖拉機隊長和康拜因機隊長，耕作隊長和養畜隊長，集體農莊田場上的優秀男女突擊隊員。

城鄉間的對立性日益消滅下去。城市在農民心目中已不是剝削他們的中心了。城鄉間的經濟上文化上結合的線索日益堅固起來了。現在，鄉村經常由城市及其工業方面得到種種幫助：拖拉機，農業機器，汽車，人材和經費等等，而且，鄉村本身現在也有自己的工業，如農業機器站，修理場，集體農莊中的各種製造場，小型電站等等。城鄉間文化程度懸殊的深淵日益填平了。

這就是勞動者在改善他們物質狀況，日常生活以及文化方面的基本成績。

在這些成績基礎上，我們在報告期內便有如下情形：

(1) 國民收入已由一九三〇年的三百五十萬萬盧布，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五百萬萬盧布，更因為資本主義份子（包括租借企業家在內）現時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部份已不滿百分之小數點五，所以幾乎全部國民收入，都是歸工人，職員，勞動農民，合作社和國家所有了。

(2) 蘇聯人口已由一九三〇年末的一萬六千零五十萬人，增加到一九三三年末的一萬六千八百萬人。

(3) 工人和職員人數已由一九三〇年的一千四百五十三萬人，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二千一百八十八萬三千人，其中體力勞動人數在這時期內由九百四十八萬九千人增加到一千三百七十九萬七千人，大工業工人（連運輸工人包括在內）數量由五百零七萬九千人增加到六百八十八萬二千人，農業工人數量由一百四十二萬六千人增加到二百五十一萬九千人，商業工人和職員數量由八十一萬四千人增加到一百四十九萬七千人。

(4) 工人和職員底工資基金已由一九三〇年的一百三十五萬九千七百萬盧布，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三百四十二萬八千萬盧布。

(5) 工業工人每年平均工資已由一九三〇年的九百九十一個盧布，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一千

五百一十九個盧布。

(6) 工人和職員社會保險基金已由一九三〇年的十八萬一千萬盧布，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四十六萬一千萬盧布。

(7) 全部地面工業都已過渡到七小時工作制。

(8) 國家爲幫助農民而設立了二千八百六十個農業機器站，一共投入了二十萬萬盧布的資金。

(9) 國家爲幫助農民而發給了集體農莊十六萬萬盧布的信貸。

(10) 在報告期內，國家爲幫助農民而借給了他們二萬六千二百萬普特的穀物，作爲種子和糧食。

(11) 國家爲幫助能力單薄的農民而給予了他們的免稅和保險優待，共計三萬七千萬盧布。

關於我國文化發展情形，我們在報告期內有如下的事實：

(1) 在蘇聯全國施行了普及的初級義務教育，識字人口已由一九三〇年末的百分之六十七，提高到一九三三年末的百分之九十。

(2) 各級學校學生人數已由一九二九年的一千四百三十五萬八千人，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二千六百四十一萬九千人，其中受初級教育者由一千一百六十九萬七千人增加到一千九百一十六萬三千人，受中等教育者由二百四十五萬三千人增加到六百六十七萬四千人，受高級教育者由二十萬零七千人增加到四十九萬一萬人。

(3) 受育嬰教育的兒童人數已由一九二九年的八十三萬八千人，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五百九十一萬七千人。

(4) 普通大學和專門大學數目已由一九一四年的九十一所，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六百所。

(5) 科學研究所數目已由一九二九年的四百所，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八百四十所。

(6) 俱樂部式的機關數目已由一九二九年的三萬二千所，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五萬四千所。

(7) 電影院，俱樂部電影機和流動電影機數目已由一九二九年的九千八百部，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二萬九千二百部。

(8) 報紙每日出版份數已由一九二九年的一千二百五十萬份，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三千六百五十萬份。

此外，也許不妨指出，在我國各大學學生中，工人成份佔百分之五一點四，勞動農民成份佔百分之二六點五，而例如在德國各大學學生中，工人成份在一九三二——三三學年間只佔百分之三點二，小農成份只佔百分之二點四。

還要指出一件可喜的事實和鄉村文化水準增長的明證，這就是集體農莊女莊員在社會組織工作方面積極性底增長。大家知道，例如現時在集體農莊女莊員中，約有六千人當集體農莊主席，有六萬餘人當集體農莊管理委員，有二萬八千人當生產隊長，有十萬人當生產班長，有九千人當集體農莊商品農場主任，有七千人當拖拉機駕駛人。這些統計材料當然是很不完全的。可是，就從這一個很不完全的數目中間，也可顯然看見鄉村文化水準銳增的情形。這個情況是有莫大意義的，同志們。其所以有莫大意義，是因為婦女佔我國人口半數，是一支龐大的勞動軍，而且她們負有使命來教育我們的兒童，我們的後輩，即我們的將來。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不可讓這支龐大的勞動軍沉淪於黑暗無知的境地！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應當歡迎勞動婦女日益積極參加社會生活和被提拔來擔任領導工作的情形，作為我國文化水準增長的一個毫無疑義的明證。（鼓掌多時）。

最後，還應指出一件事實，但這是一件不良的事實。我所說的這個不可容許的現象，就是師

範『科』和醫『科』在我們這裏至今尙被輕視。這是幾乎等於違背國家利益的一個大缺點。這個缺點是一定要剷除的。而且剷除得愈快愈好。

(四) 商業高漲與運輸業

這樣，我們就有如下的情形：

(1) 工業產量——包括日用品出產在內——增長了；

(2) 農業產量增長了；

(3) 城鄉勞動羣衆對於農產品和工業品的需要和需求量增長了。

爲了把這些條件結合起來，並使全體消費者大眾都能得到必需的工業品與農產品，還要有什麼條件呢？

有些同志認爲，只要有這些條件，就足以使全國經濟生活十分活躍了。這是很錯誤的。即令這一切條件都已完全具備，可是如果商品不達到消費者手上，那末經濟生活不僅不能十分活躍，反而會根本解體和紊亂起來的。到底必須瞭解：商品畢竟不是爲生產而生產，而是爲消費而生產的。我們有過這樣一種事實，就是工業品和農產品本來不少，但這些產品不僅沒有達到消費者手上，反而積年徘徊於官僚主義的迂迴曲折的路上，即所謂商品轉運網中，而不能與消費者見面。很明顯的，在這種條件下，工業和農業就失去其擴展生產的任何刺激，商品轉運網就堆滿貨物，而工農羣衆却落得沒有工業品和農產品。結果，雖有大宗工業品和農產品，而全國經濟生活還是陷於解體。爲要使全國經濟生活十分活躍起來，而工業與農業又有不斷擴大生產的刺激，那就還要有一個條件，這個條件就是城市與鄉村間，區與區間，省與省間，國民經濟各部門間的擴展的商品流轉。必須使全

國各地都佈滿批發處，商品和貨攤。必須使商品源源不斷地從生產場所經過這些批發處，商店和貨攤流到消費者手上去。必須使國營商業網，合作社商業網，地方工業，集體農莊以及個體農民，都來參加這一事業。

這就是我們所稱呼的擴展的蘇維埃商業，沒有資本家參加的商業，沒有投機者參加的商業。由此可見，擴展蘇維埃商業是一個最迫切的任務，不解決這個任務，便無法繼續前進。

雖然這個真理是十分明顯的，但黨在報告期內終究不得不克服擴展蘇維埃商業道路上的許多障礙，這些障礙，如果加以簡要的估計，便可說是由於一部份共產黨員完全不懂蘇維埃商業必需和重要的結果。

首先，在一部份共產黨員中間，仍然流行着一種高傲鄙視一般商業以及蘇維埃商業的態度。這些所謂共產黨員認為蘇維埃商業是一件沒有什麼價值的事情，而認為商業工作人員是些毫無出息的人。這些人大概是不懂得，他們這種鄙視蘇維埃商業的觀點根本不是布爾塞維克的觀點，而是一種大有野心而毫無本事的失意貴族的觀點。(鼓掌)這些人不懂得蘇維埃商業是我們切身的布爾塞維克的事業，而商業工作人員，包括店檯工作人員在內，只要他們誠懇工作，就是我們革命布爾塞維克事業底執行者。(鼓掌)。當然，黨只好把這些所謂共產黨員稍許打擊了一下，而把他們那種貴族偏見拋到了垃圾堆裏去。(鼓掌多時)。

其次，我們還克服了另一種偏見。此地所說的，就是流行於我們一部份工作人員中的「左派」廢話，說蘇維埃商業已成了過去的階段，說我們必須實行產品直接交換制，說貨幣很快就要取消，因為貨幣似乎已變成了簡單的核算符號，說根本用不着發展商業，因為產品直接交換制已是指日可待了。應當指出，這種幫助資本主義份子來破壞蘇維埃商業擴展事業的「左派」小資產階級廢話，

不僅是流行於一部份紅色教授中間，而且還流行於某些商業工作人員中間。這些人甚至不能辦好最簡易的蘇維埃商業的事情，却在那裏妄說他們決意要辦好更複雜困難的產品直接交換事情，——這當然是滑稽可笑的。可是，吉訶德一流的先生之所以叫作吉訶德先生，也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最低限度的人生知覺哩。這些與馬克思主義相隔十萬八千里的人，大概是不懂得，貨幣在我們這裏還會長期存在，一直存在到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即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完成時為止。他們不懂得，貨幣是蘇維埃政權從資產階級經濟那裏拿到自己手裏來適應社會主義利益，盡量擴展蘇維埃商業，藉以準備條件去實行商品直接交換的一種工具。他們不懂得，產品直接交換制，只有在蘇維埃商業辦得盡善盡美的時候，才能代替蘇維埃商業，而辦得盡善盡美的蘇維埃商業現在我們還完全沒有的，並且不會是很快就有的。所以，黨在設法擴展蘇維埃商業的時候，當然也就只好把這些「左派」畸形兒打擊一下，並把他們的那種小資產階級廢話拋到九霄雲外去。

其次，我們必須克服商業工作人員機械分配商品的不良習慣，剷除忽視貨物種類和買者要求的態度，剷除機械運送貨物的辦法以及商業中的無人負責現象。為此目的而添設了許多省批發處和區間批發處，開設了幾萬個新商店和新貨攤。

其次，我們必須消滅合作社獨佔市場的狀態，因而責成各人民委員會開始各自經營銷售本部門的商業，責成供給事業人民委員會開展廣泛的營業性的農產品貿易，結果是一方面用競賽辦法把合作社商業改善了，另一方面又把市場上的物價降低了，把市場情形健全化了。

開展了廣泛的廉價飯堂網（「公共飯堂」），在各工廠中組織了工人給養部，取消了與各該工廠無關的人所領取的給養證，單是在重工業人民委員會這一方面，就取消了不下五十萬個局外人所領取的給養證。

整理了統一集中的短期信貸銀行，即國家銀行，它有二千二百個能資助商業活動的區分支行駐設於各地。

由於實行這種辦法的結果，我們在報告期內就有了如下的成績：

(1) 商店與貨攤數目在一九三〇年是十八萬四千六百六十二所，而在一九三三年則已增加到二十七萬七千九百七十四所；

(2) 新設立的省批發處有一千零十一個，新設立的區間批發處有八百六十四個；

(3) 新設立的工人給養部，共有一千六百處；

(4) 營業性的糧食商店網已經擴大而普及於三百三十個城市；

(5) 公共飯堂網已經擴大而包括有一千九百八十萬個用膳者；

(6) 經過國營商業與合作社商業（包括公共飯堂在內）機關所進行的商業流轉總額，在一九三〇年等於一百八十九萬萬盧布，而在一九三三年則已增加到四百九十萬萬盧布。

如果以為蘇維埃商業這全部發展規模已能滿足我國經濟需要，那就是錯誤的想法了。恰巧相反，從來也沒有像現在看得這樣明顯，商品流轉底現狀決不能滿足我國需要。因此，任務就是要繼續擴展蘇維埃商業，吸收地方工業來參加這件事情，加強集體農莊的農民的商業，以求在提高蘇維埃商業方面獲得有決定意義的新成功。

可是必須指出：問題不能局限於擴展蘇維埃商業。要發展我國經濟，就必須發展商品流轉，必須發展蘇維埃商業，而為要發展蘇維埃商業，又必須發展我國運輸業——鐵路運輸業，水上運輸業和汽車運輸業，可以發生這樣一種情形：有商品，有充分擴展商品流轉的可能，但運輸業却趕不上商品流轉底發展，不能充分轉運貨物。大家知道，我們往往正有這樣一種情形。因此，運輸業現時

是這樣一個狹窄處，我國整個經濟，首先是我國商品流轉，都能碰到它而跌交，而且也許已在開始跌交了。

固然，鐵路運輸業底轉運量是增加了：在一九三〇年等於一千三百二十九萬噸哩，而在一九三三年則已增加到一千七百二十萬噸哩。可是這還不夠，這對於我們，對於我國經濟是還嫌太少的。水上運輸業底轉運量也增加了：在一九三〇年等於四百五十六萬噸哩，而在一九三三年已增加到五百九十九萬噸哩了。可是這還不夠，這對於我國經濟是還嫌太少的。

更不必說汽車運輸業，它所有的汽車數量（載重汽車和輕便汽車）雖有增加，在一九一三年是八千八百輛，而在一九三三年末則已增加到十一萬七千八百輛，可是，這對於我國國民經濟是少得簡直不方便去說的。

當然，運輸機關如沒患有所謂官僚形式主義領導方法的有名病症，那末所有這各種運輸業就會工作得好得多。因此，除了用人材和經費幫助運輸業而外，還必須在運輸業各機關內根本剷除官僚形式主義的辦法，而使它們成爲更靈活的機關。

同志們！我們已把工業各基本問題正確解決了，於是工業現在是腳根穩固了。我們把農業基本問題也正確解決了，於是農業——我們可以直截這樣說——現在也是腳根穩固了。可是，如果我們的商業竟開始跛足，如果我們的運輸業竟成爲我們腳上的贅累，那我們是會喪失這些成績的。因此，當前最迫切的任務就是要擴展商品流轉額和斷然改良運輸業，我們不解決這個任務，便不能繼續前進。

選自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一九四八年莫斯科版

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第二段第五八二至六一七頁

論農業勞動組合與農業公社問題

拿農業勞動組合和農業公社的問題來說吧。現在大家都承認，勞動組合在現今條件下是唯一正確的集體農莊運動形式。這是完全明白的，因為第一，勞動組合把集體農莊莊員底個人日常生活利益與他們的公共利益正確配合起來；第二，勞動組合很恰當地把個人日常生活利益適應於公共利益，因而便利於用集體主義精神來教育昨天的個體農民。

農業公社却與勞動組合不同，因為在勞動組合中只把生產資料公共化，而在農業公社中，不久以前却不僅把生產資料公共化了，並且把每個社員底日常生活也公共化了，——這就是說，農業公社社員與勞動組合組員不同，他們沒有個人佔有的家畜，小牲畜，乳牛，穀物和園圃土地，這就是說，在農業公社中，沒有顧到各社員底個人日常生活利益，沒有把它與公共利益配合起來，却爲了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利益而用公共利益把它蒙蔽起來了。這當然是農業公社底最大弱點。正因為如此，所以農業公社也就沒有廣泛流行起來，而只是偶然碰得見幾個或幾十個。同樣也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農業公社爲了維持自己的生存，爲了避免瓦解，竟不得不放棄那種把日常生活公共化的辦法，而開始按照勞動日來進行工作，給社員分發穀物回家享用，允許社員個人佔有家畜，小牲畜和乳牛等等，可是由此可見，農業公社在事實上已改爲勞動組合了。這當然是沒有什麼壞處，同爲這恰巧是廣大集體農莊運動底健全發展利益所要求的。

這當然不是說農業公社根本用不着了，已經不是集體農莊運動底最高形式了。不，農業公社是需要的，而且它當然還是集體農莊運動底最高形式；但這不是現時在技術不發展與產品不够的基礎上產生，並且已經自動改變成了勞動組合的農業公社，而是將來在技術更發展與產品極豐富的基礎上產生的農業公社。現今的農業公社是在技術不很發展和產品不充足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因此現今的農業公社也就實行了平均主義辦法，而很少顧到社員們底個人日常生活利益，因此它現在也就不得不改成為勞動組合，把集體農莊莊員底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適當配合起來。將來的農業公社是要從發展了的豐裕的勞動組合中長成的。將來的農業公社是在勞動組合田場上和農場中有了豐富的穀物、家畜、家禽、蔬菜及其他種種產品的時候，在勞動組合中附設有機械洗衣坊、新式廚房、食堂、麵包廠等等的時候，集體農莊莊員看見從農場方面領取肉類和牛奶是比自己飼養乳牛和小家畜便宜些的時候，集體農莊莊員看見在公共飯堂中用膳，向麵包廠領取麵包，向公共洗衣坊領取乾淨衣服是比自己料理這種種事情方便些的時候產生出來的。將來的農業公社是在技術更發展和勞動組合更發展的時候，在產品十分豐富的時候產生出來的。這在什麼時候才會呢？當然不是很快就會有。但這是一定會有的。如果用人工方法勉強加速勞動組合轉變為將來農業公社的過程，那就是罪惡了。這樣來作，便會是紊亂一切計劃，幫助敵人了。勞動組合轉變為農業公社的過程，應當是逐漸發生，應當是隨着全體集體農莊莊員確信有這種轉變必要的程度發生。

關於農業勞動組合與農業公社問題，就是如此。這看起來是很明白的，而且幾乎是很淺顯的。

可是，有一部份黨員對於這個問題却抱着一大堆糊塗觀念。他們認為黨既然宣佈勞動組合為集體農莊運動底基本形式，於是就離遠了社會主義，由集體農莊運動最高形式的公社退到低級形式上

去了。試問爲什麼呢？原來是因爲在農業勞動組合中沒有平等，因爲在農業勞動組合裏還保存有各組員底個人消費和日常生活中的差別，而在農業公社中却有平等，因爲在農業公社裏各社員底個人需要和日常生活狀況都是彼此平均化了的。可是，第一，我國現在已經沒有這種在個人消費和個人生活方面都實行一律平均了的農業公社。實踐已經表明：如果農業公社沒有放棄平均主義辦法，沒有在事實上改變爲農業勞動組合，那它就會是已經滅亡了。所以，根本就用不着援引那已不復存在於天地間的東西。第二，每一個列寧主義者，只要他是一個真正列寧主義者，都知道需要和個人生活方面的平均制是一種反動的小資產階級謬論，這種謬論只適合於某種原始禁慾主義教門，

但它不適合於按照馬克思主義組織起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因爲決不可要求所有的人都有一樣的需要和胃口，決不可要求所有的人都過着一個模樣的個人日常生活。最後，在工人中間豈不是也保留有需要方面和個人日常生活方面的差別麼？這是不是說工人比農業公社社員離社會主義離得遠些呢？

這些人大概認爲社會主義要求把社會組成員們底個人需要和個人日常生活都平均，劃一和均等起來。不待說，這種設想是與馬列主義毫不相干的。馬克思主義所瞭解的平等，並不是個人需要和日常生活方面的平均，而是階級之消滅。這就是說：第一，在推翻和剝奪資本家以後，一切勞動者都平等地擺脫剝削而得到解放；第二，在生產資料轉歸全社會公有以後，對於大家都是平等地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第三，大家都有按各人能力勞動的平等義務，一切勞動者都有按各人勞動領取勞動報酬的平等權利（社會主義社會）；第四，大家都有按各人能力勞動的平等義務，一切勞動者都有按各人需要領取勞動報酬的平等權利（共產主義社會）。同時，馬克思主義認爲各人底胃口和需要，無論按質量或數量來說，無論在社會主義時期或共產主義時期，都不會是，而且不能是彼此一樣，大家平等的。

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平等觀。

任何其他一種平等，都是馬克思主義沒有承認過，而且也不會承認的。

如果由此作出結論，說社會主義要求把社會組成員們底需要都平均，劃一和均等起來，要求把他們的胃口和個人日常生活都均等起來，說按馬克思主義者底計劃，大家都應當穿一樣的衣服，吃一樣和同量的飲食，那就是胡說八道，誹謗馬克思主義了。

到底應當瞭解，馬克思主義是堅決反對平均主義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就已經痛斥了那種簡陋的空想的社會主義，並因為它鼓吹『普遍禁慾主義和鄙俗平均思想』而稱它為反動的社會主義。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一書中，闢整整第一章，專門痛切批評了杜林所用來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對立的那種『急進派的平均主義的社會主義』。

恩格斯當時說：

『無產階級平等要求底實在內容，就是要消滅階級。任何超過這一範圍的平等要求，都必然會得出荒謬的結論』。

列寧也這樣說過：

『恩格斯寫得千真萬確：平等概念除消滅階級而外，就是最荒謬的一竅不通的偏見。資產階級教授們企圖藉口平等概念來誣賴我們，硬說我們想把所有的人都弄得一模一樣。他們企圖把他們自己臆造的這個謬論加在社會主義者頭上。可是，他們由於自己昏暗無知，竟不知道社會主義者——而且正是現代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說過：平等二字若不瞭解為消滅階級，便是一句空話。我們是想消滅階級的，我們在這方面是主張平等的。可是，如果以為我們能把所有的人都弄得一模一樣，那就是最空洞的辭句和知識份子的拙劣臆造了』節自列寧

論自由平等口號來欺騙民衆的把戲的演說，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九三至二四九頁）。這看起來是很明白的了。

資產階級作家們喜歡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形容成的沙皇時代的營房，那裏一切都服從平均主義『原則』的。可是，馬克思主義者決不能對資產階級作家底昏暗魯鈍習性負責。

毫無疑義，個別共產黨員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所持的這種糊塗見解，以及他們對於農業公社平均主義趨向所持的迷戀態度，恰與『左派』糊塗蟲底小資產階級觀點一模一樣，這些糊塗蟲曾把農業公社當作偶像崇拜，而企圖在工廠裏培植公社制度，要各按本人手藝做工的熟練工人和不熟練工人都把所得工資交出來混在一塊，然後按人平均分配。大家知道：『左派』糊塗蟲所玩的這些平均主義的兒戲，是使我國工業受到了莫大害處的。

由此可見，被擊破了的反黨集團底思想餘毒還有頗大的生機。

顯然，如果這些『左派』觀點在黨內獲得了勝利，那末黨就會不成其為馬克思主義黨，而集體農莊運動就會完全解體了。

例如又拿『把一切集體農莊莊員都變成爲生活豐裕的人』這一口號來說吧。這個口號不僅與集體農莊莊員有關。它尤其是與工人有關，因爲我們想把所有的工人都變成爲生活豐裕的人，變成爲享受豐裕和完全文明的生活的人。

這看起來是很明白的了。如果我們做不到使我國民衆享受美滿生活，那又何必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實行推翻資本主義，多年建設社會主義呢。社會主義並不是要大家貧窮困苦，而是要剷除貧窮困苦，要給社會上全體成員造成豐裕和文明的生活。

可是，這一個十分明白，而且實在是很淺顯的口號，竟在一部份黨員中間引起了許多誤會，糊

塗觀念和混亂思想。他們說：這個口號不是回復到黨所推翻了的那個『發財吧』的舊口號麼？他們接着又說：如果大家都變成爲生活富裕的人，如果再也沒有窮人存在，那末我們布爾塞維克進行工作的時候又倚靠於什麼人呢，我們沒有窮人，怎能工作呢？

這聽起來也許是很可笑的，但這種幼稚的反列寧主義觀點却確實存在於一部份黨員中間，而成爲一件不可忽視的事實。

這些人大概不瞭解：『發財吧』的口號與『把一切集體農莊莊員都變成爲生活富裕的人』的口號，是根本不同的。第一，能够發財致富的只有個別份子，或個別集團，至於富裕生活的口號，不是與個別份子或個別集團有關，而是與一切集體農莊莊員有關的。第二，個別份子或個別集團發財致富，是爲了奴役和剝削他人，至於使一切集體農莊莊員都能在集體農莊內生產資料公有化條件下享受富裕生活的口號，却絕對排斥任何人剝削人的可能。第三，『發財吧』的口號是在新經濟政策第一階段中提出來的，當時資本主義局部地恢復起來，富農還有勢力，個體農戶還在國內佔居大多數，集體農莊經濟還處在萌芽狀態中；至於『把一切集體農莊莊員都變成爲生活富裕的人』的口號，却是在新經濟政策最後階段中，即是工業中的資本主義份子已被剝除，農村中的富農已被擊潰，個體農民經濟已被排擠到了次等地位，而集體農莊已變成了農業統治形式的時候提出的。況且，『把一切集體農莊莊員都變成爲生活富裕的人』的口號並不是單獨提出，而是與『把集體農莊變成爲布爾塞維克的農莊』的口號一同提出，不可分開的。

『發財吧』的口號實質上是號召恢復資本主義，而『把一切集體農莊莊員都變成爲生活富裕的人』的口號，却是號召用加強集體農莊底經濟實力和變一切集體農莊莊員爲生活富裕的勞動者的手段，來澈底剝除資本主義底最後餘孽，——這難道不是很明白麼？（喊聲：『對呀！』）

這兩個口號沒有，而且不能有絲毫相同之處，——這難道不是很明白麼？（喊聲：『對呀！』）

至於說沒有窮人，便不能有布爾塞維克的工作，便不能有社會主義，那就甚至是不好意思去說的一種蠢話了。當有資本主義份子和有被資本家剝削的窮人存在的時候，列寧主義者是倚靠於窮人的。可是，當資本主義份子已被擊潰，窮人已免除剝削，而貧苦現象和窮人所藉以存在的前提已被消滅的時候，列寧主義者底任務就不是要把貧苦現象和窮人固定起來，保存起來，而是要剷除貧苦現象和把窮人變成爲生活富裕的人了。如果以爲社會主義能在貧窮困苦的基礎上，在縮減個人消費的基礎上，在降低人們生活水準至窮人生活水準的基礎上建設成功，那就是愚蠢的想法了。何況窮人自己也不願照舊做窮人，而是力求上進去過富裕生活哩。試問誰需要這種所謂社會主義呢？這並不是什麼社會主義，而是一種譏笑社會主義的諷刺畫。社會主義只有在社會生產力蓬勃發展的基礎上，在農產品和工業品豐盈的基礎上，在勞動者生活富裕的基礎上，在文化水準洶湧昇長的基礎上才可建成。因爲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並不是減少個人需要，而是要盡量擴大和發展個人需要，並不是限制或不肯滿足個人需要，而是要盡量和完全滿足文化程度很高的勞動者底所有一切需要。

毫無疑義，個別黨員對於貧困和富裕問題所持的這種糊塗見解，是『左派』糊塗蟲觀點底反映，這些『左派』糊塗蟲把窮人當作偶像來崇拜，以爲窮人是布爾塞維克在任何條件下永遠倚持的靠山，而把集體農莊看作是殘酷階級鬭爭的舞台。

由此可見，在這裏，在這個問題上，被擊潰了的反黨集團底思想餘毒也還沒有失去生機哩。顯然，如果這種糊塗觀點在我們黨內獲得了勝利，那末集體農莊就不會有它們在最近兩年來所達到的成績，而是很快就會陷於瓦解了。

選自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一九四八年莫斯科版

『在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第三段第六二一至六二九頁

六、爲完成社會主義建設而鬥爭

在克里姆里宮舉行的紅軍

學院學生畢業典禮大會上的演說

——一九三五年五月四日——

同志們！不可否認：我們近來無論在建設方面或在管理方面都有了巨大的成功。於是在我們這裏關於領導者底功績，關於領袖們底功績，就未免講得太多了。人們把所有一切，幾乎把我們所有一切成績都歸功於領袖們。這當然是不對的，不正確的。問題不僅在於領袖們。但我今天所想的，不是這一點。我想簡略說到的，是幹部問題，我們的一般幹部，尤其是我們的紅軍幹部問題。

大家知道，我們從舊時代方面所得到的遺產，是一個技術落後的國家，幾乎是赤貧的，破產的國家。它是既被四年帝國主義戰爭所破壞了，又被三年國內戰爭所破壞了的，其中居民很少識字，技術落後，工業好像個別孤島一樣沉沒在無數極小農莊這一汪洋大海中，——這就是舊時代所遺傳給我們的國家。當時的任務是要把這個國家由中世紀的黑暗無知的軌道上，轉移到現代工業和機器化農業的軌道上去。可見，任務是很嚴重，很困難的。當時的問題是這樣擺着：或者是我們在最短期間就把這個任務解決成功，於是在我國把社會主義鞏固起來，或者是我們解決不了這個任務，那時我們這個技術薄弱，文化落後的國家就會喪失獨立的地位，而變成爲帝國主義列強的玩具。

我國當時是處在技術十分缺乏的時期，沒有充分機器來供給工業，沒有機器來供給農業，沒有

機器來供給運輸業，沒有國家工業改造專業所絕對必需的那種最低限度的技術基礎，而只有一些創立這種基礎的前提。當時須創立頭等重工業，必須使這個重工業在技術上不僅能够改造工業，而且能够改造農業，而且能够改造我國鐵路運輸業。因此也就必須甘願担受犧牲，在各方面實行極端節省，節省飲食，節省教育經費，節省布疋，以求積累創立工業所必要的資金。我們當時沒有其他什麼辦法可以消滅十分缺乏技術的現象。列寧就是這樣教導我們，而我們也就是這樣跟着列寧底脚步行進了的。

當然，在這樣巨大艱難的事業中，決不能期待獲得接連不斷，迅速表現出來的成功。在這種事業中，只有經過幾年以後，才會有成功表現出來。因此必須用堅強的精神，用布爾塞維主義的堅定性，用堅忍不拔的意志把自己武裝起來，以求克服初次挫折，而勇往直前地向着偉大目的前進，不許在自己隊伍內有什麼動搖和猶疑。

大家知道，我們正是這樣進行了這件事業的。可是，堅強精神，忍耐性和堅定性，並不是我們所有一切同志都充分具備的。當時在我們的同志中間有些人一遇見初次困難，就叫人退却。常言道：『既往不咎』。這當然是對的。可是，人總有記性，所以我們在總結我們工作的時候，也就會於無意中想起過去的事情來。（全場歡動）。是的，我們當時有一些同志是害怕困難並叫黨退却的。他們說『你們的工業化和集體化，機器，鋼鐵，拖拉機，康拜因機和汽車，對我們有什麼用處呢？倒不如多給我們一些布疋，多買一些原料來生產日用品，多給居民們一切點綴日常生活的零件細物吧。要在我國落後情形下創立工業，何況是創造頭等工業，那就是危險的幻想』。

當然，我們當時也許是能不能把我們用嚴格節省方法獲得的三十萬萬金盧布拿去創立國家工業，而用去輸入原料並增加日用品的生產。這也是一種『計劃』。可是，如果我們採用了這種『計劃』，

那我們就會沒有什麼冶金業，機器製造業，拖拉機和汽車，飛機和坦克了。那我們在外來敵人面前就會成爲手無寸鐵的人了。那我們就會破壞了我國社會主義底基礎了。那我們就會成爲國內國外資產階級底俘虜了。

顯然，當時必須在兩個計劃中間選定一個：一個是退却計劃，是要使社會主義遭受失敗，而且不能不使社會主義遭受失敗的計劃；另一個是進攻計劃，是要使社會主義獲得勝利，而且——你們知道——真正已使社會主義在我國獲得了勝利的計劃。

我們也就選定了進攻計劃，循着列寧道路前進，而拋開那些鼠目寸光，根本不願看見我國最近將來，不願看見我國社會主義將來的同志。

可是，這些同志並不是始終都只限於批評和消極抵抗。他們以在黨內舉行暴動反對中央來威脅過我們。而且，他們還用槍彈威脅過我們某些人。他們大概是指望嚇倒我們，並迫使我們離開列寧道路。但他們顯然是忘記了，我們布爾塞維克是具着特殊氣概的人。他們忘記了，布爾塞維克是既不怕困難，也不怕威脅的。他們忘記了，把我們鍛鍊成鋼的，是在鬭爭中不知恐懼爲何物，根本不承認恐懼二字的偉大列寧，即我們的領袖，我們的導師，我們的父親。他們忘記了，敵人愈是發瘋，黨內敵對份子愈是神經錯亂，那末布爾塞維克也就會愈加堅強奮發地進行新的鬭爭，愈加猛勇地向前邁進。

當然，我們根本沒有打算離開列寧道路。而且，我們在這條道路上穩立了起來的時候，便更加猛勇地向前行進了，掃除了前進途中所有一切障礙物。固然，我們在向前行進時不得不沿途打翻這些同志中間的某些人。可是有什麼別的法呢。我應當承認，我對於這件事情也是出了一臂之力的。（熱烈鼓掌，高呼『烏拉』）。

是的，同志們，我們真正是自信地猛勇地沿着使我國工業化和集體化道路走了的。現在這條道路可算是已經走過的了。

現在大家都承認我們在這條道路上已達到偉大的成功了。現在大家都承認我們已經有了強大的頭等的工業，強大的機械化的農業，日益開展的蒸蒸直上的運輸業，組織精密和武裝優良的紅軍了。

這就是說，我們在基本上已渡過了十分缺乏技術的時期。

可是，渡過了十分缺乏技術的時期以後，我們就走進了新的時期，走進了可說是十分缺乏人材，十分缺乏幹部，十分缺乏善於駕駛技術並推動技術前進的工作者的時期。問題是在於我們有工廠，有集體農莊，有蘇維埃農莊，有運輸業，有軍隊，我們有技術來供給這全部事業，可是我們尚缺乏一些具有充分必要經驗來最高限度利用這種技術的人材。從前我們是說：『技術決定一切』，這個口號幫助我們消滅了十分缺乏技術的現象，並在一切工作部門裏創立了極廣大的技術基礎，以便用頭等技術來武裝我們的人材。這是很好的。但這還千萬不夠。爲要使技術動作起來並把它利用到底，就需要有精通技術的人材，就需要有善於學會利用和巧於運用這種技術的幹部。技術沒有精通技術的人材，便是死的東西。技術有精通技術的人材來使用，便能夠而且應當顯出奇蹟來。如果在我們的頭等工廠裏，在我們的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裏，在我們的運輸業裏，在我們的紅軍裏，有充分數量能夠駕駛這種技術的幹部，那末我們國家所得到的效果，就會比它現時所有的還要多三四倍了。正因爲如此，所以現在應當特別注重人材，特別注重幹部，特別注重精通技術的工作者。正因爲如此。所以舊口號，即『技術決定一切』的口號，反映着已經過去時期的口號，反映着我們十分缺乏技術時期的口號，現在應當由新口號，即『幹部決定一切』的口號來代替。現時的主要點，

就在這裏。

可以說我們的人完全瞭解和認識了這個新口號底偉大意義麼？我認爲是不可這樣說的。否則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便不會有人時常用一種豈有此理的態度去對待人材，去對待幹部，去對待工作者了。『幹部決定一切』的口號，要求我們各領導人員對於我們的工作者，對於無論在那一方面做工作的『大』『小』工作者，都表現出最關切的態度，很懇懇地培植他們，當他們需要扶助時就予以幫助，當他們作出初次成績時，就予以獎勵，提拔他們上進等等。而我們在實際上却往往看見那種用官僚主義的刻薄態度，用一種簡直豈有此理的態度對待工作者的事實。也正因爲如此，所以往往也就不去考察人材，不把他們考察以後才任用他們，而是往往把他們東拋西擲，如同拋擲棋盤上的小卒一樣。重視機器，呈報在我們工廠裏有多少技術品，這算是已經學會了。可是，我從未聽見有人用同樣熱情來呈報說我們在某個時期內培植了多少人材，我們怎樣幫助了工作者在工作中長進和鍛鍊起來。這是由於什麼原因呢？這是因爲我們還沒有學會重視人材，重視工作者，重視幹部。

說到這裏，我回想起了我被流放在西伯利亞時所碰見的一件故事。這是在春天漲水時發生的。當時有三十個人跑到河裏撈取波濤洶湧的大水所沖下來的木料。到黃昏的時候，他們回到村莊來了，可是缺少了一個同伴。當我問第三十個人在那裏時，他們就冷冷地回答道：第三十個人『留在那裏了』。我問：『怎麼會留在那裏呢？』他們又同樣冷冷地回答說：『那還要問什麼，當然是淹死了』。當時在他們中間就有一個人忙著要走，說是『要去給母馬灌水喝了』。當時我責備他們，說他們憐惜人還不如憐惜牲畜，於是他們中間便有一個人在其餘同伴贊同下回答道：『我們爲什麼要憐惜人呢？人是我們隨時都可做出來的。而母馬呢……你試一試做出一匹母馬來吧』。（全場聽見

活躍)。你們看，這就是一個也許不大重要，但很標本的例子。我覺得，我們有些領導者對於人材，對於幹部所採取的冷淡態度以及不會重視人材的習氣，正是上面那個遙遠西伯利亞故事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奇異的對人態度遺留下來的餘毒。

所以，同志們，我們如果想要順利地消滅十分缺乏人材的現象，並使我國得到充分數量能夠推進技術和運用技術的幹部，首先就應當學會重視人材，重視幹部，重視每一個有益於我們共同事業的工作者。畢竟應該瞭解：人材，幹部是世界上所有一切寶貴資本中最寶貴最有決定意義的資本。應該瞭解，在我們現時的條件下，『幹部決定一切』。如果我們在工業，農業，運輸業和軍隊中將有人數衆多的優良幹部，那我們的國家就會是不可戰勝的。如果我們不會有這種幹部，那我們就會寸步難移。

我就說到這裏爲止。讓我舉杯敬祝我紅軍學院畢業生康健和進行！我希望他們在組織和領導我國國防事業中一切都順利。

同志們！你們已在最高學府畢了業，並在那裏受到了初步的鍛鍊。可是，學校還只是一個預備階段。幹部底真正鍛鍊，是要在活的工作中，在學校以外，在和困難作鬭爭中，在克服困難的過程中取得的。同志們，請記着吧：只有那些不害怕困難，不躲避困難，反而前去迎接困難，以求克服和消滅困難的幹部，才是優良的幹部。真正的幹部，只能在和困難作鬭爭中鍛鍊出來。如果我們的軍隊有充分數量真正受過鍛鍊的幹部，那它就會成爲不可戰勝的軍隊。

同志們，我敬祝你們康健！（全場熱烈鼓掌。全體起立，高呼『烏拉』，向斯大林同志表示致敬）。

在第一次全蘇聯斯達漢

諾夫工作者會議上的演說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一) 斯達漢諾夫運動底意義

同志們，關於斯達漢諾夫工作者，在這裏，在這次會議上，有人已經說得很多，而且說得很好，因此我實在沒有多少話可說了。可是，既然你們已把我叫到講台上來，我就得說幾句話。

決不可把斯達漢諾夫運動看作一個普通的男女工人運動。斯達漢諾夫運動是定會成爲我們社會主義建設史上最光榮篇幅之一的男女工人運動。

斯達漢諾夫運動底意義何在呢？

首先就在於它是社會主義競賽底新高漲，是社會主義競賽底新的更高的階段。爲什麼是新的階段呢，爲什麼是更高的階段呢？因爲斯達漢諾夫運動這一社會主義競賽形式，是優越於社會主義競賽底舊階段的。在過去，在三年以前，就是說在社會主義競賽第一個階段時期中，社會主義競賽並不一定要與新技術相聯繫的。而且，我們當時本來也就幾乎沒有什麼新技術。反之，社會主義競賽現今階段，即斯達漢諾夫運動，却一定要與新技術相聯繫。沒有新的更高的技術，就不會有斯達漢諾夫運動。在座的這些人，像斯達漢諾夫，布塞根，斯美坦寧，克里沃諾斯，普羅寧，兩位維諾格

拉多娃以及其他許多同志，都是些新的人材，都是些完全精通了本行工作技術，駕馭並鞭策着這種技術前進的男工和女工。三年以前，我們沒有這樣的人材，或者是幾乎沒有這樣的人材。這是些新的特別的人材。

其次。斯達漢諾夫運動這一男女工人運動底目的，是要打破現今的技術定額，打破現行的生產標準，打破現行的生產計劃和對照表。其所以要打破，是因為所有這些定額，對於現今時期，對於我們新人材，已經是陳舊的了。這個運動打破了對於技術的舊觀點，打破了舊的技術定額，舊的生產標準和舊的生產計劃，而要求規定新的更高的技術定額，新的更高的生產標準，新的更高的生產計劃。它負有在我國工業裏實行一個革命的使命。正因為如此，所以斯達漢諾夫運動在基本上是具有深刻革命性的運動。

這裏有人已經說過，斯達漢諾夫運動是新的更高的技術定額底表現，它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造成，而非資本主義所能達到的那種高度勞動生產率底模範。這是完全正確的。為什麼資本主義打破了克服了封建制度呢？就是因為它創立了比封建制度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它使社會有可能得到比在封建制度下更多得無比的产品。就是因為它使社會更加富足了。為什麼社會主義能夠，應當而且一定會戰勝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呢？就是因為它比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能作出更高的勞動模範，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就是因為它比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能給予社會更多的产品，能使社會更加富足起來。

有些人以為社會主義可能在貧苦生活基礎上，用稍許展平各人物質狀況的方法鞏固起來。這種想法是不對的。這是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觀。其實，社會主義只有在很高的勞動生產率基礎上，只有在比資本主義制度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基礎上，只有在生產品和各種消費品十分豐富的基礎上，只有在社會全體組成員都過着豐裕文化生活的基礎上，才能獲得勝利。可是，為要達到社會主義底這

個目的，並把我們蘇維埃社會變成最豐裕的社會，就必須使我國有超過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勞動生產率的勞動生產率。不然，就絕對不會有十分豐富的生產品和各種消費品。斯達漢諾夫運動底意義就在於它這一運動能打破不充分的舊時技術定額，並且往往超過了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底勞動生產率，這樣就造成了在我國更加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把我國變成最豐裕國家的實際條件。

可是，斯達漢諾夫運動底意義還不止於此。它的意義還在於它準備好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條件。

社會主義底原則是：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各個人在工作時是各盡所能，但在領取消費品時，還不是各取所需，而是以各人爲社會所作的工作爲標準。這就是說，工人階級底文化技術水準還不很高，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間的對立性依然存在，勞動生產率還沒有達到能保證消費品豐富的高度，於是社會也就只得不按社會各個成員底需要，而是按他們爲社會所作的工作來分配消費品。

共產主義是更高的發展階段。共產主義底原則是：在共產主義社會裏，各個人在工作時是各盡所能，在領取消費品時已不是按各人所作的工作，而是以各個文化程度很高的人所有的需要爲標準。這就是說，工人階級底文化技術水準已達到了足以打破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間對立性基礎的高度，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間的對立性已經消滅了，而勞動生產率已經增加到可以保證消費品完全豐富的高度，於是社會也就有可能按各個成員底需要來分配這些消費品了。

有些人以爲消滅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間的對立性這一目的，可能在智力勞動者、工程師和技師文化技術水準降低到中等熟練工人水準的基礎上，用稍許把智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文化技術水準展平一下的方法來達到。這種想法是完全不對的。只有那些小資產階級的空談家，才能這樣來想像共產主義。其實，只有在工人階級文化技術水準提高到工程師技師水準的基礎上，才可消滅智力勞動與

體力勞動間的對立性。如果以為沒有提高到這個水準的可能，那就是可笑的想法了。這在蘇維埃制度下是完全可能的，因為這裏全國的生產力擺脫了資本主義底枷鎖，勞動擺脫了剝削制度的壓迫，工人階級掌握着政權，工人階級底青年有受到完備技術教育的一切機會。毫無疑義，一定要把工人階級文化技術水準提到這樣的高度，才可打破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間對立性底基礎；也只有這樣，才可保證必要的高度勞動生產率與十分豐富的消費品，以便開始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

從這方面看來，斯達漢諾夫運動底意義，就在於它恰巧是包含有我國工人階級這種文化技術水準高漲底萌芽，雖然還嫌幼弱，但畢竟是已經有了的萌芽。

例如，請你們仔細看看這些斯達漢諾夫工作者同志吧。這是些什麼人呢？他們大多數都是些年輕的或中年的男工和女工，是些有文化素養，有技術素養的人物，他們作出準確工作和着實工作的模範；他們善於重視工作中的時間因素，他們學會了愛惜時間，不僅一分鐘，就是一秒鐘也不浪費的技能。在他們中間，大多數人都學過了所謂基本技術知識，而且還繼續充實着自己的技術知識。他們並沒有沾染某些工程師、技師以及經濟管理員所有的那種保守主義和頑固思想；他們很勇敢地前進着，打破陳舊的技術定額，創造新的更高的技術定額；他們對於我國工業領導者所製定的生產標準和經濟計劃提出修改，而且往往補充和糾正工程師和技師底意見，他們時常教導工程師和技師，並推動工程師和技師前進，因為他們是完全精通了本行工作技術，善於最高限度利用技術的人材。今天斯達漢諾夫工作者還不很多，可是明天斯達漢諾夫工作者就一定會增至十倍，——這一點有誰能够懷疑呢？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是我國工業裏的革新家，斯達漢諾夫運動是我國工業未來之花，它包含有工人階級將來文化技術高漲底種子，它為我們開闢了唯一的途徑，去達到更高的勞動生產率指標，即從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所必需的指標，為消滅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間

的對立性所必需的指標，——這難道不是很明白麼？

同志們，這就是斯達漢諾夫運動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意義。

當斯達漢諾夫和布塞根着手打破舊的技術定額時，他們是否想到了斯達漢諾夫運動底這種偉大意義呢？當然是沒有想到的。他們當時所關注的，只是想要消滅他們企業裏的虧空，並超過完成經濟計劃。但他們在力求達到這一目的時，却必須打破舊的技術定額，把勞動生產率發展到超過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程度。可是，如果以爲這個情況能絲毫減少斯達漢諾夫運動底偉大歷史意義，那就是可笑的想法了。

關於一九〇五年第一次在我國組織了工人代表蘇維埃的那些工人，也可以這樣說，這些工人當然沒有料想到工人代表蘇維埃竟會成爲社會主義制度底基礎。他們當時組織工人代表蘇維埃，只是爲了防禦沙皇政府底進攻，防禦資產階級底進攻。可是，這個情況絲毫也不與一件毫無疑義的事實相矛盾，就是由列寧格拉工人和莫斯科工人在一九〇五年所開始的那個爭取工人代表蘇維埃的運動，歸根到底引起了在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粉碎資本主義和達到社會主義勝利的結果。

(二) 斯達漢諾夫運動底根源

現時我們是站在斯達漢諾夫運動底搖籃面前，是站在這運動底泉源面前。

應當指出斯達漢諾夫運動底某些特點。

最觸目的事實，就是這個運動是自行開始的，幾乎是自發開始的，由下層開始的，並沒有受到我們各企業管理處方面的任何督促、不僅如此，這個運動，在某種程度內是違反着我們各企業管理處底意志，甚至是在和他們作鬭爭中誕生和擴展起來的。莫洛托夫同志已經向你們敘述過，阿爾漢

格爾斯克的鋸木工人毛新斯基同志，竟不得不背着經濟機關底眼睛，背着工作監督員底眼睛，而暗地裏作出了新的更高的技術標準，足見他是挨過了怎樣的折磨。斯達漢諾夫本人底遭遇也並不見得好些，因為他向前進展時不僅必須防禦過某些管理人員，並且必須防禦過某些因他『創新立異』而加以譏笑和攻擊的工人。至於布塞根，那末大家知道，他是因為自己『創新立異』而幾乎被開除了工作，只是多謝分廠主任蘇科寧斯基同志出來干涉，才在廠裏留下了的。

由此可見，如果我們各企業管理處對於斯達漢諾夫運動有過什麼動作，那末這種動作的目的就不是要幫助它，而是要阻難它。所以，斯達漢諾夫運動是從下層誕生出來，從下層擴展起來的運動。正因為它是自行誕生出來的，正因為它是從下層發生的，所以它是現代最有生命力而不可遏止的運動。

其次，還應講到斯達漢諾夫運動底另一個特點。這個特點就在於斯達漢諾夫運動並不是逐漸地，而是空前迅速地，好似狂風一樣散佈到我蘇聯全國各地的。事情是怎樣開始的呢？斯達漢諾夫把掘煤技術定額提高到五六倍，甚至更多。布塞根和斯美坦寧也作到了這一步，——布塞根是在機器製造業方面，斯美坦寧是在皮鞋製造業方面，報紙把這些事實登載出來了。於是斯達漢諾夫運動底大火焰就立刻燃遍全國了。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為什麼斯達漢諾夫運動散佈得這樣迅速呢？也許是因為斯達漢諾夫和布塞根是兩個巨大的組織家，在蘇聯各省各區都大有聯絡，而親自組織了這件事情的吧？當然不是！也許是因為斯達漢諾夫和布塞根居心要做我國偉人，而親自把斯達漢諾夫運動底火星子散佈到全國各地去了的吧？同樣不是。你們在這裏已經看見了斯達漢諾夫和布塞根。他們在這次會議上發了言。他們是些謙恭樸實的人，並沒有什麼想出風頭，想做蘇聯全國偉人的野心。我甚至覺得，他們看見這個運動出乎他們意料以外而在我國這樣廣泛發展起來的時候，且表現

出一些驚異的樣子。雖然這樣，而斯達漢諾夫和布塞根兩人所點燃起來的火星子畢竟使這件事情發展成了大火焰，那就是說明，斯達漢諾夫運動是一件完全成熟了的事情。只有完全成熟而有一觸即發之勢的運動，才能這樣迅速散佈起來，好似雪團一般長大起來。

爲什麼斯達漢諾夫運動竟是完全成熟了的事情呢？這個運動散佈得這樣迅速的原因究竟何在呢？斯達漢諾夫運動底根源怎樣呢？

這裏至少有四個原因。

(一) 成爲斯達漢諾夫運動基本原因的，首先就是工人物質狀況底根本改善。生活好些了，同志們。生活快樂些了。生活既然快樂，工作也就來得有勁。於是也就有高度的出產額。於是也就有勞動英雄，——男英雄，女英雄。斯達漢諾夫運動底根源，首先就在這裏。如果在我國有危機，如果我國有使工人階級受苦極深的失業，如果我國人民生活得不好，不舒服，不快樂，那末我國是不會有什麼斯達漢諾夫運動的。(鼓掌)。在全世界上，只有我國無產階級革命才不僅把自己的政治果實，而且把自己的物質果實顯示給人民看了。在過去一切工人革命中，只有一次工人革命勉強強取得過政權。這就是巴黎公社。但巴黎公社並沒有存在過多久。固然，它也曾企圖打破資本主義的枷鎖，但是它沒有來得及把這種枷鎖打破，尤其是沒有來得及把革命底物質生活幸福的果實顯示給人民看。只有我國革命才不僅打破了資本主義的枷鎖，不僅給予了人民自由，而且給予了人民享受豐裕生活的物質條件。我國革命力量雄厚而不可戰勝的原因就在於此。趕走資本家，趕走地主，趕走沙皇衛隊，奪得政權，取得自由，這當然是一件好事情。這是很好的。可是，單靠一個自由，可惜還是千萬不夠的哩。如果穀米不夠，油類不夠，布疋不夠，住宅不好，那末單靠一個自由是不多遠的呀。單靠一個自由是很難生活的啊，同志們。(聽衆齊聲表示贊同，鼓掌)。爲要保證享

受優裕快樂生活的可能，那末除了政治自由幸福而外，還要造成物質幸福。我國革命底特點就在於它不僅給予了人民自由，而且給予了人民物質幸福，而且給予了人民享受豐裕文化生活的可能。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在我國已造成了快樂的生活，而斯達漢諾夫運動也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生長起來的。

(2) 斯達漢諾夫運動底第二個泉源，就是我國已沒有剝削現象了。我國的人不是替剝削者做工，不是替不勞而獲者做工生財，而是爲自己做工，爲自己的階級做工，爲自己這個由工人階級優秀份子掌握政權的蘇維埃社會做工。正因爲如此，所以勞動在我國有着社會的意義，它是一件光榮體面的事情。在資本主義下，勞動是私人個人性質的勞動，你做得多些麼，那就讓你多賺些錢去過你自己的生活吧。誰也不知道你，而且誰也不願意知道你，你是替資本家做工麼，你是替他們生財麼？又怎能不是這樣呢？人家僱傭你，也就是要你去替剝削者生財哩。你不願意這樣幹麼，那就請你滾到失業工人隊伍中去苟延殘喘吧，而我們是隨時都能僱得其他的更馴服的工人的。正因爲如此，所以在資本主義下，人底勞動是不受重視的。在這種條件下，當然不會有什麼斯達漢諾夫運動發生。可是，在我們蘇維埃制度條件下，却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這裏，勞動者是備受尊敬的。在這裏，他並不是替剝削者做工，而是爲自己做工，爲自己的階級做工，爲社會做工。在這裏，勞動者不會覺得自己是個無人過問的人，零丁孤苦的人。恰巧相反，在我們這裏，勞動者覺得他是自己國家中的自由公民，是一種社會活動家。他好好做工，盡力効勞社會，就是一位勞動英雄，就會榮光遍體。顯然，只有在這種條件下，才能有斯達漢諾夫運動誕生出來。

(3) 斯達漢諾夫運動底第三個泉源，就是在我國已經有了新技術。斯達漢諾夫運動是與新技術有密切聯系的。如果我國沒有新技術，沒有新工廠，沒有新設備，那末我國也就不會有斯達漢諾

夫運動誕生出來。如果沒有新技術，那末至多也只能把技術定額提高到一兩倍。而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所以能把技術定額提高了五六倍，也就因為他們是完全完全倚靠於新技術的。由此可見，我國工業化，我國工廠底改造，新技術和新設備底具備，乃是使斯達漢諾夫運動產生出來的原因之一。

(±) 可是，單靠新技術是走不多遠的。儘管你有頭等技術，頭等工廠，但如果你沒有一些能夠駕馭這技術的人材，那末你的這些技術也始終不過是一些技術而已。為使新技術能夠發生效果，就一定還要有能夠指揮和推進這種技術的人材，男工女工的幹部。斯達漢諾夫運動底產生和增長，也就是表明在我國男工女工中間已產生了這樣的幹部。約在兩年以前，黨已經說過：我們雖然建成了新工廠，雖然給予了我們各企業新設備，但我們畢竟還只做到一半事情。黨在當時已經說過：除了努力建設新工廠的熱忱而外，還要有努力學會運用這些新工廠的熱忱，只有這樣，才可把事情進行到底。顯然的，在這兩年以來是進行了學會利用這新技術的工作，同時新幹部人材也相繼產生出來了。現在已經看得很清楚，我們是已經有了這樣的新幹部了。如果我們沒有這樣的幹部，如果我們沒有這樣的新人材，那我們當然也就不會有什麼斯達漢諾夫運動。所以，男工女工中間那些學會了利用新技術的新人材，乃是一個形成了和推進了斯達漢諾夫運動的因素。

這就是產生了和推進了斯達漢諾夫運動的種種條件。

(三) 新的人材和新的技術定額

我已經說過，斯達漢諾夫運動並不是逐漸發展起來，而是有如大水決堤一般，突然爆發式地發展起來的。顯然，這一個運動會須冲破某些堤防、有人妨礙過它，有人拘束過它，而這個斯達漢諾夫運動既經把精銳積蓄起來，就冲破這些堤防而汎濫於全國了。

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究竟是誰妨礙過它呢？

妨礙過它的，就是舊技術定額以及站在這些定額背後的那些人。幾年以前，我國工程技術人員和經濟工作人員，根據我國男工女工當時的技術落後性規定了相當的技術定額。自從那個時候起，已經過去幾年了。在這幾年中間，人材已經長進了，已經獲得技術素養了。而技術定額却仍舊沒有改變。當然，這些定額對於我國新材已經是陳舊不堪了。現在大家都在責罵這些現行技術定額。可是，這些定額並不是從天空裏掉下來的。而且這裏問題並不在於當時把這些技術定額規定得太低。問題首先是在這些技術定額已經陳舊的時候，還有人企圖把它們當作現代的定額保留下去。人們拚命把我國男工女工底技術落後性當作根據，專門指靠於這種落後性，把這種落後性當作出發點，以至於拿起這種落後性來耍把戲了。可是，如果這種落後性已經成了過去，那又怎樣辦呢？難道我們應當崇拜我們的落後性，把它奉為偶像，奉為神聖麼？如果男工女工已經長進了，已經獲得了技術素養，那又怎樣辦呢？如果舊技術定額已經是不合實際情形，而我國男工女工已在事實上超過它們五倍以至十倍了，那又怎樣辦呢？難道我們賭過咒，發過誓，說一定要盡忠於我們的落後性麼？同志們，我們彷彿沒有這樣幹過吧？（全場大笑）。難道我們會以指望我國男工女工永遠落後為出發點麼？我們好像是沒會以此為出發點吧？（全場大笑）。那末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難道我們沒有充分勇氣打破我們某些工程師技師底保守主義觀點，打破舊傳統和舊定額，而給予工人階級新興人材廣闊活動的場所麼？

有些人在那裏談論什麼科學。他們說：科學底原理，技術指南和技術規則底原理，是與斯達漢諾夫工作者要求新的更高技術定額的情形相矛盾的。可是，試問他們所說的究竟是那一種科學呢？科學底原理向來都是由實踐，由經驗來考驗的。如果科學和實踐斷絕了關係，和經驗斷絕了關係，

那它還算是什麼科學呢？如果科學就是像我們某些保守主義同志所形容的那樣的一種東西，那它對於人類豈不是早已沒有什麼作用了麼。科學所以叫做科學，正是因為它不承認偶像，不怕推翻過時舊物，却很仔細傾聽實踐經驗底呼聲。如果不然，那我們就會根本沒有什麼科學，譬如說，就會沒有什麼天文學，而直到如今都會信奉着那陳腐不堪的普托萊米地心說了；就會沒有什麼生物學，而直到如今都會迷信着上帝造人的神話了；就會沒有什麼化學，而直到如今都會相信着鍊金術士底預言了。

正因爲如此，所以我認爲，如果我們那些遠遠落到了斯達漢諾夫運動後面的工程技術人員和經濟工作人員翻然悔悟，不再去繼續抱守舊技術定額，而是認真來改變態度，用科學精神，用新的斯達漢諾夫的精神來改變態度，那就會很好了。

也許有人會對我們說：好吧，那末怎樣一般處置技術定額呢？技術定額究竟是工業所需要的呢，還是完全不要任何技術定額也可過得去呢？

有些人說：我們已不復需要任何技術定額了。同志們，這是不對的，而且是很愚蠢的。沒有技術定額，便無法進行計劃經濟。除此而外，其所以需要技術定額，是爲了督促落後羣衆來趕上先進份子。技術定額是一種巨大的調節力量，它能在生產中把廣泛工人羣衆組織在工人階級先進份子周圍。所以，我們需要有技術定額，但我們所需要的不是現行的定額，而是較高的定額。

另外有些人說：技術定額是需要的，可是現在就必須把它提高到斯達漢諾夫、布塞根、兩位維諾格拉多娃及其他等人所已經達到的高度。這也是不對的。這樣一種定額在目前這個時候是不實際的，因爲那些比斯達漢諾夫和布塞根等人底技術素養低些的男工和女工，就會不能完成這一種定額。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技術定額，應當是一個介乎現行技術定額與斯達漢諾夫和布塞根等人所達到

的標準間的定額。例如就拿瑪利亞、德姆青科來說吧。大家知道，她是在糖蘿蔔種植業方面從每一海克脫面積上收穫五百公担的突擊隊員。她達到了從每一海克脫面積上收穫五百公担和五百公担以上糖蘿蔔的成績。譬如說，是不是可以把這個成績當作烏克蘭全部糖蘿蔔種植業底收成定額呢？當然是不可以的。此刻還談不到這一點。瑪利亞、德姆青科從一海克脫面積上收穫了五百公担以及五百公担以上的糖蘿蔔，而今年每一海克脫面積平均收成率，例如在烏克蘭，却只等於一百三十公担到一百三十二公担。可見，這裏的差別是不小的。可以把糖蘿蔔收成定額規定為每一海克脫出產四百公担或三百公担麼？所有的內行人都說，此刻還不可這樣做。很明顯的，在烏克蘭方面，一九三六年的收成定額，必須規定為每一海克脫出產二百至三百五十公担。而這個定額是不怎樣小的，因為我們完成這個定額，就能獲得比一九三五年多至兩倍的糖。工業也是如此。斯達漢諾夫大概已超過現行技術定額十倍，甚至於十倍以上。如果把他所達到的這種成績宣佈為全體汽鑽掘煤工人底新技術定額，那就不合理了。很明顯的，我們必須規定一個介乎現行技術定額和斯達漢諾夫同志所達到的標準間的定額。

但無論如何有一點總是很明顯的，就是現行技術定額已經不符實際情形了，這些定額已經落後而變成阻礙我國工業的東西了，所以為要不致阻礙我國工業，就必須用新的較高的技術定額來代替它們。既然有了新的人材，新的時期，也就應當有新的技術定額。

(四) 最近的任務

從發展斯達漢諾夫運動方面看來，我們最近的任務是什麼呢？我們為集中注意力起見，且把這件事情歸納為兩個最近任務。

第一。個任務就是要幫助斯達漢諾夫工作者去繼續擴展斯達漢諾夫運動，使它擴大和深入到蘇聯全國各省各區去。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要把經濟工作人員和工程技術人員中間所有一切死守成規，不願前進，一味阻礙斯達漢諾夫運動擴展的份子約束一下，爲要把斯達漢諾夫運動儘量推行到我國各地，單靠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本身，當然還是不夠的。還一定要我們各個黨組織參與這個事業，幫助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把運動進行到底。頓涅茨省黨組織在這一方面表現了不容置辯的巨大倡導作用。莫斯科省黨組織和列寧格勒省黨組織，在這一方面也工作得很好。其他各省的情形怎樣呢？其他各省大概是還在『準備動作』哩，例如，烏拉爾方面就好像是一點聲息也沒有，或者是很少聲息，同時大家都知道烏拉爾是一個很大的工業中心。在西北伯利亞和庫茲巴斯那裏也是如此，那裏的人大概也是還沒來得及『動作起來』哩。不過，我們各個黨組織無疑是一定會担任起這件事情，並幫助斯達漢諾夫工作者克服各種難關的。至於另一方面的事情，即是把經濟工作人員和工程技術人員中間的頑固保守份子約束一下的事情，却就比較複雜一些了。這裏首先就會要實行勸導，用同志態度來耐心勸導工業方面的這些保守份子，使他們相信斯達漢諾夫運動底進步性，使他們相信有用斯達漢諾夫精神改變態度的必要。如果勸導方法不能奏效，那就會要採取更堅決的辦法。例如拿鐵路人民委員部來說吧。不久以前，在這個人民委員部中央機關裏，有一些教授、工程師以及其他專家，其中也有共產黨員，硬說每小時十三至十四公里的貨車駛行速率已是一種界限，超出這個界限，便是甘願違背『營業學』了。這是頗有威信的一部份人，他們在口頭上和刊物上鼓吹自己的觀點，並向鐵路人民委員部所屬各機關發出種種訓令，而且他們根本就是鐵路營業人員中間的『思想權威』。我們雖不是鐵路事業專家，但我們根據鐵路事業方面許多實際工作人員底建議，也奉勸過這些有威信的教授們說：十三至十四公里的速率，決不能當作一種界限；在工作組織得當時，

是可以越出這個界限的。但他們不僅沒有來傾聽這種經驗和實踐底呼聲和改變態度，反而拚命反對鐵路事業方面的進步份子，更加緊宣傳那些保守主義觀點。當然，我們只好把這些受人尊敬的人物輕輕打擊了一下，並客客氣氣地請他們離開了鐵路人民委員會中央機關。（鼓掌）。結果怎樣呢？我們現有的貨車駛行速率已經是每小時十八至十九公里了。（鼓掌）。同志們，據我的意見，在我們國民經濟其他部門裏，如有絕對必要時，也須採取這種辦法，當然只有當那些頑固保守份子不停止其妨礙和阻撓斯達漢諾夫運動的行爲的時候才採取這種辦法。

第二個任務就是要幫助另外一種經濟工作人員、工程師和技師去改變他們的工作方法，使他們能領導斯達漢諾夫運動，這些人並不想阻礙斯達漢諾夫運動，他們是同情這個運動的，但他們還沒能改變他們的工作方法，還沒能領導這個運動。同志們，我應當說，這樣的經濟工作人員、工程師和技師在我國已是很不少了，只要我們切實來幫助這些同志，那他們在我國是一定會更其增加起來的。

我認爲如果我們把這些任務切實執行，那末斯達漢諾夫運動就會盡量開展起來，而普及於我國各省各區中去，給我們顯示出新成功的奇蹟來。

（五）兩句話

現在我關於這次會議，關於這次會議底意義，還要說幾句話。列寧教導說：只有不僅善於教導工農，而且還善於向工農學習的領導者，才能是真正布爾塞維克的領導者。在布爾塞維克中間竟有些人聽不慣列寧這幾句話。可是，歷史却向我們表明，列寧就在這一方面也是百分之百正確的。的確，千百萬勞動者，工人和農民，是在勞動着，生活着，奮鬥着。他們並不是白白生活着，他們生

活奮鬥時，當然也就積蓄着很豐富的實踐經驗，——這一點有誰能够懷疑呢？忽視這種實踐經驗的領導者，決不能算作真正的領導者，——這一點難道可以懷疑麼？所以，我們，黨和政府底領導者，不僅應當教導工人，而且還應當向工人學習。我當然不否認，你們這些參加本次會議的人，在這裏，在本次會議上，是從我們政府領導者方面學得了一些東西。可是，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認，我們政府領導者，也從你們方面，從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方面，從參加本次會議的人方面學得了許多東西。因此，實在感謝你們諸位同志，感謝教益，非常感謝！（熱烈鼓掌）。

最後，關於應如何標榜本次會議以誌紀念的問題，我還有兩句話要說。我們在主席團這裏已經商量過了，大家認為必須給這次會議——政府領導者與斯達漢諾夫運動領導者的會議——留下某種紀念。結果，我們就決定要從你們中間，薦舉一百個至一百二十個人去榮膺最高獎章。

座中一齊喊道：對呀。（熱烈鼓掌）。

斯大林說：同志們，既然你們贊成，那我們就來實行這樣辦吧。

（參加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會議的人全體向斯大林同志熱烈歡呼致敬。雷一般的鼓掌聲和雄壯的「烏啦」聲震動全場。從全場四面八方發出慶祝全黨領袖斯大林同志的無數歡呼聲音。最後，三千個參加會議的人一致高唱無產階級的國際歌）。

選自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一九四八年莫斯科版第六五三至六六九頁

蘇聯底內部狀況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日——

現在我們來說我國內部狀況。

從蘇聯內部狀況方面看來，報告時期是我國全部國民經濟更加高漲，我國文化更加發展，我國政治實力更加鞏固的時期。

在報告期內，國民經濟發展方面的最重要結果，便是工農業按現代新技術實行改造這一事業的完成。我國已經沒有，或幾乎已沒有什麼使用落後技術的舊工廠和使用古老農具的舊農戶了。現在構成我國工業和農業基礎的，是現代的新技術。可以毫無誇張地說：從生產技術方面看來，從工業底新技術裝備上看來，我國是比其他任何國家更爲先進的國家，因爲其他國家裏舊的裝備是懸在生產腳根上的累贅，阻礙着新技術的採用。

在報告期內，我國社會政治發展方面的最重要成績，便是剝削階級餘孽最終被消滅的事實，工農及知識份子團結爲一個總的勞動戰線，蘇維埃社會在道義上政治上一致性的鞏固，我國各族人民友誼的鞏固，而結果便是我國政治生活的完全民主化，新憲法的成立。誰也不敢否認，我們的憲法是世界上最民主的憲法，而蘇聯最高蘇維埃選舉和各盟員共和國最高蘇維埃選舉底結果，便是最明顯的例證。

結果便是我國內部狀況十分穩定，我國政權異常鞏固，使世界上任何一個政府都比不上它。

現在，我們就來看看關於我國經濟政治狀況的具體材料。

(一) 工業與農業更進一步的高漲

(甲) 工業。我國工業在報告期內的進展，是一幅蒸蒸直上高漲的情景。這個高漲不僅反映着一般出產量底增長，而且首先反映着一方面是社會主義工業底繁榮，另一方面是私有工業底滅亡。請看相當的統計表吧：

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八年間蘇聯工業增長情形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全部生產品	四二、〇三〇	五〇、四七七	六二、一三七	八〇、九二九	九〇、一六六	一〇〇、三七五
其 社會主義工業	四二、〇〇二	五〇、四四三	六二、一四	八〇、八九八	九〇、一三八	一〇〇、三四九
中 私有工業	二八	三四	二二	三一	二八	二六

與上年相較的百分比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全部生產品	一二〇·一	一二三·一	一三〇·二	一一一·四	一一一·三
其 社會主義工業	一二〇·一	一二三·一	一三〇·二	一一一·四	一一一·三
中 私有工業	一二一·四	六七·六	一三四·八	九〇·三	九二·九

百分比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全部生產品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一〇	一一〇	一一〇
其 社會主義工業	九九·九三	九九·九三	九九·九六	九九·九六	九九·九七	九九·九七
中 私有工業	〇·〇七	〇·〇七	〇·〇四	〇·〇四	〇·〇三	〇·〇三

對一九三三年
的百分比

從這個表上可以看出，我國工業在報告期內增加了一倍以上，而且出產量底全部增長都是社會主義生產方面的增長。

其次，從這個表上可以看出，社會主義體系是蘇聯工業中的唯一體系。

最後，從這個表上可以看出，私有工業底最終滅亡，是瞎子也不能否認的事實了。

私有工業底滅亡，並不是偶然的。第一，其所以滅亡，是因為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高超於資本主義的體系。第二，其所以滅亡，是因為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給了我們可能在幾年內就以現代新技術為基礎來把我們全部社會主義工業改造過來了。這樣的可能性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所沒有產生，而且也是它所不能產生的。事實是如此：從生產底技術方面看來，從工業生產底新技術裝備上看來，我國工業已佔全世界第一位。

若把我國工業發展速度和戰前水準作一百分數的比較，並把這種速度與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發展速度比較一下，便可看見如下的情景：

蘇聯工業發展情形和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發展情形（一九一三至一九三八年）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蘇聯	一〇〇〇〇	三八〇・五	四五七・〇	五六二・六	七三二・七	八一六・四	九〇八・八
美國	一〇〇〇〇	一〇八・七	一一二・九	二二八・六	一四九・八	一五六・九	二二〇・〇
英國	一〇〇〇〇	八七・〇	九七・一	一〇四・〇	一一四・二	一二一・九	一一三・三
德國	一〇〇〇〇	七五・四	九〇・四	一〇五・九	一一八・一	一二九・三	一三一・六
法國	一〇〇〇〇	一〇七・〇	九九・〇	九四・〇	九八・〇	一〇一・〇	九三・二

從這個表上可以看出，我國工業與戰前水準相較，已增至九倍以上，而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底

工業却依然留在戰前水準周圍踏步不進，只超過戰前水準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

這就是說，就發展速度來說，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已佔全世界第一位。

由此可見，就生產技術和我國工業發展速度來說，我們已經趕上並且超過了各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

我們究竟在那一方面還落後呢？我們是在經濟方面，即在我們工業按人口平均計算的出產額方面仍然落後。我們在一九三八年出產了約近一千五百萬噸生鐵，而英國在一九三八年則只出產了七百萬噸。驟然看來，好像我們在這方面的情形要比英國好些。可是，若把這些噸數的生鐵拿來按人口平均分配一下，便可知道：在一九三八年，英國每人可以分得一百四十五個基羅格蘭姆的生鐵，而蘇聯每人只能分得八十七個基羅格蘭姆。又如：英國在一九三八年出產了一千零八十八萬噸的鋼和二百九十萬萬左右瓩時的電力（電力產量），而蘇聯出產了一千八百萬噸的鋼和三百九十萬萬多瓩時的電力。驟然看來，好像我們在這方面的情形要比英國好些。可是，若把這些噸數和瓩時拿來按人口平均分配一下，便可知道：在一九三八年，英國每人可以分得二百二十六個基羅格蘭姆的鋼和六百二十瓩時的電力，而蘇聯每人只能分得一百零七個基羅格蘭姆的鋼和二百三十三瓩時的電力。

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就是因為我國人口比英國人口多幾倍，所以需要額也比英國多：蘇聯有一萬萬七千萬人口，而英國不過四千六百萬。在考察一國工業底經濟實力時，不要單看一般工業出產量，不顧及國內人口多少，而是要注意到工業出產量與國內每人消費額間的對比情形。一個國家按人口平均分配時落到每人份上的工業出產品愈多，這個國家底經濟實力也愈高，反過來說，一個國家按人口平均分配時落到每人份上的工業出產品愈少，這個國家和它的工業底經濟實力也愈低。所以，某一國家人口愈多，那末這個國家對於消費品的需要額也愈大，於是這個國家底工業出產

量也應當愈大。

例如拿生鐵出產來說吧。爲要在生鐵出產方面，在經濟上超過英國（它的生鐵出產額在一九三八年是七百萬噸），那我們就要把我國每年生鐵冶煉量提高到二千五百萬噸。爲要在經濟上超過德國（它的生鐵出產額在一九三八年總共是一千八百萬噸），那我們就要把我國每年生鐵冶煉量提高到四千萬至四千五百萬噸。爲要在經濟上超過美國（此地不是拿危機年度的一九三八年水準來說，當時美國只出產有一千八百八十萬噸生鐵；而是拿一九二九年度水準來說，當時美國有過工業高漲，出產有四千三百萬噸左右的生鐵），那我們就要把我國每年生鐵冶煉量提高到五千萬至六千萬噸。關於鋼和生鐵底生產，關於機器製造業等等，也要這樣說，因爲所有這些工業部門，也如其餘各部門一樣，歸根結底是依生鐵出產爲轉移的。

我們在生產技術和工業發展速度方面已超過了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這當然很好。但是這還不夠。必須在經濟方面也超過它們。我們能够做到這一步，而且我們應當做到這一步。只有當我們在經濟上也超過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時，我們才可希望我國有完全充足的消費品，有豐富的食品，那時我們就有可能實行從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過渡到共產主義第二階段。

爲要在經濟上超過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就需要有什麼呢？爲了這件事，首先就要有嚴重而堅決的前進志願，要有不惜坦受犧牲的決心，不惜拿出巨量建設基金來極力擴大我國社會主義工業的決心。我們有這種條件麼？當然有！其次，爲了這件事，就需要有高度的生產技術和高度的工業發展速度。我們有這種條件麼？當然有！最後，爲了這件事，就需要有時間。是的，同志們，要有時間。必須建築新工廠。必須給工業造就新幹部。可是，爲了這件事，就需要有時間，而且是需要有不少的時間。在兩三年以內，是不能在經濟上超過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爲了這件事，是需要有

更多時間的。例如又拿生鐵及其出產來說吧。在生鐵出產方面，我們要有多少時間才可在經濟上超過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呢？在起草第二個五年計劃時，國家計劃委員會舊成份中的某些工作人員，提議把第二個五年計劃終結時的生鐵出產額，規定為六千萬噸。這就是說，他們認為生鐵冶煉額每年平均增加率，可能達到一千萬噸。這當然是一種幻想，甚至比幻想更壞。而且這些同志不僅是在生鐵出產方面沉於幻想。例如，他們認為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內，蘇聯人口每年增加率應當是三四百萬，或且更多。這也是一種幻想，甚至比幻想更壞。可是，如果撇開幻想家而站在現實基地上來觀察問題，那末我們根據現時的冶煉技術狀況，便可以把生鐵冶煉額每年平均增加率，規定為二百萬至二百五十萬噸，作為完全可能的增加率。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史以及我國工業史都告訴我們，這樣的每年增加率雖很緊張，但却是完全可能達到的。

所以，要有時間，而且要有不少的時間，才可在經濟上超過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我國勞動生產率愈高，我們生產技術愈完善，我們也就能愈迅速實現這個最重要的經濟任務，也就能更大大縮短實現這個任務的期限。

(乙) 農業。在報告期內，農業也和工業一樣是按高漲路線發展了，這一高漲不僅表現於農產品出產量底增加，而且首先表現於一方面是社會主義農業底增長和鞏固，另一方面是個體農民經濟底滅亡。集體農莊底穀物播種面積在一九三三年是七千五百萬海克脫，而在一九三八年則已增加到九千二百萬海克脫；同時個體農民底穀物播種面積從一千五百七十萬海克脫縮減到六十萬海克脫，即縮減到全部穀物播種面積千分之六。我還不去說技術作物播種面積，在這方面，個體農民經濟底作用已等於零了。此外，大家知道，現時已加入集體農莊的共有一千八百八十萬農戶，即佔全農戶總數百分之九十三點五，而集體漁場及其他集體營業場還沒有包括在內。

景：

這就是說，集體農莊已最終地確立和鞏固，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已成為我國農業底唯一形式。若把報告期內各種農作物播種面積增加情形、和革命前播種面積比較一下，就可看見如下的情形：

蘇聯全國所有各種農作物播種面積（單位百萬海克脫）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八年與一九一三年對比 (以百分數計算)
播種面積總數	一〇五·〇	一三一·五	一三三·八	一三三·八	一三五·三	一三六·九	一三〇·四
穀物的	九四·四	一〇四·七	一〇三·四	一〇二·四	一〇四·四	一〇二·四	一〇八·五
其中技術作物的	四·五	一〇·七	一〇·六	一〇·八	一一·二	一一·〇	二四四·四
中 菜蔬瓜類的	三·八	八·八	九·九	九·八	九·〇	九·四	二四七·四
飼料的	二·一	七·一	八·六	一〇·六	一〇·六	一四·一	六七一·四

從這個表上可以看出，我國所有一切農作物播種面積都增加了，尤其是飼料，技術作物和菜蔬類的播種面積增加了。

這就是說，我國農業已成為更完善，更富於出產能力的農業，而正確輪種制的採用已有更實際的基礎。

我國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所有的拖拉機、康拜因機及其他各種機器數量在報告期內增加情形怎樣呢，——以下的統計表便可回答這個問題：

(1) 蘇聯農業中拖拉機數目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1938年與 1933年對 比(以百分 數計算)
(甲) 拖拉機總數	210.9	276.4	360.3	422.7	454.5	483.5	229.3
其中：							
(甲) 農業機器站中的	122.2	177.3	254.7	328.5	365.8	394.0	319.8
(乙) 蘇維埃農莊和輔 助農場中的	83.2	95.5	102.1	88.5	84.5	87.0	102.2

(甲) 拖拉機數量 (單位:千輛)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1938年與 1933年對 比(以百分 數計算)
全部拖拉機曳引力量	3,209.2	4,462.8	6,184.0	7,672.4	8,385.0	9,256.2	288.4
其中：							
(甲) 農業機器站中的	1,758.1	2,573.9	4,281.6	5,856.0	6,679.2	7,437.0	423.0
(乙) 蘇維埃農莊和輔 助農場中的	1,401.7	1,669.5	1,861.4	1,530.7	1,647.5	1,751.8	125.0

(乙) 曳引力量 (單位:千馬力)

(2) 蘇聯農業中康拜因機及其他機器數目

(單位:千架; 以年度為標準)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1938年與 1933年對 比(以百分 數計算)
康拜因機	25.4	32.3	50.3	57.8	128.8	153.5	604.3
內燃發動機和蒸汽發 動機	48.0	60.9	63.1	72.4	77.9	83.8	174.6
複式和半複式的打穀 機	120.3	121.9	120.1	123.7	126.1	130.5	108.7
載重汽車	26.6	40.3	63.7	56.2	144.5	155.8	736.1
輕便汽車(單位:輛)	3,991	5,533	7,555	7,630	8,156	8,594	240.4

除這些數目字而外，如果還注意到在報告期內，我國農業機器站總數從一九三四年的二千九百處增加到一九三八年的六千三百五十處的事實，那末根據這些數目字，便可確信地說，我國農業以現代新技術為基礎的改造，基本上已經完成了。

於是，我國農業與任何一國農業相較，不僅是規模最大和機械化程度最高，即商品產額最大的農業，而且是現代技術裝備最充足的農業。

若把報告期內穀物和技術作物出產量增長情形，和革命前時期比較一下，就可看見如下的情景：

蘇聯全國穀物和技術作物出產總量（單位百萬公担）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八年與一九一三年對比 (以百分數計算)
穀物	八〇一〇	八四九〇	九〇一〇	八二七三一	二〇二〇九	九四九〇九	一一八・六
棉花(生棉)	七・四	一一・八	一七・二	二三・九	二五・八	二六・九	三六三・五
亞麻(纖維)	三・三	五・三	五・五	五・八	五・七	五・四六	一六五・五
糖 蘿 蔔	一〇九・〇	一一三・六	一六二・一	一六八・三	二一八・六	一六六・八	一五三・〇
油類植物	二一・五	三六・九	四二・七	四二・三	五一・一	四六・六	二一六・七

從這個表上可以看出，雖然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八年在東部各區和東南各區有過旱災，雖然一九一三年有過空前豐裕的收成，可是我國穀物和技術作物在報告期內每年出產總量，比之一九一三年水準，還是不斷地向上增長了。

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穀物生產中的商品額問題，是值得特別注意的。據著名統計學家聶蒙啓諾夫同志計算，在戰前時期，從五十萬萬普特的穀物出產總量中拿到市場上出賣的穀物，不過一

十三萬萬普特左右，即佔當時穀物出產總量百分之二十六。同時，據聶蒙啓諾夫同志計算，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這種大規模生產中的商品額，例如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度，約佔出產總量百分之四十七，而個體農民經濟中的商品額約佔百分之十二。如果更謹慎地觀察這個問題，把一九三八年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生產中的商品額算作出產總量百分之四十，那末結果就是這樣：我國社會主義穀物業能夠供給，而且在本年度內確實供給了二十三萬萬普特左右的商品穀物，即比戰前穀物生產中的商品額多過十萬萬普特。

所以，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生產中的高度商品額，是它的最重要的特點，對於國家供給有莫大的意義。

正因為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有這個特點，所以我國能很容易而迅速地解決了穀物問題，解決了為我們這個龐大國家充分供給商品穀物的問題。

應當指出，在最近三年以來，我國每年採辦的穀物數量始終沒有降到十六萬萬普特以下，有時候，例如在一九三七年間，甚至增加到十八萬萬普特。如果更加上國家每年所收買的二萬萬普特左右的穀物，以及集體農民經過集體農莊貿易路線所賣出的數萬萬普特穀物，那末我們便可得出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所提供的上述商品穀物總數。

其次，還要指出，最近三年以來，商品穀物底根據地已從一向號稱我國穀倉的烏克蘭移到了北部和東部，即是移到了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大家知道，最近兩三年以來，烏克蘭每年採辦的穀物將近四萬萬普特，而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每年採辦的商品穀物等於十一萬萬至十二萬萬普特。

這就是穀物出產方面的情形。

至於養畜業，那末在這個最落後的農業部門中，最近幾年來也表現出重大的進展。固然在養馬業和畜羊業方面，我們還落後於革命前的水準，可是在養牛業和養豬業方面，我們已超過了革命前的水準。

下面便是這方面的統計：

蘇聯全國所有牲畜數目（單位百萬頭）

以每年七月為標準

	1916年（按調查結果）					1938年與1916年（按調查結果）對比（以百分數計算）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馬	358	166	157	159	166	167	175	48.9				105.4
牛	60.6	38.4	42.4	49.2	56.7	57.0	63.2	104.3				164.6
騾羊和山羊	121.2	60.2	61.9	61.1	73.7	81.3	102.5	84.6				204.2
豬	20.9	12.1	17.4	22.5	30.5	22.8	30.6	146.4				252.9

養馬業和畜羊業部門的落後情形，顯然是在最短期間就會消滅的。

（丙）商品流轉與運輸業。隨着工業和農業的高漲，我國商品流轉額也增長了。在報告期內，國營商業與合作社商業底零售額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國營商業與合作社商業底零售額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七十八。集體農莊市集貿易額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一十二。

下面便是相當的統計：

商 品 流 轉 額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1938年與 1933年對 比(以百分 數計算)
①國營商業與合作社商業零售額(商店與貨舖)——以年底為標準	285,355	286,236	298,713	289,473	327,361	356,930	125.1
②國營商業與合作社商業零售額(包括公共飲食在內)——單位百處盧布	49,789.2	61,814.7	81,712.1	107,700.9	125,943.2	138,574.3	278.3
③集體農莊市集貿易額——單位百處盧布	11,560.0	14,000.0	14,500.0	15,607.2	17,799.1	24,399.2	212.2
④食品工業、輕工業、重工業、木材業等人民委員會及各盟人民委員會地方工業人民委員會所設各貨品批發處——以年底為標準	718	836	1,141	1,738	1,912	1,994	277.7

我國商品流轉額，假如沒有運輸業轉運額底相當增加，當然是不會這樣擴展起來的。的確，在報告期內，所有各種運輸業方面的轉運額都增加了，特別是鐵路運輸業和航空運輸業方面的轉運額增加了。水上運輸業方面的轉運額也有增加，不過增加得很不平整，而一九三八年水上運輸業方面的轉運額，可惜還比上年減低了一些。

下面便是相當的統計：

轉運額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1938年與1933年對比(以百分數計算)
鐵道運輸(單位十萬噸哩)	169.5	205.7	258.1	323.4	354.8	369.1	217.7
內河與海洋運輸(單位十萬噸哩)	50.2	56.5	68.3	72.3	70.1	66.0	131.5
民用航空運輸(單位十萬噸哩)	3.1	6.4	9.8	21.9	24.9	31.7	1,022.6

一九三八年水上運輸業稍許落後的情形，顯然是在一九三九年就會消滅的。

(二) 人民物質狀況和文化狀況更進一步的提高

工業和農業的繼續高漲，當然不能不引起，而且真正引起了人民物質狀況和文化狀況更進一步的改善。

剝削制的消滅，社會主義體系在國民經濟中的鞏固，失業現象以及與其相連的城鄉貧困情形的絕跡，工業大規模的擴展，工人數量的不斷的增加，工人和集體農莊莊員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土地永遠留歸集體農莊使用，集體農莊獲得巨量頭等拖拉機和農業機器的供給，——一切都造成了工農物質狀況更進一步提高的實際條件。工農物質狀況的改善，自然又使構成我國重大力量而為工農利益服務的知識份子底物質狀況改善起來。

現在，問題已經不是要怎樣想點辦法，發點慈悲心，為那些拚命逃出農村，忍飢受餓，無工可作，無家可歸的農民在工業中找點工做了。這樣的農民在我國早已沒有了。這當然是很好的，因為這是我國農村生活豐裕的明證。現在的問題只能是勸集體農莊尊重我們的請求，每年供給我們至少一百五十萬左右的青年莊員，來滿足我們工業發展方面的需要。過着豐裕生活的集體農莊莊員應當

知道，如果沒有他們方面的這樣幫助，便很難繼續擴展我們的工業，如果工業不擴展，我們便不能滿足農民對於日常消費品的日益增長的需求。集體農莊完全能夠滿足我們的這種請求，因為集體農莊有豐富的技術，能解放農村中一部份人的工作，這些人一移轉到工業中來，就能給我們全部國民經濟莫大的幫助。

總結起來，在報告期內，我們在改善工農物質狀況方面便有如下的成績：

(1) 國民收入在一九三三年等於四百八十五萬萬盧布，而在一九三八年則已增加到一千零五十萬萬盧布；

(2) 工人和職員數目在一九三三年是二千二百餘萬人，而在一九三八年則已增加到二千八百萬人；

(3) 工人和職員全年工資基金已由三百四十九萬五千三百萬盧布，增加到九百六十四萬二千五百萬盧布；

(4) 工業工人每年平均工資在一九三三年是一千五百一十三個盧布，而在一九三八年則已增加到三千四百四十七個盧布；

(5) 集體農莊底貨幣收入在一九三三年是五十六萬六千一百九十萬盧布，而在一九三七年則已增加到一百四十一萬八千零十萬盧布；

(6) 穀物區內每年平均發給每個集體農戶的穀物在一九三三年是六十一個普特，而在一九三七年則已增加到一百四十四個普特，並且種子和保險種子存額，公共牲畜飼料存額，對於國家的穀物交納，對於農業機器站工作的實物報酬等，尚不計算在內；

(7) 國家按預算支出舉辦社會文化設施的款項，在一九三三年等於五十八萬三千九百九十萬

盧布，而在一九三八年則已增加到三百五十二萬零二百五十萬盧布。

同時，人民底文化狀況也隨人民底物質狀況提高而提高了。

從人民底文化發展方面看來，報告時期真正是文化革命底時期。普通初級義務教育制用蘇聯各民族語言的實現，各級學校與學生數目的增加，畢業於高級學校的專門家數目的增加，新的蘇維埃的知識界的養成和鞏固，——這就是人民文化程度高漲底一般情景。

下面便是相當的統計：

(1) 人民文化水準增高的情形

指 標	計算單位		1938-1939年度與1933-1934年度對比(以百分數計算)	
	1933-1934年度	1938-1939年度		
各級學校學生總數	單位千人	23,814	33,965.4	142.6
其中：				
(甲)受初等教育者	單位千人	17,873.5	21,288.4	119.1
(乙)受中等普通教育和中等專門教育者	同上	5,482.2	12,076.0	220.3
(丙)受高等教育者	同上	458.3	601.0	131.1
蘇聯所有的學習人數(包括一切學習方式)	同上	—	47,442.1	—
蘇聯圖書館數目	單位千所	40.3	70.0	173.7
其中藏書數目	單位百萬册	86.0	126.6	147.2
俱樂部式的機關數目	單位千所	61.1	95.6	156.5
戲院數目	單位一所	587	790	134.6
電影院(放映映小影片者除外)	單位一部	27,467	30,461	110.9
其中放映有聲片者	同上	458	15,202	增31倍
農村中電影機數目(放映映小影片者除外)	同上	17,470	18,091	108.7
其中放映有聲片者	同上	24	6,070	增278倍
報紙每年銷數	單位百萬份	4,984.6	7,092.4	142.3

(2) 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八年蘇聯新建學校數目

年份	城市及市鎮地方的學校數目		鄉村地方的學校數目		學校數目總計
	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三年	三二六	三,二六一	三,二六一	三,二六一	三,二六一
一九三四年	五七七	三,四八八	三,四八八	三,四八八	四,〇六五
一九三五年	五三三	二,八二九	二,八二九	二,八二九	三,三六二
一九三六年	一,五〇五	四,〇〇六	四,〇〇六	四,〇〇六	五,七一七
一九三七年	七三〇	一,三三三	一,三三三	一,三三三	二,〇五三
一九三八年	五八三	一,二四六	一,二四六	一,二四六	一,八二九
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八年總數	四,二五四	一六,三五三	一六,三五三	一六,三五三	二〇,六〇七

(3) 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八年間畢業於高級學校的年輕專家人數(單位一千)

年份	蘇聯全國每年畢業專家人數(軍事專家除外)	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八年間畢業於高級學校的年輕專家人數(單位一千)
一九三三年	三,四〇六	九七.六
一九三四年	六.一	一〇四.八
一九三五年	一.八	一二七.六
一九三六年	四.八	二七.〇
一九三七年	二.五	六.一
一九三八年	一〇.五	一〇.六
總計	一〇.九	二五.二

年份	(1) 工業和建築業工程師	(2) 運輸和郵電業工程師	(3) 農業機械化工程師, 農學家, 獸醫以及動物飼養家	(4) 經濟工作人員和律師	(5) 中學, 工人速成中學, 中等實業學校教員以及其他教育工作人員(包括藝術工作人員在內)	(6) 醫生, 藥劑師及體育工作人員	(7) 其他專家
一九三三年	六.一	一.八	四.八	二.五	一〇.五	四.六	四.三
一九三四年	一四.九	四.〇	六.三	二.五	七.九	二.五	一一.一
一九三五年	二九.六	七.六	八.八	五.〇	一一.五	七.五	一二.七
一九三六年	二九.二	六.六	一〇.四	六.四	一一.六	九.二	一四.二
一九三七年	二七.六	七.〇	一一.三	五.〇	三.一	九.九	九.九
一九三八年	一〇.六	二五.二	一〇.六	五.七	三五.七	一三.六	九.八

由於這一切大規模的文化工作的結果，在我國誕生和形成了人數衆多的新的蘇維埃的知識份子，他們都是從工人階級、農民和蘇維埃職員中間出身，與我國人民血肉相連，根本不知剝削制的羈軛爲何物，仇恨剝削者，並決計忠誠服務於蘇聯各族人民的。

我認爲，這個新的人民的社會主義的知識界之誕生，就是我國文化革所底最重要成果之一。

(三) 蘇維埃制度更進一步的鞏固

報告時期中最重要成果之一，就是我國內部狀況更進一步的穩固，蘇維埃制度更進一步的鞏固。

而且事實上也不能不是如此。社會主義體系在國民經濟一切部門中的確立，工業和農業的高漲，勞動者物質狀況的增進，民衆文化程度的提高，民衆政治積極性的增長，——所有這一切都是蘇維埃政權領導下實現的，結果也就不能不引起蘇維埃制度更進一步的鞏固。

現時蘇維埃社會與任何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不同的地方，就是在蘇維埃社會裏已沒有什麼彼此對抗敵視的階級了，剝削階級已被消滅了，而構成蘇維埃社會的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是在友愛合作基礎上生活和工作着。現在，資本主義社會正被工人和資本家間，農民和地主間不可調和的矛盾所撕裂着，使資本主義社會內部情況動搖不穩，而我們的免除了剝削制羈軛的蘇維埃社會，却根本沒有這種矛盾，沒有階級衝突，而表現爲一幅工人、農民以及知識份子友愛合作的圖畫。在這種共同性的基礎上，也就有蘇維埃社會在道義上政治上的一致，蘇聯各族人民友誼，蘇維埃愛國主義這樣的動力擴展了起來。在同一基礎上，又產生了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所通過的蘇聯憲法。以及我國最高機關選舉制完全民主化的事實。

至於我國最高機關底選舉，那就要指出它是構成我國內部狀況特徵的蘇維埃社會統一，以及蘇聯各族人民友誼關係光輝燦爛的表示。大家知道，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選舉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時，幾乎有九千萬個選舉人，即佔所有參加了選舉的人數百分之九十八點六，是投票擁護共產黨人和非黨份子聯盟的，而在一九三八年六月選舉各盟員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代表時，有九千二百萬個選舉人，即佔所有參加了選舉的人數百分之九十九點四，是投票擁護共產黨人和非黨份子聯盟的。

這就是蘇維埃制度堅強鞏固，蘇維埃政權力量源源不絕的基礎和根源。

這就是說，在戰爭一旦爆發時，我國軍隊底後方和前線，由於性質單純和內部統一的關係，一定會比其他任何一個國家更加強固，這是國外那些愛鬧軍事衝突者所應當牢牢記住的。

國外某些報界人物胡言亂語，硬說我們把間諜，兇手和暗害者，如託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雅基爾，屠哈切夫斯基，羅津果里茨，布哈林及其他暴徒從蘇維埃組織中清除出去，便『動搖了』蘇維埃制度，引起了『瓦解』。這種粗鄙的廢話是只應受到恥笑的。把蘇維埃組織中的暗害份子和敵人份子清除出去，這怎麼會能動搖和瓦解蘇維埃制度呢？託洛茨基份子和布哈林份子這一小夥間諜，兇手與暗害者，是在外國面前奴顏婢膝的賤人，是在每一個外國官老爺面前匍匐伏跪拜，甘願投奔到他那裏去担任間諜勤務的奴才，他們不懂得每一個擺脫了資本枷鎖的最平常蘇維埃公民，都比國外任何一個背着資本主義奴隸制枷鎖的大官顯宦高出萬萬，——這樣一個小得可憐的賣國奴匪幫，試問誰人需要呢，他們對於人民能有什麼價值呢，他們能『瓦解』什麼人呢？一九三七年，判決槍斃了屠哈切夫斯基，雅基爾，烏波列維奇及其他暴徒。隨後，我們就舉行了蘇聯最高蘇維埃底選舉。選舉中所有參加投票人數百分之九十八點六，是投票擁護蘇維埃政權的。一九三八年年初，判決槍斃了羅津果里茨，李可夫，布哈林及其他暴徒。隨後，我們就舉行了各盟員共和國最

高蘇維埃底選舉。選舉中所有參加投票人數百分之九十九點四，是投票擁護蘇維埃政權的。試問這裏有什麼『瓦解』的表現呢，爲什麼這個『瓦解』沒有在選舉結果中反映出來呢？

假如聽信外國這些胡說八道的人，那就可以得出結論說：如果我們讓間諜，兇手和暗害份子逍遙法網，任憑他們進行暗害勾當，行兇殺人和從事間諜活動，那末蘇維埃組織就會更堅強穩固得多了。（笑聲）。這些老爺們如此厚顏辯護間諜，兇手和暗害份子，豈不是把自己的黑幕暴露得太早了麼？

如果說，從蘇維埃組織中肅清間諜、兇手和暗害份子，必定會而且真正引起了這些組織更進一步的鞏固，豈不是較爲正確麼？

舉例說，哈桑湖事件豈不是證明從蘇維埃組織中肅清間諜和暗害份子，正是鞏固這些組織的最可靠的辦法麼？

★
★
★

黨在國內政策方面的任務是：

(1) 繼續加緊發展我國工業，繼續加緊提高勞動生產率，繼續加緊完善生產技術，使我們在生產技術和工業發展速度方面已經超過了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水準的蘇聯，能於最近將來十年至十五年間在經濟上也超過它們。

(2) 繼續加緊發展我國農業和養畜業，以求在最近將來三四年中把每年穀物產額提高到八千萬萬普特，把每個海克脫底平均收成率增加到十二至十三公担，把技術作物產額平均增加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把羊和豬的數目增加一倍，把牛的數目增加百分之四十，把馬的數目增加百分之三十。

(3) 繼續改善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底物質狀況和文化狀況。

(4) 始終一貫地實施我國社會主義憲法，澈底實現我國政治生活民主化，鞏固蘇維埃社會在道義上政治上的一致，工人、農民及知識份子間的友愛合作；極力鞏固蘇聯各族人民底友誼，發展和培植蘇維埃愛國主義。

(5) 不要忘記資本主義包圍存在的事實，而要時刻記住，外國偵探機關將繼續派遣間諜、兇手和暗害份子到我們國家裏來，必須記住這一點，並加強我國社會主義的偵探機關，有系統地幫助它粉碎和剷除人民公敵。

選自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一九四八年莫斯科版

『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第二段第七五—至七七五頁

在先進的男女收割機師會議上的演說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

同志們！首先讓我慶祝你們在收穫陣線上所達到的成績。你們的成績是不小的。全蘇聯平均計算，收割機收割的數量，在一年中增加了一倍，這不是很小的成績。我們國家裏精通技術的人還很少，所以這個成績更有特殊的意義。我們國家向來都是缺少精通技術的幹部，特別在農業方面。在全國範圍內，培養精通技術的幹部，這是非常巨大的事業。完成這個事業須要幾十年的時間。我們在比較短時期內達到了把昨天還是農民的子女培養為極好的男女收割機師，而且，他們的成績超過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標準，這就表示我們在培養技術幹部的專業上，是在飛速前進。同志們！你們這樣重大的勝利，是值得黨和政府的領導者來慶祝你們的。（鼓掌）

現在讓我來講到事情的實質。

在我們這裏常常有人這樣說，我們已經解決了糧食的問題。如果就我們目前所處的現在的時期來說，這當然是對的。今年我們收了五十五萬萬普特以上的糧食。這個數目，足夠供我國人民的吃食，並且，還可以貯蓄充分的糧食，以應付一切意外事變發生時的需要。當然，這在今年已經是不壞了。可是我們不能祇限於今天，我們應當想到明天，想到最近的將來。如果從明天看起來，那末我們所達到的成績，還是不能滿意的。在最近的將來，例如在二四年之後，我們需要多少糧食呢？我們

至少需七十到八千萬萬普特的糧食。同志們，你們看，事情是怎樣的。所以我們現在就必須採取適當的方法使糧食生產一年一年的增加起來，使我們能夠按時完成這個嚴重的任務。在過去時候，在革命前，我們國家糧食的生產約有四十到五十萬萬普特。這樣數量的糧食足夠與否，是另一個問題，無論怎樣，當時大家都認為是足夠了的，因為我們國家每年要輸出四萬萬到五萬萬普特的糧食。過去的情形就是這樣的，現時在蘇維埃條件之下，情形就不同了。我已經說過，我們從現在起就要準備在最近的時期，在三四年之後，達到生產七十到八千萬萬普特的糧食；以前是四十或五千萬萬普特，將來是七十或八千萬萬普特糧食。你們看，這裏的差別是不小的。

這個差別是怎樣產生的？我們國家的需要為什麼這樣增長起來？這是因為我們國家已經不是如過去時候，如革命前的國家一樣。

首先就是因為：在最近幾年來，我們的工業和城市比之舊時，至少增加了一倍、現在我們的城市和城市居民、工業和產業工人至少比舊時增加了一倍以上。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我們把好幾百萬勞動者從鄉村轉到了城市，變成了工人和職員；現在，他們同其餘的工人一塊推進我們的工業。這就是說，好幾百萬的勞動者以前在鄉村中生產糧食，現在他們不僅不生產糧食而且需要鄉村糧食的供給。而我們的城市還會增長起來，因此糧食需要也就會增加起來。

這就是糧食需要增長的第一個原因，

再則，舊時農產原料的生產比現在少些。現在我們棉花的生產比之舊時增加了一倍，至於麻和糖蘿蔔及其他等農產原料比之舊時增加得更多。結果怎樣呢？結果是種植原料的人就不能充分生產糧食。於是就必須有很多糧食來供給生產農產原料的人，使之能一天一天生產更多的農產原料，生產更多的棉花、麻、糖蘿蔔、葵花子等等。如果我們希望繼續發展我們的輕工業和食品工業，我們

就不得不一天一天增加農產原料的生產。

這就是糧食需要增長的第二個原因，

還有一點，我已經說過，舊時我們每年生產四十到五十萬萬普特的糧食，沙皇的閣員經常這樣說：『雖然我們自己吃不飽，可是糧食還是要輸出的。』到底什麼人吃不飽呢？當然不是沙皇的閣員們。吃不飽的人是兩千萬到三千萬的鄉村貧農，他們真是吃不飽，祇是爲了沙皇的閣員們能把糧食輸出到國外去，他們過着飢餓的生活，過去的時候，是這樣的。現在我們是處在完全另外一個時候，蘇維埃政府是不能讓人民吃不飽的，兩三年來，我們已經沒有貧農了，沒有失業工人了，吃不飽的現象已經消滅了，我們已經很穩固地走上了富裕生活的道路，請問這兩三千萬貧農那裏去了？他們加入了集體農莊，他們已經在那裏安居樂業地生活着，並很順利創造着富裕的生活。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我們現在比之舊時需要更多的糧食來供給勞動農民，因爲舊時的農民成了現時的集體農莊的莊員，他們在集體農莊中，應當有充分的糧食來建設自己富裕的生活。你們知道，他們已經有糧食，而且會有更多的糧食。

這就是我們國家對於糧食需要極大增長的第三個原因。

其次，現在大家都說，勞動羣衆底生活是大大改善了，日子更好過了，更快樂了。這當然是對的，但是這就使人口的增加比之舊時要快得多。死亡率減少了，蕃殖率增多了，人口的純粹增長數目很快地增加。這當然是很好的，我們是歡迎這個現象的。（滿場歡動）現在我們每年人口純粹增加數將近三百萬，這就是說，我們每年增加了整個芬蘭國一樣多的人口。（滿場大笑）既然這樣，我們就得出去養活一天多似一天的人口。

這是糧食需要增加的又一原因。

末了，還有一個原因。我在上面已經講過人口，講過人口對糧食需要的增長。然而人底給養不僅僅限於糧食，他們還需要肉和油。城市底發展和增多，農產原料底增加，人口一般的增加，富裕的生活，凡此種種都要使油和肉的需要增加起來。因此，必須有經營得很好的牲畜業，有很多大牲畜和小牲畜，使能滿足人民對於肉類日益增長的需要，這都是明顯的事情。然而沒有大批的糧食來飼養牲畜，就談不到牲畜業底發展，祇有日益發達和日益開展的農業，才能造成發展牲畜業的必須條件。

這就是我們國家裏對於糧食的需要大大增長起來的又一個原因。

同志們，這些就是根本改變了我們國家底面目，並在我們面前提出刻不容緩的任務，——要使最近將來糧食的生產每年達到七十萬萬至八十萬萬普特的原因。

我們能不能夠完成這個任務呢？

是的，是能夠完成的，對於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

要完成這個任務，需要什麼條件呢？

要完成這個任務，首先就須要使我國農業的主要經濟形式不是小農戶而是大農莊。為什麼正是須要大農莊呢？因為祇有大農莊才能採用新技術，祇有大農莊才能充分利用新的農學知識，祇有大農莊才能盡量和適當地應用肥料。在資本主義國家中，農業的主要形式乃是個體農民的小農戶，在那裏，創造大農莊的辦法不外使一小部份地主致富，而使大多數農民破產。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破產農民底土地照例轉到殷富的地主手裏去，而農民本人不願意餓死的話，就要到這些地主那裏去做傭工。我們認為這條道路是不正確的，使農民破產的道路，這種辦法是我們不能採用的，因此，我們走上了另外一條道路來組織農業方面的大農莊。我們所走的道路，就是把小農戶合併而成爲大

的集體農莊，這種農莊用集體的勞動來耕種土地，它們享有大農莊底一切優點和可能，這就是集體農莊底道路。現時，在我們國家內，集體農莊式的大農莊是不是我國農業底統治形式呢？是的，是統治的形式。在我們的國家裏現時加入集體農莊的大約有全體農民的百分之九十。因此集體農莊式的大農莊已經是我國農業的統治形式。

要完成上面所講的那個任務，第二就須要使集體農莊、使我們的大農莊有充分的便於耕種的土地，我們的集體農莊有沒有這種土地呢？是的，是有的。你們知道，所有皇朝的、地主的和富農的土地已經轉交給集體農莊。你們知道，這些土地已經撥歸集體農莊永遠使用。因此，集體農莊有充分的便於耕種的土地，以便盡量發展糧食底生產。

要完成上面所講的那個任務，第三就須要使集體農莊有充分的技術，拖拉機、農業機器、收割機，你們自己懂得，祇是採用手工是做不了很多事情的。因此，須要充足的技術，以便集體農莊能夠開展糧食底生產。集體農莊有沒有這種技術呢？是的，是有的。而且它們愈往前去，則此種技術也愈多。

要完成上面所講的那個任務，末了還須要使集體農莊有善於使用技術、精通技術並學會了駕駛技術的人材、幹部。集體農莊有沒有這種人材、這種幹部呢？是的，是有的。不錯，這種人材還不多，可是這種人材總算有了。出席這次會議的，是最好的男女收割機師，這個會議祇是集體農莊所有的男女收割機師這一枝軍隊的一部份，這次會議乃是集體農莊中已經出現這種幹部的明證。不錯，這種幹部還不多，同志們，我們主要的困難也就在這裏。可是，我們國家裏這種幹部，將不是與年俱增，與月俱增，而是與日俱增，與時俱增，這是無疑的。

因此，我們有一切必要的條件，以便在最近的將來使糧食底生產每年達到七十萬萬至八十萬萬

普特。

所以我認為，我上面所講的刻不容緩的任務，無條件的是完成得了的。

目前的主要點就是注重幹部，訓練幹部，幫助落後的人去學會技術，逐日培養出能够精通技術和推進技術發展的人材。同志們，目前主要點就在這裏。

應當對於新式收割機和收割機師特別注意。你們知道，在農業方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收穫，收穫是有時間性的，它不會等待。及時收穫，就贏了；收穫晚了，就輸了。新式收割機底意義，在於它幫助我們及時收穫糧食。同志們，這是很重大的事情。

然而新式收割機底意義並不以此爲限，它的意義還在於它使我們避免極大的損失。我們自己知道，用舊式的收割機來收穫，就要損失很多的糧食。先把麥子割下，再把麥子捆起來，又將它們堆在一起，然後送上打麥機，所有這些手續處處都受損失。大家都承認，用這種辦法來收穫，我們要損失收成的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新式收割機底偉大意義，在於它使這種損失減到極少的限度。這方面的專門家說，假定其他條件都相同，用舊式收割機來收穫比較用新式收割機來收穫，每一公畝要少十普特糧食。如果拿一萬萬公畝的田地來說，——大家都知道，我們要比一萬萬公畝多得多，那末用舊式收割機所遭受的損失爲十萬萬普特糧食。現在你們試一試用新式收割機來收穫這一萬萬公畝的糧食——當然要在新的收割機工作做得不壞的條件之下——，那末，你們就贏得整整十萬萬普特糧食。你們看，數目是不小的。

請看，新收割機和駕駛新收割機的人底作用怎樣偉大。

因此，我認爲在農業中應用新收割機，培植很多的男女收割機師的幹部，這是首要的任務。因此，我說完話的時候，我要表示一種願望，希望我們的男女收割機師人數不是與日俱增，而

是與時俱增，希望他們學會新收割機底技術並把這種技術教給自己的同志，結果成爲我國農業方面的真正勝利者。（長時間的大鼓掌，轉而歡呼，高呼『萬歲』。會場中有人高呼：『親愛的斯大林萬歲！』）

同志們，我還要說兩句話。我們在主席團裏已經細聲商議過，認爲應當保薦到會的人受最高的獎賞，給他們以獎章，因爲他們的工作做得好。同志們，我們最近幾天就要實行這件事情。（長時間的大鼓掌，高呼『萬歲』。會場中有人高呼：『斯大林同志，謝謝你！』）

在克里姆里宮招待高級 學校工作人員宴會上的演說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七日——

同志們！

請大家爲科學、爲科學的昌明、爲科學界人士們的健康來舉杯稱頌！

這裏所指的科學是不脫離民衆的，不遠離着民衆的，而準備爲民衆服務的，準備把一切科學的收穫交給民衆的，並且，不是被強制地而是自願地，情情願願地爲民衆謀利益的科學。（鼓掌）

這裏所指的科學是不讓舊的成名的領導者自滿地把科學束縛於科學僧侶的袈裟裏，束縛於科學壟斷者的甲殼裏；這裏所指的科學是懂得老的科學工作者和青年科學工作者結合的意義和力量，是自願的在我國青年面前打開所有科學的門戶，給他們達到科學最高峯的可能，並承認未來是屬於科學青年的。（鼓掌）

這裏所指的科學是從事科學的人們明瞭已規定出的科學傳統的力量與意義；善於爲科學的利益而利用這些傳統，同時却又不要做這些傳統的奴隸；這裏所指的科學是當舊的傳統、標準與規定成爲陳舊、變爲前進的阻礙時，有勇氣地、有決心地來破除這些傳統，同時要懂得創造新的傳統、新的標準與新的規定。（鼓掌）

科學在其發展中產生了不少英勇的人物、知道破壞舊的與創造新的，不管任何阻礙，不顧一

切。這樣的科學英雄，如加列里、達爾文等人，都是舉世公認的。我在這裏要舉出這樣的科學偉人中的一個，也是現代最偉大的人物。我所指的就是我們的導師，我們的教育者——列寧。（鼓掌）想一想一九一七年吧，根據俄國社會發展的科學分析，根據國際形勢的科學分析，列寧當時得出一個結論，即是說：唯一的生路是俄國社會主義的勝利。這個結論對於當時許多科學界的人們多少是出乎意外的。

普列哈諾夫是科學界的一個傑出人物，當時對列寧懷疑，說列寧『在睡夢中』。其他同樣出名的科學人物聲言『列寧發了瘋』，因此要把他藏匿到更遠的地方去。當時所有科學界人士們都狂吠亂叫，把列寧當作一個科學的破壞者來反對，但列寧不怕逆流反常而行，結果列寧勝利了。（鼓掌）這就是科學英雄們的模範，他們勇敢地進行反對陳舊了的科學的鬭爭，並為新的科學開闢一條道路。

也有這樣的情形，就是：並不是由舉世共知的科學界的人物來開闢科學與技術的新道路，而是科學上完全不出名的平常的人、實際工作者、事業創始者來開闢科學與技術的新道路。這裏和大家坐在一起的有斯達漢諾夫與巴潘寧同志，這是科學界裏不出名的人，沒有學位的、忠於自己事業的實際工作者。但是，誰不知道：斯達漢諾夫與斯達漢諾夫運動者在其工業部門的實際工作裏推翻了原來由科學與技術界有名人物所規定的陳舊標準，而重新規定出適應實際科學與技術要求的新標準呢？誰不知道，巴潘寧及其同事者在其實際工作中，在北極流動冰塊上，順便地、不特別費力地推翻了對北冰洋的陳舊觀念而規定了新的、適合於實際科學要求的概念呢？誰能否認：斯達漢諾夫與巴潘寧是科學發明者、是我們的先進科學界的人物呢？

可見科學上還有這樣的『奇蹟』。

我所說的是關於科學的。可是科學有各種各樣的。我所說的科學是稱爲先進的科學。

祝我們的先進科學的昌明！

祝先進科學的人們的健康！

祝列寧與列寧主義的健康！

祝斯達漢諾夫與斯達漢諾夫運動者的健康！

祝巴潘寧及其同事者的健康！（鼓掌）

選自斯大林譯集，第五卷一九三九年解放社版第三四九至三五頁

